

杭大人出版社

# 杭大軼事

第三集



杭州大学回忆丛书之一：【杭大轶事】第三集

杭州大学回忆丛书之一：【杭大轶事】第三集

# 杭大轶事

(第三集)

温时幸 主编

杭大人出版社

2023

杭州大学回忆丛书之一：【杭大轶事】第三集

## 图书编目数据

杭大轶事（第三集）/温时幸编。——美国西雅图：杭大人出版社，2023.6

（杭州大学回忆丛书 1）

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1-970152-38-8

I. 杭大轶事 II. 温时幸 III. 杭州大学回忆丛书 IV. 杭州大学——回忆录

## 杭大轶事

（第三集）

温时幸 主编

封面设计：吴延风

封面题词：任 平

封三题诗：施建基

封底印章：任 平

出版发行：杭大人出版社（Hangdaren Press）

地 址：2303 N 147<sup>th</sup> Street Unit B, Shoreline, WA 98133

网 址：<http://www.white-clouds.com/hdrp/>

电子信箱：[shixingwen@yahoo.com](mailto:shixingwen@yahoo.com)

出版日期：2023年6月15日

本书网址：<http://www.white-clouds.com/hdrp/hdys3.pdf>

开 本：小16K

字 数：25万5千余字

定 价：免费阅读

国际书号：ISBN 978-1-970152-38-8

# 【杭大轶事】

第三集 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排列）

毛宝钺（杭州大学中文系 84 级）

伊建新（杭州大学中文系 80 级）

郑良根（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温时幸（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杭州大学回忆丛书之一：【杭大轶事】第三集

## 《杭州大学回忆丛书》序

张美凤和史晋川向我推荐由杭大人出版社计划出版的《杭州大学回忆丛书》，目前已经出版的有《杭大轶事》和《杭大诗词》。细细阅读了这两部新作，我被文中的内容吸引住了，感动了，也说几句。

首先，我被同学们对母校杭州大学的深情怀念打动了。作者编者大多是 1977 年恢复高考以后那几年的大学生。大约四十年了，同学们对当年的青春生活记忆犹新，朴实无华，真情流露，感人肺腑，逾久弥香。实际上，那个时候各方面还在恢复和发展当中，教学条件和生活条件还比较艰苦。同学们在回忆文章和诗词里，记录了那个时候的求学经历；在相对简单的生活里，体现了勤奋、乐观、胸怀大志，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这些精神，不只是一个大学生要有的，也是人生必须有的。

其次，同学们的诗文回忆，也反映了历史的痕迹。很多同学都经历过那个特殊时代的严峻考验：高等教育遭受破坏，同学们面临青春荒芜的危险。高中阶段的同学，失去高考机会，当兵当工人，上山下乡当农民；年龄稍小一点的，可能在中学甚至小学阶段就实际上失去了读书学习的机会。幸好等来了重启高考，恢复了大学教育。你们被时代耽误过，而最后还是成了时代的幸运儿。有这些复杂和艰苦的经历，你们人生目标特别明确，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被教授们称为“空前绝后”的一代优秀学子。大多数成为改革开放新时代最倚重的人才，成为浙江省乃至全国各界发展的中坚力量。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我注意到，《杭大轶事》也梳理了杭州大学的源流，对于“求是育英”这个校训的来源和意义都有诠释。这些，对于人们了解杭州大学曾经有过的历史渊源、发展轨迹、和办学成果等，都是有意义的。杭州大学在 1958 成立挂牌，通过浙江师范学院

承继了求是育英的百年滋养，至 1998 年四校合并，经历了整整四十年，在新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杭大诗词》给了我一个惊喜。没想到同学们不只是学业各界的优秀人才，也很有才情和诗意，也是诗人词人。正如一句“时髦”的话说的，人生不止要学习和工作，还要有诗和远方。读同学们的诗，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尤其咏西溪，咏校园，每每把我也带回到自己过去的青春岁月。

我自己也是一辈子的杭大人。我从 1952 年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杭州大学工作。经历了从浙师院到杭大的全过程，经历了杭大在文化大革命十年间的停顿，经历了高考恢复以后杭大重新焕发青春的岁月，直至 1992 年离任，也是整整四十年。同学们说，“火红的青春年代”跟母校杭大紧紧联系在一起；我的青春，也是跟杭州大学连在一起的。

如今，我虽然已至耄耋之年，同学们对杭大的缅怀，对杭大的歌咏，我读来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

因此，乐为之序。

薛艳庄

原杭州大学校长  
2019 年 1 月 15 日

## 《杭大轶事》 第一版（集） 前言

才忆校园书声朗，不觉两鬓竞成霜。我们逝去的青春呢？

路上车马今胜昔，花前楼馆似而非。我们杭州大学的校门呢？

自 1958 年杭州大学正式挂牌，我们的母校像杭州西湖一样，一直是一颗全国闪亮的明珠。它文脉久远，历经曲折。到 1978 年，忽如一夜春风来，一年内两届特别的新生到来，杭大开始焕发第二春。先是省内唯一的重点大学，继而跻身全国 211 名校，一直名列省级大学的前茅。

我们杭大人曾经是幸运的，自豪的。我们等来了邓公力挽狂澜，为我们重新打开大学校门。从此，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人生发生重大转变，开启一个崭新的阶段。进入杭大也成为我们人生的一大荣耀。

然而，时至 1998 年 9 月，因高校合并，杭州大学被摘了牌子，变成西溪校区。从此，我们的杭州大学和我们的青春一样，只留在回忆里。我们杭大人何等遗憾！有人说，假如地处杭州的这所综合型大学发展至今，那将是何等格局！我们知道，历史没有假如。我们也无意去评说这场高校合并的是非功过。我们只是回顾我们的青春。

承百年渊源，杭州大学经历了四十年。我们这些杭大人，较早的从 1978 年入校算起，至今也是四十年。四十年啊！人生有几个四十年！历史一瞬间，人生已大半，而且是最重要的那一半！每当我们想起自己逝去的青春，就想起我们已经消失的母校。因为，母校就是我们的青春。

四十年过去，杭大人数以万计。如今，很多人已经是学界名人，商界大款，政界精英，或者桃李满天下的默默园丁，还有社会各界难以计数的名流名媛。或不倦深耕于家乡本土，或游刃有余于全国各地，或开枝散叶于五洲四海。不论身在何处，无分贫富贵贱，母校杭州大学，永远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杭大人”微信群是这个共同的精神家园里一个非常活跃的花坛。这里，人气旺、地域广、阅历深、感受强、主题明、才艺多。地不分南北东西，人不分男女，不分先进后学，我们共同拥有曾经的杭大。这个纽带凝聚着杭大人一起缅怀青春岁月，抒发杭大人的情怀。

“杭大人”微信群成了最活跃的杭大校友联谊会。建群一年来，日日高楼，昼夜无歇，散文佳作，诗词歌赋，书法画作等等接踵而至，精彩纷呈，目不暇给。有感于此，“杭大人”微信群发起人温时幸、金友元等，秉建群之初心，提议编辑出版《杭州大学回忆丛书》，将各位学友的名篇佳作汇编成册，既是记录我们的青春，也是对母校杭州大学的缅怀；既便于校友相互学习交流，亦或可流传于世！

本册《杭大轶事》即为丛书之一，是“杭大人”微信群校友们抒情忆旧的散文佳作选编。入选的文章内容、篇幅不拘，有洋洋洒洒的长篇巨制，也有短短的三言两语。凡校友回忆杭大旧事，兼收并蓄。“轶事”虽非正史，却是校友们真实的经历，有感而发，真情流露，读来饶有趣味，也充满了历史的痕迹。

比如高考，是在那个青春荒芜、怀才不遇的痛苦之后转折的关口，自然是充满着惊喜、奋斗、角逐、继而有所期待的焦虑和入榜的喜悦；

比如入校和学习，因人生开启了新的阶段，既充满了新鲜，更多是奋发立志，和刻苦求索；

比如生活、同学和校园，则在字里行间浸润着对当年青春的赞美，温馨校园里美好的回忆和对同学间友谊的怀念，也偶尔透露了年少时期的某些谬误，记录着成长的足迹；

比如师长，除了尊敬、缅怀和感恩，也往往记录着自己学业和事业的发展轨迹。

最后一部分荟萃，综合涉及多个方面。尤其推重其中有关杭州大学校史和学术成就地位的几篇重头资料，相信有助于读者对于母校的来龙去脉有个更全面的了解，以期求是育英，精神永存！

谈笑间，四十年。这样的抒情忆旧就不只是停留于过去的岁月，而是基于这些鲜活的回忆，透露着人生几十年之后的回望和

对过去的审视，亦或夹杂着理性的剖析。回忆就不仅仅是回忆，而是充满着对人生青春美好的赞扬，对人生道路真谛的思考，因而也可能作为对未来人的警示，启迪和参考。如此，则幸甚。

《杭大轶事》编委会  
郑良根执笔  
2018年12月19日

## 《杭大轶事》第二集出版说明

《杭大轶事》第一版于 2018 年 12 月 19 日，即“杭大人”微信群成立一周年之际，正式出版。问世后，《杭大轶事》先后被多所美国名牌大学图书馆收藏，如：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密歇根大学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印第安纳大学图书馆。此外，我还收到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的电子邮件：

“我在几天前推荐了这本书。然而，我们的图书收购馆员需要一段时间来弄清楚如何处理中文电子书捐赠，因为你们的这本电子书是我们想要收藏的第一本中文电子书。

我今天刚刚听说，他们将先在图书编目里添加链接，到时把这本电子书添加到开放存取（即，open access，免费阅读）电子书馆藏，以便今后在国会图书馆网上提供在线阅读服务。”

如今，读者可以通过美国国会图书馆下面这个链接，免费下载那本电子书：<https://www.loc.gov/item/2018372764/>

当初策划出版《杭大轶事》一书时，曾设想每年出一个增订版。那样的话，所有的回忆文章都会收录在最新的增订版中。后来在创办《杭大人》月刊时，也特地设立了“杭大轶事”栏目，为以后出版《杭大轶事》增订版提供素材。

然而，随着《杭大人》月刊收录的“杭大轶事”文章逐年增多，显而易见，按照原来的设想，《杭大轶事》一书会变得越来厚，长达几万页，甚至几十万页！那么厚的书，除了历史学家，其他人恐怕都会望而却步。而我们出版《杭大轶事》电子书，主要的目的就是广为传播，让人们记得曾经有过一所辉煌的杭州大学。

为了便于阅读，我们决定修改原定计划。每年或每两年出版一集新的《杭大轶事》，视稿件情况而定。

自《杭大轶事》第一版问世以来，至今已有 4 年。是时候出版《杭大轶事》第二集了。

《杭大轶事》第二集的稿件，均选自《杭大人》月刊 2019 年的 1 月号至 12 月号，共 12 期。依照第一版，分 8 个章节：高考、入校、学习、生活、师长、同学、校园、荟萃。第二集收录了 52 位校友的 92 篇回忆作品。

编辑对选自《杭大人》月刊的原稿进行了仔细的校订和修改。

在此出版之际，谨代表杭大人出版社，衷心地感谢《杭大人》月刊的各位编辑积极收集有关杭州大学的稿件！衷心地感谢各位杭大校友回忆有关杭大的亲身经历！

温时幸

2023 年 3 月 15 日

## 《杭大轶事》第三集出版说明

《杭大轶事》第三集的稿件，均选自《杭大人》月刊 2020 年的 1 月号至 12 月号，共 12 期。依照前 2 集，分 8 个章节：高考、入校、学习、生活、师长、同学、校园、荟萃。

第三集收录了 47 位校友的 57 篇回忆作品，共计 25 万 5 千余字。

编辑对选自《杭大人》月刊的原稿进行了仔细的校订和修改。

在此出版之际，谨代表杭大人出版社，衷心地感谢《杭大人》月刊的各位编辑积极收集有关杭州大学的稿件！衷心地感谢各位杭大校友回忆有关杭大的亲身经历！

温时幸

2023 年 6 月 1 日

## 目录

| 作者  | 标题             | 页码  |
|-----|----------------|-----|
| 薛艳庄 | 《杭州大学回忆丛书》序    | i   |
| 郑良根 | 《杭大轶事》第一版（集）前言 | iii |
| 温时幸 | 《杭大轶事》第二集出版说明  | Vii |
| 温时幸 | 《杭大轶事》第三集出版说明  | ix  |

### 第一章：高考

|     |             |    |
|-----|-------------|----|
| 魏子青 | 高考记忆        | 2  |
| 张广星 | 想起四十年前的那场高考 | 9  |
| 寿柏年 | 1977 高考杂忆   | 11 |
| 罗卫东 | 十四岁的高考      | 13 |
| 王旭烽 | 花絮翩翩四十年     | 15 |
| 陈建新 | 第二次高考       | 16 |

### 第二章：入校

|     |                 |    |
|-----|-----------------|----|
| 张广星 | 1980 年的《新生入学须知》 | 20 |
| 刘 燕 | 难忘的杭大入学第一天      | 24 |

### 第三章：学习

|     |               |    |
|-----|---------------|----|
| 计伟强 | 在姜亮夫先生门下当“学徒” | 27 |
| 张广星 | 毕业论文报告会论题目录单  | 34 |
| 熊恩生 | 丰富而紧张的学习安排    | 38 |

### 第四章：生活

|     |              |    |
|-----|--------------|----|
| 褚少英 | “爱情伞”        | 46 |
| 赵建中 | 我的老杭大，我的露天影院 | 47 |
| 范洪祥 | 我的大学寝室生活     | 50 |

|     |                |    |
|-----|----------------|----|
| 钱晓霞 | 四十年前的寝室“卧谈会”   | 53 |
| 王雅平 | 舞会             | 57 |
| 王雅平 | 寝室             | 61 |
| 全根先 | 洗澡秘史           | 64 |
| 熊恩生 | 多彩的课余生活        | 69 |
| 吴 磊 | 那年，我们一起去观潮     | 74 |
| 许丽虹 | 杭大第一届金融系女大学生日常 | 77 |

### 第五章：师长

|     |                      |     |
|-----|----------------------|-----|
| 罗卫东 | 纪念杭州大学老校长沈善洪先生       | 92  |
| 张梦新 | 忆恩师徐朔方先生             | 95  |
| 钱 炜 | 我在杭大外语系工作时           | 104 |
| 熊恩生 | 难忘的优秀师资队伍            | 106 |
| 钱茂伟 | 仓门问学记                | 111 |
| 张允若 | 我在杭州大学的教学生涯          | 120 |
| 吴 磊 | 葛藤老师和他的一堂英语课         | 126 |
| 汪林茂 | 杭大历史系资料室与我的治学道路      | 129 |
| 郑小明 | 在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的讲话      | 135 |
| 朱利中 | 纪念恩师戚文彬先生            | 136 |
| 郭伟强 | 小记恩师戚文彬先生对我人生处世的潜移默化 | 139 |
| 王 耕 | 缅怀导师戚文彬先生            | 145 |
| 骆红山 | 严师慈父戚伯伯              | 151 |

### 第六章：同学

|     |    |     |
|-----|----|-----|
| 褚建君 | 六哥 | 156 |
|-----|----|-----|

### 第七章：校园

|     |            |     |
|-----|------------|-----|
| 蒋 蕴 | 杭大的房子      | 158 |
| 汤 洵 | 一个老教授的“乡愁” | 160 |

|     |        |     |
|-----|--------|-----|
| 刘宪釗 | 十路车老线路 | 168 |
|-----|--------|-----|

### 第八章：荟萃

|     |                     |     |
|-----|---------------------|-----|
| 孙笑侠 | 校史钩沉：求是育英，中西合璧      | 174 |
| 许高渝 | 浙江省筹设杭州大学的三个历史文献概述  | 184 |
| 许高渝 | 杭州大学前身：浙江师范学院的组建和发展 | 189 |
| 蒋 遂 | 我心目中的之江大学           | 194 |
| 邹滢颖 | 杭州大学，我的母校           | 200 |
| 蒋 遂 | 叶落芳径：杭大新村的隐秘往事      | 212 |
| 包新旺 | 杭大新村：在吟咏声里，回一趟故园    | 246 |
| 潘慧惠 | 西溪河畔的芳华岁月           | 280 |
| 陈广胜 | 让我们回到金桂飘香的老杭大       | 290 |
| 伊建新 | 央视新闻“夜读”专题推介杭大老教授   | 292 |
| 周黔生 | 杭州大学求学记             | 294 |
| 张涌泉 | 梦想生处 —— 杭州大学中文系求学追忆 | 312 |
| 陈欣文 | 杭大杂忆                | 316 |
| 杜文庆 | 我的大学，我的芳华           | 322 |
| 朱 晶 | 东学西渐 —— 我的大学        | 326 |
| 熊恩生 | 众多的思想政治教育           | 328 |
| 叶 靖 | 可爱的同学 可爱的老师         | 332 |
| 罗卫东 | 我的大学岁月              | 337 |
| 沈加红 | 两枚钉子                | 379 |
| 黄国宏 | 杭大芳华                | 386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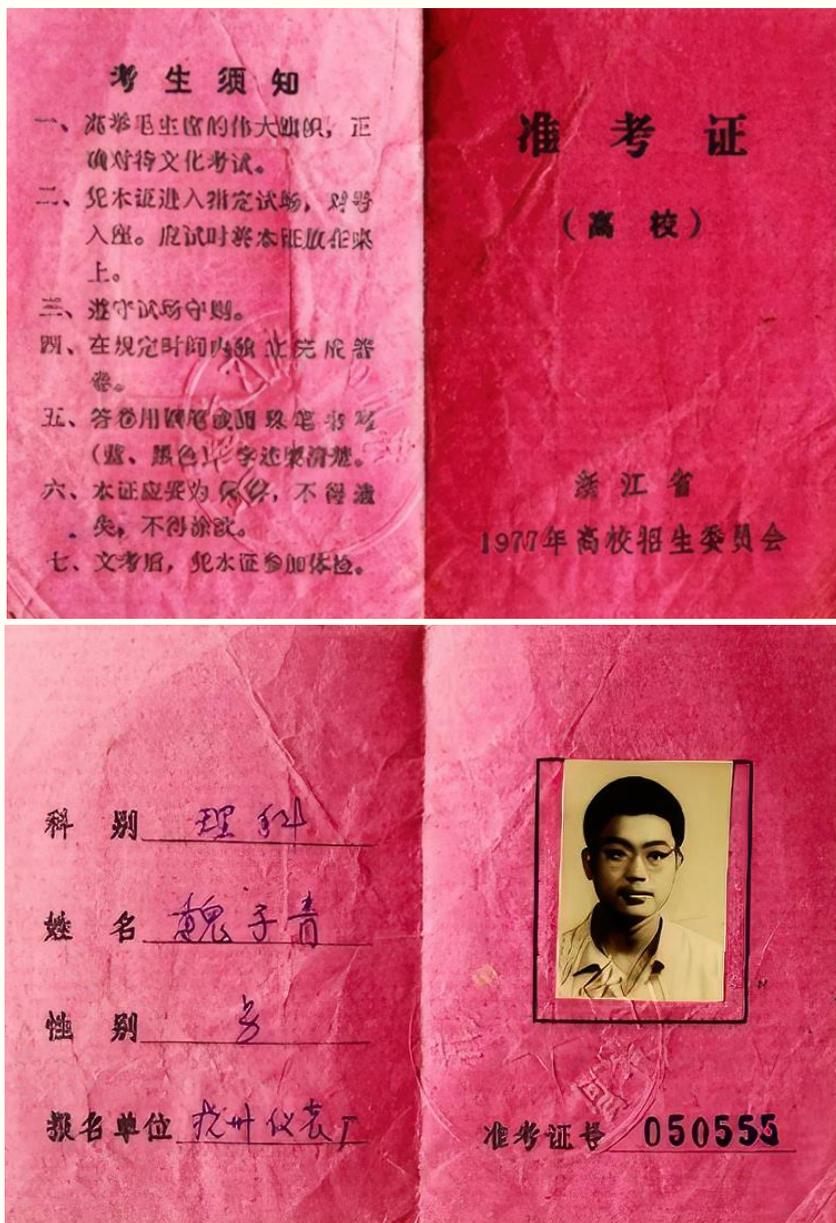
杭州大学回忆丛书之一：【杭大轶事】第三集

# 第一章：高考

## 高考记忆

——杭州大学物理系77级 魏子青

日前整理旧物，翻到了两张准考证，勾起了我对当年高考的回忆。



1977年文革后恢复高考，其历史进程和伟大意义已经有很多的文章描述过了，这里不再赘述。我只从个人角度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

1972年我高中毕业，很幸运分配到仪表厂当上了一名工人。那时候，当工人可能是除了当兵以外最好的出路了。所谓“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人的政治地位是非常高的。相比当时的其它分配去向，如插队、支边、兵团农场，能留在城里工作是多少人梦寐以求而不得的。当然了，我作为老大留城后，妹妹就必须下乡了。当时家里考虑是，先留一个算一个；妹妹还在读高中，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父母虽然是知识分子，但因经历了历次运动，特别是文革，“臭老九”的日子并不好过。再加上大学当时也只有少量的“工农兵大学生”，所以对我们子女也没有上大学的特别要求，似乎能一辈子做个工人也不错。当然啦，身边还是有很少几个高中同学一心想上大学的。虽然工农兵大学生质量饱受争议，但这个推荐到的机会是很小的，要看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等等。

尽管没有动过上大学的念头，但我当时还是比较喜欢看书学习的。除了自己喜欢的文学类书籍，也会去找一些数理化方面的书自学。我们作为文革后的第一批高中毕业生，其实并没有学到很系统的文化知识。曾经邓小平复出的一小段时期，学校恢复了正常的文化学习。但随着邓的二次靠边，文化课再次让位于政治挂帅，只是短暂地学了一些数理化课程。

一位同班同学分配在电厂，他有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在自学准备，想上大学。我也陆陆续续向他借过几本来自学，觉得尚能看懂，就有点兴趣。书还附有习题和答案，在当时是一套很金贵的自学教科书。另外，我也会到父母工作的大学图书馆借一些书来看。记得曾经借到过一本中专的《气象学》教材。以前广播电台气象节目中播报的一些术语如：冷锋，暖锋，锋面，切变线等等，学完后就能听懂了。至今还记得书里面有一个“拉普拉斯压高公式”，用气压来推断海拔高度的。我也曾经借过一本工农兵学员的微积分教材，看了一点看不下去了，就放弃了。

那个时候学习，除了工作上需要学的专业技术知识，没有什么很强的目的性，就是觉得多学一点知识总是好的。那个时代也没有什么书，反正是拿到什么就看什么，科学、文哲史、政治、艺术类的都喜欢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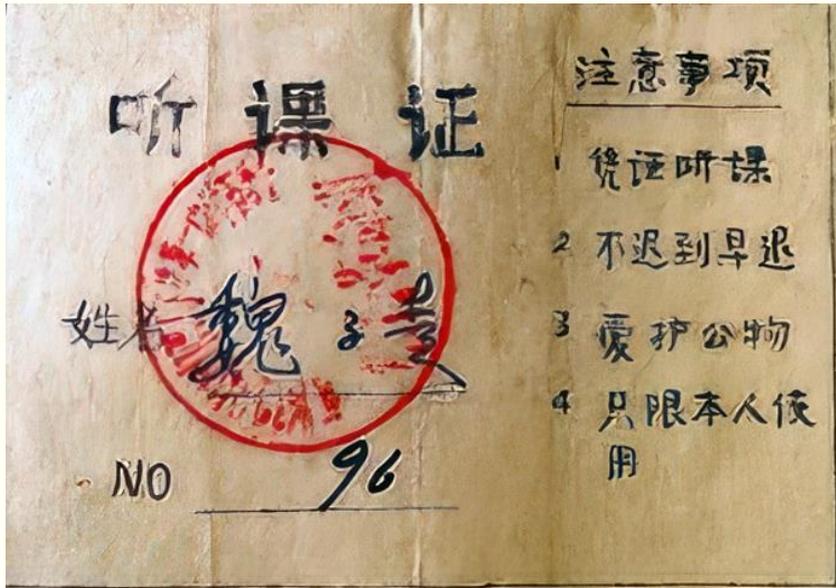
我们厂里有一批所谓的“末代大学生”，实际上是指 66、67、68 届大学生。因为文革原因，一直到 68 年才分配工作。当时的中央文件指出：“毕业生分配工作，必须彻底打破大专院校毕业生一出门只能分配当干部，不能当工人、农民的旧制度。毕业生的分配，必须坚持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可怜这批大学生，丢掉了自己的专业，和我们一样做着普通工人的活。少数几个能做个绘图员、技术员就非常不错了。最差的两位，一个在踏冲床，一个在做电镀工。真正的浪费人才啊！

我们车间当时是一个新组建的车间，为试制一种飞机上用的温度表而成立，所以配备的人员是相对比较好的。车间有两位技术员，王师傅、许师傅，是浙大和南航的末代大学生。他们其实都是正儿八经的名牌大学毕业生，经常组织我们新进去的高中生上课学习。还有一位带过我的倪师傅，也是浙大光仪系的末代大学生，在工作上、学习上给了我很多的帮助。这几位大学生师傅，乐于助人，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向他们请教。

本来日子可能就这么日复一日的过下去，不想 77 年 5 月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父亲在学校上课时，突然在讲台上发生了急性心肌梗塞，送到医院抢救几天后，不治过世。父亲的去世给家庭带来天大的打击。母亲身体不好，妹妹又面临下乡的压力。本想给父亲办个工伤，这样妹妹就可抵职。无奈一个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又没有什么关系。此事遭到学校的拒绝。

其实，我们那时候的孩子，都能干活，也能吃苦。不去下乡，主要是怕以后一辈子上不来了。有门路人家的子女，可能通过当兵、上学、病退等等办法回城。我们如果下去了，命运就不是自己可以掌握的了。但是随着单位和街道的动员压力越来越大，家里几乎扛不住了。妹妹的下乡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家庭困境的转机来自于意想不到的地方。当年 8 月左右，就有了要恢复高考的传闻，到 10 月份报上登出了恢复高考的通知。假如我能考入大学，户口迁出到学校后，家里就变成无人留城状态，按政策妹妹就能留城了。另外对我来说，还有一个利好消息。那就是，当时有规定，达到 5 年工龄的人可以带薪读书，工龄照算。此时我刚好达到 5 年工龄了。考大学似乎是一条很有吸引力的路。和家里人商量后，决定报考。



报名后，马上转入到紧张的复习迎考状态，因为时间很紧迫了。厂里有十几个人报名参加高考，各人都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到处找资料，挤时间复习。车间里的王师傅、许师傅成了最好的辅导老师，非常热心地辅导我们几位报考的人。杭州许多中学都开办了高考复习班，除了自己学校的应届生、毕业生，外面社会上的青年也可以去免费听课。我当时就去听过杭二中办的晚间辅导课。外校青年去听课，不但不阻拦，还免费发资料和试卷给你。一个偌大的教室，坐得满满当当。晚到的人坐在后面根本就听不清什么，可见当时高考的热度。那个时候，恢复高考是全社会的大喜事。不光是某个单位、学校和参考人员个人的事了，可以感到方方面面都在为高考加油。

我在厂里的工种是热处理，上班不像流水线上的工人，有比较多空余的时间。我和师傅、师兄商量换到全夜班。这样我就可以在夜里看书了。夜晚活不多，通常是我一个人上班。夜深人静干扰也少得多，12 点以后基本上就没有人来了，便于集中精力学习。每当后半夜困了，走到车间外面，看看天上的星星和北高峰上电视发射塔一闪一闪的红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清醒一下然后继续读书。当然，工作还是要管牢的。只要完成工作任务，厂里领导也不会来干涉你看书学习了。所以一直到高考，我都坚持上班，没有请过一天假。

时间太紧了，真的是争分夺秒，合理安排显得非常重要。我的报考目标是理工科，复习重点是数理化。其中，我物理最强，化学最弱。所以大部分时间是花在化学、数学上面。至于语文和政治，我自认为凭自己已经掌握的东西，已经足以对付考试了，基本上没有花什么时间复习。当时还有一个想法，如果第一年考不上，第二年就转考文科去。

考试如期到来，因为报考的人多，先进行一次初试，以便刷掉一些人。当时因为参考人员面非常广，从老三届到应届生都可以考，所以我们吃不准自己处于何等水平。考试完了就回到厂里大家对答案，估分数。车间里的大学生帮我们分析情况，抓紧在复试前再补一下薄弱环节。

初试顺利通过，然后就是复试了。那时候考大学，哪像现在这么多家长又是接送，又是等待的。近日看到报道，还有家长去为孩子考研陪考的，简直不可思议。那时考试，不管是已经工作的还是应届生，都是自己去自己回的。上午考完了，如果下午还有考试，随便哪里解决一下午饭，然后下午继续考。那个时候，我已经是 5 年工龄的三级工了，从复习、考试到最后的填志愿，家里基本上不管我，都由我自己决定。



复试结束后，总算可以轻松了。回厂对了一下答案。语文、政治、物理好像问题不大，化、数感觉错得多一点。不过此时也只能听天由命了。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

那一届高考不公布分数，只告诉你上线与否，然后就是填志愿。填志愿是在不知道分数的情况下盲填的，规定只能报三个志愿。这就有点考验人了，报差的学校怕吃亏，报好学校怕不录取。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按规定填了三个工科的学校和专业（政策规定带薪学生毕业后可以回原单位，报工科是考虑回去，另外内心还是有点工厂情结？）。然后不管有没有用，又填了医科和理科好几个志愿。这样一共是填了10个志愿。接着是继续等待。

某天，好像是上中班，下午赶去厂里上班。走到厂门口就碰到我师傅，他很高兴地告诉我，说我被录取了，红榜已经贴在厂门口。我马上就问师傅是哪个学校？他告诉我说是杭大物理系。我当时的第一感觉并不是很高兴，而是有点失望和诧异。一来我当时一心想读浙大的工科，第二是我根本就没有思想准备去读杭大的理科，觉得理科出

来就是当老师的。虽说父母都是大学老师，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那么不喜欢做老师。

记得我报的三个规定志愿，第一、第二志愿填的是浙大仪器仪表和自动化专业类，第三志愿填的是河北钢铁学院的热处理专业。在规定志愿外，第四第五个填的是浙医大，再后面是杭大物理、数学系……。当时吃不准后面多填的志愿有没有效，心想不填白不填，最多就是无用。报志愿后，心里也没底，觉得如果能考上浙大那是撞大运了，多半可能是上河北钢铁学院（热处理和我的工种符合）或者就是医大。如今被第五志愿后面的学校和专业录取，确实是出乎意料。

若干年大学毕业以后，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也曾经查到了我的高考成绩，总分其实是可以上浙大分数线的。也可能报的专业太热门，或者是其它什么原因，被刷下来了。估计杭大调档优先于医大和外地学校，再加上我物理考得很好，所以就被杭大物理系录取了。当然了，这只是当时的一种猜测，我们并不明白当时的招生录取流程。现在看到有关文章，才知道杭大是省里一直照顾的，先于同类学校调档以保证生源质量。进校后也曾经和班主任施老师聊起过，他也说我当时物理考得不错。可惜的是，查到的分数现在不知道记在哪里了，找了幾次也没有找到。现在依稀记得物理可能只扣了几分（50分满分），政治可能有80多分，语文是90分，语文这个分数在浙江理科考生里面是并列第一的了。能考上大学，我的文科分帮了不少。

当年我们厂有4个人考进大学，也算是很不错的成绩了。77级入校时间是82年3月初，我们一直上班到接近开学的时候，也算是感谢厂里对我们的培养和支持吧。

邓小平恢复大学招生考试的伟大决策，不仅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也改变了千千万万个人甚至于家庭的命运。我的考大学经历，只能从个体的侧面反映当时的时代进程。就整个事情来看，还是要感谢邓小平的魄力和决断力，感谢拨乱反正，感谢改革开放的好政策。

[返回目录](#)

## 想起四十年前的那场高考

——杭州大学中文系 80 级 张广星

（2020 年 6 月 11 日）

我想起了自己整四十年前，也就是 1980 年暑期，参加的那一届高考。在我的记忆里，对每一科考试的答题情况，我都已经淡忘了。至今满脑子鲜明地记得的，都是关于暑热的印象。

从当年的七月六日进城，我们院桥片的考生都被安排在东方红小学（即今天的锦江小学）过夜。我只能用“过夜”这个词。因为学校里没有住宿条件。好在小学生都放假了，那些空教室里的书桌，就成了我们的床（那时的书桌都是两人合用的长桌子）。但正值盛暑，即使把两边窗户都打开，教室里仍然暑气蒸腾。赤裸着上身躺在桌子上，不一会，桌面就被全身的汗濡湿了，黏黏糊糊的，翻来覆去的怎么都睡不着。更让人难受的是群起来攻的蚊子，嗡嗡地一直挥之不去。同学起来把门窗关上，教室里更断了一点风，热得更让人受不了。

但那时年轻，当瞌睡真上来的时候，也就不管暑气怎么郁结，蚊子怎么轰炸，竟然也就不知什么时候酣酣地睡着了。

我曾经写过《走过林荫道》，回忆过那次高考。我对黄岩中学老校园里的林荫道印象深刻。虽然天地之间犹如一个大火炉，但走过两旁都是高大的梧桐树的树荫底下，还是会感觉到一点阴凉的。

我已不记得考场里有没有电风扇（吊扇）。或许是当时太专注于答题了吧，我竟没有注意。但窗外梧桐树密叶间，此起彼伏的知了拉长声音的嘶叫，却无法充耳不闻。阳光越是炎热，它们越是叫得起劲。偌大的校园本来都是静静的，但现在似乎整个校园都响彻了知了的嘶哑。

在黄岩中学考场里一共考了三天。第三天上午更热，而且更闷，一点风也没有了。树叶都耷拉着脑袋一动不动。那天午后，我们是在令人窒息的闷热中走进考场，参加最后一科的考试。这最后一科考什么已经忘记了，似乎我考得还是比较顺利的。就在我一心答题的时候，

我忽然感到手臂上滑动过一丝凉风。我抬起头来一看。不知什么时候，天空里布满了乌云。云越堆越厚，凉风也越来越大。教室里暗了下来。监考老师打开了灯光。我的心也终于安静下来。这时，窗外电闪雷鸣。之后即风雨交加，天地之间只剩下了一种声音：狂风暴雨的呼啸！

真是好雨知时节。等到我们考完这最后一课，从教室里出来的时候，风止雨歇，又云开日出了。我就在雨后的清凉里，怀着轻松的心情，和同学们一起，从城里回到了乡下。

### 返回目录

## 1977 高考杂忆

——杭州大学历史系 77 级 寿柏年

参加高考之前，我已作为城市“知识青年”之一员，在萧山第二农垦场（其前身为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六团）围垦造田近八年。

“知识青年”之所以加引号，盖因我们这一批是“文化大革命”中入学的第一届两年制初中毕业生。学历配不上知识两字，且我下乡时年仅 16 岁，称为青年亦勉强。

备考过程印象较深的是两件事。一是临时抱佛脚，托人到书店购买了中学数学课本全套八册（当时初高中学制各两年），再翻出早先所置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青年自学丛书·数学》，自学恶补。后来的考试证明，几何部分很难靠短期自学奏效，但代数部分尚有可能。只不过是学得快，忘得也快。二是除了动用半个月探亲假去宁波家中突击复习外，在参加初试前未为复习请过一天假。白天照常出工，晚上复习。原因是当时同事都未上过高中，视大学为高不可攀。故全连仅我一人报考，请复习假无例可循。且时值秋收秋种农忙，担心请假复习后如果最终没考上，被人讥讽为逃避劳动。现在想来，也是年少虚荣。幸亏后来侥幸考上，否则将会因此抱憾。

由于报考人数太多，1977 年高考分为初试和复试。初试在县里，合格者方能进入全省统考。初试时间是 11 月中旬的某一天。我的考点在萧山义蓬区义文中学，距我们连队驻地单程 25 里，需步行到达。

初试为语文、数学两门。上午考语文，顺利完成。下午数学却考砸了。原因是不知道答题应先易后难，而是从头开始按次序往下做。结果中间被一道题卡住，很久才做好，以致影响后面答题时间。到收卷时，卷尾几道应用题来不及做便交了卷。

考完后，自认复试已无可能，心情沮丧。加上此前复习熬夜较累，于是自我放松，接下来的十余天基本没再复习。谁知到 12 月初，竟意外接到了复试通知。心中一喜一惊：喜的当然是尚有机会，惊的则是离复试只有十天，时间太紧了。

于是，我立马请假来到萧山衙前中学复习（我叔叔是该校校长）。那边比农场集体宿舍清静，且遇问题有老师可请教。谁知到第三天，因为叔叔正感冒，他便让我服了一片 SMD（长效磺胺）以防感染。结果引发我严重的磺胺过敏症，酿成一场大病。

一开始也不知这病的厉害，只是脸肿得厉害，手脚发水泡。在当地公社卫生院住院，结果病情加重，水泡蔓延全身，口腔内也都是水泡，无法进食。于是到第三天，卫生院建议转萧山县人民医院治疗。但到萧山后，县人民医院见状不肯接收，建议转杭州浙二医院。于是又当晚到了浙二医院住院。住院需缴费，我是国营农场职工，有公费医疗，但需要农场出具证明。所以办住院手续时，电话通知了农场。第二天下午，同事好友陈信伊从农场来到医院办公费手续。信伊说他在场部办理公费证明时，得知场部正要给我寄发高考准考证，他顺便领了带来给我作个纪念。此时是考试日的前一天。当时我虽十分虚弱，但脑子清醒。看到准考证后，心情激动。医生查房时，恳请医生同意我出院参加考试。医生起初根本不予考虑。我再三说明高考机会的重要性和我不惜代价以求一试的决心，最后医生被我感动，以“系自行出院，出了问题医院不负责任”的方式作了默许，为我配了药，留了住院床位，嘱我不得大意，考完仍去住院治疗。

医院默许后，我又立即请叔联系萧山教育局，要求将我的考点从离县城 70 多里的义丈中学就近调到萧山县城的考点。但因次日开考，准考证名单已下达各考点，考生必须对号入座，考点无法调整。

考试那天，我在信伊和头天晚上来杭的弟弟永年的搀扶下，凌晨 4 点从浙二医院出发，乘 51 路电车到龙翔桥车站，转 15 路效区汽车到萧山，再乘 7 时左右萧山去义丈的头班长途车，辗转到义丈中学考场。此时，正好赶上考生排队进场。一摸口袋，发现只带了准考证没带笔。于是叫永年在街上小店花 0.12 元买了支圆珠笔。我就用这支笔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考试。

## 十四岁的高考

——杭州大学经济系 78 级 罗卫东

我成为这个自然村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学生，也是整个行政村最近 30 年来唯一一个考取大学的人。很难形容当全村的乡亲都知道我考上大学时的情形，可以说整个村子沸腾了，消息也很快就传遍了全公社。此后很多天里，络绎不绝的人把家里挤得水泄不通，父母亲和姐姐们忙里忙外地招待大家。亲朋好友送来米面大豆、鸡蛋花生、瓜果腊肉等土产，友情特别深的访客送来了塑皮笔记本、钢笔之类乡村罕见的“高档”礼物。

我出生的这个小山村，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山寨，有一个很雅的名字，叫流湘。得名的缘由不得而知。全村有 4 个自然村，我家所在的村最大，也不过 60 余户人家，300 多口人。它坐落在海拔 800 米的一个小山谷之中。我在大学时代第一次读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时，就以为他写的简直就是我的家乡。溯溪而行，小道蜿蜒，山重水复，村民们傍水而居。那条源自白际山脉老山深处、从村边蜿蜒流过的小溪，长年不断流，保障了全村人的生活和生产用水。这条溪流的出口处就是当地有名的风景点“流湘石柱”和“流湘飞瀑”。村子地处山区，水田不多，村民靠种植高山旱地作物糊口谋生。一条狭窄的山道连接了山里山外，物资进出全凭肩挑背扛。

由于交通不便，村子和外面没有通公路。出发到杭州来读大学的那一天，必须凌晨三、四点起来准备，四点半左右就得出发，翻山越岭去山外的车站坐去往码头的客车，在那里等待去县城排岭镇（后来更名为千岛湖镇）的客轮。然后要在县城住一晚，次日一早再乘开往杭州的长途客车。

我在乡亲们的护送下，离开了这个养育我 15 年的村子。我在这里有艰苦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在风土人情的熏陶和无数古老传说故事的滋养下长大。一想到此后就要长期地与它告别，内心充满了惆怅。那天凌晨，天光未见，几乎全村的乡亲都举着火把在后面送我。我被

簇拥着走在队伍的最前头，翻山越岭。我永远也忘不了，当我走到山顶，转过身子，俯瞰村子时，眼里所看到的那惊人一幕：蜿蜒的山路上，之字形的火把长龙在缓慢移动。那一刻，我禁不住流下感动的热泪。虽然尚不能清楚自己走向未来的具体方位，更不可能想象后来的发展，但在内心发誓，将来一定要尽力报答这个养育我的山村。

走出大山的我，从此开始了此前完全没有预想到的人生。离开村子前从山顶俯瞰到的那一幕，让我此后无论做什么工作，有什么样的地位，在世界的哪一个地方，都铭记初心，砥砺前行。

### [返回目录](#)

## 花絮翩翩四十年

——杭州大学历史系 77 级 王旭烽

初试出来，突然感觉自己把作文题目看错了，顿时天昏地暗，差点失去知觉。幸亏马上得知还有复试的机会，但得从初试考生中选拔，这让我陷入了比上吊还难受的状态中。干脆没有复试，我也就死心去“自挂东南枝”了。但万一和打牌一样，倒数第二也不垫底呢？没有办法缓解我这种万箭穿心般的感受。那时，我不过是个小女人啊。但本小女人除了一哭二闹三上吊之外，还是抱着侥幸心理找到了一个通道——打毛衣。我托人从上海买了一斤细毛线，而且是粉红色的，日夜不停地忙活起来。我进入了一种机械的麻木状态，所有高考复习资料统统束之高阁。一天，我的一位考友到我家楼下来叫我，希望一起复习功课。我从厨房伸出手来，拎着那件打到一半的毛衣说：“我打毛衣呢！再见！”

然而，我竟然被通知可以参加复试了！这不是以另一种方式逼我去死吗？我一把扔了那件还剩半个袖子的毛衣，把复习资料扒拉扒拉下来，又开始拼了。

考上大学后，我拿上了那件粉色的半拉子毛衣，还以为我能够边读书边把它打完。不料这计划永远胎死腹中。四年之后，我在学校的垃圾箱旁烧掉了三小麻袋稿纸，拎着那半件毛衣走向社会。

大学毕业后，搬了许多次家。每一次，那件未完成的毛衣都会夹在我胳肢窝下，随我周游四方。大约 20 年以后，我终于决定重新完成它，无奈发现那毛线针已经锈在了毛衣上，死活拔不下来了。

[返回目录](#)

## 第二次高考

——杭州大学中文系 78 级 陈建新

42 年前，1978 年的 5 月，我再次报名高考。

作为一个初中生，又离开教室 6 年多了，1977 年底第一次参加高考心中没底。但在 4 月 30 号得知自己被杭大中文系录取为 77 级走读生，虽然由于单位的阻拦，我没能去报到，但却让我信心暴涨。原来我的学业水平还真达到了“同等学力”。我忘掉了第一次被单位领导卡住不放的不快，只是希望第二次能考得更好，去北京或者上海读书。

与第一次高考相比，第二次高考的复习时间少得多。因为当时我担任了厂团委宣传委员，脱产坐办公室，上班时间就不能再偷偷看书。而且，我当时担任了厂团委《杭氧团讯》的主编，一份油印小报，从采编到刻印都以我为主。我为此还学会了在蜡纸上刻写仿宋体的技艺，每次印刷出来并装订完，我都有一种参加重庆地下党《挺进报》印刷工作的感觉。另外，我还承担着团委在厂食堂门前两旁大块黑板的采编和抄写工作。每一期团讯和黑板报，我自己就要写多篇稿件，并且编辑组稿来的稿件。所以，工作时间我几乎没时间复习功课。但下班吃完晚饭后，我却能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学习，头上的吊扇温柔地转着，白天嘈杂的办公大楼安静极了。晚上九点左右，还能去食堂吃夜宵，然后回宿舍。在宿舍，我盥洗完毕就爬进自己的蚊帐内继续看书。同宿舍有好几个室友，每到晚上唯一的娱乐就是打牌。以前我也是活跃牌友之一，再次决定参加高考后，我只能“忍痛”停止打牌。但我们这间宿舍仍然是打牌重镇。好在我的工友们都很支持我考大学，那段时间他们打牌，静悄悄的，打完后也悄悄地撤离。而我，常常看书超过 1 点。

我完全记不得那年的梅雨怎样，但 7 月 23 日肯定已经出梅。我的考场在重机中学，离宿舍有两站多路。好在我有一辆永久 17 型自行车，骑过去并不远。有趣的是，和我一同赶考的厂友，后来遇到时还记得我单放手骑着自行车，一边用另一只手拿着资料背诵考试内容的情状。

1978年的夏天真热，考场里用大盆盛着机冰，头上也是吊扇。在没有空调的年月里，这已经是最好的降温方法了。其实我比较耐温，这大概是杭州人的基本机体能力吧，所以在教室里我根本感觉不到热，全部注意力都在考卷上。后来回想，我当时一点也没注意到77级和78级的考卷难度是否有差异，几乎是机械地一门一门考下来。同教室参加考试的没人认识，所以考完后也无须对答案。上午考完，骑车去厂食堂吃午饭，然后回寝室躺一会，按照规定时间再骑车去考场。

我爸妈根本不清楚也不关心我的高考，更不会想着买啥补品给我。可以说，我这读大学的权利完全是自己争来的。想想也是，我在工厂“三年学徒四年帮工”（这是电影《渡江侦察记》里的著名台词），接下来顺理成章应该恋爱结婚生儿子，还读啥大学啊？

第二次高考的录取通知书改往家里寄了，我单位领导已经不可能像前一次那样阻拦我上大学。我再次被录取的消息，是我妈打电话告诉我的。当我知道录取我的还是杭大中文系，心里有些莫名的失落。我本以为第二次会考得更好一些，能去外地读重点大学。记得第二次填报志愿时，我很狂妄，三所重点大学填完，三所非重点大学就只填了杭州大学中文系，剩下的空格全没填，还在后面强硬地写了“不服从调剂”。后来才知道杭大中文系的分量，以及我们这一届高考的比例（77级录取率4.7%，78级录取率6.6%），能考上杭大是非常难的事。

杭氧是杭州市的大厂，当年也有几个参加高考的厂友，但最后只有我一人考中，令人奇怪。我的初中同学，以及我初中母校的所有校友（包括后来读了高中的），居然在我之外无一人考中，也很奇葩。当然，那时候很多人并不知道，一个学习高潮正在社会上掀起，学历会成为改变人生的重要通行证。差不多五六年后，我的很多同龄人通过读夜大、电大以及远程教育，进入人生的上升通道。而这时候，我已经开始我的研究生生涯了。

[返回目录](#)



## 第二章：入校

## 1980 年的《新生入学须知》

——杭州大学中文系 80 级 张广星

我的私人藏品中还收着这份杭州大学于 1980 年 8 月铅印印制的《新生入学须知》，我正是这一年的杭大新生。

按理说，它不过是个附件，正件应该是《入学通知书》，但《入学通知书》我却没有保存下来。

我还记得收到《通知》的那个早上的情景。那是个晴和的早上，田野、村庄都沐浴在初生的阳光里。当时我正在屋后的流水沟里刷牙，母亲在上灶做早餐，父亲大概早就下地去了。这时，从村道上有一位绿衣邮差蹬着自行车疾驰而来，好像直冲着我就位于路边的老屋而来的。在他的身后，有一位村民，还有一位孩子跟着，一边跑一边喊：给张广星送录取通知书来了！大概这位邮差不知道我家在哪里，是一路打听过来的。我母亲听到后，赶紧从屋里跑出来，而我也赶快漱了口，奔了过来。记得邮差还要母亲盖印以示收讫，所以母亲还回身到家里取了父亲的私章来。

我们等这份通知书已经等了好久了。非常感谢这位邮差，好像很懂得我们的心思似的。他肯定是一收到这份《入学通知书》，就迫不及待地要尽快送到考生及其家长的手中。所以今天来得这么早，真是想人之所想，急人之所急啊。把别人的事，当成了自家的事了。

我曾写过一篇《三十年前的那个暑假》，自然是 2014 年夏天写的，纪念的就是高考的那个暑假。其实，高考过后，我当时对自己的上榜并没有任何信心，更没想到自己会被杭州大学录取。我对自己各科的估分都很低，我已准备好复读。这个暑假才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真正觉醒。意识到自己可能不被录取之后，生活才在我这个懵懂无知的农家少年（当时我只有十五周岁）面前展现了它严肃的本相。如果我不复读升学的話，那我就真的只能跟父兄，跟祖祖辈辈一样，再一辈子土里刨食了。意识到这点，我才跟父母说，这个暑假不帮你们做农活了，我也不再去田间钓黄鳝了，我要读书。刚好邻村有一位老右派在家里

教几个学生，其中就有一位我的高中同学兼远亲。他来喊我，我就去了。

发榜的消息是一位女同学冒着大雨，专程赶到老右派家里告诉我的。她到镇上集市，顺便去了学校，发现教学楼过道的墙上，新贴着一张鲜墨淋漓的全县上榜名单，其中就有我的名字。

我一辈子感激这位女同学冒雨报喜的情谊。

这时我才确认，我已经考中了。我用不着复读了。我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填报志愿。我的志愿其实很渺小，能脱农门就满足了。虽然我在征求李老师意见的时候，李老师认为我的这分数，是可以填报大学本科的，但我没有信心。我填的都是浙江各地的师专，如嘉兴、绍兴和本地的台州师专。也是李老师的催促和鼓励，说，你大胆报一下杭州大学。如果那里不能录取，可以退到第二个志愿学校。

这样，我就走进了杭州大学的校园，成为了杭州大学新生中快乐的一员。现在虽然杭州大学早已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但我永远感激她！

还是回到这份《新生入学须知》。其第一条规定：“新生报到必须携带入学通知书，本人户口、粮油关系，党团员携带县（部队师）以上组织关系介绍信，缺一不可办理手续。”粮油关系，只有城镇户口的学生才有，我们农家子哪来的国家供应粮的粮票？所以《须知》中补充说明：“农村户口新生只带路途粮。”这句话自然对我们都是相当鼓舞的。因为它表明，只要我们到了学校，即使我们空着手，国家就不会让我们饿着，也就是管饭。果然，到了学校，那时还实行助学金制。虽然助学金普遍的只有十五、六元，但都能满足哪怕最身强力壮的同学一个月的伙食需要了。

说到迁户口，我是到当时的人民公社去办理的手续。经办的是一位中年人，公社文书。他拿着我递交给他的《入学通知书》及其它相关资料，看了又看，然后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说：“真不相信，你是少年大学生啊！”

是啊，准确地说，我那时还是一个少年啊。

很多人都以为我学习成绩好，可能读小学的时候跳过级。其实我是一级一级读上来的，只不过我读书较早（我是七虚岁就上小学了），而初、高中都是两年制，所以我读到十六虚岁，就高中毕业了。而且，我又是应届就考上了的。那个年代，应届考上的学生是不多的。所以我毕业到了地方工作，才只有十九周岁，自然被人称为“小张”。机关里很多人都看着我进来，他们叫惯了我“小张”。现在，尽管我白发盈颠，有不少孩子都喊我“阿公”了，但那些老机关的人碰到我，还都是喊我“小张”。

年轻真好，年轻时积极进取的干劲，真叫冲天之高哪！

《入学须知》一共有十条。有些规定很细，好像很婆婆妈妈，如第五条说：“带全日常生活用品：如被褥、衣服、餐具、雨具、蚊帐等。”其实，即使《须知》中不说这一条，每一位学生及其家长也会仔细准备好这些生活用品的，但这一条的规定，让人觉得很温暖。

《须知》的第八条，也让人感到暖意融融，说：“新生赴校路费，国家职工由原单位发给，其他学生因路途较远，家庭经济确有困难的，可持证明向所在县（区）招生委员会申请补助。”记得我们家还商议过要不要去申请。后来大概是因为怕手续麻烦吧，觉得我能考上大学已经很不错了，再不能麻烦政府了，所以就没有再向政府申请补助。

最后一条是说接站的事情：“在规定的时间内，学校在火车站、武林门长途汽车站、卖鱼桥轮船码头有专车迎接新同学。”记得我和父亲是那天下午三点半左右，从武林门长途汽车站出站的。刚出站门，还在左顾右盼的时候，上来一位挥着小旗子的年轻人（印象中这个人是挥着小旗子的，实际上有没有，说不定了），问我们是来上学的吗？我们答是的，并答是杭州大学的。这位年轻人就把我们往旁边引。这时我也看到了，墙边停着一辆大客车，车厢上贴着大字，具体是什么已经记不清，但大概是“杭州大学新生接送车”或“杭州大学欢迎你”之类的。

我们不用自己到路上找6路公共汽车站的站牌了。

等其他同学都上了车，车子就启动了。

武林门离杭大并不远。我还在车上东张西望的时候，司机已经朝着一个大门口转向了：我们到了自己志愿的大学了！

写到这里，我又非常感念我的父亲。这趟送我上学，也是父亲一生中的第一趟远门，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远门。但就是这唯一的一次远门，父亲也没有好好享受。他在帮我办过入校手续，帮我在寝室铺好床铺被褥之后，第二天就回程了。

杭州应该是父亲所向往的，因为他读过《说岳》，知道岳飞的墓在西湖边。当然，他更知道西湖，知道杭州被称为人间天堂。

但他到了杭州就进校园，出了校园就回家了。他好像是一位士兵，送我到校是他的任务。这趟任务完成了，他是不能再耽搁的。

#### 返回目录

## 难忘的杭大入学第一天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刘燕

杭大毕业一晃已经三十八年了，但是开学第一天的情景仿佛历历在目，尤其是那天的夜晚，至今记忆犹新。

当大家经过一天的劳顿进入梦乡的时候，和我并头的上铺只见行李，不见人。虽然历经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从京城到杭城的长途跋涉，白天又忙于报到办理手续，我却因为开始了盼望已久的大学生活而兴奋得丝毫没有困意，于是开始琢磨这个姗姗来迟的同学是个什么样的人。

夜深人静之时，忽然听到开门声，借着楼道昏暗的灯光，看到一个俊俏的女孩蹑手蹑脚的走进来。外面还站着送行的家长，看样子是她的父亲。父女俩长得很像。他在轻声的叮嘱着什么。我侧耳听到夹杂着的熟悉的北方口音，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仔细端详后，看到他身着海军服，顿时心生敬意。我自小就有军人情结，或许是因为父亲曾经也是军人的缘故吧。我对这个新来的同学也立即产生了好感。

我们压低声音做了自我介绍，得知她叫敖丽。人漂亮，名字也好听。由于我们都是睡在上铺，又挨在一起，等她安顿好后，我们就开始头对头的压低嗓音聊了起来。结果越聊越投机，仿佛一见如故，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为了不吵醒已经入睡的其她女生，我们索性钻进了一个被窝，再蒙上被子继续天南地北的聊了下去。

我们都喜欢同样的音乐，看过许多同样的小说和电影，为同样的中外演员痴迷。谈到喜欢听的外国音乐时，我还给她看了舅舅送给我的外国音乐 200 首的歌本。结果从入校的第一晚起，我们就结成了金兰友谊，成了推心置腹的闺蜜。





刘燕（左）、敖丽（右）

在杭大的四年里，我们经常是形影不离，一起看电影、一起逛西湖、一起跳舞，互相诉说各自的理想、烦恼以及对未来的憧憬。虽然不久和她分了班和寝室，但是最后一个学期又相约到了同一个班，回到同一个寝室，一起度过了美好的大学生活。

1982年大学毕业后，我们各奔东西，从此南辕北辙。1984年我到美国纽约市定居。早年回国探亲时在上海和北京都有过短暂的见面。九十年代初她在香港工作时，我们都还保持联系，直到后来因为各自忙于学业、工作和家庭，不知不觉地就失去了联系，从此杳无音信。后来听说他们举家迁到澳洲，希望有生之年能够重新叙旧。

后记：冥冥之中，仿佛上苍听到了我的祈祷，心诚则灵。在孙淦钊的帮助之下，很快就和敖丽联系上了，激动之心可想而知。我们的二次牵手来之不易，终于圆梦了！

[返回目录](#)



## 第三章：学习

## 在姜亮夫先生门下当“学徒”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计伟强

入夏了，杭州又开启“火炉”模式，气温突然就飙升到 39 度。不过，空气也变得干净了。炽烈的阳光下，天空变蓝了，蓝得几乎像 37 年前在“杭大新村”穿过树荫抬头看到的一样。

37 年前的 1981 年，也是夏天，系领导找我谈话，说语言文学研究室的老教授姜亮夫先生急于恢复“文革”起停滞下来的工作。而先生原来的助手郭在贻老师和张金泉老师现在已经承担着大量的教学和研究任务。学校需要为姜先生重新配备助手。

郭在贻老师是我的古汉语任课老师。经郭老师推荐，系里考虑让我从大四最后一个学期开始，在撰写毕业论文的同时，提前为姜先生工作，帮助先生整理受“文革”干扰积压下来等着出版的论著。

姜先生、夏承焘先生是当时杭州大学中文系最负盛名的两位教授。因为有他们在，才有所谓“北大中文系是地主，杭大中文系是富农”的说法。姜先生在清华研究院的老师是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诸先生，之后在上海工作期间又拜章太炎先生为师。他的《屈原赋校注》是我读楚辞的重要参考书。至于先生其他的丰富著述，虽说还没有接触，但名声在外，也是仰慕已久。现在我居然能够做先生的助手，真是喜出望外，当时就一口答应了。

杭州大学正门往南，沿着杭大路，过西溪河上的道古桥左拐，有一个跟通常所见不太一样的住宅区。里面有不少小洋楼，树木花草繁茂，环境安静，是杭州大学许多专家学者的住所。这就是“杭大新村”。因为在西溪河南岸、道古桥东边，也叫“杭大河南宿舍”，或“杭大道古桥宿舍”。

姜先生就住在那儿，一幢两层小洋楼的一楼。先生家正门在南面，带个花园。进门是客厅。客厅东面是主卧，师母陶秋英住。客厅西面是个书房，那时是姜先生的女儿姜昆武一家三口住着。客厅北墙放着一只立式钢琴，虽说老旧，那架势依然高贵。客厅尽头西北边是后门，

东北边就是姜先生的房间了。房间很小，窗户朝北；一张床，一张老旧的写字台，一张椅子，然后是堆着的书和杂物。房间很挤，来个人只能站着说会儿话就走，没处坐。

初进师门，很正式。郭老师领我到先生跟前，说：“小计来了。”因为事先已经介绍过我的情况，征求过先生的意见，就没再多说什么。姜先生坐在椅子上，师母陶秋英站在一侧，都挺高兴，很和蔼。我小心地向先生和师母问好。然后师母说了：“你算是入室弟子（原话如此，不敢妄改，师母只是强调关系密切，而非以学问深浅称之），本来是要跪拜的，现在不时兴了，就免了吧。”听得我惶惶然，不知所措。当时的场景，更像是旧时徒弟拜师学艺。清华是洋学堂，梁、王、陈、赵诸先生估计不会要姜先生行跪拜之礼。而后来太炎先生收姜先生为弟子，姜先生或许就是行大礼的吧？当然，我从来没有问过。凭我当时认师的气氛，感觉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身份，应该是更接近于“学徒”。

“学徒”是要干活儿的。自此开始半年，然后是1982年2月毕业正式留校担任姜先生助手，我跟着先生工作前后共有3年半时间。先生80岁了，高度近视，行动不便，平时不去学校。于是，杭大新村4幢3号就成了我经常出入的地方。

我最初的任务就是逐篇整理先生的楚辞学论文，编辑先生《成均楼论文集》之一《楚辞学论文集》。像《说高阳》、《三楚所传古史与齐鲁三晋异同辨》、《秦诅楚文考释》、《荆楚名义及楚史地》、《楚郢都考》、《楚文化与文明点滴钩沉》等篇，至今想来，仍会脱口而出。这些稿子共有20多篇，都是先生历年累积。其所论，往往从文献到出土文物，从语言到历史，从社会形制到民间习俗等等旁征博引。加上姜先生博闻强记，有些资料信手引用，所以需要由我重新核对原始出处。先生眼力不济，高度近视，通常原稿草就，付与专人誊抄复写。这个誊抄复写的本子中有一份，就是我的工作本子。誊抄者我没见过，只晓得是个上点年纪的人，是以往先生专门聘请的，既写得一手好字，又有初步的专业知识，读得懂先生的文章。但是毕竟还是会有疏失错漏之处，于是就成了我要解决的问题。除了核对资料，

纠正誊抄错漏，对观点、论证过程如有疑问，自然也要提出来。而这往往是我尤为关注的地方，也是最能够刺激我的兴趣。让我在核对资料、检查文字誊抄错漏之余，获得成就感的所在。

记得当初整理《楚文化与文明点滴钩沉》一文，原稿讲到楚国特有官制，本来有“除道”、“营军”两个小条目，用的书证是同一个，就是《左传·庄公四年》：“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嗟，营军临随。”这显然是个不小的问题。此处“除道”是开辟道路，“营军”是统领军队，不是官职名。我向先生提了出来。先生一听，马上就说：“好，删掉！”助手真的“助”上了，很得意，所以就一直记得。

除了工作，“学徒”自然会想着学本事。先生知道我喜欢训诂学，看过我以往写的古汉语论文。可是他要求我读的第一本书却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先生非常重视摩尔根对古代社会形态的研究，曾在其论著中多次引用，比如《凸犹为鬼方考》、《说高阳》等等。他早年还曾以摩尔根等人的学说全面论证《尚书》，写成《尚书新证》一书，可惜历经战乱，只剩残页了。先生的意思是，研究古代语言文字，有必要了解人类古代社会形态、制度、习俗、文化等特点；反过来，破解古代语言文字密码，又是研究古代历史文化和文明发展的重要基础。也因为这样，我在先生身边，在学习和研究上，打开了视野。

1982年上半年到1984年上半年两年间，我先后在《中国语文》、江西社科院《争鸣》和《杭州大学学报》增刊《古籍研究所论文专辑》独立和合作发表三篇语言学论文。其中《为什么约定俗成的结果正好是这样——浅谈语音和语意的结合有一定的缘由》由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

先生的学生阶段，正值西学东渐的又一高潮。尤其是他在清华研究院的老师正是几位学贯中西的大家，这使得他的研究更富理性思辨特征；其研究方法受到西方学术路径影响明显，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他论证一个观点，往往列举极其丰富的资料。很多时候，他同时研究几个课题，互为印证，或者一个课题，从几个方面研究；再者他往往是主课题与副产品同时收获，为研究某些课题而积累排比了丰富的资

料。等主课题研究完成了，这些资料进一步充实完善编辑起来，又成了非常有价值的工具书。或者本来最初的成果是珍贵资料的辑录，而后又有了对这些资料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如《瀛涯敦煌韵辑》、《瀛涯敦煌韵书卷子考释》、《莫高窟年表》、《敦煌学论文集》、《敦煌学概论》等等。

还有就是姜先生论证中往往是具体的文献资料和广泛的理论学说并重。他说自己研究古史，“植基于语言文字。而为玃衡者，大抵不出穆勒利尔、恩格斯、摩尔根、马林确斯特、罗维诸家之说。”也就是说，姜先生一方面依据具体的古代语言材料，具体的文字记录，另一方面每每以社会学、政治学、文化人类学理论来考察、观照、衡量、判断中国古代历史。因此，他的研究便更具广阔天地，更具想象力，对其后的研究者提供了更具探索空间的启迪。

说助手像“学徒”，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跟先生一家的关系，显然比普通的学生、同事要亲近得多。先生偶尔去杭大医院看病，会让我陪着他。有时候师母也会让我帮着整理她的画作题记。先生家里来了重要的客人，会让我帮着安排。在先生家里，我碰到过前来看望先生的著名学者钱伟长、季羨林等。最有意思的是先生在太炎先生门下的小师弟，苏州的朱季海先生，通常每年来一趟，住一阵子，既是看望师兄，也是顺便休养、读书。姜先生说，朱先生是太炎先生最喜欢的小弟子，一生清贫，但极聪明，精通英、德、日、法语，学问广博。那个时候，大家生活都不容易，就算是姜先生这样文革前二级教授的工资，也很有限。朱季海先生没有工作，自然也没有收入，每次来师兄这里，住得时间长一些，也算是请师兄接济，往往无所谓客套。有一年的暑假，姜先生把我叫去，塞给我一些钱，说朱先生来了，嘱咐我悄悄将朱先生安排住在杭大招待所，食宿费用都付了，不要告诉师母，意思是怕师母知道了生气。他们师兄弟的情谊是令人感动的。那阵子，对我来说，也有了难得的机会，跟着师叔讨教学问，真正见识了一位学术领域广泛，性格独特，洁身自好的学术奇人！印象最深的是他这位训诂大师那次大谈美学和世界美术史。他说这次来杭州，

重点就是冲着美术史课题来浙江图书馆看书找资料的。其间谈到李泽厚《美的历程》，颇不以为然，语气严厉，把我听得一愣一愣的。

1983年4月，也是在杭大新村，姜先生学术生涯中一件大事发生了：国家教育部批复浙江省教育厅请示，同意杭州大学成立古籍研究所。姜先生担任所长。为了离姜先生家近一点，古籍所办公室就设在杭大新村19幢。

那年4月18日，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成立大会召开。姜先生特意叮嘱我做好会议记录，告诉我档案文书的重要性。如今这份会议记录，还保存在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

古籍所初创之时，常务副所长平慧善老师主持日常工作。她跟雪克老师是先生的左膀右臂。平老师和雪老师的家也在杭大新村。教育部委托先生办的敦煌学讲习班组织学员去敦煌考察，是雪老师带的队，我帮着雪老师打下手。

先生还有两位得力帮手，那就是当时还在浙江图书馆当副馆长后来调任杭大古籍所副所长的崔富章老师和姜先生的弟子，也是曾经的助手张金泉老师。先生在家里办公、研究，我就是姜先生跟这些老师之间的通讯员。

当时古籍所另一位副所长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徐规先生。所里还有一代礼学宗师沈文倬先生，以及文理兼通，独步于古代天文历法和科技史的刘操南先生等多位学术大家。蒋礼鸿先生主要的工作在中文系，是中文系古汉语研究的学术领军人。但是教育部委托姜先生举办敦煌学讲习班，以及古籍所招研究生班，蒋礼鸿先生也来授课，参与主持答辩等。郭在贻老师既是中文系挑大梁的教授，也是古籍所的一些研究项目，尤其是敦煌俗语词研究的挂帅者，同时他也在古籍所研究生班授课带学生。这些学术大家基本上也都住在杭大新村。

那几年，姜先生真的是很拼，带领所里的老师一届接着一届招收硕士生、博士生，引进了当时能够得到的全套敦煌文献缩微胶卷，启动敦煌文献研究，同时继续整理出版他自己的专著。

当年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研究生培养计划和所里第二个五年计划就是姜先生口述，我帮他记录的。原件现在也还在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历史档案之中。

那几年姜先生自己则连续出版了《楚辞今绎讲录》、《古文字学》、《楚辞学论文集》、《楚辞通故》等专著。期间我参与了《楚辞今绎讲录》和《古文字学》的校对，《楚辞学论文集》的整理，《楚辞通故》部分条目的整理，《敦煌学论文集》部分篇目、《古史学论文集》部分篇目的整理。

1985年2月，我为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热潮所激励，一心想当个“船头的瞭望者”，投身新闻工作，调往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后转调浙江电视台。

37年前那个阳光灿烂的夏日，站在杭大新村4幢3号姜先生家花园里，抬头望去，树冠之上天空一片蔚蓝。那是个百废待兴的时代，也是个重新尊重文化学术的时代。

37年后，恩师已故，旧时庭院满目破败。我的“学徒”生涯也已经远去，了无痕迹。而这个“杭大新村”呢？它又会怎么样？草木有知，仍具当年灵气；小楼无怨，且说昔日情怀。它会留下来吗？会留下姜亮夫先生们的故事吗？

（2018年6月6日）

[返回目录](#)

## 毕业论文报告会论题目录单

——杭州大学中文系 80 级 张广星

其实，我这个标题拟得是有问题的，只是为了简练一点，才这样概括的。它的原题比较长：中文系第三届学生学术论文报告会论题目录。

对于高考制度恢复之后的杭大中文系来说，我们是第四届学生。但对于系里所举办的学生论文报告会来说，则是第三届。所以这里的“届”，不是指学生，而是指报告会。

举办第三届学生学术报告会的时间，是 1984 年的 6 月上旬。被选拔参加第三届学生学术报告会的对象主体，就是我们这一届的毕业生。但也不限于我们这一届，还吸收了低我们一届或两届的八一、八二级学生以及干修班的学员参加。

从目录上看，一共有四十二位同学的论文被列入报告会论题，其中我们这一级学生是二十九位。

非常荣幸，我是这四十二位中的一位（但也可以说，我是这二十九位中的一位）。

从我保存的这份论题目录上看，同学们的学术趣向非常丰富。目录编订者把这些论文归纳为四大单元：文艺理论，现当代文学，古典文学，外国文学·语言·民间文学。其实这第四大类中的三小类，都可以是独立分类的。只是分开后，每个类别的文章数量少了一点，所以给归了大类。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重新审视这份目录，我的感慨是很深的。我感到很庆幸，我们是在国家拨乱反正、重新走上现代化建设之路之时，有幸踏入大学校门。我们很多同学都出身寒门。还有些年纪大一些的同学，入学前已经在工农商学兵各个领域有过工作经验。大家都非常珍惜能入大学学习的机会。我们入学的前两年，学校里好像没有举办过舞会。大多数的同学，晚饭后除了在校园内和校园围墙外的田野漫

步，除了去边上的电影院看电影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图书馆阅览室和各个阶梯大教室自修。

我曾经写过学校图书馆，对图书馆非常怀念。现在留存的当年笔记本，还记录着我在学校图书馆所借的书目及其各本书的编号。我的笔记本上还列着很多计划向图书馆借读的书目。要读的书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在杭州这四年，即使是周末，也很少走出校园。杭州的名胜，我大多还是毕业工作后走过的。

今年上半年，我有机会同儿子一起到了杭州，还专程去了一趟老杭大校园。我们来到图书馆大楼前，拉着儿子合了一张影，向他讲了当年我在这里借书读的情形。

同学们各有自己的阅读趣尚，这从他们每次从图书馆借的书，就可以看得出来。语言学多么枯燥啊，但杭大中文系的语言学，在国内同学科中是非常有名的，而竟也有几位同学对语言学有浓厚的兴趣。比如，女同学蔡的论文题目就是《论连绵词的特征》，而男同学蔡的论题则是《辞海唾余》。大家沿着各自的兴趣不断往深层探寻，就积累了从事某项学术的基础。到了毕业的时候，就可以在相关领域发声了。

我们这一届同学，大部分毕业后即走上了实际工作岗位。我相信早年的学术基础，对于他们后来的工作和人生都是有帮助的。当然，也有少数同学，毕业后升考研究生，然后成为大学的教授，在学术领域都取得了令人尊敬的丰硕成果。如李剑亮同学，他提交给报告会的论题是《鲁迅校勘【嵇康集】的成就及其特色》。毕业之后，他考上了本校吴熊和老师的研究生。吴熊和老师是国内有名的唐宋词专家，所以后来李剑亮同学也成了唐宋词研究的学术传人。又如余连祥同学，他的报告会论题是《【呐喊】和【彷徨】中的抒情小说初探》。这说明，余连祥的兴趣在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文学。后来余连祥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就成为了在国内有影响的现代文学研究专家。

同他们的成就相比，我汗颜得很。但我还是很高兴，在学生时代写的论文，能够与他们同列。我的论题是《文学的现代化和王蒙的小说——谈王蒙对典型涵义的丰富》。这说明我当时的阅读兴趣着重在

以王蒙为代表的新时期文学。说王蒙是新时期文学的代表性人物，就是从今天来看，也是不会错的吧。当然，我当时所跟踪阅读的，绝不限于王蒙。我几乎对所有当年有影响的作家作品，都强烈关注。所以我后来到图书馆，不是再去借书，而是到阅览室读新出文学杂志。那是个文学井喷的年代，也可以说是文学复兴的年代。其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文学杂志的大量涌现。文学的勃兴，需要有承载它们的辽阔沃土。我已经在多篇文章中描述过我当年阅读新出杂志，跟踪各位作家新出作品的痴迷热烈情景，这里就不赘笔了。但在新时期最有影响的作家中，王蒙无疑是我最为心仪的作家。我既喜爱他的《说客盈门》这类传统意味的小说，但更喜欢他的《风筝飘带》、《海的梦》、《春之歌》、《杂色》等被称为“意识流”的小说。虽然我的论题看上去很大：文学的现代化和王蒙的小说，但我也认为是恰如其分的。王蒙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贡献良多。系里选中了我这篇论文，除了论文质量尚可的因素，我想，论题的价值，也应该是因素之一吧。

写这篇论文，我是很下了功夫的。为了这篇论文，我还放弃了实习的机会。而我的指导老师张黛芬老师也给予了宝贵的指导。我估计，我这篇论文，可能就是她向报告会组委会推荐的吧。我已经记不清了，是不是当时所有四十二篇论文都上台宣读过了。如果这样的话，费时自然很久，不要说一天，就是两天也完不了。我在目录表上发现，现当代文学部分共有十一篇论文，其中有五篇被分别被小写英文字母标上“a/b/c/d/e”，是不是说明在“现当代文学”这十一篇中，这五篇是被选中要上台宣读的呢？

又很荣幸，我这一篇也在这五篇之中，而且序号是 b。如果我上面的推测是对的话，那么我应该是“现当代文学”部分第二个上台发言的。我是带了厚厚一叠完整的稿子上台的，在鞠过躬正准备照本宣科的时候，下面有老师提醒我：只说概要，给你 X 分钟时间。我立时慌了。本来我上台就紧张。我从来没有上过台，更何况坐在第一排的都是系里德高望重的老师们。平时都是他们在台上，我们洗耳恭听，现在换成了他们坐在台下听我的。如果照念，我还念得下去。现在临时要我说简要的，我就无所措辞了。我说了开场几句，接着脑袋就空

了，开始还语无伦次了一下，接下来就不知道说什么了。知道自己再说下去只会出丑，只好检讨了一下，说自己不知道要节要说，没有准备，就慌慌的自己跑下来了。

我辜负了张黛芬老师的一片好意。

这第一次上台的怯场表现，可能是我这一辈子大场面怯场的预演。直到现在，我都最怕当众即席发言。这说明我不但嘴笨，更主要的是胆小。所以我是上不到台面的人。正因为我自己有自知之明，所以我年轻时，就从行政岗位主动退下来，到媒体混迹。我自己觉得当记者还是非常顺心的，也是比较顺手的。但后来又在媒体单位走上了负责岗位，这也不是我所乐意的。但人生的路，又岂能都如人意？

最后还是来说说王蒙。我对王蒙的热情一直保持到了现在。虽然中间他的一些风格变化，我不是很喜欢。但前年他的大作《这边风景》（上下卷）出版，虽然标价高达七十多元，我还是第一时间就到台州书城买下了，而且一口气就读完了。我认为王蒙的诸多作品中，他写伊犁的小说，不说是最出色的，但肯定是非常独特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写的《在伊犁》系列，我就非常喜欢。

[返回目录](#)

## 丰富而紧张的学习安排

——杭州大学中文系 62 级 熊恩生

1962 年 9 月初，我考进了杭州大学中文系学习。我们这个年级共有两个班，我所在的是中一（1）班。我们班有 33 个人，其中插班生 3 人，均来自全省各地。杭大历史悠久，前身是创建于 1897 年的求是书院和育英书院，是一所文理为主的综合性大学；师资力量比较强，当时讲师职称以上就占教师总数三分之一；学校图书馆藏书达 50 多万册，在全国高校中也是名列前茅。至于中文系更是杭大的强系，前身是成立于 1920 的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国文系和成立于 1928 年的私立之江大学文理学院国文系。老一代很多著名学者都曾在中文系任教。校园内林荫夹道，校舍整齐，环境幽雅，应该说还是个读书治学的好场所。我们这一届的学制是 5 年，但由于参加农村社教和碰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到 1968 年 7 月才毕业。我在这里度过了不寻常的 6 年大学年华。

中文系的课程，古今中外都涉及。我们这一届一年级时开有《文学概论》、《现代汉语》、《写作》、《现代文学作品选读》、《外语》、《中共党史》和体育；二年级时开有《古代文学作品选读》、《语言学概论》、《古汉语通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外语》和《政治经济学》；三年级时开有《中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下册）》、《古代汉语》、《外语》和《哲学》。所有科目除《外语》是分小班教学外，其余都是大班教学，两个班一起上大课。一年级时，有的课还与新闻系的同学一起上。记得入学后第一次上大课在 227 教室，感觉很新鲜。与中学相比，教室大不说，黑板也多，有 4 块，且是活动的。但没有桌子，只有一张靠背桌，前面有块固定的板，可以记笔记。大学里，虽基本按教务处排的课程表上课，但也不时有变动，多时一天要上 8 节课，少时一天一节课也没有。每学期的成绩分考试科目和考查科目。考试科目不多，每学期一般只有两门；不考试的科目，都要进行考查，考查只要及格

就行。考试科目虽不多，但小测验经常有，压力也是蛮大的。记得教我们俄语那位老师就经常使用这一招，督促我们不放松学习。

与中学相比，学习安排也比较丰富。除上课这一主要途径外，还不时组织一些讨论。而讨论时，同学们往往“论战”激烈。记得一次关于对巴金小说《家》一书中觉新这个人物的评价，讨论中就有3种不同意见：有的认为觉新是个帮凶、是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有的认为觉新是个牺牲者、应该予以同情；有的认为觉新既是个牺牲者、但又必须加以批判。一次关于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的主角夏洛克，围绕作者对其有无同情的问题，争论同样很激烈：有的认为作者是予以同情的；有的则不同意这种看法。还有蒋光慈1927年写的小说《短裤党》一书中关于邢翠英形象的塑造，有的认为是成功的，有的认为是失败的，还有的则是折中意见；至于对书中杨直夫等人是否有必要写进去，也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是多余的，有的认为还是写进去好，只是刻画得不理想。就是党史课关于“真老虎、纸老虎”的问题，讨论中也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从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时就存在，有的认为只是到了帝国主义时期才存在。同样，政治经济学关于商品属性的讨论，也非常活跃。这样的讨论或者说争论，我很欢喜。每次我都积极参加，有时还第一个发言。我认为，讨论无论是能取得共识，还是不能取得共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大家多一些角度思考，相互得到一些启发，这会使自己的认识更趋完善。

除组织讨论以外，印象深刻的是，系里还不时举办一些学术讲座。如1964年1月徐步奎老师给我们作过《红楼梦》讲座，同年6月丁子春老师给我们讲过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的《红与黑》。《红楼梦》我事先看过，但两节课的讲座收获很大，特别是对《红楼梦》反封建的表现，以前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经徐老师一点拨，清楚了不少。徐老师特别指出，宝玉的进步性突出表现在他的叛逆性格上，不愿与封建统治、封建社会和平共处。当时《红楼梦》已拍成电影，对这部小说改变的电影，徐老师认为也是基本成功的，特别是最后的结尾（宝玉含糊出走）很好，对原著精神既不违背，又有所发展。徐老师还着重分析了《红楼梦》的爱情描写，指出了其成功的地方和妙处，听了

很有启发。让我钦佩的是，徐老师讲座没带任何书和资料，只带了一张小纸条，但却侃侃谈了两节多课，足见其学术功底之深。其实对《红楼梦》的研究还只是徐老师的一个侧面。徐先生对元明清文学尤其是在戏曲小说研究领域卓有建树。他关于明代戏曲家、文学家汤显祖研究的一系列成果，奠定了国内外汤显祖研究的基础。在1964年4月杭大庆祝建校65周年时，徐先生还专门作了一个《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学术讲座。汤与莎是同时代人，且同死于1616年，有不少相同点，但也有不同的戏剧创作传统；徐先生将两者做了比较，深入浅出，有独到见解，听后颇有收益。

《红与黑》是19世纪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的代表作，丁子春老师着重围绕主人公于连，讲了于连个人奋斗的过程、实质和时代意义，也讲了于连毁灭的根源和作者思想的局限。听后觉得对这部作品的阅读和认识挺有帮助，比自己阅读后的感受深刻得多。

除本系老师外，系里也不时外请一些学者或作家、艺术家来讲座，如盖叫天、高名凯、陈望道、胡裕树、叶以群、杨树达、任斌武、沈虎根等。印象比较深的是盖叫天和陈望道、胡裕树的讲座。记得进校后约两个月，系里便安排盖叫天老先生为我们作了一个学术讲座，主题是“艺术与生活”。第一次见到盖老很让我吃惊，当时他虽已76岁的高龄，但看上去只有50多岁的样子，身体很健壮，神采奕奕，精力充沛，又说又唱又表演。盖老讲话很风趣，谈的虽不是什么大道理，但却很实在。如“学问是大家的，艺术也是大家的。学问是一通百通，不通黑咕隆咚。要学得一点学问，必须要经过一番苦楚”、“要人读书，不要书读人；人用字，别让字用人”、“有钱不会用不行，有学问不会用也是白搭。因此学问最重要的是在于用”、“艺术是难话难描的，非得经过自己的体验”、“学艺术，自己对自己要狠、稳、准，学起来一大片，用起来一条线”、“学艺术，应该学会自己跟自己闹别扭，自己跟自己为难”等等。听了盖老的讲座，觉得很有收获，特别是关于要学以致用和严格要求的思想。

继这次讲座以后不久，1962年底的一天晚上，中文系还和盖老举办了一个联欢会，盖老把他的小孙女也带来了，并给我们表演了舞剑。

别看她只有 7 岁，可已经练了 3 年啦。随后，盖老给我们讲解了景阳冈上武松打虎的戏，并做了精彩表演，精神抖擞，活灵活现，一招一式，至今仿佛还闪烁在我眼前。令人痛心的是，盖老在文化革命中未能幸免于难，被诬为“反动艺术权威”，被推进垃圾车里游街。他在批斗中被压断双腿，从故居扫地出门；之后度过 5 年凄凉的晚年生活而病逝；粉碎“四人帮”后，沉冤才得以昭雪。金沙港 26 号盖老故居，2003 年修复开放。我退休后散步时曾多次前往，追忆这位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代京剧表演艺术家。

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和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胡裕树先生，于 1964 年 4 月被邀前来我们中文系做学术报告。主持报告会的是系主任姜亮夫先生。他介绍陈望道先生，说他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曾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同时也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语言学家，是我国现代修辞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于 1932 年出版的《修辞学发凡》影响深远；他还对中央反修的“九评”文章在修辞逻辑方面参与了把关。陈望道先生报告的主题是“语言学与反修”。他讲了 3 个方面，一是当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二是关于语言研究试行方案 4 个方面的内容，三是复旦大学近年来在语言学方面研究的近况。报告中他特别强调，一切要从我们中国的现在的语言实际出发，建立起我们自己的理论，一切崇古仿外都是错误的。

胡裕树先生是我当年读书时的教材《现代汉语》一书的主编，对现代汉语的研究有较高造诣。他在讲座中对陈望道先生在语言研究方案中提出的 4 个问题作了具体的探讨和说明。他也着重强调研究文法必须从中国的语言事实出发，说那种认为汉语没有形态变化、不能进行词的分类以及没有词法的观点是脱离汉语实际的，并列举了一些实例；同时强调对中国文法和外国研究成果的批判继承和吸收，只是为了借鉴，不是机械模仿。中文系当时学习的内容主要是两大类，一是文学，二是语言。我个人比较欢喜文学，不太喜欢语言，觉得语言比较枯燥。但听了两位先生的报告，我感到许多知识只要深进去，还是

蛮有乐趣的。就是这次报告会之后，我还特地去书店买了本陈望道先生撰写的《修辞学发凡》。

1962 年的高考招生，当时正处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录取分数线高，录取比率是解放后最低。据说杭大中文系我们这届就是录取分数线最高的一届。且当时根据省委主要领导指示，浙江自己也要留一些尖子生，因而便“截留”了一些高分考生。我和我们班有好几位同学，按高考成绩，当时都是可以进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正是这个原因，班里同学基础相对都比较好，读书也都很勤奋认真，成绩大部分都不错。系里老师也普遍看好我们这一届。

因为眼睛视力问题，我是高三下学期才决定考文科的。虽然中学里各课成绩都是优秀，也欢喜看一些课外书，写作基础相对比较好，但因只读过两年高中，还有一年读的是中专，学的是铁道建筑，平时对数理似乎更喜欢一些。因而进大学后，深感文科基础还不扎实，特别是外国文学和古典文学接触不多，颇感有些压力。记得新生见面会上，系主任姜亮夫先生说：“做学问就是要严格要求自己，既要猛火烧，又要文火煮，要持之以恒、刻苦钻研”。为弥补自己与有些同学的差距，我也曾决心用猛火烧 3 年，订了一些学习计划，决心在学习上把基础打好打牢。当时中文系编有一份《大学中文专业必读书举要》，列入了古今中外一大堆文学名著和语言类书籍，许多我都未读过甚至连书名还是第一次见到。当时我们陆续开的专业课，不少讲的都是古今中外的名家名作。每次上课前，老师都要我们预习一些原著。我总是尽力完成，并摘录了不少笔记，按照上面那份《举要》目录订了个读书计划，争取多看一些；对古典文学的名篇名诗词，则尽可能予以背诵。记得那几年，我们除上课外，自习时间比较多。为了有个安静的学习环境和多一点学习时间，也为了不影响同寝室同学的休息（学校规定晚上寝室 10 点要熄灯），我跟有些同学一样，不少时间都是到 137、201 等大教室里自修，晚上回寝室也比较迟。当时我家住在北山街，杭大离家比较近，从黄龙洞翻过一座宝俣山就到了。但为了多一点学习时间，除星期天外，我基本上都是在学校里度过。有一年，甚至整个寒假，除春节回家外，几乎都在学校里度过。即使星期天也

很少外出。上午时常安排到浙江图书馆去看些资料，浙江图书馆离我家比较近，不少书都是在那里借阅的。即便这样，总感到时间不够用。但通过这种如饥似渴的学习，自己感到还是很有收获的，与进校时相比充实了不少。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革去了我们继续学习的机会。我们没有能够完成 5 年的学业，否则我们这一届同学的知识会更加扎实，走上社会以后会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返回目录](#)



## 第四章：生活

## “爱情伞”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褚少英

记得大学时代，爸爸送我一把暗淡的橄榄绿尼龙伞。我非常喜欢！原因有很多：它色彩很文静，男女都可用；它很轻巧，既可遮阳又可挡雨；把它收好了卷起后，又酷似英国绅士的司的克（stick），很有高贵优雅纤细之“范”；它被撑开后空间较大，两个人同享还显得有点“奢侈”；因为是尼龙伞，淋湿后一撑开不久就干了！所以很受大家欢迎。有时天下雨，我看见寝室里有两个同学各自拿着一把伞要上街，就主动建议让她们带上我的伞合用，可以省掉一个劳力，以便可腾出手来，提街上采购回来的东东。大家觉得这个办法很实惠，以后都喜欢借我的伞出去。

不过，曾几何时它慢慢地成了情人们的“专用”伞！那是一个阴天，班付笑嘻嘻地对我说：“今天要借用一下你的伞！”我会心一笑，兴高采烈地抽出那把特受青睐的伞递给她，因为我知道她那天晚上要和 Li 大哥去散步……时间一长，大家都知道了这个秘密，开始借鉴和仿效。蒋文华，蓉儿一个个都既带羞涩又带几分俏皮的神色向我借用那把经久耐用的伞。

开始，旁观者都是心照不宣地相互眨眨眼偷笑，后来干脆调皮地拖着长长的“哦——”字调侃借用者。从此它就被称之为“爱情伞”了！

毕业后，我被分到桐乡二中，一个离嘉兴须乘起码两个半小时车程的崇福镇。我不想在那里呆上一辈子，所以尽管累也坚持每星期周五傍晚回家，周六傍晚回校，以实际行动来回折腾，让学校领导和同事认识到我铁了心要打回老家，以免某些热心人动脑筋劝我“做崇福人”。我本来就是丢三拉四的人，加上每周的折腾，有一次不小心将那把久经考验的伞落在车站，从此不再拥有……

好在我一向富有阿 Q 精神。我在感到惆怅惋惜的同时，又觉得有一丝安慰！请大家猜猜为什么？

[返回目录](#)

## 我的老杭大，我的露天影院

——杭州大学中文系 78 级 赵建中

电影适合在黑暗、封闭的空间中观看。看电影要在电影院或者至少是在室内，这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但我却有无数次在月亮下面的露天广场看电影的经历。在目前电影院已多如米店、影院也从大厅变为小厅又演变为 3D、4D、IMAX 放映厅的时候，回忆起以前在露天广场看电影的经历，真还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1978 年，我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当时，我们班上的几乎每一个同学都是电影爱好者，特别是外国电影的爱好者。只要上映新片，总是一场不落。

当年的杭大中文系位于武林门附近的上宁桥。那时候，晚饭吃好后，我们同学经常成群结队出去散步。散步的线路，有时候是去位于中文系隔壁的杭州师范学院（即今天的杭州师范大学）看新张贴出来的学生刊物，尤其是后来在众多的学生刊物中异军突起的《我们》；有时候就沿着西溪河边的马路到文二街，再到挨着杭大政治系的露天电影院看电影。

当年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经济、文化全面复苏，富有探索、创新精神的国产电影与风格多元的外国电影层出不穷，这让我们大开眼界。

那时的中国电影，像李俊导演的《归心似箭》、郑洞天导演的《邻居》、滕文骥导演的《生活的颤音》、杨延晋导演的《小街》都让人耳目一新。这些影片从苏联后期电影中的人道主义、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法国新浪潮与当年欧美流行的意识流等表现手法中吸取营养，在思想内涵挖掘与艺术风格探索上显出全新面貌。比如，《归心似箭》描写战争中的人性之美，既没有编排离奇曲折的情节，也没有追求叱咤风云的大场面，而是通过人的命运遭际表现革命者的情操。片中主人公是活生生的人，不是政治理念的化身。他们在严酷战争环境中萌发了一段纯洁含蓄的爱情。这在当时几乎排斥个人感情的革命题材

电影创作中似乎是犯忌的。《邻居》以住房问题为切入口，展现原生态的社会生活，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勇气。《生活的颤音》则将剧情与小提琴协奏曲巧妙地结合在一起，通过音乐更好地反映人物的性格特征与波澜起伏的内心世界。《小街》有意让影片不依赖矛盾冲突、情节发展来推动剧情，而依靠人物心理情绪的跌宕来展开，并为之新造了“情绪式影片”这一个新词。电影没有一个完整的、令人满意的结尾，而是设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构，让观众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去选择结尾。

当年的外国影片也是国别与风格样式多种多样，几乎每一部都是精品，并且有极其出色的配音。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日本影片大量引进。因此，当年我们看得最多的是日本片。其中有山本萨夫导演的反映日本中小企业在与大企业竞争中苦苦挣扎的《阿西们的街》，讲述日本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缫丝女工悲惨遭遇的《啊！野麦岭》，以20世纪70年代日本金融重组时代的风云变幻为背景、反映金融界钩心斗角内幕的《华丽的家族》等。这些影片形成一种集体性的艺术气势，反映社会矛盾深刻，让我们观后深受震撼。还有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山田洋次导演的反映小人物命运的系列喜剧片《寅次郎的故事》。片中，主演渥美清以幽默质朴的表演塑造了四处流浪，善良、热情、豁达的日本第一大闲人——寅次郎的形象，以此反映日本平民最朴素、最简单的乐观精神。影片在嬉笑之余，也流露出一丝淡淡的惆怅。就在这家露天电影院，我还观赏到高仓健、仲代达矢、三浦友和、山口百惠、松板庆子、中野良子、吉永小白合、倍赏千惠子等众多日本明星的精湛表演，从此记住了他们的名字。

在露天电影院看电影虽然有缺憾，就如用粗瓷大碗喝拉菲红酒，但也自有一番情趣。比如在观影时，有清风明月相伴，间或有汽车喇叭穿插其间，感觉接地气，观影心态放松。另外，有些电影真还适合在露天放映。比如，《阿西们的街》有多个场面是表现那些日本青年弹着吉他、用近乎呐喊的声音演唱摇滚歌曲、宣泄心中苦闷的。在广场上放映，那些弹唱就有响彻云霄的感觉；在讲述挪威作曲家格里格早年生活的传记影片《挪威之歌》中，格里格名作《A小调钢琴协奏

曲》作为主题音乐贯穿始终，音乐的节奏与旋律昂扬、激越。露天欣赏，我总觉得它在天际回荡，令人热血沸腾。1979年拍摄的捷克电影《非凡的艾玛》也是在这家露天电影院看的。片中，艾玛将歌剧艺术带到民间，将美声歌唱融汇到日常的生活情境，脱去了之前过于舞台化、远离生活的局限。这段故事在露天电影院中看似乎更容易读解。艾玛亮起嗓子唱起华丽的咏叹调，在露天影院听来更有穿透力、更加辽阔悠远。我想，这种音乐效果在电影院是无法替代的。

我在文二街的露天电影院看过许多优秀影片，也留下许多回忆。当年，紧挨这家露天电影院有一排平房。平房对着银幕，所以每次放电影，总有好多人头挤在一起，隔着窗上的铁栅栏看免费电影。当年，正好有一部讲述监狱里革命斗争的故事片叫《铁窗烈火》。于是，每当看到免费蹭看者聚集在栅栏口，一位后来成为小说家的同学就说：“铁窗烈火又开始了！”有些同学觉得滕文骥执导的电影《生活的颤音》，片名文艺腔太重，有点矫情。于是说到此片，就称之为“生活的抖音”。还有一次，露天电影院放映讲述一对原本关系冷漠的父子消除心理隔阂的意大利电影《父子情深》，看后大家为之深深感动，然而觉得片名很一般。同寝室一位有语言天赋的同学查阅后告知，片名的意大利文直译是《春天里的最后一堆雪》。我们听了都为之叫绝，觉得这才既点题，又富有诗意，为该片中文译名的平庸深感遗憾。

到了大学后期，杭大中文系附近又新设两个看露天电影的场所：一个是学军中学的操场，一个是海洋研究所运动场。我们在大学就读期间，电视也开始兴起。在学军中学操场看完电影后，有时意犹未尽，会再拥到学军中学办公楼，继续看荧屏播出的电影。

（原载解放日报 2019 年 1 月 31 日）

[返回目录](#)

## 我的大学寝室生活

——杭州大学中文系 74 级 范洪祥

1974年9月，当年已经24岁的我被杭州大学中文系录取，成为当地少有一位被推荐进入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我根据录取通知书的报到地点，按时来到了杭州市文二街杭州大学中文系校址报到。

进入学校大门，在新生报到接待处几个大字的指引下，我向接待人员办了入学手续，又在新生花名册上找到了我的名字。我被编入杭州大学中文系二班（6）组，担任组长，寝室编号304室上铺。

我领取了304寝室钥匙、学生证、校徽，在一位老生的引领下到了我的寝室。寝室设备很简陋，没有电风扇、空调、储藏间。寝室放了3-4张双人床，睡5-6人，其中一张床放行李与洗漱用品。还有一只多层的脸盆架子，每人一只单人课桌供在寝室学习使用。双人床的底下，每人放着鞋子或暂时不需要的用品。整个寝室面积小。放好行李，这标志着我的大学寝室生活的开始。

中文系的校址原来是一所省级干部培训学校。由于大学本部住不下，将中文系安置在这所学校。学校规模挺大的，教学楼、学生寝室、阅览室、操场、食堂一应俱全。宿舍楼是三层的工字型大楼，中间是一条走廊，每个层面都有卫生间。

同学们在规定报到的最迟期限内都到齐了。第二天，学校如期举行开学典礼。我们通过自我介绍相识，有来自嘉兴、上虞、临海、江山、诸暨5个地方的同学。我们因为年龄差距，大小相差4-5岁，经历也各不一样。

同学中有来自基层农村的普通农民，有来自城镇单位的职工，有来自东北支边的知青；有已婚人士，也有未婚的单身汉；都经历过艰苦环境的磨练，性格也各异。但是，我们寝室就是一个家，每个人是家中的一员。大家相互关心、照顾、体谅。

我们寝室这个家是我们大学学习生活的场所，是我们共同的生活家园，是我们每天的学习生活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当时，尽管物质生活十分简陋，但是我们非常珍惜这个整体，精神生活非常丰富。

我们实施了寝室长轮流值周制度。轮到做寝室长这一周，负责好一周卫生、纪律。早起一刻钟，负责将寝室 5 名同学开水打好，寝室卫生保洁好。当同学有事时，其他同学会主动替代。有的同学住双人床的上部，每次上下都要踩着床铺边上的支点爬上爬下，比较不便。但是大家很好商量，定时或随时可以轮流调换上下位置。有同学亲朋好友来校，大家也都热情招呼。需要过夜的，有时与同学合床，艰苦让出一晚。

当年大家没有电话机，楼层也没有公用电话，同学之间联系靠书面留言或托人传话。当有同学上街或到市区办事不能按时返回吃饭，同学看到留言就主动帮助到食堂打饭菜拿到寝室，体现同学寝室大家庭的温暖。

当时寝室生活非常艰苦，寝室没有晾晒衣服地方。同学们就在楼下空旷地方拉一根绳子，挂上衣服晾晒。寝室没有卫生间，洗澡就到厕所间，带一瓶开水在厕所冲洗。当年粮食定量供应，男同学每月 30 斤，有时不够吃，农村同学就主动从家里带来几斤粮票奉献。

时逢六、七月高温季，杭城天气非常炎热，寝室实在热得难受。寝室同学就相互帮助，将床铺抬到室外，大家就在室外度过一个个炎热之夜。当有同学汗水湿透没有换洗衣服时，其它同学就帮助递送换洗衣服。

这寝室又是我们小组学习交流的场所，精神文明传播的平台。我们小组 10 名同学，其中来自舟山、金华、绍兴 3 位女同学住在一层，2 位来自义乌、文成的同学插在其它组的寝室。每次分组讨论，都要集中到我们寝室。

同学来自全省各地区，说地方方言都听不懂。我们都以自觉说普通话，为我们学习交流的行为规范。大家意气风发，谈笑风生。一起听课讨论，做作业，作诗词，讨论国家大事，相互取长补短。有很多课余时间或周末一起上街、一起在校园外走路散步。

每逢放假返校，来自各地的同学都会带些许家乡的土特产给同学们分享。尽管当时大家经济条件都很差，带来土产极少，那怕是几只桔子，几块芝麻糖，在当初生活贫穷，物质匮乏的年代也是非常不易。深深觉得量少情义重，是一份真情的体现。

每逢佳节时，特别是中秋节，我们寝室同学会自发相约。大家各自买点糕点到白堤中秋赏月，共赏明月良辰，共祝节日快乐。在临近毕业季节，我们寝室也举行分别茶会，大家表达依依惜别之情。这些依依之情都留在笔记本上，我记得其中有：

同窗三载见情深，临别倍觉朋友真。  
愿君此去创大业，群英会上再相逢。

还有：

三年同窗结知心，今日挥泪别友人。  
胸有万言口难吐，只愿频频报佳音。

除了相互赠送离别留言，还赠送离别照片，表达了深深的寝室同学之情。

[返回目录](#)

## 四十年前的寝室“卧谈会”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钱晓霞

（2020 年 6 月 6 日）

每每回忆起 40 多年前在杭州大学的求学生涯，脑中就会浮现绿草如茵、朗朗书声穿徬于小树林间的校园；不同语种课堂上抑扬顿挫的讲课声和此起彼伏的互动对话；图书馆里求知者穿梭或驻足于无数排书架间的孜孜搜寻；阅览室里埋头苦读或奋笔疾书的背影。除了这些画面之外，在我的记忆中还有一处难忘的“美丽岛屿”——大学寝室，尤其是每晚熄灯就寝后与室友们的卧谈。

因为宿舍紧张，外语系 78 级的杭州籍学生在进入大学后的前三年都是走读。我记得，当时我很羡慕住在大学宿舍里的同学，总觉得没有住过大学的学生宿舍，大学生活就缺了一环，而且是很重要的一环。

在大学的第四年，杭州籍的学生终于可以选择住进学生宿舍。我的寝室在当时的杭州大学 5 幢女生宿舍的三楼（具体房间号不记得了）。除我以外，另七位室友来自不同的班级或专业。老马来自德语专业，老宣、老承、小陈、小姚来自英语专业 4 班，小邓来自英语专业 5 班，老安来自英语专业 6 班，我来自英语专业 2 班。因为都是杭州人，有时在寝室里交谈，我们时而用英语（当然是在老马回来前），时而用汉语，而很多时候却是杭州方言大行其道。

我们八人虽兴趣不一，个性迥异，却彼此包容，相处得非常和谐快乐。老马兰心蕙质，善解人意；小姚谨言慎行，凡事低调；老承沉稳内敛，委婉含蓄；小陈天真烂漫，率真活泼；老安遇事不慌，处事不惊；小邓喜欢凡事分析因果，一探究竟（我总觉得这与她喜欢



历史研究相关)；老宣平静的外表涵盖着她的内心的执着和热烈，在室友需要帮助时，她的大姐风范立刻显现；而我却是天马行空，空想多于行动，常出惊人之语，或引起哄堂大笑，或招致“群体抨击”。我们当然也有各自的小秘密，偶尔被识破，也只是心照不宣地相视一笑。室友中，我和老宣喜欢斗嘴。我时不时会被她软软地呛一句，于是给她起了个外号叫“鸡汤”。表面看似温温醇敦，猛喝一口会烫到肺腑，但回味一下又觉得味道鲜美。

有人说，大学生的真正交流是在每日紧张学习放松后的就寝时间。这话对于我们那代的大学生来说尤其如此。我们是文革结束高等院校恢复招生后的第二届大学生。我们都知道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我们对知识的那份求知若渴，可以说怎么形容都不为过。每天的校园生活，除了食堂和宿舍外，基本两点成一线：教室——图书馆/阅览室。在这两点之间行走匆匆的外语系学生，大都夹着一本厚厚的词典，手捧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头上带着耳机，边走边听，嘴里还念念有词。词典、半导体收音机和耳机当年成了外语系学生的标配（到1981年，不少人的半导体收音机逐渐被卡式录音机所取代）。

白天，我们几乎见不着面，只有到晚上10:00左右陆续回到寝室。熄灯后入睡前，开始了我们的“卧谈”。小邓因为正处大四考研冲刺阶段，有时会回来更晚些。等她回到寝室，我们或已处在聊天的“强弩之末”而睡意困顿，或已呼呼大睡而进入梦中的境界。但还是有不少时候，她会加入“卧谈”。

应该说我们那个时代的大学生的精神生活是很丰富的，虽然社会环境仍然比较保守。我们“卧谈”的话题主要有关个人上大学前的一些经历，对专业相关课程内容的讨论（有时也难免会对某些专业课老师的教学吐槽一番），新近读过的书和看过的电影、国际时事、国内要闻以及对社会和校园里一些事件的看法等。记得80年代《潘晓日记》所引发的全国人生观大讨论也是我们的“卧谈”话题之一。《潘晓日记》挑开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表达了年轻人的困惑。然而，那个时候的我们却并不觉得人生的路越走越窄。我们“卧谈”了各自的家国情怀和舍小我顾大我的社会价值观，乐观满满，觉得前程坦途一片。

还有，当年外语系有同学参加人民代表竞选，我们也很兴奋，幻想着对学校的很多不满能随着这位同学当选人民代表而迎刃而解。那几天我们的“卧谈”就围绕着他与其他系科竞选人的优势和劣势比较，及如何到现场给他加油造势。与今天的大学生相比，那时候的我们，虽思想单纯，但并不缺乏思辨。我们有着较强政治意识和更多对社会发展的关心。

在我们的“卧谈”内容里，几乎很少涉及毕业后的就业，似乎这不是我们要关心的话题。我想，这与我们当年毕业计划分配的教育政策相关。我们普遍没有今天大学生的就业焦虑。而如今女大学生所津津乐道的嫁人、美容、减肥、穿衣搭配等话题，在我们的“卧谈”中完全缺席。当时我们的头脑里确实没有这些意识。当我们说起 beautiful 或 pretty 一类英语单词时，会联想到很多自然景观，或书中及电影中的人物，却全然不会关联到现实中的自己，或彼此该如何打扮。

有时，个人在生活中或学习中遇到的难题也会拿到“卧谈会”上谈论。七嘴八舌的建议，即使不能解决具体的问题，但也能使诉说者得到宣泄和安慰。关于异性与爱情的话题偶尔也会被提及，但几乎都停留在精神层面。当年的大学生虽多为成年人，但由于文革思想禁锢的影响，普遍缺少有关性的知识。虽然外语专业的学生读了不少欧美小说和诗歌，然而每每谈到爱情，似乎都远离人间烟火而飘在云间。我当时算是读了不少人间“杂书”，因而相比较而言稍稍多知道一些。有一晚“卧谈”，我试图给室友们“扫盲”。可刚一开口，听者一致要我停止再聊这种“流氓”话题。几十年之后，我们重聚时，我旧事重提，我们都大笑不已。

我们的大学寝室生活虽只有短短的两个学期，但在这期间，通过寝室“卧谈”，我们有思想的碰撞，情感的交流，智慧的互补，因而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982年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大学里教书。35年的教学生涯中，我接触过60后、70后、80后、90后及00后不同年代的大学生。在与学生交谈中，我明显感到，作为校园生活一部分的大学生寝室文化带

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就寝后的“卧谈”话题从理想主义的精神轨道越来越转向实用主义的物质目标。当然，这也是因为后来的大学生要面临更多的现实问题和人生选择。后几代大学生的寝室“卧谈”的话题范围要广得多，内容也更开放和包容。我们当年羞于启口的某些话题被 80 后及再后来的大学生聊得坦坦荡荡，理所当然。而且，电子设备的更新换代也使得大学生在寝室里的交流越来越趋于无声。尤其是 90 后和 00 后的大学生，虽同处一室，“卧谈”却多是通过点击手机屏幕而进行的无声交流，内容更为琐碎日常。曾经让我们怀念的大学寝室“卧谈会”，在今天的大学生中正渐行渐远.....

[返回目录](#)

## 舞会

——杭州大学外语系 92 级 王雅平

今天是我母校的生日，虽然她在官方序列里不存在了。我们自发地怀念她……

“老”这个字的意思，最常用的是“上了年纪”。有时候用来作为一种亲切的尊称，比如老王、老张。“老”还有一种苍凉感，意味着消逝和失去。比如老房子、老故事。这也没啥。谁都要老的。比较狠的一个用法是，不说某某故去了、过世了，而说他“老”了。比如“老衣”。用一种平静和缓看破一切的语气说：某某老了。

我的母校在使用着的官方序列里不存在了，知道她的人现在提起她需要加个“老”字——老杭大。非常民间、非常口头的一个称呼而已。她的身份被剥夺已经 22 年，虽然还有一条通往南校门的路名保留了当年的名称“杭大路”，但是这些年这座城市大量的新移民并不能确知这条路和一所曾经是这座城市的荣光的学校的内在联系。

一切都在加速消失，加速湮灭。我们这批称得上是最后的杭大人的回忆，很快会成为“口述历史”。作为“老”杭大，她现在只有靠她养育过的散落的杭大学生的一鳞半爪的拼凑，给她缝一件记忆的百衲衣……

我入校是 90 年代初，女生住在 9 幢五楼。甫一进校，就有高年级的同学来发纸片，周末有交谊舞会培训——“上了大学不会跳舞可不行！”。被这句话击中的、大部分来自村镇的女生们面面相觑，当即决定集体去接受这个扫盲培训。

到了周五，吃过晚饭，我们相约着一起往梧桐掩映的白水泥路上走过去，寻到“公共体育部”。很好找，老远就听见大喇叭放送的音乐。

双开木门挂着一块墨绿绒布门帘，长长地垂到地上，门口一个男生站着收票。怯怯地问是这里吗？“新生是吧？进去好了，进去好了”。

和教室的水泥地面相比，健身房的木地板温馨多了。我们不会跳，站边上看着。很快，有附近的男生伸出手做出邀请的姿势，也不说话。慌乱地拒绝是唯一的解救之道。

——新生真好“骗”。

哪是什么培训，舞厅需要吸引女生罢了。

后来上了体育课，学了几式华尔兹、快三，再去舞厅就有了几分底气。健身房靠墙放着里外两排低矮的长凳，女生大多数扎堆。有的看看舞场里的身影，更多的则是三、两个聊天。奇怪，既然专门来了舞厅，又为什么总是坐着和女同学聊天呢？男生则是站着的居多。偶然有善于此道的男生和舞伴跳出华丽的舞步，就有几个近旁的拍手叫好。一曲未终，那女生面前就被数条胳膊围住。这时候便是女生的矜持和男生的坚持之间的博弈。那片胳膊从小树林到两、三并列，在女神心情好的时候，终于有一个得到青睐。其余的虽然散去，但是总有执着者一而再、再而三。得到青睐的自然高兴，屡屡受挫的除了悻悻然之外，是不是生出发愤图强的志气来了呢？我无从得知，需要当年的男生来回答了。而女神之外的普通女生，特别是在低矮长凳上黯然独坐成为“壁花”的，是不是因此生出自卑心，还是回寝室苦练化妆术并搬出名人名言：“上帝给女人创造一张脸，女人自己再创造一张”来自卫呢？我也无从得知。但是我们寝室的几个女生（包括我），在几周后，纷纷补上了人生第一个化妆盒。

在“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的年代里，舞场上的受挫倒是不可或缺的一课。知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也熟悉了萨克斯、肯尼金、探戈这种西洋名词，也算补了一堂西方文化课。

杭大文科之强，当年在浙江省无出其右者。即便放在全国也是可圈可点。相应的，杭大的女生就比浙大、浙工大等要多很多。但是人数多了并不因此减少“女大学生”的骄傲。1990年代初，大学生心中自有一个排名。从录取分数线来看，浙大第一，杭大就是第二，之后工大、商学院、杭电、丝工院等等。于是形成一个心照不宣的“鄙视链”。外校到杭大舞厅来的男生不少，而除浙大的之外，其他学校男生就不太容易被杭大女生看见。于是有脑子灵活的找到在杭大的同学

搞联谊，把杭大的女生集体约到对方学校的舞厅去捧场。某个晚上，我们一群人在熟悉的男生（大概是班长或者学生会什么干部）带领下，骑着自行车出北校门，沿文三路往东。昏黄路灯下，铁栅栏围着的绿篱团团的，我们在风里说笑着往前。进门又上桥又下桥地寻到工大的舞厅。在那里待的时间并不很久，工大的舞厅并不比杭大的舞厅好玩。又都有寝室的规矩管着，很快就有女生提出要回学校。带我们去的几个男生没办法，只好分工，让其中一个早早地送我们回学校。也不知道应承了兄弟会带“校花”、“系花”去捧场的男生，到底是有了面子还是没了面子。

谁能想到 20 多年后，是排在倒数的杭师院的男生被众多女人称为马爸爸并改变了世界呢？

读的什么大学，真的很重要吗？

离学校不远有一条教工路——文教区之氛围可见一斑。某一回，我们系的学生会主席，诸多女生心中的男神，找到我们几个低年级的学生会干事宣布：“有一个和外国专家联谊的机会”，然后报出一个听上去非常高大上的单位名字——亚太水利中心。已经读大四的主席素来稳重，金丝眼镜浅色衬衫，已然是潇洒成熟的青年才俊。这次他竟然把这样的好事发给我们这些初进校门的小啰啰头，怎不叫人激动。学外语的女生热切盼望和外国专家练口语的机会啊！

可惜的是，那一个晚上最多见到一、两个老外。口语也没练成。

同去的一位女同学很善于唱歌，一首香港流行金曲得到了满场掌声。

偶然听说，有为了争夺舞伴而拔出老拳的。输赢是谁不重要，在青涩的女生听来，更多的倒是青春激扬的浪漫。

周末舞会也有在食堂举行的。餐桌被吱吱嘎嘎地移开，再拖上两遍地。录音机哄哄地放出音乐，简陋的舞场就算开张。但是食堂毕竟是食堂，即便是新食堂也还是有滞留不去的大锅饭菜气，水磨石地面也总有些油腻。最受欢迎的总还是公体部的健身房。

我因为缺乏运动才能，很不善于跳舞。加之后来谈了男朋友，有一种落后而纯朴的自律意识，所以舞厅去得很少。在交谊舞课程方面，我属于不及格生。回想起来，还是小有遗憾的。

[返回目录](#)

## 寝室

——杭州大学外语系 92 级 王雅平

1993 年夏天，酷热。空气好像烈日下暴晒的钢板一样，滚烫、刺眼、僵硬。这当口，学校宿舍却停了电。

我们那一级的女生宿舍在 9 幢，靠近北校门的文三路。斜对面是杭州的一所排名前三的高中——有从这所高中毕业的女生就微微一笑说：我们读了三年，就为了跨过一条马路。

一种谦虚的骄傲。

9 幢是一排 80 年代末才修建的宿舍楼的四分之一，那一群淡红色的建筑还透着新鲜气儿。外墙是淡红色调，宿舍内则是绿色配暖黄——打开墨绿色木门，迎面两排面对面的学习桌，一人一个，带挂锁；暖黄桌面光洁明亮，铁质的书桌抽屉里贴心地做了个隔层。一人一个小世界！

靠两边墙各放了两组上下铺，墨绿色铁质栏杆、木板床。那时候，学校宿舍管理还没有要求统一被褥，于是床品就显出各自的趣味来。淡蓝提花的、彩虹细条的、绿白方格的，和着女生们淡淡的香气，一屋子生长着春天。

睡在上铺的女生有时候偷懒不爬上床去取东西，就踩着方凳上了学习桌，踮起脚来，上半身向床铺里找东西。于是，暖黄桌子的直线、女生踮着的脚背的短斜线、微微带一点弧度的小腿的后侧线、身体和床铺构成的长斜线、半截儿胳膊的短横线，有时兼有刚洗完头发披着的湿漉漉的乌黑的略有起伏的小瀑布线，身后对开的鲜绿色的木窗横平竖直的线……组成一幅写实主义的青春图画。

傍晚的寝室是最芬芳的。吃了饭，洗了澡，湿淋淋的头发飘散着海飞丝和飘柔的香气，哼着歌儿端着盆从水房回来，身后留下几排塑料拖鞋半只半只的水影。进了宿舍门，先弯腰放下绿壳塑料热水瓶，再把盆归置到脸盆架上，把尽量绞干的毛巾挂上凌空拉着的一条塑料绳。然后向里走，到了自己床前桌前，拿出小镜子——镜子里一张水

灵灵明媚的脸。有的同学打开了随身听，这叫做 walkman 的东西当年可是奢侈品，好几百元，抵得上大半年的生活费。但是，既然学外语得经常听磁带，那么随身听的奢侈似乎也算不得应当。

熄灯后，寝室静下来，能听见随身听咔哒咔哒轻微而明确的按键声。卡朋特乐队 yesterday once more，麦当娜 bad girls，林忆莲王靖雯（后来她改名王菲）陈淑桦《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辛晓琪的《领悟》……在没有微博没有微信没有网络社交的年代，流淌各种歌声的磁带是年轻人不可或缺的蕴藉。

随身听不是人人都有的高级玩意儿，收音机是人人有的。

学校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个迷你收音机，圆头圆脑的，手感挺好，叫我们收听当时有限的几个外语广播电台。

不过女同学们更多地用它来听“孤山夜话”。

晚上10点（也可能是10点半），一个磁性的男中音悠悠地说道：静静的夜，睡不着觉。请听：孤山夜话。

那是本城开风气之先的情感夜线直播节目。

静静的夜，睡不着觉，又不能看书（或者说不想看书），寝室卧谈会也已经暂告一段落，不如听一会儿别人的故事吧！这世界上，有诸多的人有诸多的心事，只能说给陌生人听。即使不能解决问题，诉说本身就已经是一种解救。

温和的声音是具有抚慰力的。

打进热线的听众总不外是些个人遭遇，无非是情感受挫。很少有人讲职场困境——1990年代初，南巡讲话刚刚结束，入关谈判正在进行，大学生虽然说不再“包分配”，但是年轻人总体上还在无忧之中。

于是有闲情关心陌生人。关心他人的喜怒哀乐。

谁说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呢？在无须为自己的生计发愁的时候，人的同情心都是会散发的。

主持人功力深厚，语言亲切。打来电话的听众，大部分都能得到抚慰。这样一档节目，在我们之中非常能够引起共情。

偶然，在一片静谧里会炸起一声怒喝：气死我了！

那是替热线听众愤然。

这时往往会从某个床铺里响起应和声：就是，太坏了！

于是卧谈会又重新开始。

孤山夜话的主持人之一，好像姓姚的一位，某次被学生会邀请到学校来交流。消息传开，很快大教室就水泄不通，里外三层。

这一次集体追星是我们共同的精神记忆里的一个碎片。

甬道算得上宽敞，南北两排宿舍门都有气窗各自借光。楼高五层，每一层都有半个教室那么大的水房。水房不但飘出水汽和水声，更时不时地飘出歌声，响遏行云。

水房歌手主要是男生。中气足，歌曲多，“四大天王”提供了各种曲风，在校园里回荡，供学生们模仿——以及，荷尔蒙乱窜的年轻人，除了打牌踢球之外，还得有更方便的宣泄精力的渠道呀！

水房既不像教室那么严肃刻板，又自带混响效果。白瓷砖贴的水槽上，一排水龙头白花花地尽情用，根本不用考虑费用问题。无论是洗衣服刷鞋还是洗自己，都有一种即刻呈现即刻回报的劳动快感。

还有比这更好的卡拉OK吗？（看懂这个词的人也得是没资格过青年节的中老年人儿了。）

至于为什么女生能听到男生从水房传来的歌声？那是因为我们女生住在9幢5楼，1、2、3、4层都是男生宿舍。有时候，需要去三楼找自己班里的男生。刚到甬道口，便是扑面而来的热力，烘烘然，温度都比五楼女生区高一度。

夏天男生不可以上五楼，女生确有需要可以下去——但是甬道上遇到光着膀子刚从水房出来的男生，饶是假小子女生也会羞涩地转过眼去。

男生也羞涩的。有只穿着短裤的会大叫一声，仓皇逃走，急遁。羞涩是宝贵的人生礼物，年轻时才有。

## 返回目录

## 洗澡秘史

——杭州大学历史系 80 级 全根先

洗澡对于现代人来说，早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天不洗澡，总感到似乎缺了什么。然而，对我而言，洗澡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对早已过了知命之年的我来说，以大学二年级正式进入澡堂为界，人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乡野小子与开化之人！所谓乡野小子，就是不知现代文明为何物。即便有一点书本知识，也与自己的生活基本没有关系；所谓开化之人，是指不仅有了一些文化知识，而且在自己的生活中融入了现代文明因素。以当时语气说，就是有点像“城里人”了。

为什么我直到大学二年级才进入公共浴室呢？说起来，还真有点常人或许不太理解的一点点“秘史”。

说起来，在洗澡这个事上，我真有点对不起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礼乐文明了。根据史书记载，洗澡这事，或者说沐浴文化，至少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甲骨文当中，就已有“浴”“沐”“洗”等字。这几字还有不同的含义：“浴”是洗澡，“沐”是洗脸，“澡”是洗手、洗脚。商周时期，最高统治者在登基、祭奠等重大活动中，都要斋戒三日、沐浴更衣，以示郑重；对官员而言，“吏五日得一休沐”，表明洗浴对官员仪容仪表的重要性，对于天地的敬重。《论语·宪问》中说：“孔子沐浴而朝”。可见，作为一代宗师的孔子，他也是洗完澡再去见诸侯的。不仅是孔子，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也是非常讲究卫生，勤于洗澡。《庄子·田子方》中说：有一次，孔子去见老子，正好碰上老子在洗澡，见他披着长发，简直不像个人，把孔子吓了一跳。战国时期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在《离骚》中，也写下了“浴兰汤兮沐芳”一句，这是当时民间人们在沐浴节活动的形象描述。实际上，我们说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不是瞎吹的。它体现在对日常生活的严格要求上。古代甚至还有规定，上下身浴巾都是要分开的。我

们现在都不一定能做到。《礼记·内则》中讲：“外内不共井，不共湣浴。”这里不仅有道德因素，还有卫生方面考虑。

不过，洗澡这事，“老外”可能不见得比我们落后多少。我最近看于殿利先生写的《人性的启蒙时代》一书，注意到公元前五千年，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已经过上了相当的文明生活。虽然没有发现澡堂遗址，但是，其中有一件文物，两个裸身男人顶着一个像澡盆一样的东西。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就有了公共浴室，人们把安置在一根大约齐腰高的独脚柱上的喇叭口承水盘——“卢泰利雍”中的水淋到自己身上，大家一起洗澡。在古罗马，浴室以皇帝的名字命名，建筑富丽堂皇，像宫殿一般。浴室不光是为了洗澡，还是社交活动场所。印度人将恒河视为母亲河，从喜马拉雅山麓奔涌而下的恒河水，被视为“通向天堂的大门”。数以百万计的印度人跳进“圣河”，其场面着实蔚为壮观。如果有什么可以引以为自豪的话，或许我们宋代就有的“浴池挂壶”，给十九世纪的英国人带来了灵感。他们发明了比较私密化的家庭浴室，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然而，这些洗澡故事，对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活于乡下的我来说，却是毫不知情。我小的时候，一开始是住的草房（当时我们一个生产队四十来户人家，只有两家是砖房），家里人多，不可能有浴室。夏天，我们洗澡其实不难。我家有一个百米平方左右的池塘，跳到池塘里冲洗一下，算是洗澡了。顺便说一句，我学游泳，就是在家里的池塘学会的。有一次，我手中抱着一个洗脸盆下水。一不小心，脸盆脱手。出于本能，在水中奋力挣扎，发现自己居然会游泳了。当然，距离是不行的，就是从池塘这边游到对岸。春秋天，天气有点冷，不能游泳，怎么洗澡？其实，没有洗澡，就是端个脸盆，倒上一些热水，家中找个地方，擦一下身子。不过，因为不太冷，所以，还算勤快，一个星期左右擦一下身子，这个频度还是有的。可是，到了冬天，寒风刺骨，室内阴冷，别说洗澡，就连擦身子都不能，因为担心感冒。虽然脏一点，不生病总比感冒强。

我上的小学、初中，学校没有澡堂，都是回家洗，大体如此。高中时，我们第一年是在学校农场劳动，一天上课，一天劳动。我家离

学校不到十里地，每到周末，我们就结伴回家。回校时也是一样，约几个同学，结伴回校。大家肩上都背一个米袋，十来斤左右，是一个星期的口粮。可能还会带上一瓶或一盒家里做好的菜，稍微改善一下伙食。因为一个月的伙食费只有三块钱，平均一天一毛。所以，一个星期我们才能吃上一次肉，大概每个人一两左右一块肉。那个时候，记得学校澡堂是有的。老师们家里都没有浴室，他们怎么洗澡？还记得在农场时，我们的语文老师洗完澡，热气腾腾地从澡堂出来的情景，真是神清气爽！我跟老师打了个招呼。他跟我说：全根先，你一会到我寝室来一下。我进了老师的寝室，还能感受到老师身上散发的浓郁的香皂气味。不过，老师对我讲的话，却让我记到现在。他说：全根先，你是学习的料，但交朋友要注意，不要与那些吊儿郎当的人来往。当时，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吊儿郎当的人指的是谁，到现在也不明白。但是，话我是记住了，大体是孔子讲的“益者三友”、“损者三友”的意思。

1980年秋天，我进入杭州大学历史系。我们的寝室，是在刚落成不久的九幢。窗明几净，八个人一屋，其乐融融。有的同学甚至可以说形影不离。然而，在洗澡这件事上，我却很少与同学们一起去。同寝室的人中，张杰、沈泽恩他们是城里人，自然比我们农村来的几位讲卫生。陆卫明、赵德清、毛水生、余金荣、曹永义他们，好像也比我讲究，进学校不久，是去学校澡堂洗澡的。特别是毛水生，因比我们稍大几岁，我们叫他老毛。他还经常自己拆被子，自己洗，自己缝，这在男生中是少有的。而我呢？大概十一月以前，我就在宿舍浴室冲冷水澡。直到在南大上研究生，我基本保持这个习惯。可是，到了十一月以后，天气有点冷了。特别是十二月、一月，冷水澡是不能洗的，否则容易感冒。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拖。实在不能拖了，身上脏得难受了，打点热水，到寝室的浴室去，像在家里一样，擦一下身子。

我第一次进学校澡堂，是在大二第一学期冬天。有一天，周崇坚同学跟我说，咱们一起去洗澡？那时候，经过大学一年多的熏陶，我多少有点开化了，所以没有拒绝。我们一人带了一个脸盆和换洗的衣

服，来到位于学校东南角的公共浴室。我是平生第一次进入这样规模空前的大澡堂。当然，进去以后，先是找一个放衣服的柜子。脱衣服时，我没有脱短裤。崇坚说，把短裤脱了，大家都一样。我还是没有脱，就进去了。澡堂里，热气腾腾，烟雾笼罩，不辨人物。有一些同学泡在大水池里，好像是在享受人生。我小心翼翼地用手先试探了一下水中的温度，然后轻手轻脚地下到水中。一股水流冲来，似乎还带一点咸涩的味道。我胡乱地在身上抹了几下，似乎有一种快要休克的感觉。于是跟崇坚说，我上去休息一下。上来以来，果然感觉良好。我不下去了，就到冲淋浴的地方，与不相识的同学共用一个水龙头，痛快地洗了一个热水澡！

从那以后，我倒真觉得洗澡的好处了。一般而言，两个星期去一次澡堂。其中的原因，还与洗衣服的频率挂钩。那时候，学校真是没有评什么个人卫生。如果要评，或许我还能有点上进。我总是等身上的衬衣领子已经彻底变黄、汗味比较明显时，又没有更多换的衣服，于是只好往澡堂走一趟。平常时候，我还是喜欢打一点热水，在寝室的澡堂擦一下身子，解决问题。这个习惯，我一直到上研究生时才完全改变。那时候，南大的澡堂条件很好，洗完澡后，还可以在放衣服的长柜子上休息。躺在那里，抽一颗烟，与同学闲聊。那真是享受人生。与我一起去洗澡最多的是计秋枫同学。可惜他在学术成就突出时，英年早逝而去！

我为什么在大学时代有澡堂而不常去？主要是卫生习惯不好。此外，有两个因素也不能忽视：一是去澡堂比较费时间。我上大学时，学习还是比较用功的，不舍得把时间花在一些当时觉得并不重要的事情上。二是浴室人太多。人多其实还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我自己的内心感受。年轻时候，我其实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自卑情绪。这个自卑，不是因为别的，而是我纯生理上的原因，就是太瘦小。因为瘦小，心灵似乎也变得渺小。这一点，我跟一些影视明星真的比不了。在大庭广众之下，我总是喜欢藏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别人可能不知道是因为什么，而我则是为了避免在他人的比照之下自惭形秽。

有一件事情，或许可以说明我当时的瘦小。那时候，我已经是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总编室主任了。单位安排献血，出版社两个名额。为了显得公平，决定从社办公室先派人去体检。办公室人本来就不多，而且以女的为主，总不能让女同胞当先锋吧？于是，安排我与老阎两人先去。老阎已是五十多岁，本来不应在安排献血之列，也只有委曲他一次了。我与老阎到了北医三院体检。老阎先体检完了，对我说，他是胃不好，医生不让他献血，意思可能是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了。我也没有退却，体检就体检，献血就献血，无所畏惧。其实，这是装出来的，真要献血，我还是有点害怕。可在当时，我还是勇敢地站到了首先进行的身高与体重测量上。我一上去，只听检查的医生高声说：“等一下，你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我老实地跟她讲了。她听了以后，有点生气的样子，然后说：“你们单位没有人了？检查身体，不是有病，就是太瘦，去！下一个！”听了这话，我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以轻松的心情打道回府。

当然，这事已经过去了二十余年，大学毕业更是过去了三十五年。我也不再是不肯去公共浴室洗澡之人，人也不再是过去那么消瘦了。在现代文明的浸染下，在经历了奋斗的艰辛之后，我早已摆脱了自卑情绪，能够以一种轻松的态度面对自己过往的不足和羞涩。某种程度上说，通过洗澡这看似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见证了我这个乡野小子向现代文明成长的成长历程。现在，我每天在家睡前必定洗澡。如果是出差在外，条件允许，我还会早晚各洗一次澡。当然，这纯粹是个人的生活习惯了。

有时候，我会想到，人类文明的发展步伐，其实不是直线上升的，而是错综复杂的。文明不是时时处处都在进步，更不是进步都会在每个人身上体现出来。洗澡这事，在古今中外，本来早已体现在人类文明之中，可是却在20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的自己身上，出来了这样一种生活状态。可以说，这样事例在地球上或许还没有绝迹。记得《圣经》中有这样一句话：“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我应当为此而感到高兴吗？

洗澡，冲刷掉身上的不洁，怀着感恩之心去面对生活！

## 多彩的课余生活

——杭州大学中文系 62 级 熊恩生

除丰富而紧张的学习以及众多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外，回想我们的课余生活还是很活跃的。团支部、班委每个学期都要组织一些集体活动。如到七堡观潮，到玉皇山爬山，到西湖划船，到初阳台看日出，到金沙港野餐，到孤山开月光晚会，还有九溪觅踪、植物园探梅等。杭州有美丽的西湖和众多的风景名胜，也为开展这些活动提供了去处。

记得那次野餐，是在 1963 年 3 月底，地点是金沙港的一片大林子里，即现在的曲院风荷。班里 4 个小组各自开灶，虽都是煮面，但各有特色。为这次野餐，我们这个组备了鸡蛋、年糕、豆子和菠菜等，菜油、香油、酱油、味精、葱和虾皮等作料什么的也一应俱全。可就是没有一个像样的厨师。大家都似懂非懂还装懂，各有主张，且互不相让。有的说，菠菜要先烧，有的说豆子要先煮；有的说太咸了，有的说刚好。七嘴八舌，边说笑边动手，林子里不时爆出一阵阵笑语声。没料到的是锅子太小，只好分 3 锅煮。最后的产品都是厚厚的，几乎都成了糊涂面。幸好作料多，味道还不错。据当时大家评价，我们这个组总体算是好的，第二组的鸡蛋炒得不错，第 4 组的面下得还顺眼。

除户外活动外，当时校内每天下午都安排有课外活动。大家可以按自己的兴趣喜好参加。有的打排球，有的打篮球，有的做体操。同时，也有不少校园内活动，如 1962 年底、1963 年底班里都组织了元旦联欢活动。1964 年的这次联欢会就很有趣。朱文达、金光荣、戚平岨、朱友焉等 4 个同学的化装出场，一下子就吸引了大家的眼球。朱身上挂满了气球、肥皂盒、钢笔等 18 件物品，围着大家走了一圈。能说出件数最多者优胜。结果胡先林、戴幼琴获得优胜。接着进行击鼓传花，鼓声停在谁那里，谁就要表演节目，常常引来一阵阵笑声。还有戴志康和徐子祥的相声、林崇明和楼月芳的双簧也很精彩。不过林、楼的双簧不够“厚道”。我讲普通话有时“n、l”不分也成了她们的笑料。跟 1963 年那次一样，大家还互相赠送小礼物，抽到谁给谁。非常巧合

的是，我1963年抽到的是徐子祥同学的礼物，1964年抽到的仍然是徐子祥的。我的礼物1963年是送给了沈永欣，1964年是送给了杭美华。这次联欢会一直持续到半夜3点多钟。会上的鼓声和互送小礼物的笑声至今似乎还在耳边回荡……

除班里活动外，系、校也不时组织一些活动，如“一二·九”纪念晚会、诗歌朗诵会、普通话观摩赛、运动会、书法比赛、师生联欢会、观看浙大文工团交流演出、观看武术表演等。记得那次武术表演真让我大开眼界，刀、棍、剑、箭、枪，样样俱全。年龄最小的是小学4年级的红领巾，年龄最大的是著名的海灯法师。海灯法师久闻其名，这次才有幸一睹风采。当时他是上海体育宫的教练，曾是少林寺的和尚。别看他个子像个小和尚，但软硬功夫样样精通。来软的，只见他身体就像没有骨头一样，胜过女体操运动员；来硬的，可用2根手指着地来做俯卧撑，用一个拳头着地倒立达7分钟之久。“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据说，法师从十几岁就开始学艺了。

记得我在担任系团委宣传委员期间，还组织举办过“革命歌曲大联唱”，组织过各支部办好国庆特刊和百花园，开展过影评、书评小组活动和毛笔字书法比赛。但印象最深的还是1963年12月31日晚上举办的迎接1964年元旦赛诗会，因这是第一次搞。为筹备这次赛诗会，我和系学生会一些同学足足准备了半个月。所有的午睡时间、课外活动时间、晚饭后晚自习的时间都花在这上头了，多次讨论研究。赛诗会内容比较丰富，先是有系文工团的《蝶恋花》演出和（2）班管江声、王琦、沈济萱3位同学的诗歌朗诵，接着便开始比赛：一是看画作诗，主要挑了5幅宣传画；二是命题作诗，特请写作教研组马骅老师等出了9个题目；三是对对联，特请林淡秋副校长、张仲浦老师出了19幅上联，有“乃祖乃翁难得顺风拉纤”、“国际歧途塞”和“三潭印月”等。马骅、蔡良骥、张仲浦3位老师应邀作赛诗会的裁判。我主持了这次赛诗会，有近60位同学参加。不是因这天晚上学校大操场放电影《武松》，来的人可能还要多。后来林淡秋副校长也来参加，使活动更增添了热烈的场面。赛诗会原定1个小时，结果大家兴致高，又延长了半小时。比赛结果，对联对得最多，命题写诗其次，最少是看画

作诗。评选结果，诗歌有 12 人得优胜奖，对联有 7 人得优胜奖。特别高兴的是，我们班在这次比赛中名列前茅。参赛的 6 个人中，张安吉、潘中和、刘曾遂、章启迪同学获得了诗歌优胜奖，贺圣谟同学获得了对联优胜奖。比赛结束，系团委书记陈为良老师做了小结。

再说运动会，1963 年 4 月、5 月中文系和学校都开过运动会。1964 年 4 月中文系又开过运动会。值得骄傲的是，我们这个班学习成绩不错，体育运动也不差。1963 年那次，虽然事先准备不是很充分，女同学几乎没参加，但男子 400 米接力赛获第二名，庄炳基同学获得 100 米第二名，贺圣模同学更是一人获得 3 个第一，为班里增添了 21 分。那年 5 月份，学校也开运动会，系里得知我原来体操不错，要我报名参加。其实，那还是我读初中时的体育强项，虽获得过国家三级运动员称号，但高中以后随着学业和学生干部工作的加重，就很少去摸了。这次因推辞不掉而参加了，结果不出所料，双杠还可以，单杠、自由体操和跳马都不理想。其实也不奇怪，什么事都要坚持才有成效。1964 年这次系运动会，我因身体不适，未报名参加。担任了班里的通讯组长，主要是组织稿件报道班里的比赛成绩和好人好事。高兴的是，班里成绩不错，总分位列第 3，广播体操获团体赛冠军，贺圣谟、刘曾遂、唐森灿、庄炳基四同学的男子 400 米接力获第 1 名、女子 400 米接力获第 2 名。

大学期间，文娱活动量最多的要算看电影了。每周三、周六晚上，校系都要在大操场或大食堂放一场校园电影。究竟看了多少部，已记不清了。反正如果那天晚上没有更重要的事情，我都会去看。特别是一些文艺专片和内部片，中文系师生更享有观看特权。看电影不仅是一种享受，对中文系同学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特别是一些中外名著拍成的影片，如《红楼梦》、《青春之歌》、《林家铺子》、《红与黑》、《巴黎圣母院》、《安娜卡列尼娜》等，本身就是中文系要认真学习的内容。其中电影《红楼梦》杭州市里还未公开放，而首先放给我们中文系师生看。除电影外，还有周六的舞会，在那个年代，也算一种开放。还要求团干部带头，不过我对跳舞不感兴趣，故从未光顾过。

除文体活动外，学校也不时组织我们参加一些外事活动和社会公益活动。我们曾在杭州饭店前路旁欢迎过毛里塔尼亚总理达达赫和锡兰总理班达拉纳克夫人及印尼副首席部长苏班德里纳博士，并有幸近距离见到陪同客人来杭访问的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我们还到老和山抓过松毛虫，到乔司农场帮助抢收过棉花。抢收棉花的事发生在1963年9月11日。头天晚上，晚自习刚开始不久，系总支把我们班、团主要干部叫去开了个紧急会议，说据气象台报告，这两天有台风来袭浙江，而杭州乔司农场尚有许多棉花未采摘，省委决定抽调大批干部下去抢收，人员不够，临时决定从高校再派5000人下去。会议结束，我们班立即行动，除去身体有病的和留下做保卫工作的，班里共组织了20个同学，按要求分成了两个大组、4个小组。第二天凌晨一点半起床吃早饭，两点半就出发前往乔司农场。到农场后等天一亮，我们立即投入了抢收。半天多下来，虽然有点累，腰有点酸，但心里很高兴。

或许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关，组织民兵军事训练学校也非常重视。我曾参加过基干民兵的实地利用地形地貌训练，参加过1962年的国庆武装民兵的游行，参加过全市民兵登北高峰比赛。说起游行，记得读小学时，曾多次挂着红领巾、捧着和平鸽，参加少先队队伍在杭州平海路西端的检阅台接受过检阅，觉得很光荣。而1962年这次是参加武装民兵的游行，背着枪（尽管枪里没子弹）。事前还进行了半个月左右的训练，有时要走到人民大会堂那么远。有时下午、晚上都要排练。虽有点累，但心里很高兴，感到特别自豪，觉得自己是个男子汉了。10月1日那天早晨，我们4点半就起床了，7点半左右就赶到了集合地点。走过检阅台时，大家都精神饱满，真有点“兵”的样子。基干民兵除了平时的训练，1963年、1964年暑期，学校还组织我们中文系基干民兵集中训练了各一个星期。1963年那次，中文系同学都被编在机枪排。教员专门讲解了捷克式轻机枪的构造、分解、组合和射击原理；讲了“单兵进攻”、“班进攻”等战术知识并分班进行练习。还去留下部队看了刺杀和“班进攻”的表演，到浙大看了中村部队的准实战“班进攻”，最后我们还进行了机枪实弹打靶。1964年那次，安

排在留下解放军 6291 部队营区进行。训练头一天，是学校保卫部易部长作国际国内形势动员。训练内容很丰富，有队列训练、兵器（主要是三八式、七九式步枪和手榴弹）教练、战术理论、利用地形地貌和射击训练。还观看了部队专为我们举行的战术表演和刺杀表演，又和部队同志举行了联欢和篮球比赛。训练虽然比较辛苦，每天 5 点钟就要起床，训练长达五六个小时，但大家都非常高兴。不仅学到了一些军事知识，而且亲身感受了解放军的光荣传统。

[返回目录](#)

## 那年，我们一起去看潮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吴磊

四十多年前的 1979 年是我们在杭大读书的第二个年头。

这一年的大事记：

中国正式开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走改革开放正确道路的第一年；

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开始酝酿；

中美建交。

这一年还有一件记忆中的往事，虽然 40 年后的记忆已经支离破碎了：10 月 10 日（农历 8 月 18 日）这一天，我们班 8 位同学同行，选择最佳观潮日，开启难忘的观潮之旅。

钱塘江潮，天下闻名。受天文、地形的影响，每年农历八月十八日，东海潮波进入杭州湾，溯江而上，奔流 200 公里，止步于富春江水电站下游，有着“天下第一潮”之誉。我们班的老姚同学热情地邀请大家前去观赏他老家边上的天下美景，天赐良机。

我们一律带上校徽，当年的服饰，当年的发型，当年的模样，当年的同学。

受全班同学的信任，当了 4 年的班副，所以粮草先行此类的小事一般都是由我去提前落实。于是周末，从校门口搭乘 16 路公交车，带上单词本，路上的时间不会浪费的。在杭州火车站延安路的售票处附近的车站下车，去排队购票。马路对面的西湖电影院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了，看上一本好电影是最好的享受；吃饭会选择去奎元馆面店，热气腾腾的片儿川回锅面是我的最爱；一路往回坐，到了六公园，去外文书店转一下。内居书店有新到的影印版书，当然要买上一本带回。

买回来的 8 张火车票要保管好，找了最安全地儿，铅笔盒。对，就是现在还躺在书房抽屉里呢，拿出来给她拍个照上传分享。我们班的同学都喜欢我的铅笔盒。有时转身就会不见，然后找回来的时候，

铅笔盒上那个漂漂亮亮的女孩脸上就被画上眼镜或者胡须什么的浓妆打扮。

那日早起，不敢大声，打着手电筒。完成梳洗工作后，3位女生悄悄溜出寝室。校门是挡不住我们的。如果没开，我们就翻墙进出。

和男生会合后，一行8人兴匆匆地赶到熙熙攘攘的车站。排队快到检票口时，我突然大叫一声：“哎呀，车票呢？找不到了！”只见我慌慌张张地在绿色的军用书包里翻来找出，找不着。大家都傻眼了。一阵慌乱过后，不知是哪位高人决策，马上去买8张站台票，先上车再补票。

上车后，记得因为票子找不到，补票是没有座位的，我们只得挤在狭窄的过道上。我们班团支书邱同学一直说怪他不好。我很好奇地问：为什么？他说，他没有提醒我应该检查一下，有没有拉下东西。哦，真是一个勇于担当好同学。

绿皮车慢悠悠地开到海宁长安，然后又在码头上等轮船。北人骑马，南人坐船。那时还没有通公路，我们就坐运河的轮船去我们同学的老家盐官。船上都是去看潮的人。

一下船，我们同学的漂亮姐姐就在出口处大声招呼我们。看到弟弟带着一大帮子同学，他们全家都动员出力。姐姐是那天的热情导游。她带着我们急忙赶路，好像是和潮水在进行马拉松比赛。一进入目的地，就听她就大声说：“快看！潮正好奔过来了！”

在盐官看一线潮的情景：远处先呈现出一个细小的白点，转眼间变成了一根银线，并伴随着一阵阵闷雷般的潮声。白线翻滚而至，几乎不给人们反应的时间，汹涌澎湃的潮水已呼啸而来。潮峰高达3-5米，后浪赶前浪，一层叠一层，宛如一条长长的白色带子，大有排山倒海之势。

相传农历8月18日，是潮神的生日，故潮峰最高。宋代词人潘阆的《酒泉子》真实写照当年“弄潮”与“观潮”活动：

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  
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

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  
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

潮退去后，人群也慢慢散去。看到甘蔗摊上有位口干舌燥的老外想买甘蔗解渴，苦于言语不通，几个男生忍不住上去帮忙。结果交易成功。边上满满的围观人群里都是好奇的眼神。

刚刚跨入同学的家门，满屋子都是他爸爸妈妈热情好客的招呼声。一股饭菜的香气扑鼻而来。

据说蒋文华同学那天表现出色，给老姚全家留下无限的遐想。

那天离开老姚家往回赶路的时候，记得乡间小道上美丽的月色，一直留在脑海中。

回到寝室很晚了，心里还想着 8 张车票的下落。顺手打开床边书桌上的铅笔盒，8 张车票排着队，笑嘻嘻地看着我！

[返回目录](#)

## 杭大第一届金融系女大学生日常

——杭州大学金融系 82 级 许丽虹

### 大一女生新世界

1982 年，我 16 岁，懵懵懂懂考上了杭州大学。

什么专业呢？经济系金融专业。那时不知道金融是啥。填志愿时，我立志学医，我爸定要我读师范，折中为金融。我爸说了，金融就是搞银行，铁饭碗。

临出发，我爸说要带我去上趟祖坟。家里四个孩子都因为“地主子女”身份没书读，奶奶去世时为此闭不了眼。终于，最小的孩子上大学了，得去和他们说一声。当年考上大学，就是这么隆重。

到了杭大，找到报名处。第一个遇到的就是小语。像接头暗号：你什么系？经济系。什么专业？金融专业。哪个宿舍楼？11 幢。全对上，一起走。由高年级学生领了去宿舍。11、12 幢，在校园最后面。过条马路就是学军中学。两幢都是崭新的宿舍楼。11 幢一至三层是男生，四五层住女生。经济系女生在四楼。

一进宿舍，首先看到一个小提琴盒子。惊着了！还没回过神来，秀秀迎上来说：我们都来自五湖四海。

来自五湖四海共 8 人。其中四个地名同款。样儿是宁波骆驼，陌华是浦江白马，莉莉是衢州龙游。我是临安白牛。

宿舍不大，四张叠铺占去大部分空间。屋角有自下而上的空格放行李。八十年代初，姑娘们家当少，每人一个长扁小箱子，人造革，订满银白色亮晃晃的钉子带扣。

宿舍中间有一张大长桌，往上翻的抽屉 8 个，每人一个。这张大长桌可有用了。既是书桌，又是饭桌，还是梳妆台。大一不停地在写信。那时，信是唯一的通讯方式。桌面合成板，光滑，写信要下面垫本书。

洗了被子，在大长桌面上面缝被子正正好。为何要缝被子？被套要几年后才出现。洗被子，先要拆线。里子是棉的，要用力刷洗；被面

是绸缎的，就要轻轻揉捏；被胎是棉花絮弹的，得好好翻晒。所以，宿舍里洗被子要排队的。我针线活好，经常被预约。

八个抽屉，一人一个，时间一长马上显现整洁度不一。乱的很乱，每次找东西找不到。最整洁的就是秀秀，一丝不苟。我们笑她：以后你找的男朋友，肯定头发油亮停不住苍蝇。

我们的教室，也是崭新的。在学校最前端，杭大大门进去左边第一幢。八十年代初，发展经济成了国家重中之重。在大学的体现就是在最显眼处建造一幢崭新的经济楼。这幢楼现在还在。教学楼成“倒L”形，前面有个小水池。我们金融专业在5楼。

金融专业有2个班，共招了60个人。开学不久，一个病休留到下一年级，一个好像是偷自行车被学校开除了。高考千军万马杀出来，8个取1个，尚未开始，两个先撂下马了。剩下58个人，一直坚持到毕业。

虽说是两个班，但行动都在一起，大课是一起上的。小课不多，后来也并着上。所以基本像一个班。

有一次，我和林子上完课出来，在5楼窗户突然看到她爸来了。她飞奔下楼，一下扑到她爸怀里，搂住脖子。我站在窗口看得吓傻了。在我家，我爸从来“君子相”，没有过多情感流露的。我不知道世上还有这么亲昵的父女关系。

如果说经济系是崭新的，那金融专业则是刚刚分娩出来。我们是第一届，连教材也没有。班主任胡关金老师，实际比我们大不了多少。《货币银行学》是胡老师手编的，油墨印刷出来，人手一份。翻多了，手指会有油墨印。

首届金融专业的专业课，除了手工油印的《货币银行学》，其他还是老套。《资本论》、《国民经济计划》、《政治经济学》等等，也学《大学语文》。课椅有扶手，在右边。扶手凸出来一大块，用于记笔记。语文老师人很高。上文言文时，似乎只有林子和我感兴趣。不过，无论大家感不感兴趣，语文老师对我们很客气，说：你们来上大学不容易。天之骄子，山沟沟里飞出的金凤凰。

英语，我们这届高考时分数按七折计。到了杭大，正儿八经开始学。英语老师年纪大，温州人。他说杭州大学电话号码是冷水淋淋落（24006）。英语从发音开始教，炒冷饭多。后来我们纷纷自学《新概

念英语》。《新概念英语》对我们的吸引力，就像是进入新世界的通行证。

另一个记忆深刻的老师是周大风。对，就是《采茶舞曲》的曲作者。他一口宁波普通话，舒伯特总说成“修伯特”。讲解广东音乐《金蛇狂舞》音律节奏由繁到简那种表述手法时，可能是普通话实在不够表达到位，直接用宁波话说：“闹闹闹，就是蛇脱壳……”。样儿宁波人，一听就明白，乐不可支。“修伯特”的营养全跑她那里去了。

开学没多久，我们就发现了一个宝库——图书馆。当时的图书馆是平顶的，正对校门，高出其他建筑许多，是杭州大学的标志性建筑。林子是杭州人，父亲是高级工程师，那把小提琴就是她的。虽然后来没怎么见她拉，但要说到读书，她绝对是宿舍的一颗读书种子。

世界名著，基本被我们翻了个遍。《简爱》，读了无数遍。我毕业后，遇到人生疑难杂症，还是要看它来寻求答案。《简爱》有电影，上海译制片厂的，后来又有电影录音剪辑。那个电影录音剪辑，我们从头至尾全部会背的，台词滚瓜烂熟：“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我也会的。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一定要使你难于离开我，就像现在我难于离开你。上帝没有这样。我们的精神是平等的，就如同你跟我经过坟墓将同样地站在上帝面前……”无论哪段音乐一起，都知道是哪个场景。

课余喜欢的事，是去看电影。11幢后面12幢，12幢后面就是杭大后门。从后门出去是文三路，有个杂货店，再往右拐稍稍走点路就到了文二路。

文二路长不过几百米，却挤满学校。化工学校、杭州师范学校、幼儿师范、团校、财贸干校和商业学校。东端是一条小河，西端全是稻田和菜地。文二路有稻田和菜地？你记错了吧？没错，我和林子，经常傍晚时分在那些稻田里散步聊天。秋天的稻田有股浓浓的收割完稻子的味道。夕阳余晖，两个穿裙子的小姑娘逡巡期间，窃窃私语。林子想象力丰富，有次回去时回望，说：我们有点像在世界名画里。后来才知道她说的是《拾稻穗》。

还有个佐证。入校次年春天，有一次对面宿舍的蓉蓉她妈来看她，拎了条大鱼。我们都出来看。蓉蓉妈说，快到校园时，这条鱼从田里跳上来，被她抓住了。

文二路有个露天电影院，我们的乐园。说电影院，其实就一大块空地，局部地方长草像荒地，有几排水泥长条算是长凳。天热时看电影，一边是放映机“哒哒哒”的声音里飞蛾乱舞，一边是双脚在草里被蚊子乱咬。《城南旧事》、《牧马人》、《女大学生宿舍》、《佐罗》、《庐山恋》等等，都是那时看的。

看电影往往是宿舍集体行动。看电影那天，最焦急的是打开水。打开水要去其他楼。早晚两次，老师、学生拎着热水瓶排队打开水。开水房水龙头一字排开也就二十多个。每个水龙头前排队的队伍都很长。那水从来不痛快出来，“噗噗噗”几声后，就是苟延残喘；一壶热水瓶打满要很长时间。打开水成了最头疼的事情。

看完电影，我们7、8个人一路讨论。冬天时，天墨黑，走过海洋二所宿舍楼一带时，总觉到处黑魆魆的。我们就越走越快。路是砾石路，越走快，脚下声音越响，到后来变成了奔跑。

看完《城南旧事》，喜欢里面的英子。有一阵，我们样儿就将头发剪成了齐刘海，煞是好看。对于我来说，记忆最深刻的电影是《女大学生宿舍》。里面有个人说，将来的理想是当个贤妻良母，结果遭到同学与老师们的激烈批评。看完电影回宿舍的路上，“叽叽喳喳”议论中，我一句不敢插嘴。因为我的理想也是当贤妻良母。

早上有早锻炼课，一般就是跑步。秀秀还是校长跑队的。我们是11幢4楼，下面3层楼不都是男生吗？小伙子们脚劲好，装了弹簧似的，跑步回来，一上楼，尤其三楼的，一串就上四楼了。所以大凡四楼哪个女生宿舍发出高声尖叫，便是有愣头青闯进来了。

八十年代的男女大学生，说两小无猜并不为过。下雪天，我们将窗口的雪捏成雪团，往楼下窗户里扔。他们往上扔，扔不准，气不过就跑上来打雪仗。玩够了，照样谁也不认识谁。

夏天很热，往往是早上一起来，草席上一滩汗水呈现一个人形。校园周边稻田多，溪流多，蚊子也多。八个人都挂起了蚊帐。当时我小哥顶我爸的职在供销社工作，给我买的蚊帐是尼龙的，比纱的新潮，显得很突出。

每人床头，放个小盒子，放书和随手拿的杂件。我经常有点昌化小核桃、番薯干之类。陌华经常有冻米糕。前几天，样儿网购了昌化番薯干，激动发来微信：番薯干收到了，迫不及待尝了。哎呀，就是那个想念了几十年的味道。当年和你头碰头睡着，总是摸你饼干盒里的番薯干。

说起经济账，你又要不信了，完全没有压力。

八十年代初，国家根据大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发放每月生活补贴。一等助学金 21.5 元、二等 17.5 元、三等 15 元。班里有两个男生家庭优裕，没享受助学金。我们宿舍，基本 17.5 元这一档。

17.5 元也是学校每月伙食费标准，发放饭菜票就这个标准。如果是 17.5 元这档，领饭菜票无需交钱。如果是 15 元这档的，每月要交 2.5 元。饭菜票有老有新，老的是纸质的，新的都是塑料的，水红翠绿，颜色非常鲜艳。

饭菜票女生吃不完，可以卖给同学，也可以去学校饮食店买面食，直接找回现金。还有就是每学期结束前，以班级为单位统一退。副班长（兼生活委员）到每个宿舍，将要退的饭菜票收来，统计好，退回来的钱再发给相应的同学。据说退饭菜票的那个女的有时有点凶，副班长们有点怕怕的。

说到饭菜票，我们楼里有个宿舍经常莫名其妙少饭菜票，怀疑是有人偷，案子一直破不出来。很久后，发现作案者是任何人想不到的。因为其家庭背景、经济条件好到我们不敢想象。他们分析说，这是一种心理疾病，根本不缺这东西，但忍不住要去拿。这件事让我脑洞大开，原来人的心理是沟壑纵横的，有些沟壑旁人难以触及。

学校的补助，加上家里每月给 5 元生活费。买书、买衣服鞋子、零花，不但够了，放假回去还可以买礼物带回去。陌华每个寒、暑假回去，第一件事情就是将省下的粮票、换好的钱交给她妈。她说，每次递交时，心里有种为家分忧的骄傲。那粮票可是全国粮票！

每当中午午睡时，四楼空荡荡的楼道里，总飘荡着一个声音：“鸡蛋要哇？鸡蛋要哇？”那是附近村民偷偷摸摸来做生意的。粮票可以换鸡蛋，可讨价还价。那是最初学到的真正的市场经济。

当然，这点钱可不能痛快花。有一次小组搞活动，我们是第三组。组里有个男生杭州人，家里较宽裕。他带我们去六和塔玩。六和塔对

岸，当年全部是滩涂田地。哪里想得到，几十年后会是一线江景豪宅。中饭去了一家面点，一碗肉丝面 0.36 元，也没跟我们商量他就点了。这价格贵到我完全不能接受，想退又开不了口。脑子大战三百回合之际，面来了，吃一口，天哪！世上竟有这么好吃的面条！

八十年代的杭大，最开放、最时髦的女生集中在两个区域：一个是外语系，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济系的旅游专业。对外开放，外语系是前沿阵地，人才奇缺。外语系有外教，有出国机会，了不得啊。旅游呢，刚刚苗头起来。一股热潮即将破土而出，亟待专业人士来引领。因此，她们身上不知不觉都有一种带你们出去开开眼界的霸气。

外语系宿舍离我们较远。但食堂来回的路上，哪拨女生是外语系的一目了然。经济系旅游专业的女生宿舍，就在我们旁边。我们进出宿舍都得经过她们门口。确实，口红、粉饼、香水、高跟鞋这些，启蒙均来自她们。

有人要说了，你们金融专业也不得了啊，日后轰轰烈烈的。确实，现在金融也算人尽皆知了。有一次央行（即人民银行）作“投放货币”操作，网上有人感叹这是将林志玲送给李莲英啊。笑死我了。不过，在当时确实很少人知道“金融”为何意？老乡之间介绍，说我读金融。对方往往瞄过来一眼：金融是啥玩意儿？所以，金融专业的女生不知道自己可以牛啊，一个个安守小家碧玉的本分。多年后，有个朋友偶然见到我们的老杭大照片，说这批女生可以的，一个个下巴敦圆，担得起社会重担。

真的是啊！杭大首届金融专业这批女生，日后一个个吃得起苦，担得起重任，接得住春风，守得住秋实。经历了许许多多风雨后，仍有一颗颗积极向善的心。

## 大二女生悄悄话

大二，学校调整宿舍。我们从 11 幢搬到了 6 幢。

6 幢在杭大正门的右前方。11 幢是崭新的，6 幢是老旧的。旧到什么程度呢？还是木地板，据说这个楼是五十年代苏联专家造的。

金融专业女生分到 3 个宿舍。抽签，我们抽到了朝南的一间。此后三年，阳光灿烂。

旧宿舍楼面积小，小云被调剂出去。这下就 7 个人了。真是青春无忧啊，7 个姑娘，放到哪里就觉哪里好。分明楼道暗、木窗破、地板裂，但是没关系，好喜欢新地方。

依旧是 4 张高低铺，冲门的下铺用来放行李箱。其余 7 张床，说好每学期抽签。也奇怪了，我与样儿，每次抽签都是头碰头。宿舍中间依旧有张长桌子，不过比 11 幢的小多了。行李箱随意放，放在下面的拿东西很不方便，大家也都不计较。

老宿舍楼自东至西两列共六幢。一、二幢是教师宿舍，其他都是学生宿舍。宿舍之间有好几个操场。下午放学后，校园内的高音喇叭开始播放。球场上人声鼎沸，很是热闹。

如今这些场景都不见了。2008 年，这里建了住宅小区“启真名苑”。

启真名苑建于 2008 年，是把原来东区的 6 幢宿舍楼、食堂、开水房、大礼堂拆了重建起来的。

马上，我们宿舍与其他的不一样了。为啥？拖地板了。门边用毛竹杆一栏，进来要脱鞋。这下意见最大的是那些老乡们。尤其是男生，说你们女生，还是经济学的，怎么花头精这么多啊？多麻烦！其实，麻烦只是表面。小伙子大凡身体棒的，脚都臭。

有个高年级男生，我们系的学生干部，和秀秀同乡。每次来找她，我们不响，做事不关己状。等他一走，集体炮轰秀秀，将刚才秘密观察到的十万条线索呈堂证供，秀秀百口莫辩。我们穷追不舍：秀秀你是嫌他黑吗？可人高呀，又是国字脸，不错了。老乡是最好的借口，多少爱情萌芽以此为名。

1983 年年底大雪，长途汽车发不了。我们雪地里一趟趟跑武林门长途汽车站，打探消息。终于等到可发车那天。一早，天还灰蒙蒙的，映着雪光，走路去武林门。这时体会到外出闯荡的滋味了。

宿舍搬到 6 幢，吃饭就近，二食堂。且因为近，饭菜打到宿舍吃了。有段时间，我们每人中饭吃六两。没记错，正常吃二两饭。那时食堂推出八宝饭，一小碗要四两饭票，可实在爱吃啊。没办法，真的都还是长身体的时候。食堂又推出芝麻鞋底饼，二两。打饭菜时，鞋底饼与面包的香气交相冲击，无法抵挡。再买个鞋底饼吧，夜自修回来吃。事实上，总是回宿舍的路上就下肚了。所以，有时一顿吃八两。

在校园中间，还有个“杭大饮食店”，吃面食的。小语和我是常客。总是下课了，背着单肩书包，一路树影走过去。吃的面也一样，雪菜肉丝面，0.11元一碗，经济实惠。还有一种“光面”，0.1元，递进去1元的菜票，能找回9毛钱。这是我们换零钱的好去处。换来的零钱，攒着买小东西，或考试考完，到平海路副食品店买鸡仔饼。

也奇怪，宿舍离教室，这下近了，按说去教室应该更勤快了。可我们几个，夜自修反而不去了。八十年代初，宿舍没电视，没电脑，更没手机。几个人呆宿舍干嘛呢？读杂书肯定的，其他真想不起来了。

现在想来，杭大还真有自己的特色。比如：整个氛围是多元的、多维度的。系与系之间、文科理科之间、专业课与杂学之间，融合度非常高。杭大有很多公共课可选。陌华选“欧洲古典音乐”，老师是历史系的，报名时人多到没法弄。在杭大，想用功的学生，能找到顶尖的老师与刻苦的氛围。我们这种懒散的，散到哪也都有养分，遍地是养分。

我们宿舍几个人，喜欢背着书包去“流浪”。地理系老楼、数学系老楼、外语系老楼、化学系新楼等常去，有时混在他们中间听他们的大课，混充开眼界。

老师中有白发的先生，基本两个极端：要么很受欢迎，要么不受欢迎。很受欢迎的老学者，他们自己也在复苏过程中，传递给我们的不是力量，而是启蒙：世界原来如此丰富，世界又可以如此丰富了。相对来说，年轻老师更受欢迎。他们尚未形成自己的力量，上课时兴奋的脸皆写满新世界。

老楼基本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造的，黄墙红门窗，建筑风格统一。我们那时，经济系新楼崭新，教室十分明亮。走进他们昏暗的老楼，心里有一种优越感。三十多年过去，经济楼沦为“平民”。老楼们被列入杭州市第二批历史保护建筑，成了“老贵族”。短短三十年，也算看尽世易时移。

熄灯后的夜谈是女生宿舍的重头戏，什么都谈，谈得最多的肯定是男生。最好笑是取绰号，笑得真正肚子疼。班里的男生一个个取过来，二班班长名带“景德”，脸圆，取绰号变成单人连续剧；从“江西人”一路取到“瓷娃娃”，特别形象。也给自己人取绰号——以后的男朋友，名字先取好，按照邓丽君的歌名取。莉莉的叫“奈何”，

样儿的叫“悬崖”，林子是“勒马”，我轮到是“深谷”。写到这里，我怕自己记混了，去翻了一下毕业纪念册。样儿那页，给我的留言是“别在深谷里得意忘形，要知道悬崖上有我的眼睛。”

6幢到教室那段路，真美。梧桐树树影婆娑，边上是小操场。拐过一个报刊栏，就是一幢老房子，有点欧式的地理楼。上下课我喜欢与陌华一起走。她主意大，凡事听她的，我不用动脑筋。

说起小操场，有件改变我一生思维的事。那时受女排精神鼓励，时兴打排球。我们班3个小组比赛，比赛先要定规则。一伙人站在操场上，各说各的。我认为最简单的规则是：先1组与2组比，胜者再跟3组比。两场决胜负。秀秀说，不行啊，假如1组败给了2组，2组败给了3组，就一定是3组实力最强吗？那3组再败给1组呢？我内心窃笑，怎么可能！可事实证明，3胜2，2胜1，确实，1又胜3，形成了一个循环。

另一件深刻改变思维的事，与山口百惠有关。林子不知哪里弄来一本小书，薄薄的，说是山口百惠自传。有一天读到一句，醍醐灌顶。书上说：早上背着书包去上学，书包里放着月经用品，心里很骄傲，因为自己是个真正的女人了。

这件事，难道可以骄傲的吗？不是非常非常羞耻的吗？那时没有卫生巾，倘若知道日后卫生巾能在电视上大模大样做广告，非吓死不可。妈妈的教育中，月经用品从不能让人看到的。清洗时不能让人看到，晒出去要藏在裤子里面。可是，难道不是吗？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值得骄傲。

1984年，山口百惠结婚退出演艺界后，用了四个月写成自传《苍茫的时刻》。在书中，她诚挚剖露了自己从一个出身寒微的私生子成长为引人注目的明星的经历。她说：“21年来，我是在风中长大的。有扑到我身上的大风，也有发自内心的风暴，……有令人身心舒畅的微风，也有刺入骨髓的寒风。就像在风中摇曳的火光忽明忽暗，我随着大风小风成长起来。……对于迎面扑来的风，发自我内心的狂风，我都不怕。”

新生来了，老生就老练起来。上大课，大家抢位置。我们一般不抢中间第一排，太显眼了。我们抢旁边的二三排，一摞本子唰一下排过去，很是熟练。

专业课基本没负担。班主任胡关金老师动员能力很强，劲头足，课业抓得紧。每每被他一顿训诫，我们立即抽紧骨头，痛恨浪费了许多时间。当天吃晚饭吃得飞快，吃完去夜自修。一周后，又故态复萌。

### 大三女生没烦恼

大三时，突然来了位美国回来的客串老师。他人不高，脑袋奇大，给我们讲《西方经济学》，打幻灯片让我们很新奇。他举例用可口可乐，喝第一杯什么感觉，第二杯什么感觉，第五杯就没啥感觉了，是为“边际效应”。可口可乐，我们谁也没喝过，可听得醉了。掀起热潮，不上自修课的我们也场场不落，真正头脑风暴！后来查了好久才记起这个老师叫海闻。

宿舍挪到靠近杭大正校门，生活圈子也变了，所以说孟母三迁还是很有道理的。

杭大大门出去有个松木场菜场。夏天，花一点点钱就能买回一脸盆番茄。个个红透烂熟，香得很。剥了皮白糖一腌，美味。

菜场往左，一条小路通向松木场，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裁缝一条街”。那时刚刚兴起。有一次，林子别具一格要做条“军裙”。她买了块军绿色的布。什么叫“军裙”，我们不知道，裁缝摊一家家问过来也都不知道。后来有家勇气十足，答应按照描述加工，果然做出一条军裙。

往右拐，小路在农田间穿过去，是省艺校。省艺校都是小姑娘。我们那时把她们看成很小的的小姑娘，根本不放在心上。当然，那时周迅、董卿、何晴、何赛飞她们还远远没来艺校。我们去艺校，不为别的，为的是剪头发。艺校的理发师傅是个小伙子，会设计发型。杭大女生去剪头发的人很多，多时要排队。说是设计发型，不如说变换发型。某种发型杂志上有了，他能做出来。所有的人就都是这种发型。过段时间，杂志上的明星们或者电影里的女主角换发型了，他能跟上赶上潮流，所以杭大校园里女生们同款发型很多。

艺校再往西，走过一片宽阔的农田，农田中间还有一家奶牛场，就是浙大了。晚饭后，在田塍间散步师生很多。

浙大是理工科，几乎没有文科生。杭大则有很多文科系。好像有种说法叫“浙大的男生，杭大的女生”，经常要联谊。但就我们宿舍接触的范围来说，不尽然。为何？杭大的女生嫌浙大的男生不懂生活，不解风情；浙大的男生则有他们自己的骄傲，他们认为只有理科生才能真正为社会创造价值，文科生都是花架子。总之，彼此瞧不上。

我们的活动半径也大了，去的电影院也移到前面来了。有两个：艺校电影院与宝石会堂地下电影院。《疯狂的贵族》、《茜茜公主》、《幸福的黄手帕》、《伦敦上空的鹰》等等，看得津津乐道。有时会去看第二遍。《茜茜公主》三部曲，每一句台词都会背。某个场景，比如叫谁谁没听到，就来上一句索菲姨妈讥讽她丈夫的话，拖长音调说：他听不见～～

宿舍里很热闹，流行歌曲一批批涌现。《我的中国心》、《莫愁莫愁》、《双脚踏上幸福路》、《谢谢你》、《小螺号》、《南屏晚钟》、《妈妈的吻》、《北国之春》等等。“每周一歌”以照片形式出现，我们往往一买就是十多张，交换着看。林子弄来个录音机，淡灰色。那是宿舍里使用率最高的东西。

山口百惠没迷够，又迷上邓丽君。端了一盆洗净的衣服从盥洗室回来，邓丽君柔柔歌声由远及近，跟着唱开了。说林子不同吧，还真是，有文化底蕴的家庭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她又带来了齐豫的歌：“我们的恋哪像雨丝，在星斗与星斗间的路上，我们底车舆是无声的……”以至于后来，九十年代齐豫走红大陆时，一听到那高仙声线，就想起我们宿舍。

其他女生宿舍也有自己的听歌爱好。一次元旦联欢晚会，政治经济专业的女生唱了首东北《摇篮曲》，好听。大凡联欢晚会，样儿都是主角，或主持，或唱歌跳舞，没有她不会的。她还有一招，随地捡根树枝，用蜡烛油烫出花三三两两一沾，一树梅花风姿绰约，当晚会背景很是好看。

晚会经常在交谊舞中结束。一些欧美流行歌曲，如《红河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友谊地久天长》等，一波一波在校园舞会上走红。

那时生活没有烦恼。

## 大四女生笙箫默

大四时开了《国际金融》。蔡老师长得帅，高我们两届留校的。我和林子同桌，两人上课时爱悄悄说话。林子语文功底好，我一个成语想不起来，稍稍出点意思，她就脱口而出。她挂在口上的一句话是：啊呀呀，你以后离了我怎么办啊？

国际金融上着上着，和她说话，她不理我了。以为她认真听课，一段时间发现不对。她笔下出来了蔡老师的漫画。吃晚饭也找不到她人。11幢边上有个新操场，操场周围有台阶式看台。她总是一个人坐在那里。后来才知道他们恋爱了，蔡老师常去新操场踢足球。

现在想来，最可惜的课是《金融史》。可能是教材使然，全程枯燥无味。当几十年后，我迷上古董珠宝，接触到远古货币，一一了解上面的纹饰，才知金融史，集神话、战争、河流、山卡、运输工具、统治者审美等等于一身，极其丰富。像遨游于万花筒，随手捡一片都反射出光怪陆离的故事。多有趣啊。可惜。

快毕业了，林子的高中同学在法律系，她告诫林子：要去了解外面的单位，到老师那做工作，争取分配到好一点的单位。我们一听，很是惊奇。一方面突然明白还有个社会存在，另一方面又觉得那个社会与我们无关。反正毕业包分配，听从安排便是。

安排断断续续来了。我们小组一个男生，被分配去北京人民银行总行，谁知他死活不干，愣是回绍兴了。我们宿舍7个人，基本回原地区，进当地人民银行。第一届金融专业大学生，俏得很。外地的大都不愿留杭。我那时与现在的老公谈恋爱了。大男人说，你还是去学校教书吧。两个假期，能照顾家里。当初竭力反对我爸，不愿去当老师，现在乖乖答应，好的。档案去了银行学校，我安心回昌化家里等单位通知。谁知两天后，接到大男人的信，说不行的。他骑车去银行学校看了，都是泥泞地，很远。你还是去人民银行吧。我又火速赶回。省分行去不了了，只能去市分行。

12年后，人民银行省、市分行合并，冥冥中似有天意安排。

大学四年，我们进去是小白羊，出来还是小白羊，没有变成很多人期待的独角兽、黑骏马，哪怕是灰犀牛。你们第一届啊，应该大有作为，经常听到此类鼓励或失望之言。于我们宿舍的人来说，好像从

来没这种焦虑。年过五十，忽然明白：大学四年，杭大给予我们的是“宽”。正是这样一个宿舍，让“宽”留了下来。

我们宿舍8个人，说来不敢相信。竟然有1人掉出了我们的视野。谁？林子。她经历了留校、出国、回国、换单位等。曾经有些年，她会写些东西发给我，以小说形式。我隐隐约约能猜到一些她的心境。毕业30年后，不再有了。

其余7个人，秀秀、莉莉退休了；陌华、小云退居二线；小语后来离开杭大去了一家商业银行，去年也从行长位置退下来了；样儿老书记，工作却越来越多；我仍在业务前沿，走“德艺双馨”路线，看来真是一把年纪了。

三十多年金融威震江湖、天翻地覆、高潮迭起后，回顾我们宿舍，个个无恙，对生活十分满意。不容易啊，总算没被金融玩坏。杭大四年读的那些世界名著，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人生模板，那是我们的底蕴。

说来好笑，如今我的出身被外面界定为杭大中文系，经济系倒成了秘密身份。

如今我们4人在杭州，另外3人如果来杭州了，我们便聚一聚。见与不见，一样，像家人。

## 返回目录



## 第五章：师长

## 纪念杭州大学老校长沈善洪先生

——杭州大学经济系 78 级 罗卫东

(2020 年 9 月 11 日)

【作者按】时光荏苒，一转眼，杭州大学老校长沈善洪教授离开我们已经七年多了。

在沈善洪校长八十岁寿诞的时候，我牵头组织了一批当年杭州大学的学者和国内学术界同道，编写了一本纪念文集《知行合一：沈善洪教授八秩寿庆文集》，表达对老校长发自内心的敬佩与爱戴。

这本文集中，每一篇文章都包含着对沈校长的深情。

纪念文集出版时，沈校长已经久病不起。由于严重的糖尿病并发症，他已经目不能视，神志时清时浑。一代教育家油尽灯枯，不到一年半时间，就溘然长逝了！

沈校长是 1931 年生人，今年是他的九十虚岁冥诞。再发此文以示缅怀！

成立于 1958 年的杭州大学，在它走向鼎盛时期的 1998 年，完成了自己 40 年的生命历程。这所文脉可上溯至百十余年前育英书院和求是书院的新大学，办学不过四十年，但在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方面的贡献之大，被公认为地方综合性大学的翘楚。在许多学科领域，其影响力甚至直逼国家重点综合性大学。

杭州大学的成功办学，虽是各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多位杰出人士的先后长校，应该是最重要的原因。在这些优秀的校长中，沈善洪教授无疑是最重要的代表。

1986 年，时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著名哲学史家沈善洪接受任命，接下了杭州大学校长的帅印。这一年他 55 岁。从此，他将自己的身心全部奉献给了这所他年轻时曾工作过的母校。直到 1996 年，65 岁的他才因年龄原因卸任。沈善洪在校长岗位上连续工作了十年，是杭大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

沈善洪担任校长的十年，是杭州大学实现重大转型和跨越式发展的十年。十年里，沈校长带领学校一班人，以超常的前瞻性和战略眼光，巨大的勇气和强力手段，克服各种约束和压力，围绕学术发展自身的规律建设学科，面向社会需求拓展新的发展领域，筚路蓝缕地推进国际交流与合作；排除阻力，不遗余力延揽名师，不拘一格任用人才，全面提携和起用年轻干部，为青年教师的迅速崛起提供支撑条件和发展平台……。经过十年的调整和发展，杭州大学具有了现代综合性大学的内在发展活力，形成了让世人为之瞩目的发展态势。

沈善洪担任校长的十年，我们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重视还不能和今天相比，办学资源短缺和体制约束都非常严重。但沈校长全力倡导以学术为本的治校理念，大力弘扬和全力发展学术至上的大学精神。他鼓励和支持教师潜心治学，突出学术研究的地位和功能，把学术水准的高低作为教师评价的主要依据，以学术发展的要求和学术贡献大小来配置各类资源。在较短的时间里，使杭州大学从具有浓厚师范院校特色、以教学为中心的高校，转型为研究教学并重型的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

沈校长酷爱阅读，博闻强记，具有极高的学术品位和卓越的学术眼光。他殚精竭虑，苦心经营，力图将那个时代校内外各种非学术因素对办学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降至最小。在大多数时候，沈校长给人的印象是不苟言笑，一脸威严，让很多人望而生畏。在学术标准面前，他是非分明，原则性极强，臧否人物实事求是、坦率真诚。他对那些学术动机不纯、急功近利、世俗习气浓厚的人，毫不掩饰地当面表达厌恶和反感，不留任何情面，让人下不来台。但是，对待学术潜力好、学术志向坚定、表现优异的年轻教师，他必是百般呵护，关爱有加，犹如一位慈父。一些治学严谨、成果卓著的学者，因个性原因，和同事相处不好，他会想方设法予以重新安排，体现了一个教育家对学者的包容和尊重。

沈校长的爱才和惜才，是尽人皆知的。他有开放办学的胸怀，愿意向上级和社会争取各种办学资源。但面对来自校园外的不合理干预，会据理力争，以免伤害到大学的核心精神和学术原则。他树立起学术

至上的精神文化标杆。围绕它，学校开始形成相应的行政和学术文化氛围。客观地说，沈校长给师生提供的物质条件完全无法和今天相比，但是他及其合作者们的不懈努力，确立了办学的正气，逐渐化为一种无可替代的宝贵精神资源和强大文化动力。也正是这种精神文化塑造了杭州大学的内在气质和外在形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懂得，他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如何不易，这样的品德又是多么的可贵！今天，人们对于沈善洪时代的怀念之情还是溢于言表。

今年是沈校长八秩寿诞。以此作为契机，一批对他心怀感佩之情的老友、部下和同行，自发地聚集在一起，用文字表达对他本人的由衷敬意和祝福。这本文集同时也献给他长校十年的亲密合作伙伴们，那个出色的领导集体。因为，正是这个领导集体给予沈校长以强有力的支持。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文字，表达对即将到来的新时期，应该有什么样的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的认识。

[返回目录](#)

## 忆恩师徐朔方先生

——杭州大学中文系77级 张梦新



再过二天，就是徐朔方先生的忌日。2007年2月17日，我们敬爱的先生驾鹤西去。但是13年来，先生的音容笑貌却时在脑海。特别是随着自己也从中年步入老年并退休离开讲台，暇时回想以往与徐先生相处并受教的情景，他的音容笑貌更是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己亥岁末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神州。我等未能像白衣战士那样奋战抗疫前线，只能宅在家中。值此非常时节，我又再次拜读了先生的《徐朔方集》、《明代文学史》等著作，更觉先生的道德、文章乃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而先生唯实求真、勤奋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学术精神，更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兹将三年前的一篇旧文发给徐门学友，以缅怀恩师。该文原刊于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传记文学》2017年第6期，后又被先生弟子、长江学者、中山大学黄仕忠教授加配照片与后记，发表于当年10月的《戏曲与俗文学》。

敬爱的徐朔方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 一位教学认真，直言不讳的严师

我是杭大附中 1966 年高中毕业的“老三届”，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支边黑龙江。在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年，经过参加共和国历史上唯一在冬天进行的高考，而且是经过初试与复试两次考试，与来自全省各地的 140 名学子进入了杭州大学中文系。

我对自己能在而立之年迈入大学校门深感庆幸，更对杭州大学这所母校和中文系充满了感激之情。正是杭大中文系，这个拥有姜亮夫、夏承焘、王驾吾、胡士莹、任铭善等著名教授的百年老系，人文荟萃，名师辈出，才能在“求是育英”的这方圣土，培育了一届又一届的优秀学子。在我们 77 级求学的四年中，除了王毅、陆坚、姜新茂这些系领导，姜亮夫、王驾吾、吕漠野、蒋礼鸿、沈文倬、刘操南、徐朔方、吴熊和、蔡义江、郭在贻、王元骧、王维贤、倪宝元、陈坚、郑择魁、朱宏达等老师，都为我们上过课。

由于 1977 级汇聚了从 1966 届到 1977 届 12 年的优秀毕业生，当时全国 570 万考生仅录取了 27.3 万人。而浙江由于当时高校较少，30 余考生中才能录取 1 人。我们杭大中文系 77 级的学生更是百里挑一。因此杭州大学和中文系的领导对于 77 级的教学和培养分外重视。当时担任 77 级教学任务的老师，都是富有教学经验的高级和中级职称的老师，而且系里采取的是拼盘式教学。

即以我们的古代文学课为例，上诗经、楚辞等先秦文学的是刘操南和平慧善先生；上两汉文学的是孔镜清先生；上隋唐五代文学的是吴熊和先生；上中晚唐和北宋文学的是邵海清先生；上南宋文学的是陆坚先生；上元明清文学的是洪克夷和平慧善先生。

徐朔方先生给我们上的是魏晋南北朝文学。初见先生，只见他身材中等，面色红润，神色严峻，双眼炯炯有神。当时虽已 50 多岁，但上课时嗓门洪亮，中气十足。先生上课从不照本宣科。每次上课，总是只带几枝粉笔。但作家、作品都烂熟于胸，头头是道，娓娓道来。

其讲课内容丰富，见解精到，颇能发人深省。记得上完陶渊明的诗文后，徐先生布置了一次书面作业，让我们对陶渊明的诗文写一评论或赏析。下一次上课伊始，徐先生一连报了10个人的名字，我也在其中。徐先生让我们报到名字的同学都站起来，众人不知就里，都忐忑不安，整个大教室鸦雀无声。但结果是虚惊一场，徐先生说这些同学的作业是做得比较好的，表扬了我们。而正当大家的心情放松下来时，只听得徐先生话锋一转，又点名批评了某位同学作业不认真，还特别指出这位同学竟然把陶渊明的“陶”写成了桃子的“桃”。这次作业讲评虽然只有短短几分钟，但对同学们的触动很深。大家都领教了徐先生的“厉害”，从而更自觉认真地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经常到图书馆翻阅相关资料，到系资料室查看文献和论文，尽可能把作业做得内容丰富、材料充实。既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又有自己的见解。

以后，我们又渐渐从与任课老师们的接触闲谈以及从图书馆、阅览室的文献、论文中，加深了对徐先生的了解。先生生于1923年，步奎是其本名，浙江东阳人，毕业于老浙江大学。1956年4月8日，徐朔方先生的《〈琵琶记〉是怎样的一个戏曲》在《光明日报》副刊发表。

在同年夏天，中国戏剧家协会邀请京、沪、穗、渝、杭等全国文艺界和高校专家学者在北京举行《琵琶记》大型研讨会。当时还只是一名年青讲师的徐朔方大胆鲜明地表述了自己的观点，舌战群雄，被封为否定派的主将。研讨会的第三场讨论会记录说：“徐朔方同志的发言引起大家很大注意。他对《琵琶记》的看法和前两次会上发言的同志的意见不同。他认为在《琵琶记》这部作品中有很多封建说教的部分。”在第六场讨论会的会议记录中说：“负责这个小组讨论的是黄芝冈、王季思、徐朔方三同志。会上，徐朔方同志和他的老师王季思教授展开了不同意见的争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三位同志——侯岱麟、顾学颀、陈北鸥先后发表了他们对戏剧中典型意义的看法，并对徐朔方同志的意见提出了反对意见。……而徐朔方同志也以冷静、科学的态度，仔细听取了‘肯定派’的意见以后，继续提出了比较尖锐的相反意见。”

从这两段 60 年前关于《琵琶记》学术研讨会的会议记录文献中，我们见到了时年 33 岁的徐朔方不惧权威、坚持实事求是的学术胆识和独立不倚的个性。而这种唯实求真、坚持学人本色，不随波逐流、保持士子风骨的学术胆识和个性，是徐先生获得丰硕学术成果的重要原因，也是徐先生留给莘莘学子与世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就是这位徐朔方先生，称赞 1977 级是他教过的最好一届学生。徐先生的这一评价，成为了我们杭大中文系 77 级学生的骄傲。

### 一位循循善诱，严格而慈爱的导师

本人于 1982 年 1 月从杭大毕业后，幸运地与费君清、颜洽茂等多位学友留在中文系任教。并有幸在 1984 年 4 月被任命为中文系的党总支副书记，先后在郑择魁先生和吴熊和先生两任系主任的带领下为中文系的发展尽己绵力。

而到 1988 年，因杭大恢复了新闻系建制，我又被调去与张大芝、邬武耀先生等创建新闻系。

1995 年春，受到当时校长沈善洪先生“博士工程”的鼓励和鞭策，我继张涌泉、颜洽茂、费君清三位学友之后报考了古代文学博士生。因为，此前我曾费时数年整理出版了一百多万字的明代文学家茅坤的诗文作品《茅坤集》，于是想把茅坤研究作为今后的博士论文题目。另一方面，因为本科阶段听过徐朔方先生的课，又于留校后与徐先生同在中文系 6 年半，耳濡目染，深为徐先生的学问和人品所折服。于是鼓足勇气，报考了徐先生的博士生。

徐先生的试卷很难，知识覆盖面很广。因为四卷本的《中国文学史》和六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的内容基本没有出到一道题。但毕竟自己毕业后一直担任古代文学和大学语文的教学，业余时间阅读了较多的古代文学作品与文献，又对徐朔方先生的专著和论文有一定的研读，所以还是顺利地通过了入学考试，幸运的成为徐先生的入门弟子。当时我已 47 周岁，继 30 周岁时“抱着儿子上大学”（这是《钱江晚报》2007 年 5 月 17 日在恢复高考 30 年之际对我采访后刊登

的一篇专题报道的题目）后，又创造了杭州大学的一个记录：最大龄博士生。

当时本人忝任杭大新闻系的总支书记，又要担任新闻系本科生的古代文学课与研究生的古代文学和新闻写作等课程，日常工作较为繁忙。博士生又有外语学习与测试等要求，加之当年我慈爱的母亲去世，所以感到压力很大。徐朔方先生就多次找我谈话。先生喜欢散步。有时我们沿着徐先生居住的杭大新村宿舍的小路，有时在西溪校区的林荫道上，有时则沿着宝石山的登山石阶边走边聊。徐先生和我谈课程、谈学术，谈我的学位论文的框架结构和内容章节，也与我交换了如何处理好学校工作与个人读研关系的一些看法。在徐先生的循循善诱和亲切交谈中，我焦虑的心情得到了舒缓，对攻读博士学位也更增添了信心。

徐先生1947年毕业于老浙江大学外语系，1981年就评为杭州大学教授，是“活跃于中国文史学科教学与研究第一线的屈指可数的德高望重的学界前辈之一”（著名学者、复旦大学章培恒教授语），博览群书，学贯中西。因此，他要求我们也特别严格，每周都要指定阅读书目。

我虽然读的是元明清文学，但徐先生决不让我们只读元明清的典籍和文献。《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史记》、《汉书》和唐宋八大家的原著等都要求我们精读。读后不但要向先生汇报，还要完成先生布置的作业。当时我住在西溪路杭大新建的教师宿舍，与徐先生的宿舍相距只有四、五百米。先生就每月数次叫我，有时还有另一名博士生吴敢到他家中学习。有时是听先生讲，有时是让我们读一段先生指定的原著，然后先说译文再谈体会；有时则是让我们阐述某一问题或作业，然后他与我们一起交流讨论。这样的座谈式、互动式和启发式的教学方法，循循善诱，很能提高我们的学习主动性和独立思考能力，让我们受益匪浅。

在我这位老童生的博士论文撰写中，先生也耗费了大量心血。记得是1998年的春节，大年初二清晨的六点多钟，我还躺在被窝中，突然我家的房门被人咚咚咚地敲响。我吃了一惊，赶紧披上棉衣就起了

床。打开房门，我惊讶地发现竟然是徐朔方先生站在门口。他手拿一卷线装书，兴奋地对我说：“我发现了茅坤的几首轶诗，你快查对一下，是否可以写入论文。”面对满头白发、手拄拐杖的导师，我的心灵被深深感动了。就在举国欢度春节的日子里，年过75的先生竟还在手不释卷地学习。茅坤的《初过湖上逢雨》、《由湖上归抵家再赋》等15首诗，就是徐先生在查阅归安陆心源所编穰梨馆《过眼录》卷二十二《茅鹿门诗翰册》时发现的，为《茅坤集》所未收。让我感动的不仅仅是徐先生提供新发现的茅坤15首轶诗，更是因为从他大年初二清晨冒着严寒大驾枉顾我家所体现出的对学生的深切关爱，以及对知识孜孜不倦的追求。

在徐先生的悉心指导督促下，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茅坤研究》得以完成，并于1999年6月顺利通过了学位论文答辩。复旦大学章培恒先生专程来杭担任我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席。

2001年9月，《茅坤研究》由中华书局出版，又承蒙章培恒先生在百忙中为拙作撰写了一篇4000余字的序言。章先生时任教育部文科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又是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和古籍研究所所长。他这样全国著名的大学者能对我这名后学眷顾有加，主要是出于对徐朔方先生的敬重，才能如此爱屋及乌。《茅坤研究》于2011年获得“浙江省高校哲学社科优秀成果专著类一等奖”和“浙江省政府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其中就饱含了徐朔方先生和章培恒先生的心血。

### 一位鞠躬尽瘁，视学术为生命的学者

徐朔方先生一生勤奋治学，而且十分严谨，是一位视学术为生命的学者。他早在1954年就在《文学遗产》等重要学术刊物发表了《论〈西厢记〉》等论文。1956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学术论著《戏曲杂记》。在他六十岁以后，徐先生仍先后出版了《论汤显祖及其他》（1983，上海古籍出版社）、《史汉论稿》（1984，江苏古籍出版社）、《元曲选家臧懋循》（1985，中国戏剧

出版社）、《论〈金瓶梅〉的成书及其它》（1989，齐鲁书社）、《沈璟集辑校》（1991，上海古籍出版社）、《晚明曲家年谱》（收入《徐朔方集》，1993，浙江古籍出版社）、《汤显祖评传》（1993，南京大学出版社）、《小说考信编》（1997，上海古籍出版社）、《元明清戏曲经典》（主编之一，1999，上海书店出版社）、《汤显祖全集笺校》（1999，北京古籍出版社）、《徐朔方说戏曲》（2000，上海古籍出版社）、《南戏与传奇研究》（主编之一，2005，湖北教育出版社）、《〈长生殿〉插图本》（校注，2005，人民文学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合编，2005，上海古籍出版社）、《明代文学史》（与孙秋克合著，2006，浙江大学出版社）等。而且更令人惊叹的是，徐先生几乎每年还有数篇高质量的论文问世。而这一切，还都是在承担了繁忙的教学任务和指导多名研究生之外完成的。

在这里，囿于篇幅，我只简介一下徐先生《晚明曲家年谱》和《明代文学史》的情况。

《晚明曲家年谱》共录明代戏曲家年谱 39 种，收入 1993 年浙江古籍出版社的《徐朔方集》之中，分为年谱、行事系年和事实录存三类；又因为曲家籍贯之异而分为苏州、浙江、皖赣三卷。中国古代戏曲作家的地位大多低微，相关资料十分缺少。徐先生从上世纪 50 年代写《汤显祖年谱》起，就一直大海捞针般地努力搜寻有关曲家的资料。经过三十多年的艰辛，爬罗剔抉，披沙拣金，终于完成了《晚明曲家年谱》这部巨著，勾勒了 39 家晚明曲家的生平暨创作系年。为中国古代戏曲小说研究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材料，也为研究者树立了熔史料考证、理论思考和艺术分析于一炉的年谱范本。

而《明代文学史》的前期准备加后期写作更是历时四十余年。1962 年，身为讲师的徐先生接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来信，约他编写《明代文学史》。虽然以后因种种原因此事搁浅了，但是撰写《明代文学史》的念头从此一直萦绕在先生心中。徐先生“大胆地认为所有名家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或断代文学史有一个通病：编写者在执笔之前并没有通读他所论述的全部作家作品”，因而坚持“编写文学史应该将所编时期所有的作家作品巨细无遗地全部加以阅读研究”。为此他

千方百计阅读了大量的明代典籍及作品，写卡片、做索引，做了极为充分的准备。

终于，在距 1962 年几近 40 载之时，《明代文学史》被立为了国家“九五”社会科学重要项目。此时徐先生已快八十高龄，健康水平已大不如前。要阅读卷帙浩繁的明代典籍，写成一部文学史，任务的艰难可想而知。特别是 2000 年徐先生的夫人宋珊苞老师患重病，并不幸于是年 12 月 17 日去世。暮年痛失老伴，这对不善家务的徐先生无疑是致命的打击。先生的两位公子，徐礼杨在美国、徐礼松在北京工作，无法照顾他的生活。但老先生不坠青云之志，一心为完成《明代文学史》而勤奋工作。

2001 年 6 月，承蒙省民政厅余刚学友的帮助，我和徐先生的首位博士弟子廖可斌君把徐先生送进了古运河边的杭州福利院，以便解除他生活上的后顾之忧。但徐先生却把他的房间变成了撰写《明代文学史》的工作室。不足 20 平米的房间内有两张床，一张床上堆满了书，一张床上铺满了书稿与卡片等资料；桌子上则放着几只饭碗、茶杯和许许多多的药品盒与药瓶。由于患有高血压、高血脂、胰腺炎等疾病，加上写作的劳累，当时年近八旬的徐先生健康状况已很差，每天都要吃药、打针和治疗；老年性白内障，又使先生的视力非常差。但他硬是用颤抖的手，坚持每天从早到晚字斟句酌地修改着一页页书稿、一句句文字、一个个细节。值得庆幸的是，上年秋天访问学者孙秋克副教授来先生门下访学。在徐先生的主持与指导下，孙秋克副教授积极协助徐先生努力工作。终于，历尽艰辛，80 高龄的徐先生在 2003 年春天写成了《明代文学史》的初稿，完成了他多年的夙愿。这部 42 万多字的煌煌巨著，在 2006 年 6 月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基金和浙江省社科学术著作出版资金的资助下，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封底印着四行字：“著名学者徐朔方教授在明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结晶；全国社科规划重点项目优秀成果；一代国学名师与后辈学人共同打造的力作；浙江大学出版社倾力推出的学术精品。”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鉴定专家认为该成果是“迄今所见明代文学史著作中学术性最强、特色最明显的一部”，“将明代文学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2003年7月26日，徐先生因跌伤住院治疗。虽经多方救治，但一直昏迷不醒。2007年2月17日，丙戌年除夕的下午4:45分，徐朔方先生鹤驾西逝，享年84岁。《明代文学史》，这部先生的呕心沥血之作，就成了徐朔方师留给世人的最后一部巨著；而先生这种对学术至死不渝的执着追求，更为我们树立了一座永恒的丰碑。

本人忝为徐朔方先生弟子，也已年届70。但30多年前在杭大中文系求学的情景和老师们的音容笑貌却历久弥新，读博期间朔方师的耳提面命、亲切教诲仍如在眼前。

抚今追昔，更是缅怀恩师。特写此文，献给杭州大学中文系，也纪念恩师。敬爱的徐朔方先生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返回目录](#)

## 我在杭大外语系工作时

——杭州大学外语系教师 钱炜

我在外语系工作时，英语教研室是名副其实的老中青三结合：蒋炳贤和鲍屡平教授是老一代；姚祖培、商亚南、上官筱簾、朱雅美属于中间的一代；任绍曾、我、严威夷、卢世雄、黄成煌等构成年轻的一代。

我印象最深的是外语系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两次留级就退学。有一个学生不愿意退，在系办公室用刀砍了自己的一个手指也没有用。正是这种严格要求使杭大外语系的水平超过上海外国语学院。那时我们和上外挂钩，我多次去上外听课取经。（蒋教授的侄女在上外任教。）上外学生开口的能力比我们略强，但是我们的毕业生笔语能力强于他们。为什么？因为从蒋、鲍老教授开始，我们一直非常重视笔语的训练。

鲍屡平教授给我们开设“词汇学专题”讲座。他十分强调用 **simple but idiomatic English** 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蒋教授修改作文同样强调这一点。这使我受益终身。今年上半年我和林珍珍为杭州大学退休的副教授朱丽云编写的词典（专用于帮助外国人学习中文）翻译所有的解释。我们遵循的首要原则便是使用 **simple but idiomatic English**。

朱丽云副教授是我们在杭州大学的老邻居。我们都住在校内的一幢学生宿舍三楼。我们的孩子一起办“娃娃家”。

杭州大学外语系的严格要求是我被调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担任负责教学与科研的副院长时带去的一种财富。在北京的一个晚上，我在宿舍附近听到两位学生的对话，其主题是“60分万岁”。当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属国家旅游局管辖。学习风气很差。北京人的一个口头禅是“好男不娶二外女，好女不嫁建工男。”建工指的是北京建筑工程学院。两个学校的许多学生都不认真学习，热衷谈恋爱，找对象。我到二外上任后，第一年只是听和看。后来经过学校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采纳我的建议，实行严格的淘汰制：大系最后三名；中系最后两

名；小系最后一名。第一次一律警告，第二次勒令退学。三年之后，全校学习风气大变。我离开二外已有 20 年。二外也早已放弃我的办法。但是我深信，没有淘汰制度，一定不会有好的质量。这是我在杭州大学学习、工作十多年所学到的最重要的原则。

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时，美国哈佛大学跟杭州大学建立了交流关系。杭州大学派往哈佛的第一个教师是刘忆岚（第二个是林珍珍）。刘回国后与我见面时说，哈佛也实行严格的淘汰制。有意思的是，有的学生学了一年半载之后会自动退学，因为那里竞争十分激烈。有的学生自知无法参与竞争，便自动离开。有的则是因考试成绩差而被勒令退学。

我们英语教研室另有一位特殊的人物，赵冕。他是所谓的右派分子，被安排在外语系。他的英语有相当的水平。坐在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我跟他个人关系尚可。有时我会问他语言方面的问题。

陆谷孙算得上是我的好朋友。那时，他多次来到杭州。我请他作讲座。有一次我专程乘火车去上海向他请教一个语言上的问题。你们手头如果有他主编的“英汉大词典”，可以在“参加部分编写的人员...”中看到我的名字。这是因为应陆教授之请，我为词典的最后一次校对出了一点力。那时的英语教科书都是他们写的。

## 返回目录

## 难忘的优秀师资队伍

——杭州大学中文系 62 级 熊恩生

杭大中文系当时师资力量雄厚。系主任姜亮夫先生是中国著名的楚辞学和敦煌学专家，夏承焘教授在中国唐宋词方面排得上是第一把交椅，系副主任蒋祖怡在文艺理论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与教学上成绩卓著。在我学习期间，除外语、体育及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哲学等公共课由外系教师担任外，所有专业课都是本系教师任教。

王林祥（元骧）、张颂南、陈子椿、蔡良骥先生教过我们《文学概论》，任铭善、蒋礼鸿、祝鸿熹、黄金贵先生教过我们《古代汉语》，马骅、王荣初、吕洪年先生教过我们《写作》，傅国通、倪宝元先生教过我们《现代汉语》，王维贤先生教过我们《语言学概论》，周育德、张仲浦、裴正琮和陈坚、郑择魁、朱宏达先生教过我们《现代文学作品选读》。

三年级时，我们还专门开有《中国文学史》和《外国文学史》的课。教过我们古典文学唐宋部分的有徐朔方、吴熊和、平慧善、刘操南、蔡义江、雪克、余荇等先生；教过我们外国文学的有华宇清、孙席珍、蒋寿强、丁子春先生。这些老师当时或后来都是在学问上很有造诣的学者，也是在教学上一丝不苟、诲人不倦、非常敬业的师长。

这些老师中有几位，记忆中我印象特别深。一位是王林祥老师，1958年后一直在杭大从事文艺理论和美学的教学与研究。王老师当时还是一位年轻助教，但现在已是海内外知名的文艺理论家、教授。记得我进校后上的第一节课是《文学概论》，授课老师就是王老师，是上大课的形式。除我们一年级两个班外，还有新闻系的同学。我们有些课，如《写作》、《古汉语通论》、《古典文学作品选》等，当时都是没有部编教材，用的是老师自编的教材和讲义。《文学概论》开始就是王林祥等授课老师自编的讲义。自编教材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教师自信、实力和水平的展现。

杭大中文系当时没有分专业。但听了王老师的第一堂课，或许是先入为主吧，我倒渐渐爱上了文艺理论这门课，觉得在这方面也很有学头。因此，有段时间我除了认真听课以外，也多方或找或借一些相关的书籍和刊物阅读，并摘录了不少笔记。如以群的《文学基本原理》、辛未艾翻译的《赫尔岑论文学》、李传龙的《文学与社会生活》、梁真翻译的《别林斯基论文学》、周扬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高尔基的《文学论文选》，以及[苏]《共产党人》杂志专论《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和[苏]维·伊凡诺夫的《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等。

文艺理论有些问题看似平常，其实非常深奥。记得有一次上课时，王林祥老师就谈到：当前对美学的研究，从文学理论方面来看，就是一门比较高深的学问；倘若能给“美是什么”下个确切的定义，那是不亚于天文学上发现一颗卫星的。其实，王老师这里说的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早在2000年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曾在著名的《大希庇阿斯》篇中，论辩过这个问题。之后人们从未停息过对美的探索，以各种不同的哲学思想为指导，从各种不同的途径解释美，企图对美找出一个人们所能接受的定义。但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美是主观的；有的说美是客观的；有的说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有的……对这个问题，我也曾一度找过一些书籍和文章阅看，作过一些思考。在寝室里还与同学进行过辩论，觉得每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又似乎不能涵盖一切，最终也没能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王老师除给我们上课外，还是我们年级一度成立的兴趣小组的指导老师。记得一次兴趣小组围绕田汉的独幕剧《获虎之夜》是否属于浪漫主义的作品，大家讨论分歧比较大。甚至认为在表现手法上还有浪漫主义手法和现实主义手法之分，而这归根到底是对浪漫主义这一创作方法的特征的理解问题。听了大家的争论，王老师最后做了小结，特别指出：浪漫主义这一创作方法的特点是对理想的抒写；所描绘的是生活中应当如此的东西；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情节尖锐、曲折、离奇；追求精神的真实；语言常是抒发的、夸张的。经王老师这一指点，大家豁然开朗。我也对这一创作方法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王老师对鲁

迅先生非常敬仰。文革初期，还组织我们几个同学编了本《鲁迅语录》。

王老师当时比较年轻，待人又诚恳，没有一点架子，同学们都愿与他接触。特别是后来还一块参加了农村“社教”运动，大家对他更是无拘无束。我们有什么问题向他请教，他总是耐心地解答。王老师家就在杭大南面西溪路的学校教职工宿舍。毕业后，我曾去看过他几次。他总是非常热情接待。不能忘怀的是，他母亲每次都要烧西米莲子羹款待，让我很过意不去。遗憾的是，我由于分配在外地，加上又一直从事行政和党务工作。隔行如隔山，终于失去了经常聆听王老师继续教诲的机会，也失去了我做文艺理论工作者的梦想。退休之后的同学会，王老师是被邀请参加最多的一位老师。我们不时还能见面。2004年10月，应杨仲坚同学之邀，我还曾和王老师及林崇明、唐森灿同学一块去诸暨搞“社教”的斯宅等地重游怀旧。

还有一位老师是马骅老师，是二年级时教我们写作课的。马骅老师很风趣，记得他上第一堂课讲到做作文时，一开始就说：“初次见面，本不该向你们讨东西的。可中国有个老规矩，学生见老师是要送见面礼的。那还是做篇作文吧！”接着出了4个作文题让我们自选一题。对我们的作文，他每次都要一一认真阅看，并用毛笔的蝇头小楷写出评语；肯定很多地方，又指出不足。有次作文，我写了篇《故乡》的小小说。他批阅后写的评语加旁批就多达1600多字，其诲人不倦的敬业精神让我非常敬重。批阅后，他每次都要认真进行讲评。马老师在上世纪40年代就是很有名的诗人。他的表达能力特别好。我很爱听他的课，真像听诗歌一样，非常舒服，能紧紧扣住你的心弦。

除作文课的接触之外，二年级时，我任系团委宣传委员，为筹办1964年元旦系书法比赛和赛诗会的事，曾两次晚上去找过马老师，请他和写作教研组支持、帮助。第一次是1963年12月初，那几天他身体可能不是太好，在家里头上还戴着一顶小圆呢帽。但依旧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一进他家门，便让我坐下，听我说明来意后，很赞同我们的做法，并提供了一些很好的建议。谈完赛诗会的事，围绕写作问题，我们又聊了聊；我也抓住机会向他再请教。

进大学后，为记录这段难忘的时光，我开始写了些流水账似的日记。写日记自然也是其中一个话题。马老师对我说：“写日记，不仅可写一天的生活、思想的变化、最难忘的一件事以及学习等，而且应该远比这些宽广得多，可以写今天接触中感受特别深的一个人，甚至一朵花，还可写些书评、影评，乃至觉得某两个人的对话很有趣，很能体现他们各自的身份、性格等，也可记下来。而且如果给自己的朋友写了一封信，认为信不错，也可将它抄在日记上。总之，要多方面地观察、吸收。”正是听了马老师的这席话，我以后的日记自觉似乎有了一些改变。很可惜的是，由于学习紧张，没能坚持下去。而是断断续续，到文革开始就终止了。

第二次去马骅老师处，是过了一个多星期，还是为赛诗会的事，主要是就赛诗会形式想听听马老师的意见。原来我们只打算搞看画题诗，马老师虽不反对，但认为形式还可多样。正是受马老师意见的启发，我们后来做了调整，确定了3种形式。马老师还应邀作为裁判参加了我们的赛诗会。这次到马老师处，马老师还主动谈起了我不久前写的一篇作文《在列车上》，认为总的构思不错。但可能由于生活的问题，有个别情节有点失真。他强调：“作家必须写自己最熟悉的东西”。这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这又让我想起第一次去马老师家时，他还同我谈到扩大生活面的问题，说：“这对一个学中文的同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要提高写作能力，丰富的生活感受更是不可缺少”。我联想中文系出来的学生，真正当作家的不多，缺少生活基础恐怕是一个重要原因。“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是千真万确的。我至今还保存着马老师批改的7篇作文。很遗憾，我们这届写作课只安排到二年级。否则在写作方面，从马老师处一定会得到更多的教益。

中文系当时最有名的教师当然是夏承焘。在刚进校时师生见面会上第1次见到他。很可惜他没有直接给我们上过课，但我曾参加过一次对他的学习专访，听过他的一次讲座。学习专访的事情是这样的：在一年级第2学期时，系里在我们年级组建了一个学习兴趣小组，有八、九个人，我也是成员之一。兴趣小组安排的活动不多，除前面说到的结合田汉的独幕剧《获虎之夜》关于浪漫主义的讨论外，还有一

次是关于曹禺剧本《雷雨》中周朴园形象的讨论。而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专访夏承焘先生。夏先生毕生致力于词学研究和教学，是现代词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记得那天他在门口迎接我们，把我们接到屋里，让我们一一坐下。原以为他是个很严肃的人，其实不然。夏先生穿着很朴素，头上戴着一顶呢帽，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一件旧蓝布上装，一双布鞋。随后，我们这些刚踏入大学校门不久的学子们纷纷向他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如何读书？什么是基础？如何做卡片？……等等，他都一一热情作了回答。如何做卡片？夏先生说：“做卡片应当做到三个字，小、少、了。卡片的面积不宜过大，便于随身携带；不要记得太多，否则将来连自己都没有功夫查阅，特别是对一些比较容易到手或者自己有的可以少记一些，孤本当然例外；‘了’则是要明了，对一个问题非钻通不可。”对于读书，他说：“不宜太深，也不宜太浅。太深了，一点不懂，等于不读；太浅了，对提高没有什么好处。最好是十分当中有二、三分和三、四分不懂，这样提高最有帮助。”说到基础，他认为基础有两种：“一种是永久的基础，每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必须具备，如《孟子》、《论语》、李杜诗等；一种是目前的基础，这是在时时改变的。前者是基本功，无疑很重要；但后者也不能忽视，更应该踏踏实实，不能放过”。他还说：“刚进大学的同学有个毛病就是急，觉得要读的书太多了，不知从何着手。读书不在多，而在精和细。比如欣赏，杜甫的诗读个 20 来首就足够了。对于上万首的全唐诗只要精读个 100 来首就行了。至于要研究的话，那当例外，则是越多越好。”在谈到写诗的时候，他说：“有个学生写了一首诗，有一句是‘枝上小桃红’，老师把它改成‘红上小桃枝’，这一改，不仅更形象了，而且把静的也写成动的了。写诗一定要有形象。”交谈中，夏先生还谈到要热爱生活，说：生活里到处都是知识。他反对那种认为做学问应该苦读，特别是学文学的。这些都是难得的治学箴言。

### 返回目录

## 仓门问学记

——杭州大学历史系 80 级 钱茂伟

### （一）我的历史文选课老师

我是 1980 年 9 月入杭州大学历史学系学习的。仓修良是我们的历史文选课老师，我们就是这么认识的。记得 9 月中旬的第一堂课，仓修良老师穿着蓝色的中山装衣服，拎着一只十分普通的皮包，拿了一叠试卷，进了教室。我坐在第一排，正好在讲台下。他朝我嘿嘿一笑，我也朝他一笑。一开头，他就发了一通议论，称浙江的高考太不合理。高校少，学校多，导致浙江的高考分相当高。许多有才华、有培养前途的同学仅因几分之差而名落孙山。相反，江苏好多了，好学校多，学生容易考。他是江苏人，但在浙江工作，故有此比较。后来发现，他喜欢在课上讲一些课外的见闻与感受，这是仓师的一个特点。听说有一次，有一个高年级同学告到了系上，说仓师上课废话太多。他听了相当不以为然，在给我们上课时讲了这件事，称：我这是教书育人，废话不废。“废话不废”，就成了仓师的经典名言。

那天，仓师一上来就要考我们一下。他称这是摸底调查，要知道我们的古汉语掌握程度。在我看来，这是给我们新生来了一个下马威。这是一篇《史记·淮阴侯列传》，不算难也不算易。因为那年浙江高考的语文试卷中，就有一段选自《史记·淮阴侯列传》的话。其中“多多益善”，一时难住了我。所以，考这篇文章，颇有一些熟悉性，可能成绩也尚可。

仓师的历史文选课，有自己的风格：重视大意诠释，重点解释一些词汇，而不纠缠于每一句字词的解释。有时也会借题发挥一下，听起来比较有意思。当然，如果课后想仔细琢磨每一个字的意思，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

一年以后，此课由魏得良老师承担。魏师的风格正好与他相反，重视每一句字词的解释，基本功比较扎实。但过于一板一眼，有时不免乏味，难以引起人的激情，会让人打瞌睡。

历史文选课上了二年。其间，因仓师出差，时任杭州大学教务处副处长的杨招棣（后任杭州市委宣传部长）也给我们上了几周课。杨师的风格近于仓师，重视诠释大意。有时也会我们讲一些新知识，譬如诸葛亮年纪小于周瑜，就是那时由他讲给我们听的。

## （二）报考中国史学史研究生

到了三年级，即1983年上半年，仓师再次给我们开中国史学史课。此课没有教材，只有他那厚厚的讲义。其时，他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已经在1980年国庆时交稿，尚未出来。到了这年6月底学期快结束时，我们终于拿到了他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前后花了三年时间才正式出版，可见当时出版周期之长。

由于没有教材，我们完全靠记笔记。没有教材也好，我们记得十分周全。一学期下来，感觉颇有趣，尤其对仓师的中国古代史学史分期体系十分欣赏，觉得对各期特点的提炼相当到位，用词也相当准确。这种标题，今天称为中心主题式标题。课后，我写了一篇几百字的书评稿，当然没有机会发表。此稿曾长期随我同行，可惜最近一次搬家后，一时找不到了。

仓师的中国史学史课，改变了我的兴趣爱好。此前，我想报考宋史研究生。我这个人好上进，一个目标实现以后，会不断地追求更高的目标。考研究生这件事，早在中学即听说。当时我的一个物理老师沈华参加了研究生考试，结果没有考上。那时其神秘、高深莫测之感可想而知。

1980年8月底接到杭州大学录取通知书后，我就规划着进大学以后的目标，其中之一就是要考上研究生。进大学以后，我的目标十分明确，就是朝考研究生做准备。像我这样一进大学，就想考研究生，并且在付诸实践的人，班上是没有的，恐怕全校也屈指可数。这样的

想法过于超前，自然难以让人接受。有一次，与同寝室某二位同学说起毕业后可以考研究生之事，他们都嘲笑我。这使我发誓，以后再也不要与那些胸无大志的人谈论此事。不过，具体考什么专业，我寻找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考虑到本校历史系的宋史最强，我先决定考宋史研究生。我以为，要学好宋史，须学好辽、夏、金史。于是，读了不少关于辽、夏、金史的图书。这一读又改变了我的想法，发现中国民族关系史与中国民族史十分有意思，决意想考这方面的研究生。这个专业，当时只有中国民族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才有。

直到1983年上了中国史学史课后，最终决定考中国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那年，仓师刚评上硕士生导师，首次可以招生了。我当时没有出过省，没见过大的世面，怕考外校考不进。为了保险起见，还是留在系上好。仓师的中国史学史课改变了我的兴趣，最终决定考仓师的研究生。有一次在路上遇见仓师，谈了我的设想，仓师当然首肯。那年，同室的叶建华也决定报考仓师。1984年考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史学史方向的人不少，据说有十多个。最终，我以第一名成绩录取了，叶建华第二名。到了复试的时候，才知尚有第三个人，即舒仁辉。那年，仓师本计划招二人，因先秦史专业没有招满，于是调剂了一个人过来。舒仁辉是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的，不在杭州考试，所以我们不知道还有此人。

### （三）三年硕士生涯

1984年9月6日，我再次来杭州大学报到，开始了我三年的研究生生涯。寝室在8号楼213室，在楼梯左边，住四人，即我、叶建华、舒仁辉、傅允生。傅允生是先秦史专业的，先秦史复试时没人。他是后来补录的，外语仅36分，来自浙江师范大学，是我们78级的学长。那天，我与傅允生最早到，抢占了靠窗的下铺。中午时分，叶建华也到了，住傅允生里边那张下铺。到了第二天上午，舒仁辉姗姗来迟，住我的上铺。从此，开始了我们四人三年的同室生活。

我们的专业课是在历史文献教研室中进行的。每次仓师来校，我们三人就按时到历史文献教研室集中。仓师的开场白，目标定得十分远大，希望培养比较多的研究生，以后能学有所成，最终形成一个自成学派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群体。此话让我深受鼓舞，决意好好随仓师学习，发扬光大仓师的学术事业。由于大学期间已经修过中国史学史课，所以仓师要我们从读原著入手。首次读的是刘知几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这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上最著名的两部理论著述。文字深奥，就当时的认知水平，并不容易读懂。尤其是没有专题研究目标，读不出感觉来。一学期下来，似懂非懂地完成了任务。于《史通》，我最感兴趣的是外篇。那实际是一部唐前中国史学史。我觉得可以据此还原唐前中国史学发展史。我想写一篇论文，但没有完成。最近，读到马铁浩《史通与先唐典籍》（人民出版社2010年），此题颇近我意。于《文史通义》，我写了一篇《论章学诚的名利观》。此文针对仓师所说章学诚没有名利思想而作。其实，仓师所说名利，实指功利。而我所谓名利，更为广泛；成为学者，也是一种名利思想的表现。第二年，仓师给我们上了谱学通论。我写了《明人年谱述略》。此文是我读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后而作。此书前有一篇总序，概述了清代年谱的特点。于是，我仿作《明人年谱述略》，除了内容不同之外，形式上完全模仿来新夏序文格式而来。后来读南炳文的《论明人年谱的价值和利用》（《求是学刊》2004年第6期），颇有我的文章开明人年谱研究先声之感。我比较重视文献积累，至今仍保留着《论章学诚的名利观》、《明人年谱述略》的复写原件。当时尚是复写纸时代，我保留了正件，而将副件上交给了仓师打成绩用。

仓师要求甚严。而我们过于年轻，不懂事，难于满足老师要求，故经常会受到训斥。他又重伟岸，不太肯放下老师架子，与我们作朋友式沟通。我们每次见仓师，都是小心翼翼的。

1986年国庆节，老师、师母请我们几个学生到家吃饭。这是我们第一次上老师家吃饭，大家都非常开心。

#### （四）确定明代史学作为主攻方向

我是一个比较有理想，也肯将理想付诸实践的人。一旦认准一个目标，会用日积月累之法，直到做成为止。随仓师专治中国史学史后，怀着一颗十分虔诚的学术研究之心，着手寻找属于自己的学术领地。有一次上课，仓师要我们选择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的断代方向。叶建华选择了宋代史学，舒仁辉选择了南北朝史学，我选择了明代史学。明代史学一直以来是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不仅单篇论文少，而且所有的中国史学史著作，写到明代史学部分，也总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的。明朝立国近 300 年，难道在史学上真的就没有什么建树可言吗？这恐怕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历史研究强调运用新的史观、新的方法，对具体的史学问题，作出新的认识。拿前人的现成结论，代替自己的具体的研究，只能窒息史学的发展。明代史学水平到底如何，恐怕只有经过脚踏实地的研究，才能下结论。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我选择了明代史学作为自己的主攻目标。

我确定明代史学，尚还有一个原因，与我的大学毕业论文选题有关。因为要研究宋史，我购置了明代史家陈邦瞻撰写的《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大体读过一遍。等大四选择毕业论文选题时，因报考了中国古代史学史方向，便想确定写中国史学史方向的选题。手头的图书，直接启迪了我。我确定研究陈邦瞻的宋元二部纪事本末。本来想请仓师做论文指导老师，结果人太多。系上指定魏得良老师作为我的论文指导老师。于是，在魏师的指导下，我独立完成了《简论陈邦瞻宋元纪事本末》。这篇论文，开启了我明代史学研究的先声，引导我进入了明代史学研究领域。

从此，我踏上了一条十分艰难的史学研究道路。说艰难，不是套话，那是真的艰难！因为我要读的书都是古籍善本，而这些善本又多分布在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等大图书馆。善本不能复印，只能手抄，且只许用铅笔抄，条件之困难可想而知。有一次，叶建华都不理解，说你要读善本干嘛。

我先利用了杭州大学图书馆的资料，接着查阅了浙江图书馆的资料。1986年9月，我们三人首次北上考察，先后到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查阅资料。上北京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时，我拿了杭州大学的介绍信，到馆办公室盖章。那女工作人员爱理不理的神态，让人十分不舒服。没想到我引以为豪的杭州大学在她心目中的地位竟是如此之低。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有不少港台图书，其中就有朱国祯的《皇明史概》、何乔远的《名山藏》、雷礼的《列卿纪》等。因时间紧迫，我只能将要复印的内容标上页码，然后托复印师傅代为复印、代为邮寄、代开发票，答应收到材料后立马汇款。那师傅也够意思，复印后邮寄给了我。我当然也守信用，立马汇了款。

通过二年多时间的摸底调查，我大体上了解了明代史学的发展状况。于是在修中国史学史专题课时，写了《明代史学研究的现状及展望》一文。此文曾投《史学史研究》，可惜没有过主编白寿彝先生的关。责任编辑朱仲玉先生回信转达了白先生的意见，大意是，与其写这种提要式、点水式的文章，不如选择一本书，做一个专题的深入研究。我觉得这个意见有道理。于是我决意做明代史学的专题研究。到了确定论文选题的时候了，我拿出了几个候选题目，征求仓师的意见。仓师听了我的汇报后，觉得朱国祯《皇明史概》比较合适。主要的理由是，此题没人做过。而且朱国祯史学研究材料可以全部找到，可以做得出来。于是，我确定了《朱国祯史学之初探》作为毕业论文题目。又经过近一年的研究与写作，终在1987年5月完稿，顺利参加了硕士论文答辩。

我们是仓师第一届硕士研究生毕业，答辩活动是十分正规的。从华东师范大学请来了苏渊雷、袁英光两位名家，另外就是仓师、魏师，共四人，组成了答辩小组。我的论文答辩尚满意，得了一个优秀。此前，我见过苏渊雷、袁英光两位先生。1985年，我首次到上海，决意谒访名校名师。我非常冒昧地，通过朋友引路，上苏渊雷、袁英光家门，谒访过两位先生。也到复旦访问过黄苇先生。他在读的研究生巴兆祥正是这次认识的。这几位是仓师屡次提及的上海名家。1986年，

我们三人复到华东师范大学住了半个月，听袁英光先生系统讲授了中国近代史学史，这使我们更多地了解了袁先生。

苏渊雷先生是典型的江南才子，十分有文人情趣。答辩前一天，我与仓师接他俩到杭大专家楼下榻后，他立马拿出一小瓶白酒，打开一包花生米，就边聊边悠然地喝了起来。答辩后的晚上，仓师在家请客。我们当然没有资格参与，但仓师答应可以为我们要一些书画作品。据仓师后来说，那天晚上，苏渊雷喝到八成时，兴奋地拿起准备好的毛笔与宣纸，开始为大家奋笔疾书。我拿到了两幅书法作品，其中一条写的是诸葛亮的“宁静致远”。仓师说，苏渊雷先生是书法名家，他的书画很值钱，让我们好好收藏。到宁波工作以后，我将“宁静致远”条幅挂在寝室中，相当自豪。1992年初结婚后，搬出单身寝室，条幅收了起来。可惜，后来弄丢了，十分遗憾。当时也不明白“宁静致远”的深意。现在想来，这倒符合我走过的学术之路，正是前贤有知。

### （五）毕业以后

1987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宁波师院工作，科研条件相当差。不过因为我是一个有理想的人，倒也没有气馁。我利用出差等机会，到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去查阅资料，断断续续地写出了十多篇明代史学的专题论文。

到宁波以后，仓师要我找中文系的白砥民教授。白先生相当客气。那年冬天，让我参与了《中国文化知识备要》的编纂工作。我负责中国传统史学部分。我圆满地完成了编纂任务。可惜，由于出版社的失信，从巴蜀书社到中国书店，出了清样，至今未上机付印。

读研究期间，曾参与仓师主编的《史记辞典》。毕业以后，又参与了仓师主编的《汉书辞典》的编纂。这些工作，让我对工具书编纂有了一些经验。

1988年，管敏义从宁夏大学调至宁波师院工作。我在管敏义与崔曙庭先生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1989年10月，第一

次参加了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的嘉定年会。在会上，见到了张舜徽诸先生。会后，我陪仓师与山东教育出版社的温玉川先生，一起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商讨《南史辞典》、《北史辞典》的编纂问题。我们三人住进了华东师范大学招待所。这是一个套间，桂遵义先生安排了我們。第二天上午，我们三人在袁英光先生的带领下，到吴泽先生家，见到了吴泽先生。那次是我第一次听吴泽先生讲话。中午，袁英光在家请客，吴泽先生及华东师范大学简修炜诸位先生均参与了。

1991年，管敏义先生结合地方特色，提出了《浙东学术史》项目，以此带动宁波师院政史系的整体科研工作。我协助他承担了主要的编纂工作。除了承担多篇文章外，还负责了明清部分的通稿工作。从此开始了我的浙东学术史研究生涯。浙东史学一直是仓师着意的项目。他曾屡次说要做浙东史学研究。因此，我们的项目得到了仓师的全力支持。他还替此书写了序。仓师关照管敏义多提携我。他确实也是这么做的。

在宁波工作初期，因宁波籍的师母喜欢吃宁波特产糯米做的“块”，仓师曾来信，要我回杭州时，帮着带几斤来。我当然照办，过年回家时，顺便到仓师家一趟。

我一直想考华东师范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但因种种原因，就是下不了决心。一直拖到了1997年，才实现上华东师范大学读博士研究生之愿。此时，已经是吴泽先生弟子盛邦和招生了，我成了他的第一个博士生。我继续做明代史学研究，终成博士论文《明代史学研究》30多万字。此后，又上复旦读博士后。约2001年左右，仓师上韩国讲学。他来上海韩国领事馆办签证，我特意作陪。从韩国忠南大学讲学回上海时，我又上虹桥机场接他。在火车南站等车时，我们谈了不少。仓师说，你与我一样，是靠自己努力成才的。相对说来，我比他强多了，遇到了一些好的导师，而他则没有。《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出版以后，系上有人眼红，煽动其师黎子耀先生到系上告他，说用了他的讲义材料却不注明出处。自己的恩师也如此待他，这让他十分伤心。由此也可见“文革”结束以后，学界生态之恶化。

1997年8月20日，全国地方志奖颁奖大会在宁波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李铁映作讲话。他提出两个建议：一是在天一阁成立一个方志博物馆，二是在宁波大学成立一个方志学专业，培养方志学人才。于是，宁波大学积极筹办方志学专业，中国方志办公室主任高德先生要求仓师兼任宁波大学教授，指导宁大方志学专业业务工作。从此，仓师受聘担任了宁波大学的兼职教授，承担了方志学通论、谱牒学通论课。后来，仓师虽不再担本科生课程，但每次方志培训班时，必请仓师来讲课。每次来宁波，仓师总会打电话来，我也一定会上宾馆看望仓师，聊聊近况。这使对仓师生平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

2003年前后，《中国史学名著评介》增订本拟开一个编纂会议，仓师决定到宁波来开，由我出面联系宾馆之事。那次，仓师与温玉川、周国林、胡逢祥、张书学四位先生来宁波开了会，我替他们找到了面湖的月湖大酒店。会后，他们上普陀山游览了。我分担了《明实录》与《皇明资治通纪》两篇。事后，圆满地完成了撰写任务。

时间过得相当快，从1980年随仓师学习，迄今已三十二年。仓师是我成长过程中影响最大的老师。如今，恩师年跻八十，仍退而不休，著书立说，到处讲学，这是我们十分的欣慰的，也是永远值得学习的榜样。



[返回目录](#)

## 我在杭州大学的教学生涯

——杭州大学新闻系教授 张允若

外国新闻事业史的教师一直想要搞一个外国新闻史的学会，作为学术交流的机构。但是搞一个新的学会，要经过民政部的审批，比较麻烦。后来就打算在中国新闻史学会下面设立一个分会。因为是中国的新闻史学嘛，既包括对中国的新闻史、也包括对外国新闻史的研究。

有一次在广州暨南大学参加面向 21 世纪新闻传播学讨论会，遇到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赵玉明。他建议我把外国新闻史学分会的担子挑起来。我回来后还跟邵培仁老师谈起过这个事。当时史学会提出的要求不高，希望主办学校提供一个办公室、一部电话、一个做具体工作的秘书长人选，还要有点经费。邵培仁说办公室、电话都好办，但是想来想去，谁来具体管这个事呢？赵玉明同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年轻教师有的已经走了，有的也不打算长期在杭大待下去，所以没有合适的办事人选。还有个插曲：暨南大学有个很优秀的外国新闻史的年轻教师吴非，他愿意承担秘书长的职务，说：我们一起来干。我说也好，我来牵个头，具体的事情你秘书长来做。外国新闻史分会就放在你们暨南大学。后来大家觉得会长在这边、秘书长在那边，总不方便，这个事情就没有谈下去。几年以后，还是北京的几个学校经过协商组建了这个分会。

我回归新闻教育队伍后，教学和科研的重点是在传播学和外国新闻事业史这两个方面。在江西时期如此，来到杭大后仍然如此。传播学从引进中国时开始我就关注了。引进传播学的先行者、我的复旦系友陈韵昭教授，八十年代在珠海创立了中国首家应用传播学研究所，曾经邀我到珠海共事。但当时珠海还不发达，我的家属工作难于安排，所以未能实现。但是我还是同她合作做了一些编译工作。我编写了自成体系的传播学概论教材，但是未能及时出版。至于外国新闻史的教学和研究，总算有一些看得见的成果。从 1989 年出版的《西方新闻事

业概述》，到2003年的《外国新闻事业史教程》，这些在前面已经说了。

上述两个方面，都属于新闻教学科研的新兴领域，全国性的学术讨论活动是比较多的。我在外面参与的这类学术交流，当然也是我们杭大新闻系对外活动的一个部分，也是系史的一个侧面。关于传播学，基本上每两年开一次会。这种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始于上世纪80年代之初，是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主持的。每次由一个地方院校承办，也就是社科院和地方院校合办。我从第三次开始参加，一直参加到第七次。后来这个研讨会终止了。原因是研究活动走向多元化。各个学校都自行组织和召集会议，不再是某一个全国性的机构在办了。我们系呢，那时邵培仁老师还没有来，传播学一直是我在教。这些会议都要我去。每次去都要带论文。这也促使我必须积极思考这方面的问题。另外，新闻理论和新闻史也有一些会议。因为我在外面交流比较多了，人家有活动总会来邀请我。所以，相对而言，我是系里参与学术会议比较多、学术活动比较多的人。在会议上，如果人家要我发言或讲话，总说是杭州大学某某老师，这也是在外面扩展我们系的影响。人家对我们系还是比较重视的。下面我简要回顾一下所参加过的学术会议。

一、1992年10月，北京有个规格比较高的会议，叫做“亚太地区报刊与科技和社会发展研讨会”。主办单位是中国科技新闻学会、中国特稿社、中国国际科技会议中心。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为大会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为大会主席并致开幕词，惠永正、吴阶平、邓楠为副主席，国内外名人陈香梅、赵浩生（资深美籍报人）、蔡子民（台盟主席）等为顾问。组委会包括国家科委、中国科协、中国记协、中国新闻社、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等单位负责人。学术委员会由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社科院新闻研究所负责人组成。我的邀请函是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转发来的，在校长那里申请了一点旅差费才去成的。到那里一看，发现国内外新闻界很多实权人物都来了，有人民日报负责人、解放日报吉林日报农民日报总编，台湾民生报经济日报、香港大公报文汇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美国国际日报等的老总，当然还有国内外新闻院校的许多熟悉或知名的教师同行，真是

济济一堂。会议最后合影的地点放在人民大会堂。政治局常委兼中央书记处书记李瑞环也来了。会议探讨的是报刊和科技跟社会发展的关系，看来目的还在于借此加强媒体的国际交流。我当时同陈韵昭、南京政治学院的卢惠民、暨南大学的郑惠卿等在一个组。我在分组会上做了发言，题目是《报刊和社会发展》。大会的论文集和几个全国性的新闻刊物刊载了。

二、1993年5月，第三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地点厦门，由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和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合办。当时社科院新闻所所长是孙旭培，传播学研究室主任是明安香。会议由明安香主持，厦门大学的校长曾到会致词。我的发言题目是：《当前传播学教学的几个问题》。后来发表在《新闻学探讨与争鸣》上。

三、1993年10月，全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新闻事业研讨会，在北京召开。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主办。我提交的论文：《简论市场、受众和服务观念》，收入论文集《市场经济与新闻事业》（燕山出版社）。我记得戴元光老师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在会上提到一个问题：现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那日常新闻报道中，对企业该如何报道呢？弄不好就是为某一个企业做宣传，做广告了。这个界限要好好把握。他谈的这个问题，我脑子里至今还有印象。

四、1995年6月，第四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在成都，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四川省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四川大学新闻传播系主办。我提交的论文：《国际电视：飞越太空的跨文化传播》，以后刊于《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5年第8期；又收入论文集：《传播·社会·发展》（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国际传播——现代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新任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喻权域参加了这次会议。明安香作为传播学研究室的主任，仍然是会议主持人。这里顺便谈谈我同喻权域的交集。1998年，他在复旦大学的《新闻大学》发表了长篇文章《对新闻学中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引起了许多学者的质疑。姚福申、陈力丹（笔名李位三）、孙旭培、刘建明和我，先后在同一刊物上发文，对喻文在理论上的错误和逻辑上的混乱表示异议。这场论争涉及了新闻学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例如新闻的定义、

新闻的商品属性、党性和人民性、新闻自由、新闻体制等等，对澄清观念、明辨是非、推进我国新闻理论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但因遭到外来干预，没有能够充分展开。为什么没有充分展开呢？据《新闻大学》主编事后告知本人，当时中宣部阅评组发话认为《新闻大学》是在围攻喻权域，是在传播资产阶级的新闻思想、宣扬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要求停止《新闻大学》的出版。因为《新闻大学》是教育部门主管的刊物，此事被转到了复旦大学党委。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亲自阅读了刊物的讨论文章，认为这是正常的学术讨论，不存在所谓“围攻”或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问题，因而没有理由停止该刊的出版。作为妥协，建议《新闻大学》不再发文继续进行这场争论。

五、1996年11月，广州召开的“面向21世纪的新闻与传播学术研讨会”，暨南大学新闻学系主办。暨南大学新闻系主任吴文虎主持会议，香港浸会学院俞旭教授等参加了会议。俞旭是复旦第一届博士生，当年我们在上海见过。后来他到美国深造去了，再后来又回到香港浸会大学传播学院，是那儿的负责人。四川大学的黄绿萍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她是搞中国新闻史的。我提交的论文：《国际新闻传播的历史走向》，收入《面向21世纪的新闻与传播》论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



广州研讨会上，左三为吴文虎教授，左四为本人，左六为俞旭教授

六、1997年4月，第五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杭州，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杭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合办。台湾学者李瞻夫妇都来了。李瞻是我国最早编撰世界新闻史的学者，是我国世界新闻史研究领域的开拓者。我们开始讲外国新闻史，都要参考他的书，一本厚厚的资料丰富的书。台湾还有个外国新闻史学者程之行也很有名，我曾想邀他参加会议，没有及时联系上。这一次全体会议的集体照，我没有赶上。我提交的论文：《对传播学几个基本概念的辨析》后来发表于《杭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并收入《新闻传播论坛》第三辑（南京大学出版社），以后有多家报刊转载，对传播学的教学和研究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七、1998年5月，“全国新闻期刊研讨会”，哈尔滨，由新闻期刊协会和《新闻传播》杂志社主办。原浙江日报总编、人民日报副总编郑梦熊参加了会议。他可能是新闻期刊协会的会长或顾问。会上我曾作即席发言。

八、2001年10月，全国第七次传播学研讨会，南京，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合办。我们系还有李岩老师参加，我提交的论文：《关于网络传播的一些理论思考》，后发表于《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1期。这次会议上我认识了南京大学的秦州老师。他自己办了个学术性的网站，名为紫金网，颇有影响。我应邀在那里开了自己的博客，还挂了个顾问的名字。

九、2004年4月，“中国新闻史学会年会暨全国新闻传播史教学学术研讨会”，开封，中国新闻史学会、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办。我提交的论文是：《关于外国新闻事业史教学的几点看法》。会议中接受《中华新闻报》记者丁华艳采访，谈外国新闻事业史教学，后来连载于该报6月28日和7月5日两期。我同资深新闻史学者、复旦大学的老师宁树藩教授、系友丁淦林教授一起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十、2004年5月，“中国网络传播学年会”，南京，中国江苏网、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主办。我担任论文第七组评议人并作即席发言。

会议过程中同中国传媒网的主编有过交流。这是个传媒领域的学术网站，我应约在该网开设了专栏，刊登了一些论文。

十一、2005年9月，“第四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办。我提交论文：《海外华文报刊和国内政治变革》，收入大会论文集。我们系还有范志忠老师参加。他是搞电视编剧、编导的。这个会上见到了香港和海外的一些老朋友，也结识了一些新朋友。

[返回目录](#)

## 葛藤老师和他的一堂英语课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吴磊

葛藤老师是我们外语系 78 级 3 班一年级的精读课老师，还有一位是邢老师。当年的外语楼的 3 班教室里，有他的 22 位学生。至今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的是他手执的教鞭，飞快书写的英语板书，字正腔圆的英语。而常常使我们提心吊胆的是他的听写课。终生难忘的是他教我们的那一堂英语课。

刚刚开学，走进教室，一切都要从严格的训练开始。这个道理从第一眼看到他手中的教鞭就明白了。他的教鞭细细的，银色的，有时阳光照耀着，有点像孙悟空手中的金箍棒。站在讲台上的他，面带微笑，和蔼可亲；手上的教鞭闪闪发光，为他增添了几份威严。

学英语第一个要过的是语音关。26 个字母，48 个音标，在课堂他要一个一个地帮我们纠音。晚上夜自习，教室里座无虚席。每人装备一面小镜子，对着镜子检查各个器官的位置。所有的音素都要练好久好久，练到太阳穴发酸，练到脸部肌肉僵硬。而他总是手执教鞭，在教室里来回踱步，认真查看每个同学的口型，仔细听每个同学的发音，帮助有需要的同学。

教室的讲台上的一台大大的淡黄色的录音机上，一大盘录音带一遍一遍慢悠悠地转着，播放着单词和句子的录音；播放着灵格风英语教程（The Linguaphone English Course）的纯真的伦敦音：“Hello, Betty Dear”，至今余音缭绕耳旁。而清晨和晚上的教室里，从来都是座无虚席，人人带上耳机，轻轻的跟读声，模仿声。用我们学英语的行话说：“耳朵就是这样练出来的”。

然后就是上课时的 Speaking Pair 练习。他在课堂上教授我们许多语言的基本功。有次讲到开心之时，当场示范给我们看他的独门秘决“舌头功”。以此要求我们多多练习，再多多练习，掌握好基本功。我的同桌很多年后还提起，我们在课堂上被要求站起来练习句型的时候，我居然会眼睛发亮！我有吗？我应该是在课后练了好久，掌握了

这个句型的呀。估计当时还是有点怕他手中的”金箍棒”。很多年以后，我给学生上英语课时，每到得意之时，也会拿出他当年教我们的“舌头功”演示一番。学生看到目瞪口呆，佩服的五体投地；多亏了葛藤老师当年的传授。

到了他上课要给我们听写的时候，常常最提心吊胆。要把所有几十个，上百个单词听懂，全部写下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后来，我和同桌发现了小诀窍。坐在第一排的我们俩，只要看到他的口型，写起来会增加正确度。可惜不久，我们的诀窍被他攻破。他用本子挡住口型。这点小诀窍就此宣告失败。很多年以后，我们这些当老师的同学聚在一起，发现我们在课堂上给学生用的最多，最有效的方法也是听写。多亏了有葛藤老师当年的传授。

最难忘的是他那节英语课。有一天，我们上完了“My Family”（我的家庭）这篇课文，记完了单词，记完了句子，练完了句型，到了课文课堂练习的那一天。My Family 有 5 个人物，有 grandma（奶奶），husband（先生），wife（太太），son（儿子），和 daughter（女儿）。22 位同学中有 5 位要被葛藤老师点名，到讲台前表演。本人属巨蟹，是那种天生普普通通，毫无特色，毫无趣味，在人群中，你带上八倍镜也找不到的一枚巨蟹。除了读书，其他世事一概不知。虽然有了 8 年工龄，带着工资来上的学。还是每日清晨即起，在体育场晨跑。出了东门，在一条小路的路灯下，开始晨读。于是操场、东门、教室、寝室便是每日读书的地儿。

看到一位接一位同学走上讲台，心里便开始有点紧张，尽量把身体缩小。“不要点到我！不要点到我！”我还是被老师点到了名。到了讲台上，老师开始分配人物角色。而我心里更紧张起来，不敢看台上台下的同学。只敢低头看地，只怕忘了背好的课文。当扮演奶奶，儿子，女儿的同学完成介绍后，突然发现自己的角色好可怕，一下子当了别人的太太！别人的妈妈和别人的媳妇！更可怕的是充当一家自主的那位同学居然声音巨响的介绍我是他的“歪妇”（北方同学很难发准“wife”这个音）。台下台上的同学哄堂大笑，笑成一团。而葛

藤老师也被这一戏剧性的课堂练习逗乐了。教室里像开了锅的粥，热闹极了。

后来，我就成了我们寝室的那些小同学常常戏称的“wife”。再后来，还真的和那位在英语课上称我“wife”的同学成了家。

我有时会想到，如果那天课堂上再多一次这样的练习，我们班成为一对的同学岂不是还要增加一对？

真心地感谢葛藤老师，真心地感谢您当年那一堂英语课！

[返回目录](#)

## 杭大历史系资料室与我的治学道路

——杭州大学历史系 74 级 汪林茂

杭大历史系原先是在校园东面的第三排楼房的二楼。资料室在楼层的东头，共有三大间。这三大间的每一间都排满了墙一样的书架。每一层都挤满各种大小、新旧不一的图书。后来，在校园大草坪的西面新造了一座历史楼。资料室占三楼的大半个楼层，有一间编目室，一间阅览室，四大间书库。左边第一间是中国近现代史的资料，除了当时及时购进的相关新版图书外，各省市县文史资料这里是最全的；右边第一间是中国古代史的资料，整齐排列着二十四史以及各朝各代的史料和研究论著；左边第二间是让人的视觉和嗅觉都充满历史感的线装书和旧报刊库，堆满了各种地方志、族谱、稀见文集，以及颜色从白到黄的清末、民国直至当下的各种报刊杂志；右边第二间是世界史的书，大多是外文书，有英文的、法文的、德文的，而且年代有些久远了。其中有很多是沈炼之先生从法国带回来捐献给历史系的。

我是 1974 年进入杭州大学历史系学习的。一年级学的是中共党史。记得有一次为了寻找有关陈独秀的资料，我征得了楼子芳老师的同意，第一次进入资料室。当我走进藏书库，就感觉一股书香扑鼻而来。当看到这排列得密密匝匝的书架和上面满满当当的图书时，我很是兴奋。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图书，第一次认识到学历史有这么多书可以读、应该读，真可谓大开眼界。可以说这是我第一次受到“书山”的熏陶。到二年级下学期，恰逢批判“四人帮”，系领导要我们写文章。我根据刚学过的中国古代史知识，选了《评吕雉》这个题目。在资料室李絜非先生的帮助下，我搜集了相关资料，写出了一篇两千余字的小文章。这是我第一次利用资料室的图书。虽然只能算是学习，还谈不上做学术，但我也由这一次在资料室查找和利用资料，而感受到“书山”的山高林深。

第三次进资料室是三年级为了完成世界史的课程作业。我利用这次机会，多次进入书库翻看各个书架上的书。发现这些书封面上的藏

书章五花八门，有“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之江大学文理学院”、“浙江师范学院历史系”、“杭州外国语专科学校”等等。后来我才明白，这些藏书章代表的是一部杭州大学历史系以及资料室的悠久历史。其中最多的当然是盖着杭州大学历史系藏书章的书。这些书除了从新华书店买进的以外，很多都是资料室主任楼子芳等老师奔走杭州街巷，甚至外地，淘旧书店、翻查新华书店书库，向全国各兄弟院校历史系甚至作者个人讨要、利用复本资料交换，或接受个人捐赠而来的。学术界一直都说杭大历史系资料室的图书资料非常丰富。因此经常有本校外系的、本市外校的、外地学校的老师，以及一些研究机构的学者前来查阅资料。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的一位老师来杭州参观了杭大历史系资料室后，就对这里的藏书之丰富、资料价值之高赞不绝口。他对我说：“这里的书足够你做几十年学问的了。”

要知道，这巨量的历史学书籍，这些数十年来给无数教师、学生、系外和校外学者提供了帮助的图书资料，是杭大历史系历经半个多世纪的积累，是许多资料室的老师千辛万苦搜集、积攒下来的。很可惜，大约 2005 年的时候，学校撤销了各系资料室。这些历经半个多世纪积累下来的图书，被校图书馆拉走了。本来说是要整理后再向师生们开放，但直到 2011 年，当我进入校图书馆古籍部书库去找几本书时，看到从历史系资料室运来的那些书，仍然是原来捆扎的绳子和捆扎的样子，堆在原来的推车上。所不同的是，多了一层灰尘，虫子成为这些书的唯一读者。

不少人认为，资料室也就是个借借书、还还书的地方。有学校图书馆了，资料室也就无关紧要。可我不这样认为，至少老杭大历史系资料室就不是这样。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学术沙龙。

那时候的资料室天天都很热闹。系里的老师，包括那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如沈炼之、胡玉堂、徐规、王正平、毛昭晰、倪士毅等，不管有事没事，都喜欢到资料室来坐坐，或者看看报纸，了解时事；或者翻翻杂志，了解学术动态；或者围坐在一起，探讨学术问题，聊聊校、系、教研室事务，商谈课程或研究课题。大学老师们平时都窝在家里备课或搞研究，但因为有一个地方让大家经常聚在一起，

交流、沟通，互相了解，仍然可以融为一个集体。新来的教师，也因为有一个地方，很快便与系里的同事们熟悉、融合。所以，只要走进资料室，感受到的不仅是书香，还有同事们其乐融融的气氛，和浓郁的学术氛围。

像我这样的年轻教师，也喜欢经常往资料室跑，查找资料当然是重要的目的（那时不太买得到书），但同时也是为了在这里了解校、系的事务，或向老先生们请教，不知不觉中拉近了和老教师们的关系。

那批老先生都很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我在资料室也的确得到许多老先生的教导。沈炼之、胡玉堂先生先后担任系主任。两位先生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在资料室碰上时，他们会放下手上的报纸，问问我近来的学习情况，并常给以鼓励。沈先生还嘱咐我不要畏难，但也不要松懈。徐规先生常给我具体的指导，经常会询问我最近看了哪些书，告诉我治学要从基础抓起。他对我说：“你虽然是研究中国近代史，但一定要从通读《史记》开始，读《史记》比读《清史稿》重要。”倪士毅先生虽说话很少，但每当我有浙江地方史的问题向他讨教时，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讲解，并告诉我有关的资料书和论著。在资料室每天都可以看到的是李絜非和楼学礼先生。李先生在民国时期担任过浙江大学史地系主任，因历史问题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被派到资料室工作。我每次到资料室，都看到李先生伏在桌子上，眯着眼睛给每本书编目、做卡片。卡片上的蝇头小字整齐清晰，很漂亮。因为李先生以前的教学和研究领域是中国近代史，所以我常向他请教。他常给我讲授查资料的方法，有时还站起身来，到书库把一些资料指给我看。读书做资料卡片的方法就是他教给我的。楼先生原是中国古代史教授，因被错划为右派，也被派到资料室工作。他负责做剪报工作。每天报纸送来后，他就站在一大叠报纸（包括《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解放日报》、《文汇报》、《浙江日报》等）前，一边翻看，一边把有用的资料剪下来，然后分类黏贴装订，分类码放，供老师们查阅。他做的剪报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直至80年代，很是珍贵。楼先生看到我来查资料，就告诉我，要多翻看工具书，尤其是各种目录、索引，否则便是“没头苍

蝇”。我最怕他冷不丁地抛出一个问题来考我。有时我可以回答出来，但有时也会被问得蒙掉。

杭大历史系资料室是我开始走上治学道路并取得一点成绩的地方。

留校工作的第三年，教研室负责指导我学习的三位老师（徐和雍主任和郑云山、赵世培老师）都提出建议，要我申请上课。当时正担任78级“中国近代史”课程的徐和雍老师要我插进去试讲第八章《戊戌维新运动》，给我两个月的备课期。当时的老教师们真的很负责，不仅带着我到资料室找出备课要用的书，而且从授课提纲到讲稿都仔细审阅并做了具体的指点。那时候，我自己没几本书，也买不到什么书。常常是写了一段，碰到疑难问题只好赶紧骑车到资料室翻找相关的书。所以那段时间几乎天天跑资料室，有时甚至是一天几趟。有几天索性就坐在资料室里写。一个多月后，我把厚厚的一叠讲稿交到了三位老师的手上。三位老师都仔细看过，又约我到资料室面对面地谈了修改意见。主要提了两条：一是太长，需要精炼；二是不够口语化。

正式上课那一天，我心情忐忑地走上了讲台。看见满满一教室的学生，年龄都和我差不多。又看见本教研室的徐、郑、赵三位老师以及系主任胡玉堂先生都坐在后面（按照当年的规定，青年教师试讲课必须有两位主任到堂听课），心里更紧张了。前半堂课，我大多是低头宣读讲稿，两腿不断打颤，只得不断地喝水来缓解自己的紧张，直到后半堂课才稍微松弛一点。下课后，四位老师又把我叫到办公室做点评。在总体作了肯定后，又提出许多很中肯的意见。主要是：讲课的速度和节奏没掌握好；照本宣科，没有及时地和学生交流等。胡先生还向我传授了许多讲课的方法。从这次试讲起步，第二年开始给外系的学生上课。几年后，又回来给历史系本科生上课，然后是带硕士生、带博士生。走过30余年的教书生涯，讲过七、八门课程。老先生们的教诲一直对我起到指导作用。

老先生对我们这一代青年教师的要求是，先站稳讲台，再考虑写论文。开始几年，我虽然还不敢想、也不知道怎么写论文，但还是按照老先生们的指点，先大量地看别人写的论文。现在我们坐在家只要打开电脑，就有海量的论文可供挑选。但那时，我只能靠勤跑资料

室查阅。好在历史系资料室的学术期刊很齐全，几乎每种学术期刊我都要一期不落地翻看。新期刊不能外借，我就在资料室里看；往期的期刊则借回去看。基本上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近代史论文每篇都浏览，或仔细阅读过后，我逐渐懂得了什么是学术论文，也逐渐提升了学术眼界。借助前辈们的学术成果传递给我的学术眼光，我开始有目的地在资料室里翻阅资料，只要稍有空闲，我就钻到资料室书库里，可以说基本上翻遍了资料室书库里近代史方面的资料书籍和旧报刊，确实从中发现了不少“宝贝”。有一次在地方志的书架上，竟发现其中有不少湖南省的县志。翻阅之后，联想到此前看过的罗尔纲先生的《湘军兵志》，便写了《论湘军与团练的关系》，就湘军的起源问题提出与罗先生商榷，发表在 1986 年第 2 期的《杭州大学学报》上。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还比较像样的论文（此前虽然已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几篇文章，但连我自己都不满意）。由此我又对曾国藩的资料产生了兴趣。在《曾国藩全集》出版前，有关曾国藩的资料非常少。我在资料室里翻到了线装的《曾国藩全集》，借回家通读了一遍，陆续写了六篇关于曾国藩的论文，在《近代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历史系资料室中的地方志很多，我在翻阅浙江各府县地方志的过程中，觉得这是一个还需要加大力气开发的史料宝库。恰好金普森先生邀我参加他主编的《浙江通史》撰写工作，我便以浙江各府县地方志为基本史料，写出了《浙江通史》第十卷提交出版。接着又在此基础上写出了《浙江辛亥革命史》、《从传统到近代：晚清浙江学术的转型》等多本浙江近代历史的论著，以及多篇关于近代浙江的论文。一次我在为撰写《晚清文化史》寻找资料时，偶然发现堆放破旧杂志的书架下有一叠清末文字改革的资料，这是史学界没有关注过的史料。我利用这批史料先后写了三篇论文，一篇提交给了 2005 年香港中大召开的“思想史上的认同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一篇在 2007 年第 10 期、11 期的《学术月刊》上连载，一篇刊登在《浙江大学学报》上。1981 年，长沙召开全国青年辛亥革命史学术讨论会，系领导鼓励我参会。我写了一篇论文。论文写得并不好，但我有幸结识了一批近代史研究领域的青年精英，也开始接触辛亥革命史研究。1991 年，我撰写的

《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士大夫阶层》入选当年召开的辛亥革命 8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2001 年，我的《浙北市镇的社会变迁与辛亥革命》一文入选辛亥革命 9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2011 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由于要承担省政协的纪念辛亥革命活动，和省社联下达的编纂《浙江辛亥革命史料集》的工作，遗憾缺席了。但有幸入选了全国辛亥革命史专家。十多年间，我发表了十余篇关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论文，出版了 4 本关于辛亥革命史的论著。

从毕业后钻进资料室，到白发老头退休，资料室的不吝供养，让我发表了 40 多篇文章，出版了 10 余部书。多篇论文在《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等学术综述的书和文章中，被作为代表性学术成果加以介绍。感谢前辈老师的扶持，感恩杭州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 返回目录

## 在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的讲话

——杭州大学化学系 59 级 郑小明

戚文彬教授离开我们 17 年了。今天，我们在一起纪念戚文彬教授诞辰 100 周年，说明他的精神感人至深。

戚文彬教授是我校化学分析的学科带头人，也是我校环境化学学科的创建人之一。他德高望重，学问精深，是我们大家非常敬佩的导师。对同事和同学关爱备至，在大家口中，他是慈祥的戚伯伯。

作为一位老知识分子，他一生的道路不算平坦。我也是他的学生，我的分析化学就是他传授的。我认识他时，他正在教育革命的讲坛上检讨批判分析化学的“硫化氢系统”。因为长期接触硫化氢而被腐蚀的鼻子，造成讲话的“喻”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在以后的教学创新中，他又是制定新教学体系的骨干。在文革中，因为历史上的一些小问题，他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他是化学系第一批被关进牛棚的人，也是最早被摘帽子解放的第一人。他受尽委屈，也没有灰心。78 年的改革开放，科学的春天来了，终于使他放开了手脚，在科研教学育人的道路上自由狂奔。他在“多元络合物”和“分析增效试剂”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在国内外都有了相当的影响；杭大环境化学专业是全国综合性大学的第一个环化专业；他还培养了一大批研究生和本科生。像浦炳寅、朱利中、郭伟强等等。他们都成了所在岗位的骨干。

先生离开我们已经 17 年了。可以告慰先生的是，先生毕生从事的事业又有了长足的进展。环科系经由老浙大和农大的加盟，已发展成浙大环境学院，成为了国家双一流重点学科。他的学生也取得了很多重要成就。朱利中成了工程院院士，浦炳寅成了院长，郭伟强也成为了分析化学手册的主编。他们的成就也饱含了先生的心血。

今天，大家在这里纪念先生，说明先生的为人感人之深。

今年是国家改革开放 40 年，愿戚文彬教授的榜样能够激励大家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奋斗。

## 纪念恩师戚文彬先生

——杭州大学化学系 78 级 朱利中



作者（左一）与戚文彬先生及大师兄浦炳寅在杭大老化学楼前

转眼间，先生已离开我们十六年。时时忆起，一幕幕掠影忽闪而过，真切自然，历久弥新。

戚先生是著名的分析化学家。20 世纪 50 年代曾与我国分析化学奠基人王琏教授一起编著出版了《分析化学》教材，被国内高校普遍采用。作为化学本科专业的学生，先生的名字很早就印在我脑海中。而先生于我，德高望重，不敢奢望能追随先生学习和工作。

真正与先生结缘始于化学楼的楼道。当时先生正要下楼，恰我自下往上拾级而过。我与先生打了招呼，感到先生有学者风范，且格外平易近人。这一面之缘让我记忆深刻。之后本科毕业，我本考有机化学专业。后经黄宪老师推荐，机缘巧合下，转到分析化学专业，自此受教于先生。有幸成为学生后，第一次与同门师兄郭伟强一起去先生家，聆听教诲。先生坐于沙发上，给我们布置研究工作。当时先生分

别递于我与师兄两张文摘卡。给我的上面写着三个关键词：镉、显色反应、表面活性剂。忆到此时，不禁感慨人生际遇之妙不可言。当时小小文摘卡上的几个字，却是拉开我几载学业的引子，更是启亮我科研的枢纽。直至毕业，更是有幸留在先生左右，蒙训诂拔擢。与先生同心若金，并在他的指导下，合作论文 70 余篇。

师从于先生，始于 1982 年，受他陶冶煦育整 20 年。期间，先生对我来说，亦师亦父亦友。先生从事高校教学科研工作 50 年，致其心于分析化学事业，也是杭州大学环境化学专业的奠基人。他开拓创新，成果累累，在我国分析化学、环境化学界享有较高的地位和影响。特别在多元络合物分光光度分析和环境分析化学理论及应用研究中，成绩卓越。先后编著出版了《表面活性剂与分析化学》、《新分析增效试剂》等十多部著作，作为主编写了《分析化学手册》一、二分册；在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论文一百多篇，提出了显色反应增敏“刚性不对称微环境”等一系列理论，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表面活性剂在分析化学中的应用及机理研究”、“有序介质中的分析反应的机理和应用研究”等五项成果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二、三等奖。

先生学识渊博，敬业奉献。他的学术造诣至今让我记忆深刻。我读研究生期间，查阅文献还不能用电脑输入关键词直接搜索，想要了解课题的相关进展，需要查阅美国《化学文摘》(Chemical Abstracts, 简称 CA)。当时遇到光度分析的难题，向先生请教，先生直接让我从 20 世纪 70 年代的文献里去找，当时极为震撼。而最后查阅文献，果然如此。先生对文献的了然于心为我的科研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夏日化学楼五楼上“多元络合物光度分析”课，当时教室里仅 6 名研究生。而先生挥汗如雨，认真讲解。在投影仪前替换塑料胶片的身影更是时时涌入脑海，教导我牢记责任，做好学问。此外，承蒙师恩，我在求学期间，时有机会参加全国性学术会议，并拜会引荐各位著名教授，丰富学识，拓展视野，这也是我人生极为宝贵的财富。

先生学风正派，待人宽厚。他视教书育人为自己的天职，表现出崇高的敬业精神。多年来为化学、环境及地理专业的学生开课，讲授“分析化学”等十余门课程。他言传身教，诲人不倦，数十年如一日。

先生十分重视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循循善诱，教学效果显著。他乐于助人、善为人师，既是满腹经纶的专家，又是和蔼可爱的长者，赢得了“宽厚长者，学业良师”的美誉，是众人的“戚伯伯”。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春秋，栽得桃李满天下。得到先生帮助和教诲的青年学子不计其数。许多人已成为国内化学界、环保界的骨干力量。他宽容、谦逊、大度的学者风范，深受师生员工和同行们的敬重。也正是因为先生为人处事的高风亮节，给我创造了一个极为严谨且友善的成长环境。

先生爱生如子，师德高尚。自我从师以来，先生的关爱如影随形。不仅关心学生的成长，关心我们的生活、学习与思想。即使毕业后，仍耳提面命，关怀备至，更是兼达我的家人。记得在1986年，我不堪板牙之苦，忍痛拔去。当时师母携一篮鸡蛋探望，耿耿之心我至今仍颇有感怀。而对我的妻子以及儿子，先生与师母也时有关心。对于我人生的指引，先生的一句话我时至今日仍铭记于心：做任何事情都要体现身份，体现水平！这句话作为我的座右铭，时刻告诫自己要严于律己，勇攀高峰。

自跟随先生以来，历经杭州大学化学系、环科系，从学子直至教授，取得的任何成绩莫不与先生的教导息息相关。先生不仅是我恩师，更是我生活之明灯，事业之奠基。师恩难忘，感怀在心，更与日俱长。唯有学习先生热爱教学的品格，发扬先生献身科学的精神，传承先生严谨治学的学风，铭记师恩，砥砺前行，方能报之！

（2018年3月31日）

[返回目录](#)

## 小记恩师戚文彬先生对我人生处世的潜移默化

——杭州大学化学系 82 级研究生 郭伟强



作者（左四）与戚先生（正中）及其他同学和同事

再一次站在先生的面前，凝望着先生慈祥的笑脸。一盆浅紫色的草花，怀念淡淡地弥漫在空气中，感恩永记在自己的心田里——戚文彬，这个普普通通的名字、这个在 80 年代引起过崇拜的名字、这个引导我进入科学殿堂的名字、这个像慈父般关爱着我的名字、这个……

旁边吹来的燃烧香烛纸钱的缕缕烟气，提示我这是在先生的墓前。先生自 2002 年 1 月 19 日离开我们，已经整整 16 个年头了。先生的音容笑貌、先生的严谨学风、先生的慈悲胸怀、有关先生的一切，虽然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些淡薄了，但却始终在我心中驻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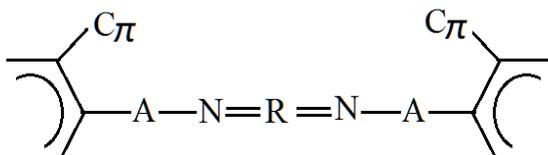
说来惭愧，虽然先生是我们化学系的大教授，但因他不参与本科生的教学工作，我与先生的初次见面，竟然是在父亲一位朋友的陪同下实现的。1982 年，大四的我参加了当年的研究生入学考试。选择导师的时候，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教师杨国梁先生推荐我报考戚先生。一直在关心我成长的杭州日报编辑李文伯先生也做出了同样的推荐。于是，在李伯伯的陪同下我初次正式见到了戚先生。

其年，先生已过耳顺。记得那天，先生身着蓝色中山装，面目清癯，一点不显老。先生问了我考试情况和本科的成绩（大一和大二，我都是校级三好学生，学习上自然不会、不敢也不曾放松过），给了我很多的鼓励。临走时，给我开了张读书清单，让我在假期里慢慢读，现在先把本科毕业论文做好。于是，我走进了先生的科研团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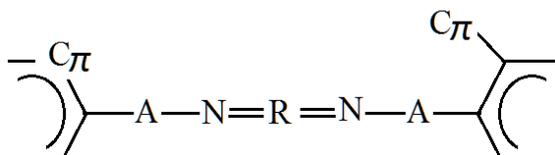
进入研究生学习阶段后，先生的功底渐渐展露在我们的面前。先生授课与其他几位教授有所不同。既不是满黑板写满，也不是只列提纲。他的板书疏密有间，讲课旁征博引。虽然是研究生的基础课，在介绍表面活性剂研究的基本理论的同时，也展示了当时国内外研究现状。即便是对一些较不活跃的研究方向的进展，也是如数家珍。这应该就是先生平时十分注重文献资料的收集阅读的结果。因为，只要我去先生家，几乎每次都看到他坐在写字台前读着或写着。这种敬业对我后来的教学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即便是大一年级的基础课，也努力效仿先生，将一些研究进展展现给学生。尽量让学生在愉悦的心情下吮吸尽可能多的化学营养。

“戚伯伯”慈悲宽容是出了名的。但这不适用于先生对我们学术上的要求。宽容不是不要求，放手更不等于放羊。先生在下达研究任务给我们以后，既有前期的督促文献检索，探讨研究前沿，也有中期的进展交流和答疑解惑，更有后期的理论提升和结论验证。整体上的动态把控，细节上的自由发挥，幕后的全力支持，就是先生留给我的宝贵财富。我的毕业论文是考察金属离子（锌离子为主体）的分光光度检测方法。有两件事，先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对我后续的教学科研工作带来很大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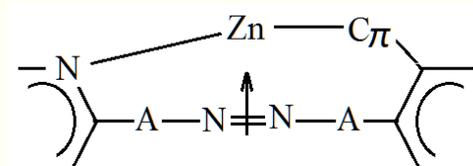
第一件事是：根据文献检索。至 1985 年初，已有 79 篇文献介绍了 108 个有机试剂-锌离子显色反应体系。在这众多反应的内在原因是什么？从原子分子的角度上如何解释？当时也有一些学者（包括张孙玮老师）提出过类似的问题，也发表了一些大同小异的见解，提出了锌离子的分析功能团结构为：



由两个 N 原子提供配位键连同两个  $C\pi$  与锌离子作用形成多个环状结构。我们的实验也证明这一功能团的结构是合理的。当时我根据实验结果提出认同这一结构，但适当将结构中的  $C\pi$  基团由文献的中-OH、-COOH、-AsO<sub>3</sub>H<sub>2</sub> 进行拓展和改造，调整为：



且  $C\pi$  基团也可以是-N。当时自己有一点小得意。这毕竟已经在原有基础上有了新的创意。但先生认为我的想法不够全面，应进一步深入探讨。因为这样结构的分子在与锌离子发生作用时，有可能形成一个不稳定的四元环(因为式中 R 可以是=CH-CN=、=N-C-N=，也可以没有 R，A 也可以没有)，在理论上存在缺陷。



在先生的启发下，在仔细考虑并征求其他老师的建议后，我提出了当 R 不存在（即普通偶氮类试剂）的情况下，将不是由两个 N 原子直接配位，而是有偶氮双键配位成键，形成的结构，终于得到了先生的认可。在这样深入探讨反应机理的处理过程中，除了体会到先生对我毕业论文所提出观点之修正的必要性，更让我感受到了先生对科研工作必须“精益求精，追根问底”的精神，促使了我在后来的科研工作中常常要探寻一番反应机理、对所提出的研究结论也必须进行“探底”式考察的习惯。

第二件事是：分光光度法的共存离子干扰是比较普遍的。当时的处理方法是寻求尽可能高效的掩蔽剂，以尽可能实现检测效果的“唯一性”。但这终究太困难。当时，我向先生提出，能否进行多种离子

同时测定方法的探讨。我的设想是，利用计算机数据解析的途径来进行考察。这些设想在 1984 年的大环境来说，还是具有相当新意的。那时候还只有 APPLE II 这一种台式机呢。虽然先生并不深知计算机处理模式和方法，对相应的计算机程序也不了解，但是先生对我的设想大为支持，为我联系了学校计算机房的上机机时。在计算机系的研究生同学的帮助下，我们终于设计并走通了计算机程序，对实验数据进行了快速处理，并针对 Lambert-Beer 定律这种在数学意义上的“病态方程”进行了特殊的校正，所得结果在现在看来显得比较稚嫩而并不太理想，但在当时也还算是比较有意义的。论文被《分析化学》录用了，我很开心，也深深地感激先生的热情支持。毕竟与先生开始跟我设计的实验路线有了一点偏离的。我感觉到，当学生要进行先生自己不太熟悉的研究内容时，他不但不会压制，不会要求学生顺着他的思路进行研究，而是积极鼓励学生走出新的路子来。这种大度且鼓励的态度潜入了我的意识。当后来我的藏族学生德吉提出要用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方法探讨我所不熟悉的藏药研究时，潜意识自然爆发。我在药学院为她联系好合适的助力团队，引导她用当时刚开始热起来的数字化色谱指纹谱技术进行样品的分类鉴别和定量检测，为她后来在西藏大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1983 年 5 月，我被杭州大学第十六届学代会推选为校学生会主席，并担任省学联副主席。研究生出任这一职位的也算是杭大校史上唯一的一次了（我卸任前学校成立了研究生会，我担任了缺席主席人选的第一任副主席）。担任此职要说不影响学习和科研是不可能的，只是要如何摆正位子处理好关系。先生在鼓励和支持我做好工作的同时，也提出了不要影响本职的最基本要求。我对此深以为是。学生干部之所以能得到学生的认可和推崇，第一条就是他们能在学习上得到认可。所以先生的嘱托是我读研期间不放松加油干的动力，不能在学业上退步而成为别人嗤鼻的理由。先生在后来的两年中，经常让我汇报论文进展，给我指出研究过程中的问题。即便是细枝末节的也会一一点明，让我少走了很多的弯路。我知道，这是集严师慈师于一体的先生在给我“开小灶”。这感觉真的很好！先生这一旁人并不在意的举措，也

成为我后来善待自己学生的“戒条”。遇到这样好的导师，没有话说，唯有用行动，“撸起袖子加油干”。“你们没有星期日，只有星期天”，时任“女朋友”之职的妻子当时就是这样评价我们师兄弟的（朱利中和我是同届的师兄弟。他比我还要用功多了，所以现在能成为院士。该祝贺他！）。

研究生毕业后，团省委和校团委都来征求我的意见，是否愿意去团省委工作。能去省里工作，对于当时的我不能说没有诱惑力。如果当时去了省里工作，我的现在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了。我想了很久，最终还是放弃了，选择了留校任教。先生的形象已经默默地融入我的思想中了，使我立志教书育人，立志做个像先生那样的能被学生称颂的好老师！留校后，我在分析化学教研室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先生也转入环境化学教研室。我没有机会与先生合作了。

1992年，全国分析化学界的大咖们参与编写（先生编写了“增效分析试剂的发展鸟瞰”一章）的《分析化学前沿》出版了。先生亲自题了词将书赠送给我：“愿您永远站在学科发展的前沿，鹏程万里！”那题词一直激励着我。虽然此时我的研究方向已经转向了色谱分析，和先生的光度分析有了一些偏离。借助的研究手段变了，做研究的风骨依旧，先生的学术思想依然规范着我——一切从实验结果出发，发掘机理，追根寻源，永不投机取巧！

1994年，出版已经15年的《分析化学手册》要再版了。原来由先生负责的第二分册的几个章节就安排我进行对接了。编撰《手册》的最大工作量就是资料的收集。我仔细阅读了先生在《手册》第一版的工作基础后，深感先生的不易和以往的艰辛。那些交换树脂的性能和分离条件的收集归类，那众多的萃取体系的确立和相关应用的筛选，无不体现出先生的渊博。要在这个基础上出新，压力太大了。还好有先生当后台，我们只要咬紧牙关往前冲就是了。于是，在先生的指点下，我们对相关知识领域从结构和内容上都进行了很大的改进。当我陆续将相关内容拿给先生时，先生都进行了仔细的审读，提出了不少很具指导性的意见和建议。反复多次，乐此不疲，还将他的一份备课笔记送给我，让我用作资料选用。这份笔记，我至今仍完好保存着。

这一版的《手册》融入了先生的心血，是他在为第二版《手册》的顺利完成保驾护航。秉承先生的精神，在2010年出版社提出将进行手册第三版的编撰工作时，我根据相关学科的新进展和编委会的新要求，在确定手册内容时，在进行了大量的调整和扩充的同时，坚决地保留了先生的主要研究内容——“分离富集中表面活性剂的应用”一章，加入了先生对胶束的论述，弘扬先生的学术思想。经过6年的努力，新手册终于成书了。这是先生治学精神的延续和发展！我的工作也得到了我的博士导师郑小明教授的赞赏。我很开心。

1997年底，快到先生79周岁的生日了。按照“做九不做十”的民俗，师兄弟们酝酿着给先生做八十大寿。那一天，在国内的能抽出空来的师兄弟姐妹们都到场了。这算是到得最齐的一次。刚好我女儿同学的爸爸在省电视台工作。我联系了他，他很乐意地亲自带队来到先生家里，录制了贺寿活动的全过程，并且在当晚的新闻节目中播出了。那一天，我能感受到先生的开心。只是没有想到这竟然成为师兄弟们与先生的最后一次大聚会。

2002年1月，我正在山东参加一个色谱新仪器的鉴定会。朱利中打来电话，告知我先生离世的噩耗。拿着手机听着，眼泪潸然而下。像慈父一样的先生走了，永远地离开我们了。那种痛无法用言语表达！匆匆赶回杭州，在杭州殡仪馆的告别大厅，我执弟子礼站在家属队伍的末尾。既然眼泪无论如何也忍不住，那就让它淌吧！告别会后，送到后院，送先生到最后，直至送到基督教公墓。此后，基本上每年都会去一趟公墓，缅怀先生。

我时刻将师恩铭记在心，化入自己日后的行动中，将先生的精神发扬光大。虽然至今仍无大的建树（更无法与朱利中的大成就相比），但我可以在先生面前说一声：先生，我努力了：百余篇学术论文、二十多个科研项目、4件发明专利、主编/参编16本教材/手册（其中3本未出版），我没有辜负您的期望！

（2018年2月28日于杭州）

[返回目录](#)

## 缅怀对我事业和人生有着直接和深远影响的导师 戚文彬先生

——杭州大学化学系 84 级研究生 王耕



1988 年初春本文作者王耕（右一）和戚文彬先生及师兄骆红山

很久以来，我都想为我的硕士生导师戚文彬先生写点文字，可一直以遗憾为结局。愧疚归愧疚，生活和工作的忙碌总推着我为日常的繁杂琐事费心，而未能静下心来缅怀那些对我事业和生活轨迹有着直接和深远影响的人，那些对我成长和成功树立榜样的生活楷模。这样的人，首选的就是我的硕士导师、学生们同声昵称为戚伯伯的这位恩师。直到最近，这心愿终于付诸实施了。

我自 1978 年上大学一直到 1982 年大学本科毕业，都还不知道戚先生是谁。那时候戚先生不再教本科生的课程。一直到 1982 年毕业离校后，因我被分配在分析化学教研室，和戚先生所在的环境化学教研室常在一起活动，才开始对戚先生的教学，科研和指导的硕士研究生有了了解和直接接触。

戚先生是个少见的好脾气的老先生。师从先生和与先生共事的记忆中，从未见过他发怒抑或是生气的表情，也没有受他责备的印象。他很少对年轻助教或学生说教或指责，遇事总是不慌不忙，似乎天大的事也没那么不可收拾。他重于在处事为人上以自己行为规范为大家树立榜样。刚留校时，发现系里面有个别年长的老师总是不苟言笑，仪器设备如古玩家珍——莫说学生，连同教研室的老师都摸不得碰不得，也不愿意帮助别人。对此，我们作为新助教也就免不了暗地里给这些老师们打分。在开始考研后，为此在选导师上很有些厚此薄彼。一是当时戚先生在学术上很有建树和威望，更重要的就是他的为人有口皆碑。为能考上他的研究生，我还利用自己已经在系里工作的优势，频频表现自己的意愿和想法，最终如愿以偿。

读硕士期间，我作为学生，感觉到日常共事或生活上戚先生是个很平易近人，从不苛求的人。他平时一点没有大教授的架子，有问题我们可以随时去问他。无论他在忙什么事，学生敲门进他办公室，他总是放下手里的活，倾听和回答我们的问题。很多时候，他周末也会来办公室转一下。那时候，我们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和他讨论。

记得刚上研究生时，和先生一起去济南山东大学开学术会议。我们一起坐火车去。当时坐的是夜车。按级别，先生可以睡卧铺。但因为有一群助教和硕士研究生同行，先生坚持和我们一起坐硬座，不搞特殊化。我们觉得他年纪大了，轮流站着，希望让他能在硬座上靠一下。他坚持和我们一起坐着，一直坐到第二天早上到济南车站。

戚先生非常放手。有什么仪器设备我们当学生的可以尽管用。不小心弄坏仪器或打破点瓶瓶罐罐也从没被责备过。但在做学问上，戚先生可是丝毫不含糊的人。记忆犹新的是读研究生时，第一篇和先生合写的论文。当时因为我留校后，除了教学任务以外，也开始了一些科研工作。在读硕士学位前，还发过一篇论文。自鸣得意的以为我自己是轻车熟路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验室工作，参考文献打点，整理好数据，画好图表，打了一遍草稿，就把誊抄的论文初稿连同数据表格交给先生审阅修改。那时候还不知道电脑是何物，论文是手写的，表格是用尺和笔画出来的，图是用描图笔在硫酸纸上自己描出来的。

也算是化了一翻苦功夫，抄写得眼花缭乱，手指生疼。当时在想，先生肯定非常看好我的论文，说不定不用修改就可以投出去发表了。焦急地等了几天，终于从先生那里拿回了手稿。打开一看，当时就傻眼了：那些用红笔画的杠杠指出该删除的句子或段落，句子的重组排列，为我改正的不恰当的语句或病句，批语指出根据不足的论证和论断，甚至标点符号，表格里的数据的疑问和增删，绘图的准确度。我当时在想，我会写论文吗？这分明是说我太幼稚可笑了。先生可能看出了我的尴尬和失望，或者这就是他一贯的作风。他没有半点责怪的意思，还鼓励我说，第一篇论文写得很好。只是说，要把这样的论文送审，每个细节都要注意。和他进一步聊天，得知他认识的业界的审稿人大多都是治学严谨的学者。要想通过这一关，不仅数据要可靠充分，接下来的讨论和结论要有独到之处和新的见解。从这次写稿开始，我就开始更留心发在当时国内化学界顶尖杂志诸如《化学学报》、《化学通报》等上的好论文。从别人的结构安排，实验手段，数据整理，讨论和结论的严谨科学性来设定自己的努力方向。后期的论文工作在先生的指导下有了比较明确的目标，清晰的思路和合适的实验手段。加上时常地和先生讨论，他又不厌其烦地一起查阅文献，联系其它实验室，做一些我们没有条件做的，诸如核磁共振和连续波谱分析等，并共同撰写论文。我们两篇论文被《化学学报》录用。在其中一篇论文中，我们首先提出了“胶束刚性不对称微环境”增色增敏机理，在领域同仁中得到了广泛认同。

师从戚文彬先生，为我在专业发展上开辟了广阔的前景。1986年先生去印度新德里参加国际胶体化学学术会议。会上他认识了国际公认的胶化领军人物，瑞典隆德大学的 Björn Lindman 教授。1987年 Lindman 教授应邀来杭大讲学，先生让我负责接待他，并且担任讲学期间的翻译。1991年我参与竞争而获得了省里唯一的两个名额，授予出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包玉刚奖学金。因为1989年“政治风波”的影响，当时国家公派人员不能去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包氏奖学金也被列为国家公派，因此不能去这些国家。除此以外，英国和瑞典是唯一两个用英语教学的国家。英国的牛津和谢菲尔德大学录取了我，但每

年要付 1.2 万英镑的学费。包氏基金管理委员会不同意付这学费。我和瑞典隆德大学化学中心的 Lindman 教授联系了一下，因为我接待过他，又是戚先生的学生。他看完我的简历后，一口答应了我的申请，并按包氏基金会要求，保证一年后可以从瑞典隆德大学拿到资助继续完成学业。瑞典的教育从幼儿园到博士毕业都是免费的，包氏基金只要付我的第一年生活费就成了。这样，在戚先生为我铺下的大路上，我踏上了留学的旅程。

去瑞典攻博，我的专业是表面和胶体化学，从事水溶性高分子聚合物和表面活性剂作用机理和应用研究。这也是我师从戚先生开始的研究方向。当时国际公认的有数的几个表面和胶体化学中心就包括隆德大学的化学中心。在那里，我得以接触表面和胶体化学的各个领域，学习各种课程，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因为表面特别是胶体化学还是相对新颖的学科，在国内时还没有作为必修课程。即使作为选修课，也没有很系统的教材。戚先生是化学系唯一为我们讲授胶体化学课的老师。在隆德大学期间，我对表面和胶体化学的涉足由浅入深，很大程度上是戚先生把我带入了这一奇妙领域，对于这一学科的理解也就扩展开去。

博士毕业后，我去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化工系做博士后研究。从事的课题依然是表面和胶体化学，水溶性高分子聚合物和表面活性剂作用机理研究，而且还开始了有机硅消泡剂的合成、工业应用和作用机理方面的研究。因为这些经历，在迈图高新材料集团（Momentive Performance Materials）的前身美国威科有限公司（Witco）有一岗位招收具有博士学位，并且加入公司工艺过程研发部门从事表面化学和有机硅消泡有关的研发工作的人员时，这个职位好像是专门为我设置的。因为搞胶体化学的人在北美不多，搞有机硅在胶体溶液里消泡的就更少了。一轮面试下来，第二天公司就给我录用通知。因为 1998 正是 .com 热时期，美国 H-1 签证全年名额很快用完。我拿到录用信时已无名额。公司特为我申请了杰出人才 O-1 签证。这样，我在 1998 年 8 月开始了在这家全球第二大有机硅研发生产销售公司的专业技术工作历程。

硕士毕业后，在和戚先生共事的几年中，我给大学生上过环境化学课，指导和从事分析化学教学和研究，搞过几个与工业界有关的研究生产环境课题。

我在 Momentive 工作的 20 年中，涉及的领域从有机硅化工工艺过程、工业化生产、产品质量控制、市场用户反馈、新市场开发拓展、环境影响，一直到工程师和化学家培养和培训、公司全球投资和紧跟新市场走向、高层战略决策、重要客户走访和培训。方方面面的处事和成功都和我在杭大化学系工作时与先生共事时打下的基础有关。更重要的是先生身教重于言传、律己严于律人的品德，一丝不苟的工作学习研究作风，乐于助人而不求回报的接人待物准则；正面鼓励远多于责备批评的领导艺术；设身处地多为他人着想的同事关系处理方式……这一切人品作风都在我的工作和生活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如生活之旅的航标灯塔引领着我，激励着我。无论国内国外，在和科学技术问题打交道时，严谨的科学研究态度是一方面，和同事、上级和下级相处时的准则和艺术也是非常重要的另一面。无论哪方面，正直、勤奋、公平、尊重、有自信心、荣誉感和责任心都是成功的基本品质。在遇到需要这些素质的时候，先生的为人处世总是在影响鞭策着我。

毫不夸张地说，师从戚先生，我重塑了自己。先生以榜样的力量深深地影响了我的职业生涯。同时，他对同事、小辈和自己亲人的慈爱也感动着我。在我自己的家庭和社会生活上，先生也同样是我的楷模。他成功地教育培养了 4 个可爱的子女。如今都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有着自己的事业和家庭。可惜的是，我 1991 年出国后，只是偶然在匆匆回国时，短短地见上先生一面。再没有很多时间共事，共享成功喜悦或聆听先生的教诲。当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我也试图以戚先生为榜样，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给以不尽的父爱；参与他们的学习，社会活动和生活；带他们去看世界，关心他们的每一步成长；共享他们的成功和喜悦。不敢说，他们将来会有多大成就或发展，但至少都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大儿子 2015 年本科毕业于哈佛大学统计专业和副修经济，现在在美国第一资本投资国际集团（Capital One Financial Corporation）工作。小儿子 2017 年秋季入读杜克大学的工程系本科。

令我遗憾终身的是，2002 年先生去世时，我都没能去告别。当时的通信手段和信息交流依然有限。我还在为解决在美工作和生活奔波。在今年先生去世 16 周年之际，写下这段缅怀先生的短文，聊以弥补那失去的时光和留下永不忘却的师恩。

先生千古，弟子永念！

[返回目录](#)

## 严师慈父戚伯伯

——杭州大学化学系 84 级研究生 骆红山



1997 年 12 月作者和部分弟子们为戚文彬先生祝寿

(左起：朱立中，王耕，郭伟强，胡利，陈笑梅，浦炳寅，师母，骆红山，先生，沈学优，刘丹萍，康继韬，汤前德)

我是 1968 届初中生。1965 年进中学不久，就遇上“文化大革命”。1969 年刚满 16 岁，就被上山下乡的洪流裹挟到云南农村插队。尽管 1973 年在上海师范大学化学系就读工农兵学员期间，多少读了点书，但随之而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又使我们在学校里根本无法系统学习化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底子较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时任皖南山区中学化学教师的我，受当时蓬勃向上的社会风气及环境氛围的影响，也不再甘心一辈子蜗居在山沟沟里当“孩子王”、“教书匠”，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拼搏，报考研究生改变命运。1984 年 5 月，好消息传来，要我赴杭参加研究生面试。

初见戚文彬先生，是在 1984 年 5 月 21 日上午。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刚走进化学系五楼的一间办公室，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就主

动与我们打招呼，并自我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原来他就是我们报考的专业负责人戚文彬教授。在介绍了同时在场的其他几位导师后，先生首先祝贺我们顺利通过笔试，并对我们几位面试学生前来表示欢迎。又和颜悦色地要求我们放下包袱，不要紧张，认真答题，考出真实水平。戚老师的话语，如同一缕春风，一扫我们的不安和慌乱。终于，我们几人都顺利考入杭大化学系分析化学专业，正式成为先生的弟子。

先生的严师之严，并非严厉而是严格。

先生的授课教案做得非常认真，仔细详尽。其内容不仅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沿革，更有与时俱进的发展前沿。有些课程的教案，从纸张的质地而言，已有一定年份了。但上面密密麻麻的覆盖着不同墨迹的蝇头小字，可以看出已经是多次修改，数易其稿。

先生对教学过程的掌控也十分严格。每次上课，他总是准时到场，认真讲学，悉心传授、一丝不苟。对我们课前课后提出的各种问题，他也都是耐心讲解、旁征博引、释疑解惑，一直到我们完全弄懂为止。记得有一次课堂上，我对一个问题无法深入理解，由于先生另有要事无法当场解决的问题，事后我也忘了。不料几天后，先生特意来找我，认真地告知解答，令我十分感动。

分析化学是一门实验科学。我们科研中和论文里的每一个数据，都必须来自严谨的科学实验。先生非常重视培养我们的科学态度、科学素养和学术道德，谆谆告诫，言传身教。尤其是在毕业论文设计和实施阶段，更是越加操劳。不仅再三要求我们实事求是，万万不可投机取巧，弄虚作假；对一些重要的实验数据和结论，先生都要反复核对，认真斟酌，确保科学实验结果的准确无误。

先生的这种严格治学、严格教学的风格和严格的科学态度，是我三年研究生学习中印象最深刻的，也影响了我以后几十年的教学和科研生涯。

到了杭大以后，知道先生的人缘很好。不仅在化学系，就是在整个杭大。但凡认识先生者，无论是机关干部、中老年教师，还是研究生、本科生，老老少少都尊称他为“戚伯伯”。先生瘦瘦的身材，一

口略带慈溪乡音的浙江官话。初识之时，实难将他与一位知名学者联系起来。

先生和我父亲同庚，都是浙江人（家父祖籍浙江义乌）。在校三年，深感他对我这个大龄老知青学员，投入了父亲般的关注。先生知道我已成家，女儿尚幼，难免会有思家恋女之情。三年之内，他对我的探亲请假从未拒绝。逢年过节，师母还会不时送上些许礼品。

虽然上海距离杭州不远，但地域文化还是略有差异。先生经常在闲暇之余，利用餐前饭后，有意识地向我介绍杭城的风俗习惯和杭大的校园文化，帮我更好、更快地融入杭大的学习和研究环境。先生还一再要求我们几位研究生弟子要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在他的教诲下，大师兄浦炳寅、二师兄胡俐以及其他几位师兄朱利中、郭伟强、王耕和刘明霞师妹等对我都很好。在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在诸位师兄弟们的全力协助下，我终于顺利完成学业，获得硕士学位。后在上海师范大学任职。

即便是毕业后离开了杭大，先生仍非常关心我的成长。一是主动协助我在《分析化学》、《高等学校化学学报》等各种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并给予辅导修稿；二是为我在新的单位开展科学研究无偿提供化学试剂，支持我继续发展；三是不断介绍分析化学的进展，便于我与时俱进，紧跟时代的脉搏。至今我手上仍有先生参与编著并亲手赠送的《分析化学前沿》一书。先生告诉我说，他是在第一时间就把此书寄达我处，便于我学习和借鉴；四是多次来信来函，鼓励我参加全国和国际专业学术会议，积极参与学术交流，向同行和专家学习，促进自身发展。记得当年有一次在夏威夷举办的国际会议，先生主动给我寄来会议通知，并多次帮助我几易其稿，投稿终被录用。实际上，准确地说，在我前进和发展的每一步，都凝聚着先生的心血。

1994年，我获得赴美国印第安纳州波尔大学（Ball State University）任访问学者的机会。先生获悉后，非常高兴，为我的首次出国提供了许多意见和建议。同时，还主动将在美国的女儿戚志红女士的通讯地址和联系电话给了我。并告诉我，他已经关照女儿。我若有事，可去找她。虽然在美期间没有与她联络，但先生这份情谊却铭记在心。

遗憾的是，回国以后，正遇到房屋动迁，忙乱之中，竟然把先生的联系电话弄丢了。我原来留在杭大的联系电话，也因搬迁而停用。原以为上海杭州距离很近，就没在意。不料此后先是赴新疆工作多年，回沪后又因职务变动特别繁忙，忽视了接头。庸庸碌碌中一直没有去杭州拜见先生。谁料有一天，遇到朱利中师兄，方知先生已经驾鹤西去。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痛心情。先生走得太早，太早！

先生若是健在，应是百岁高寿。好在众多弟子都能遵循先生教诲：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

先生虽已故世，然而他并没有离开我们。他博爱天下的音容笑貌，他的包容谦和、海纳百川的宏大胸怀，他的儒雅真诚、仁义礼智的传统美德，他严格严谨、执着创新的工作作风，他的睿智坚韧、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如钱江水奔流不息，润物细无声；如雷峰塔千秋永矗，万世传美名。

[返回目录](#)

## 第六章：同学

## 六哥

——杭州大学生物系 82 级 褚建君

我们是 1982 年上的大学。一个寝室住了 7 个人，很快就称兄道弟起来。我是年龄最小的，应该是“七弟”，但是我不服。我在家里是长子，一直习惯了弟弟们叫我哥的。于是提议大家，叫我“七哥”吧？于是，上面的 6 个哥哥，都叫我为“七哥”。七哥上面离得最近的，自然是六哥。所以，七哥与六哥的感情自然是非同一般。

六哥来自玉环县。有了金庸小说的传播之后，可以认为他是桃花岛来的大侠。六哥的最大特征是：豪爽。我最敬佩六哥的是：纯真而不虚伪。他是长跑冠军，体育方面自然是占尽鳌头。六哥的读书成绩也比我好。那个 80 年代之初，社会的物质生活还是相对贫乏。六哥家乡的来人所带来的一些海鲜，总是让我们欣喜不已。

食物的保藏，也许是人类的永恒的问题。如东方人喜欢用盐，西方人喜欢用糖。有一点是共识：脱水。六哥从家乡得到的脱水紫菜，那可是我的重要食粮！当大家按时起床去吃早饭或去上课时，我还是在睡懒觉。看看实在是熬不过去了，就撕下几块六哥带来的紫菜，藏在兜里，急急忙忙地往教室赶。等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我就吃那些紫菜。那些紫菜很干净，味道鲜美。到了胃里面一涨，颇能充饥。

有一年，六哥与几位同学去南京旅游，我是大为羡慕。他们回来的时候，还有好烟“大重九”。临近毕业还差 1 个学期的时候，我与六哥选择了同一个导师做毕业论文。那就又成真正的师兄弟了。有一次，老师约我们俩去黄龙洞周边的山上学习植物。但是，我们早上醒来一看天在下雨，就没有出去。老师等不到我们，就直接找到宿舍来打我们的屁股。

冬天的寒夜是漫漫的长夜。我们去买了 5 毛 7 分 1 斤的最劣等的白酒来喝。在酒里面加上白糖，直至饱和。一包兰花豆，先吃肉，再吃壳。我住在上铺，喝醉的时候，吐。六哥在下面端着个脸盆。

六哥不擅言辞，只有行动。他所遇到的困难，比我要多得多。他是我学习的榜样。

[返回目录](#)

## 第七章：校园

## 杭大的房子

——杭州大学新闻系 96 级 蒋蕴

对于学生来说，房子无非两样：一是教室，二是寝室。

当年杭大新闻系的专业课教室，就在新闻系的那幢楼里。至于其他的公共课、选修课，就五花八门地去别的系里听课了。所以，那几幢有点年头的老楼，我们也是经常进去的。

杭大校园里有两个楼的名字，到今天我都记得：一个叫“东临”，一个叫“西临”。不过到今天我也没弄明白，所谓东临、西临，就应该是个临时建筑吧。相当于部队里都没有正式番号，随时准备撤销、拆掉的那种。这样的房子，直到我们毕业时都还在。

“东临”离当时的女生寝室很近。那里有一条进出学校的小通道。通道的那一头，最出名的是“熄灯炒粉干”。其实，就是有一个晚上卖夜宵炒粉干的小摊。我们最常光顾的时间，总在夜里寝室熄灯前。

临近晚上 11 点，食堂晚饭那点油水早就消化殆尽了。为了给卧谈会留点精神头儿，趁“东临”的通道小门还没有关闭之前，冲出去买一份炒粉干来吃，是最大的享受了。这个跑腿和买单的荣幸，往往取决于那天晚上寝室里牌局的战果。输家自然就是那个出钱又出力的外卖小妹。

炒粉干之所以火，在于它里面既有粉干带来的充实的饱腹感，又有与之相伴的鲜嫩豆芽和炒熟的鸡蛋混合的清香。看似平常的食材，与浓烈的地沟热油碰撞，这质朴的美味，藏着保俶北路王师傅对深夜美食的代代心传。以至于我到今天还一直觉得，炒粉干这样东西，是最适合当夜宵的。

跑题了。回来还说房子。

第二样值得说说的，是杭大的寝室。

本科四年，我们住在了女生宿舍的“楼王”里：4 幢。4 幢女生宿舍，很多人都不会忘记。这个庞大的建筑，应该有六层光景吧。不好意思，因为实在太太大，我都没有去过 3 楼以上。每一层有三、四十间

女生宿舍，而且每一间最多能住满 8 个人。如果说，三个女人一台戏，那么杭大 4 幢女生宿舍，这不是宿舍，是戏剧学院呀。

住哪一间不是由你挑的，完全按系按班，再按姓系拼音来依次排床位。所以，在一个寝室窗口喊一声“小张妹妹”，没准一个房间的妹子都出来迎你。

我们就住在楼王，一楼朝北的，位置好得最没辙的那间。黄梅天的潮暗，大冬天的湿冷，统统经历了四年。那个年代，寝室里没有 wifi，没有电话，以及没有……电风扇。所以，夏天真心是可以免费来“戏剧学院”做桑拿的。

值得安慰的是有个福利。楼王的北面，正对着学校的篮球场。这时候，朝北的房间又成了最好的观景平台。傍晚时分，听着校园广播，坐在寝室窗前，捧着饭盒，聊聊八卦，看看窗外荷尔蒙在飞，画面是多么青春偶像剧……

不过剧情的最后，是几个汗津津的男生打完球，冲到女生宿舍的窗口喊道：“同学，饭卡忘带了。能不能借一下？”“借多少回了？啥时回请一下？”“谢谢啦，下次！”

然后，就没有下次了。多少青春剧，就这样尬了。

几年前，4 幢拆了。西溪校区的老楼也一幢幢地在减少。但很多人说，校园里的那些记忆，总有一些带不走。其实说来说去，毕业了以后，那些发达了的同学，就算你手里现在已经有了 N 套房子。其实你最怀念的，还是当年 20 岁时，在大学里待过的房子。

[返回目录](#)

## 一个老教授的“乡愁”

——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 汤洵口述

解放初期，国家百废待兴、经济极其困难。选定这么一块极富历史文化积淀之地建新校舍，足见党和国家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和对知识分子的关怀

我是上世纪 80 年代初入住西溪路 56 号的杭大新村的，至今已在这里度过了近 40 年时间。这可是我一生中最精华的一段人生岁月。

说杭大新村是新中国建在广大知识分子心中的一座丰碑，一点也不为过。它建于上世纪 50 年代初，北濒沿山河、南临西溪路，占地 50 余亩。

鲜为人知的是，杭大新村的历史比杭大更早。1952 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原之江大学和浙江大学的部分专业合并，成立了浙江师范学院。院址在六和塔旁秦望山上的之江大学原校舍内。

但此处容量有限。当时省委、省政府决定觅新址，在离市区更近的松木场另建校舍和教师宿舍。

松木场这一地块当时十分荒凉。解放初期对犯人行刑都选择在这个地方。建校舍时，施工中常可见到死人的骸骨。有人开玩笑说，幸好这里是建学校，只有文人的墨水才镇得住这些孤魂野鬼。

可就是这么一块地方，历史上却是文人墨客探幽觅胜之处。老底子的西溪湿地，东起武林门，西至老余杭，南到宝石山，北到白荡海，范围极大。松木场亦在其囊中。

到民国时期，松木场仍是西溪湿地的东端入口。杭州人惯于在松木场坐船从水路进入，尤其秋冬季，去西溪赏梅花和芦花。西溪梅花盛开时，“香雪霏霏，四面来袭人”，至清代已名列“西湖十八景”。

1915 年暮春，南社诗人姚石子来杭访友。曾在太平天国战乱中冒死抢救《四库全书》的杭州藏书家丁氏兄弟（丁申、丁丙）的孙子丁善之、丁宣之两兄弟，陪同姚石子游西溪茭芦庵。姚石子回去后写了篇美文《游西溪记》，将西溪之美和西湖之美作了一番比较，盛赞西

溪“如苧萝美人，淡冶幽娴，云鬓蓬松”，而西湖“如美人已入吴宫，韶丽明靓，浓妆艳抹”，两者“固有别趣耳”。

解放初期，国家百废待兴、经济极其困难，选定这么一块极富历史文化积淀之地建新校舍，极为不易，足见党和国家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和对知识分子的关怀。

到1958年，浙江师范学院与新建的杭州大学合并，定名为杭州大学，新建的宿舍也就顺理成章成为了杭州大学的教师宿舍。

当时，这片住宅并没有一个正式的名称。有人称它为河南宿舍，因为在沿山河的南面；也有人叫它为道古桥宿舍，因为附近不足百米处有一座建于南宋时期的道古桥；还有人因这片住宅位于松木场，叫它杭大松木场宿舍。

直到1982年，才由杭州市地名委正式定名为“杭大新村”。

一大摞如雷贯耳的名字：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词学宗师”夏承焘先生、先秦文学研究专家王驾吾先生……当时他们的家都在新建的杭大新村。其建筑外形、室内面积、内部装饰、小区绿化等等，在当时都是超一流水平。最早建造的是十幢二、三层的楼房，砖木结构，坡顶黑瓦，小格方窗，红漆地板；外墙用青砖细砌，水泥勾缝。既有苏式教师公寓的风味，也有中式民居的神韵，煞是好看。

楼房面积大的有90多平方米。房内三室一厅、一厨一卫，前后双门。门前有一数十平方米的小院，各家根据不同喜好种植花木。户与户之间没有隔离墙，仅低矮的绿篱作间隔。茶余饭后，教授们门前即可交谈，或探讨学术问题、或交流治学心得。许多学术名著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的。

当时国际上正流行“城市花园”的建筑理念。杭大新村的住房呈散点布局，小区内绿树成荫。远远望去，二层楼房映掩在绿色丛中，呈现出一派恬静、素雅、唯美的园林风光。引得居住在内的夏承焘先生诗兴大发，专门作词赞美自己的住处：

《浣溪沙·杭州西溪宿舍》

八月芦花作飞雪，三春柳陌有莺啼。  
侬家门口是西溪。

无梦攀天斟北斗，笑人结网罟西施。  
归途襟袖任风吹。

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被尊称为“词学宗师”的夏承焘先生、先秦文学研究专家王驾吾先生、明清白话小说专家胡士莹先生、语言和文献学家任铭善先生、训诂学和辞书学家蒋礼鸿先生、文艺理论家蒋祖怡先生，以及被学生戏称为“爱情教授”的孙席珍先生等等……这一大摞如雷贯耳的名字，当时他们的家都在杭大新村，住在最早建造的兼有中俄风格的连体别墅中。因此，人们习惯于把这些连体别墅称为“教授楼”。

我读书时，每逢周末，或回家、或与同学结伴外出，无论乘坐 6 路车到武林门，还是乘 16 路车到湖滨，都在杭大新村近旁。望着树木葱郁的小区，远远望见在绿荫中偶露一角的教授楼，都会被小区内浓厚的文化氛围所镇服，产生一种深深的敬意。

我是 1962 年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的，这一届招生不看成分、不论出身；只看分数，从优录取。许多历年因所谓“出身问题”而未能入学的学子，都在那一年与我一起进入杭大中文系读书。据说，当时省委书记江华为保证杭大录取学生的质量，特意让杭大先于北大招生。因此，那一届我们录取时的分数线高于北大。

系主任姜亮夫先生戏称这一年录取的 60 名学生是中文系的 60 颗种子。他特意为我们制订了五年的教学计划，光必读书目就开了百余本，从古到今，从历史到理论；选读书就更多了。长长的一份书单，我们看了既害怕又兴奋。

当时杭大中文系在全国很有名，流传着“北大中文系是地主，杭大中文系是富农”的说法。记得新生入学时参加学校体检，医生照例

会问一下你是哪个系。当听说是中文系时，医生不无羡慕地说：“好系。”

是的，我当年报考中文系，确实是奔着自己向往的大师们去的。

孙席珍教授讲外国文学，随身携带的仅仅是一张小小的香烟纸。孙先生烟瘾大我们是知道的，顺手利用空烟纸写几个字也可以理解。但他却凭烟纸上提示性的几句话就能非常生动地讲一两节课，并且让听众听得如醉如痴，却是我们始料不及的。

徐步奎教授上古典文学，真可谓要言不烦。他的每句话后面，似乎都是句号。这种表达，我后来在古龙的武侠小说中见到，似曾相识。徐先生给研究生上课更别出心裁。他不是让研究生在室内坐着听讲，而是让他们伴他散步、陪他爬山。其间谈课题、谈观点、谈资料收集、谈论文架构。两个小时爬山回来，课也就结束了。

那时候的大学生，业余生活也绝大多数和老师们相关。而老师们也都能放弃休息来满足我们的要求。

大学时代，我们曾邀请有“江南活武松”之称的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先生来讲他所理解的艺术与生活。盖老拉开架势表演武松打虎，告诉我们：若武松低下头看着老虎打，这是生活；若把头抬起来目注观众，那就是艺术了——仅用不到一分钟的一个动作，就把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深刻道理，阐述得淋漓尽致！

为了这个活动，我们特意去请了也住在杭大新村的、时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杭大副校长的林淡秋先生。林校长尽管工作繁忙，但仍慨然应允，陪着我们直到活动结束，时不时还为盖老先生的精彩表演鼓掌。

1976年，我到杭大中文系任教。当时中文系是在省总工会干校里（现海洋二所后面）。年轻教师也就借用省总工会干校的房子，住在筒子楼。后来，杭大中文系回到杭大后，学校分配杭大新村的房子给教师入住。

1985年，我入住杭大新村，与先生们的接触日益增多。尤其巧合的是，我竟然与姜亮夫先生成了邻居。姜先生住13幢，我住15幢，两家仅一房之隔。

我的女儿与姜先生的外孙女是小学同学。两家相距又近，只要有机会，我女儿就会到姜先生家玩。小孩子在一起，躲猫猫，大声欢笑是免不了的。此时的先生身体已很差，常常卧床休息。一旦身体许可，便又投入写作。小孩子们的吵闹对他干扰很大，但先生从不以此为忤。每次我去找女儿，路过先生书房，他都会笑笑告诉我：都在里面玩呢。那种慈爱，一扫大学问家的严肃，让我至今难忘。

我亲眼看见，为了挽回因“文革”失去的宝贵时间，杭大新村的先生们更加勤奋、笔耕不断。有时在小区内见到诸位先生，仅一声问候、一个招呼便匆匆别过。不是他们无情、无礼，实在是先生们已没有时间可供浪费。许多中断了的研究需继续、许多未完成的书稿要完成、许多研究生需考虑如何精心培育。

姜亮夫先生住院时，心中念念不忘的仍是上课，并为此焦躁不安。医生家人怎样劝说都不能让他平静。后来把研究生找来，在病榻前听他上课，他才进入状态。姜先生 180 万字的巨著《楚辞通考》（正式出版的书名是《楚辞通故》），资料和初稿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抄家时丢散在院子中。事后他一张张捡起来，“文革”以后再整理好并出版。

杭大新村先生们的言传身教，使我们受益匪浅，也赢得后辈发自内心的尊敬和难以忘怀的忆念。

地理系教授严德一先生有个学生叫陆翔兴，现在已经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教授了，对严先生是魂牵梦绕。每次回家探亲，他必做的一件事就是到杭大新村严先生家中看望先生。有一年，他回家按例又到严先生家，师母告诉他先生已逝。他在严先生家门外站立良久，怅然发出“今日到来师已去，木樨树下立多时”的叹息，并念了宋代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中的句子：“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我十分同意地理系陈谅闻教授的话：杭大新村是真正的大学文化的标记和象征，是浙江文理学科的研究中心，是新西溪文化的发源地。杭大新村的先生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是多元的。

杭大中文系师资力量最强的是“三古”（古代文学、古代汉语和古典文献），在各个发展阶段、各个领域都有造诣很深的名师专家。我大学时代，刘操南教授上《西厢记》，未见其面已先闻其声——“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随即，教室门被缓缓打开，略显瘦小的先生头戴干部帽、身穿中山装，出现在我们面前。他缓步走向讲台，边走边还学着舞台上崔莺莺的表演手势，正好走到讲台前吟唱毕。这是留给大家印象至深的先生的第一堂课。

中国的古典诗词，不仅可以读、可以看，更可以吟唱。刘操南先生如此，其他诸如夏承焘先生、任铭善先生、蒋礼鸿先生及其夫人盛静霞先生、张同光先生、雪克先生等等，也常会在上课时或各种讲座中，时不时的吟唱几句。估计这是这批老师从小学习诗词时养成的习惯。

我们就请示系里，能否专门组织一次诗词吟唱会，让能吟唱的先生都来为同学们吟唱历史上的名诗词。系里十分支持，老师们也欣然同意。记得吟唱会是在杭大 227 教室举行。可惜当时没有录音机录下他们的声音，但还是有人用简谱记下了他们的吟唱，事后再找老师们一一核对，并最终刻印成册。

夏承焘先生看后十分喜欢，为之写了序，并建议整理出版。可惜不久“文革”开始，夏先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第一个受到批判。出版事宜不了了之，连同夏先生的序言也被撕去。好在我作为当时的文宣队长，保存了一份。这也算是先生们珍贵的绝唱。

王驾吾先生在上世纪 60 年代出版了《韩非子选》。此书的序言中，先生充分肯定了韩非学术思想中的积极成分，但也一分为二地深刻剖析其不足之处。这是先生作为学者实事求是的表现。他的见解为学术界所重视。

但“文革”中恰逢“评法批儒”之际，有关方面要求先生按照“儒法斗争”的政治需要，在再版时重写“序言”，把对韩非子不足

的剖析全部删掉。先生以此要求不符合韩非内容实质，断然拒绝。故再版时，此书成为无序言版本。

王驾吾先生对人对事实求是的态度，不赶时髦、不附权贵，令我辈折服。

上世纪 80 年代，为了与国外高校合作交流的需要，学校让我主持拍摄一部杭州大学的宣传片。拍好后我取名《杭大剪影》。

当时学校指令各系配合，许多老师提供了他们出版的著作，使我从中认识了中文系以外其他各系的学界名人。生物系的董聿茂教授，他是我国甲壳动物学的奠基人；化学系的王璉教授，他是我国化学史和分析化学研究的开拓者；哲学系的严群教授，他是我国古希腊哲学研究的先驱；历史系的沈炼之教授，他是我国法国史研究的拓荒者；地理系的严德一教授，他是我国首位边疆地理学家；数学系的徐瑞云教授，是数学家陈建功教授的学生和同事，同时是中国第一位女数学博士。

这些教授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居住在杭大新村。

历史似乎开了个玩笑。1998 年四校合并后，杭大没了。杭大新村还在，只不过历经风雨侵蚀，如今已十室九空，破败不堪。

历史系教授倪士毅先生的儿子说过这样一件事：看到父亲至今住在杭大新村的老房子里，比比自己住的房子，心中很是不忍，几次动员父亲搬迁。倪先生这样回答：“我是搞历史的，你们不懂。你们住你们的新房子，我还是住我的老房子。房子虽然旧了老了，但我喜欢这里。应该要保护这些历史建筑。”

倪先生还抄了刘禹锡的《陋室铭》，以示其甘居此屋的心情。我和倪先生有一样的“乡愁”，对有着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杭大新村怀有难以割舍的情怀。我相信，杭大新村这块曾经“群星璀璨”的宝地，如好好规划设计，必会重放光彩。

我八十岁了，仍驻守在杭大新村。我有个深切的愿望：这里曾经居住过各学科、各领域的著名学者、教授，尤其夏承焘、姜亮夫等先生住过的“教授楼”。虽然建造年代最早，但质量最好。至今除门窗略见破损、屋顶尚须加瓦外，其外墙屋架及内部格局均保存完好。甚

至走在小区里，依然能感受到建筑的优雅。如果能把这批房屋修葺加固，开辟成名人故居陈列馆，把先生们的生平事迹、学术成就集中存放展示，供人参观、学习，不是绝好的“历史文化教育基地”吗？

在某些一切朝前的人看来，我的想法可能有些可笑。但城市在发展、时代在进步，文化遗产也在呼唤。无形的遗产失去了就不可再生啊。这也是我作为一个老教授埋在心底的乡愁和留给这个城市的最后心愿吧。

[返回目录](#)

## 十路车老线路

——杭州大学物理系 77 级 刘宪钊

杭大人没有不知道十路车的。我们进杭大读书时，十路车线是从莫干山路进文三路，往西再从文三路上教工路，一直往北通到终点文一路。但我们熟悉的这条线路并不是最老的。

最早的时候，杭大大门并不是现在这个位置，还要再往东，就在校园最东边那条南北干道的南端。老大门很小，就两扇蓝灰色的大门。门前也不开阔，一点都不气派。当时，杭大河南（道古桥）宿舍的教职工上下班都往这个门走。宿舍到老大门中间是西溪河的一段，叫沿山河。河上有座桥，不是铁桥，不是石桥，也不是木桥，是座竹桥。竹桥不是拱桥，是平的；也不是直的，而是曲曲折折的，很有诗意。为什么不造拱桥呢？因为这段沿山河很宽，几乎像个河湾，大跨度拱桥用毛竹做桥柱可能不够结实；又为什么不造直桥呢？估计是为了减轻冲力。河里的水流有时很急，一条长直的竹桥容易被冲垮——说明造桥的人很有物理头脑。

我读小学两三年级的时候，还是往老大门走。去杭师附小（后来分为学军小学和文三小学）要吱吱嘎嘎走过竹桥往杭大穿。走着走着，会在桥上停下，低头看着河水静静地从脚下流过。忽然间，会感到桥像船一样开了起来。一定睛，原来是河水在流。在这座竹桥上，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相对运动。

大概在 63 年下半年，杭大路开始修缮，路面垫高了些。又在路上造了铁栏杆的沿山河新桥，铺上很大的石板做桥面。差不多同时，开始建造杭大新大门。原来的老大门慢慢不用，那座竹桥逐渐破败。我也开始走新大门上学了。

从走杭大路上学开始，我才发现，新大门前或许是沿山河最美的一段了。这里的河湾很开阔，水很清也很深。河边是草木丛生的芦苇荡。春天来后，里面就探头探脑冒出红黄蓝紫各种小野花，蝴蝶、蜜蜂、蜻蜓飞来飞去，热闹得很。我在河边捉过好几次蜻蜓，飞得很低

很轻柔的红蜻蜓，像个小小的女孩子，很好捉。还有种我们称为“蝴蝶蜻蜓”的，闪耀着青蓝色光芒，抖动着翅膀飞得很高，飞着飞着会突然变向。这种蜻蜓是从来不会让人捉到的。夏秋天的时候，芦花开得雪白，茸茸的像一个个鸡毛掸。我曾去采过些回家做扫帚，弄得满头满身的白毛。在这个河湾边，还第一次认识了水鸟，有两种：一种翠羽、一种白羽间杂着黑色。白色的水鸟尤其好看，尾巴长长翘翘的，在浮萍和水草上灵敏地一蹦一跳。以后从语文课上才知道，这就叫“轻捷”。水鸟的叫声短促而尖亮。一旦受惊，它就冲天而起，在身后留下一串铃声。

从这里，沿山河笔直地往西面伸去，一直伸到远远的老和山脚下。紧靠河边一溜地种着暗紫红树皮的水杉，纤细、笔挺、高扬。小时候会三分钟、五分钟地站着，用透视的眼光沿河边的水杉朝西边望去，感受远山近水，感受心里懵懂的美好。

大约这段时间，听人说起十路车以前是从这条路走的——从以前叫杭徽公路的西溪路而不是曙光路（以前叫松岳路）拐进杭大路，穿进新大门，再笔直奔北而去。

进了新大门，左右两片草地上是地理系气象专业的小小气象站，雅致洋气。气象站用白色的宽木板栏杆围住，里面是几个白色的测温箱，百叶窗的。测温箱上了锁，我们只能透过百叶窗好奇地往里张望，想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神秘的东西。草地上还有一个高高的风向标。起风时，上面几个饭勺样的东西就不停打转。这个风向标很有趣，你可以用意念控制它的转向。你想它顺时针，盯会儿它就顺时针转；你想它逆时针，再盯会儿它就真的会逆时针转。这两片草地的草最好了，丰厚松软又富有弹性，听说种的是高丽草。但我们喜欢叫它弹簧草。外语楼南边也有这么好的一块草地，孩子们最喜欢在上面翻滚嬉闹。

过了这两片草地往北，是一大片空地。也不全空，稀稀拉拉种着些樟树苗，还有水杉苗，但已完全看不到十路车线路了——大炼钢铁时在这块空地上建了很多小土高炉，路被夷平。路边的大树被砍掉炼钢铁。有阵子，杭大的孩子会在这里捡“铜矿石”，一种多平面小石块，每一面都是嵌在石块上的黄铜色金属。我们本打算捡来换糖吃，

或者拿去卖。直到有一天大人说，这根本不是铜，而是炼钢铁的黄铁矿，不由大失所望。这里还经常能捡到“浮石”，一种表面光滑上有很多小孔的石头，放在水里不会沉，其实是炼钢铁的矿渣。还有一种“花生糖”。土高炉根本炼不出钢材，惟一的产品是铁渣，很像小时候吃的花生糖，只配用来铺路铺跑道。1978年进杭大时，大操场跑道上还偶尔能捡到几块“花生糖”。

1968年春天，我开始读杭大附中，走的是杭大最西边那条路。拐过图书馆大楼，后面是一大片荒地。除了路边有个漂满浮萍的小水塘能扔石头外，没什么能引起我们兴趣的（不过还是有个小故事：一天在图书馆后面，看见年近八十的陈建功老先生在树下“方便”。我大为震惊。同行的同学却轻描淡写地说，不奇怪。年纪大到没那方面欲望时，就不大有那方面的羞耻感了。我再次深深震惊。才初一的小毛孩居然懂那么深刻的道理）。直到有天上学时，一个孩子指着图书馆后的荒地说，看，那有条路！一看，果真！虽然路面已布满荒草，但略高的路基和路边残存的几棵枝叶稀疏的法国梧桐说明，这以前就是条公路。敢情荒废多年的十路车老线路躲在这儿！快到七幢前面时，路消失了，但在八幢、十幢（医务室）后面的围墙外，又看到了她的身影，直到文三路。

我读中学的五、六年间，几乎每天都看到这条老路，看她慢慢荒芜衰败。但一直顽强地守在那儿，就像古代独守闺房的妇女，青丝慢慢变白，但仍每天枯坐在窗边，等候戍边的良人回家。

进了杭大附中，老行政楼和老教学楼后面有条南北向的路，通到海洋研究所。这，是不是十路车老线路呢？读杭师附小本部的时候，学校没有食堂。我们中午在浙师院和杭大附中都搭伙过。在附中食堂一吃完饭，马上就跑去海洋研究所玩。文教区内很少见到这样的高大西洋式建筑，紫红色，平顶，墙基和窗户都是大块大块的方形结构。房子边上有几棵很大的树。树上垂下几根粗粗的藤条，几乎垂到地面，形成天然的秋千。我们就在那尽情荡秋千玩，直到离上课还有十分钟左右，才依依不舍急急匆匆地往学校跑去。但这跟十路车老路线无关。

这条路边种的虽然也是梧桐，但不是法国梧桐，是凤凰会在上栖息的那种中国梧桐。

十路车老路线还要往西，在杭大附中和杭大生物系中间，就是紧挨 300 米操场东边的那条路。也是我见到的最长、最漂亮的一段十路车老路线。路两旁的法国梧桐树干高大、枝叶繁茂。

那时文革暂时进入一个沉寂期，校园内人很少。远远看着这条路。她像一个沉静的少女，含着微笑独自站在那里，在操场和那座典雅的生物学礼堂身边。她再迈步向前走时，就进到了杭州师范学校。杭州师范学校文革时改成普通中学十三中。我在这读的高中。路在教学楼南面，学校操场的边上。这也是我走得最多的十路车老线路。依旧美丽动人，但那时我没有过多留意，太熟悉了，就像身边的亲人。

文二路到文一路这段十路车老线路是怎么样的，还在不在，我就知道了。希望她还在，希望她是生机勃勃，欢天喜地在往前走。

写完了，但我还是有些纳闷。建造文教区前，这一带都是荒野田地，会有些水塘，会有些树木，会东三西四地散落着一些农家，但根本就没有一家像样的单位。那为什么要造一条不算窄，还那么洋气，种着法国梧桐的公路呢？

[返回目录](#)



## 第八章：荟萃

## 校史钩沉

### 求是育英，中西合璧

——杭州大学法律系 80 级 孙笑侠

我们这一代校友们都知道，杭州大学是由育英书院而来，浙江大学是由求是书院而来。那么求是和育英这两个书院又是从何而来？由谁创办？办学历程？我们都说求是书院是由杭州知府林启创办，真的只有一个人吗？之江大学和杭州大学是什么关系？我们都说浙大杭大“同根同源”，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清楚了，那么我们母校的根也就找到了。

我对自己的母校作了些资料整理。其中主要的资料是 1909 年编印的《杭州育英书院毕业纪念册》、陈仲恕 1947 年浙江大学校庆前作并毛笔批注的《本校前身——求是书院成立之经过》，以及陈叔通 1949 年为其兄陈汉弟撰《陈仲恕先生家传》等原始文字材料。结合史料大致可把一些脉络和关系说清楚。

#### 一、育英、求是两个书院的创办

首先，说说两个书院的创办先后的问题。

随着近代传教士进入中国，西学东渐，中国人开始接触西学。杭州大学的前身——育英书院，可追溯至 1845 年（道光 25 年）。有美国长老会的传教士卫理哲、挂明德二公到达宁波传教，基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之意，在宁波江北岸创立了义塾，即“崇信义塾”，专为青年而设，目的在为日后传道打基础。但私塾的规制较狭、生源较少、成材稀罕。后来，传教士孟丁元、倪维思、莫理生、雷音百诸公也相继到来，作了一些拓展和变化，有所改观。因太平军乱城，二十多年后的 1867 年（同治 6 年），迁至杭州皮市巷。当时，杭城因太平军起义导致街市萧条，市民因饥饿四处逃荒，人烟稀少，诸校荒废。再历经七年，义塾卖掉“宁波崇信义塾”的校舍，在杭州购置田地，

新建校舍，振兴教务，规定校章，定名为“育英义塾”（Presbyterian Boy's School），成为浙江办高等教育之首例。1879年，毕业于美国汉密尔顿学院的28岁的裘德生夫妇加盟担任校长后，育英以美国同类大学的标准办学，改订章程，合力奉行。

1895年的甲午战败，刺激了国人，也刺激了清廷。逢戊戌变法，鼓励兴办新式书院，以书院形式引入西学，莘莘学子，锐意维新，求学好进。此时，杭州出了个20多岁数的年轻人叫陈仲恕。他和朋友一起想办个书院。陈仲恕（1874-1949年3月15日），名汉弟，字仲恕，号伏庐，伏庐主人，也就是民主革命老人陈叔通的哥哥，宾大海归、著名建筑师陈植的父亲。

陈仲恕1874年出生在杭州一书香家庭。父陈豪（字蓝洲）是同治九年优贡，擅长书画诗赋，当过湖北等地的知县，是个好官。1895年甲午中日之役，国势日衰，22岁的陈仲恕便与同里汪康年商议，欲振兴实学，以图自强，拟创办崇实学堂。经各方奔走，因官绅梗阻而久久不得行。

直至光绪23年，即1897年，侯官林启任杭州知府。他是熟读四书五经、担任过编修、陕西学政、浙江道监察御史并提出过“简文法以核实政”的儒学之仕。在陈仲恕的积极建议之下，查封了杭州众多寺庙中的一座——普慈寺，以充办学堂。作为“杭州市长”的他，向浙省抚院廖谷士详细请示，定校名为“求是学堂”。

林公在杭州政绩被人们记住的，就是兴办学校，特别是求是书院。学堂制度效仿育英书院办学模式，已有学堂规制，省抚院派林启兼任总办，举人陆懋勋为监院，贡生陈仲恕任文牒斋务（实为副监院）。可见，今天的官方信息中只说浙江大学前身是求是书院，由杭州知府林启创办。这个信息是有残缺的。求是书院的创办人应该是林启和陈仲恕二人。

## 二、两校校名与理念

其次，谈谈两校校名和理念。

以上大致可知，“育英”先于“求是”。育英由外国传教士创办，求是由本土文化先贤创办。因而在办学理念上有所差异。

先来看看两校校名的演变情况。

1867年（清同治六年）崇信义塾从宁波迁到杭州，改名为育英义塾（Presbyterian Boy's School）。1897年，改称“育英书院”（Hangchow Presbyterian College）。1914年改名为“之江学院”（Hangchow Christian College）。1948年获准更名为大学，即“私立之江大学”（Hangchow University，即“杭州大学”）。

林、陈等人创办的求是，并没有在英文校名上作考究。

1901年，清廷为控制书院，转向官学化，下令书院改为学堂，书院就此结束。

求是书院于1901年11月被当局改称“浙江求是大学堂”。1902年又除去“求是”二字，改称“浙江大学堂”，同时扩充学生名额至120人。1903年12月，又改为浙江高等学堂。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北洋政府将浙江高等学堂更名为浙江高等学校。1927年，国民政府通过北伐战争攻克杭州，在浙江高等学校校址成立国立第三中山大学。

1936年竺可桢校长上任浙江大学后，确定“求是”作为浙江大学的校训。竺校长又在《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一文中阐述道：“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竺校长的母校哈佛大学校训用的是拉丁文校训 Veritas（真理，求真，英文翻译为 Faith of Truth）。因此“求是”与 Veritas（真理，求真）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当年林启和陈仲恕等人所取校名的用意之深广。

从两校中文校名也可推知两校办学理念上的一些信息。从“崇信”改为“育英”，从字面到实质都具有一致性，可解读出教会重人格教育的理念，旨在培养青年精英品格上的博雅素质，强调一种人文精神。裘德生到育英后成了主导者。他当年就读的美国汉密尔顿学院，也是一所以人文主导的著名私立大学。所以和育英原先的教育理念有呼应。

而陈仲恕从原来的“崇实”改成后来的“求是”，此处“实”乃“是”也，其含义完全一致。据陈本人在回忆中介绍，因“虑杭绅或又中阻，定名为求是书院”。“求是”就是一种实证的科学精神。

1936年竺可桢长浙江大学时，定校训为“求是”，应是继承其前身“求是书院”之名而来。因此浙江大学的科学主义特征十分显著。育英与求是，正暗合了西方大学教育史早期的两股脉络：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博雅素质教育和以科学主义为核心的专业素质教育。

育英为谋更大的发展，“移城市而出之江”。1907年起，在杭州月轮山秦望山麓二龙头修理建新校舍。经过3年规划经营，主要建筑如教学大楼、宿舍、图书馆、实验室先后落成。校园三面环山，面临钱塘江；又当六和塔西侧，地势开阔，江山如画。学校占地面积300余亩。从1910年起，南北长老会合作共组校董会，司徒雷登（J. Leighton Stuart）等代表南长老会。1911年2月正式迁入之江新校舍，因地处钱塘江弯曲处，成“之”字形，故取名“之江学堂”，英文名仍为 Hangchow Christian College。1912年孙中山先生得知，应邀曾到校视察讲话合影留念。之江大学李培恩校长任上，经多次申请更名，终于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获得教育部批准，更名为之江大学，英文校名为 Hangchow University。全校师生欢庆。李培恩校长亲自钤发公函，向相关部门和机构通报大学更名后新公章启用，曰“案奉教育部指令本校奉令试办文工商三学院迄今八年，成绩渐著，所请改称大学应予照准”。

### 三、两校均采“中西合璧”

再次，讲讲两校办学的中西合璧模式。

尽管办学理念上有所差异，但两校在“中西融合”上都趋于一致。“育英”与“求是”两院办学过程中都走向中西兼顾。育英书院，基于洋学、西学的特点，注重“接地气”，努力实现中国化和本土化。求是书院，基于本土和“中学”的本色，又十分注重西学（主要是西方近代科学）和西方大学制度的引进。

育英书院在裘德生到来之后，购置了理化、测量、望远等教学实验器材。从此，育英书院的教育走向现代化。育英书院发展到之江时期，不仅强调学生对于科学知识的学习，同时也强调学以致用，倡导学生能够用所学的知识，服务于所在的社会和国家。1934年夏天还利用搁浅在钱塘江入海口的一头巨鲸，制作了鲸鱼骨架，作为教学标本。1935年，中国自行设计建造钱塘江大桥，之大校方为了让土木、机械系学生能够获得实践机会，多次联系铁路局。之大学生参与到大桥施工现场实习，直接参与到大桥的施工中去。

求是书院开办后，延请英文、算学、化学教习，招生30名学生，分科讲授。求是创办之初，还向育英书院学习效仿办学模式。这就是杭城两所大学雏形的相互关联、相互学习的开始。

1893年，育英书院来了一位传教士叫王令赓（Elmer L. Mattox），毕业于美国帕森斯学院（Parsons College），后来继任育英书院的校长，对西式教育很有经验。于是，求是书院希望向育英书院学习西式教育制度，请他帮忙，创建了“求是中西书院”。

再说，求是书院的陈仲恕公办事十分认真干练，又富有公义心。他是求是书院校务的实际操办人，相当于常务副校长。尽管文牍斋务的工作非常繁杂，收入仅车马费十元，伙食三元。但他日矢精勤，不辞劳瘁。1898年（戊戌年）4月陆懋勋应礼部试，陈仲恕任代监院，7月任监院。随着维新运动的不断高涨，陈任代监院时的数月间，根据林启的意见，当即商定求是书院派何燠时（燮侯，后一度任北大校长）等四人为首批留日学生，并于8月入预备学校。这一举措，为各省派往留日之首倡，开中国留日运动的先河。陈汉第从税金中提取教育经费的提议，说明求是书院的经费来源已由传统向现代过渡。

求是书院后来出了个著名的校友蒋百里，文武双全，成为民国的著名军事家。当年正是由林市长和陈公等人帮助他，前往日本留学，避免了因议论朝廷被开除的境地。

#### 四、办学的艰辛

我们一起看看两校的办学历程。

两校在百年办学过程中，筚路蓝缕，历经艰难。有经济的因素，有战乱的外因，更有权力的原因。主持校务的先辈们为了教育和学术，真可谓：历经苦难痴心不改，吃尽苦头无怨无悔。

从育英书院到之江学院，一直是教会大学。如果形势和环境允许正常办学，经费并不愁。可是校名问题总是因受政府限制而不得发展。

1917年至1927年，之江学院一直想更改为“之江大学”而得不到政府批准。原因基本上是因为校董会成员多数为洋人。1927年武汉政府宣布迁都南京，并改组“国民政府”。“之江大学”校名立案一事再次向政府提出。1927年8月之江学院监事会同意美国人、前校长费佩德辞云校长职务，选举1905年留日回国的朱经农（1887-1951）担任校长。但同意在差会及母会董事会在向新政权立案问题上的政策明朗之前，朱经农暂不就职。之江学院监事会当时还决定，在过渡时期，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英文编辑的董事李培恩受邀参与之大的工作，解决行政管理中的问题，其实相当于代理校长。李培恩的命运与之大坎坷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之大这个时期开始就一直面临着经济困难、宿舍紧张、学生运动，引来各种纷扰，问题接踵而至。1929年，政府拒绝之江大学重新开办招生，因为它没有获准立案。但最后于同年9月，大专和高中还是获准开学，有900人参加了入学考试，最后学生总数350人。但以前的学生没有一个返校，招收的学生中虽然有85%的人选修的宗教课程，但实际只有20%的基督徒。这对于教会大学来说，很是尴尬。根据政府的要求，之江学院立案需要作未来发展规划并推进各项建设。

1927年秋，学生中出现党争。4名学生伪造信件，攻击另外十名学生是共产党员。后来，此信件被证实是伪造。此4人被逮捕。李培恩向教育厅汇报此事，希望能预先化解学生的麻烦。1929年秋，之江学院董事会正式邀请李培恩代理校长一职。这位双硕士学位的留美海归，努力工作了三个月，把母校作为“联合的教育机构”重新组织起

来。也正是在李代理校长这一年，之大历史上首次招收女生，有 18 人通过入学考试，以后逐年都有增加。因为在当时，男女合校是政府立案的先决条件。代理校长还在师资队伍建设上作出了显著成效。他用他能支付的薪水组建了强大的教员队伍。为加强行政，他聘任王令庚博士为会计兼授法语课，等等。1930 年 5 月，学校在得到朱经农来信说不能担任校长之后，之江学院监事会正式任命李培恩担任校长。李培恩在担任校长期间不仅兼任文学院院长，还在经济系开出一些课程，并采用全英语教学，要求学生作业和考卷全部使用英文，对学生的作业和考卷用英文批改。

李培恩从代理校长起，学校一直面临着经济困难、宿舍紧张、学生运动，引来各种纷扰，问题接踵而至。根据政府的要求，之江学院立案需要作未来发展规划并推进各项建设。经李培恩校长的周密规划和积极建设，包括筹资 8000 万国元兴建的图书馆和科学馆建设，以及学生服务楼（银行、邮局和医疗诊所）、教师宿舍建设，还包括培养桥梁和建筑工程师的土木工程课程，各建设项目基本得以完成。至 1931 年 7 月，学校终于再次向政府提出立案报告。师生听闻消息后，由不安定转向平静，大家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李校长在这段办学艰难的时期，苦心经营。1934 年 11 月 13 日傍晚，学生家长、上海申报创办人史量才从杭州回沪途中遇刺。史子与母亲商议，捐赠 4 万元给母校，建造一幢新大楼。在李校长领导下，很快动工，于 1936 年建成了经济学馆。这是他在七年间建起的第四幢大楼。

可是好景不长，1937 年 12 月日军攻占杭州。李校长组织安顿师生到安徽屯溪，但条件受限办学不成。他一边布置校园留守人员的工作，一边着手在上海租界重组学校。于 1938 年 2 月 19 日，在上海博物馆路 128 号广学会大楼开学，有 138 名学生注册。在此，还与沪江、圣约翰、东吴以及从南京来沪的金陵女大等其他相邻的基督教大学开展的互助式合作，最后取名为“上海基督教联合大学”。1941 年，联合大学在战争形势下不得不解散。李校长去浙江金华考察下一步办学的地点。可是 5 月份，日军就轰炸金华，进城了。之江大学在李校长带领下转移到了福建郡武。李校长先是把之大寄借于福建协和医大学，

包括学生借用宿舍、图书和仪器。后来协和的宿舍不够给之大用，李校长通过当地政府在附近买下一块地，到处筹款，最后于1943年三座属于之大的新校舍建筑终于完工。当时很少有人知道，李校长的唯一儿子克桐正值上大学年龄，却染上霍乱夭折了。遇家庭悲剧的李校长没有声张，也不影响工作。1944年，有人辞职了，而有人归队了。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最不可思议的是，李校长的好朋友、理学院院长马尔济被日本遣返到美国。但他热爱之大也想念李校长，居然穿过南美，坐船到南非，最后乘船经印度飞越高山到达昆明，然后坐车颠簸到达福建邵武。这时按董事会决议，之大于1944年6月学期末全部停止。李校长只好把文学院和商学院的学生转移到其他大学。教员唯有两个人留下来，那就是李校长和司库留下来照看有三座新建筑的空校园。

1945年，日本人投降后不久，李校长就着手之大回迁杭州的计划。同时，他还与圣约翰、东吴三校商议，寻找校址地块，尝试在上海组成联合大学。但因南长老会的拖延，导致这个计划落空。

1947年，进步学生游行，学潮涌动。警察抓人，李校长为保护学生与警方交涉。

再说求是也一样，非常艰难。在创办之初，陈仲恕便与同里汪康年商议，欲振兴实学，以图自强，拟创办崇实学堂。经各方奔走，因官绅梗阻而久久不得行。直至光绪23年即1897年，侯官林启任杭州知府才利用旧寺庙充办学堂，不提“崇实”是因“虑杭绅或又中阻，定名为求是书院”。

陈公尽管文牍斋务非常繁杂，然收入仅车马费十元，伙食三元。但他日矢精勤，不辞劳瘁。1898年陈仲恕任代监院，7月任监院。求是书院派首批留日学生。为了减轻留学生的负担（每人每年200元），陈仲恕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予以解决。他在1900年给汪康年的信中说，求是书院“系将各局经费抽提一成，月得五百余元，又将书院存典生息，官课奖洋拨归求是，年可得八九千元。”后因学校扩大，他又“请将各州县丁漕平余（指省级各项税收）一项提拨三千余元。”

1898年这一年也是多事之秋。6月11日开始戊戌变法，迭奉上谕，鼓励办学堂，并严令限期要求各省于各府县开办学堂。浙省府院遂以

求是书院为筹设学堂总汇之所。陈公为此尽心尽责，应付几穷。由他负责收买院后空地，建设讲堂斋舍。林启答应由他兼任升官的防军局拨款。然而经费钱款未到，由陈公先予叠付。同时还添招肄业生 60 人，原 30 人内院生之伙食与纸张由院承担。与此不同，新招收者为外院生，酌收膳费。经短短的筹备工作就绪后，于是年秋季开学。然而，是年 9 月 21 日突遇政变（戊戌变法失败），太后训政，下旨各省已办学堂即行收缩，未办者即行停办。浙省抚院以奉谕旨无法批拨款，林知府原先的拨款设想也无法兑现，又无从另筹。正在此时，学使来学堂视察，便与林知府商洽，决定拟一奏本建议从防军局拨款，但又如何自圆其说呢？时年 25 岁的陈公草拟了一稿，理合奏明，通过廖抚院上奏。政变以后，许多学生纷纷退学，留下来的仅十之一二。有学生在作文中用“贼清”称呼朝廷，被旗籍学生获悉告发。官府派兵把求是书院围了起来，欲逮捕学生以“大逆不道”罪严惩。陈仲恕先生挺身而出，多方奔走，竭力调停，将这件事压了下来。

1901 年，当局将求是书院改称“浙江求是大学堂”。1902 年又去“求是”这关键二字，改称“浙江大学堂”。不然今天就是“求是大学”，和清华、复旦、南开、同济一样，是不采用地名的具文化特色的校名。

到了竺可桢校长手里，艰难困苦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接任校长不久，抗战就爆发了。要把一个诺大的大学搬迁到安全的西部后方，最后居然还在穷乡僻壤把它办成了“东方剑桥”。

两校在经历艰难困苦中办学，人的精神支柱是什么？一个显然是靠宗教信仰。另一个呢？并不是宗教信仰的力量。林启，尤其是陈忠恕、竺可桢们，靠什么来克服数十年的办学艰难与困苦？在这个世界上，可能不只有宗教信仰才是唯一的精神力量。这很值得我们深思。

自育英而来的之江大学，从 1949 年 5 月 3 日杭州解放至 1952 年上半年继续办学。1950 年，校董会推选从上海交通大学因违抗伪政府命而辞职的校长黎照寰（1898-1968）为新校长。之大不接受任何外国经费，美籍教师回国。1951 年，之大由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丹接收。黎校长交出校政后回沪。1952 年夏，全国高等院校调整院系，私立大

学尤其是教会大学停办。之大文理师资除少部分进入复旦大学外，总体进入一个新成立的大学——浙江师范学院。之大的工程学科各系并入浙江大学，建筑工程系并入上海同济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财经系并入上海财经学院。之江大学从 19 世纪 50 年代到 20 世纪 50 年代，历经 100 余年办学历史。

之大的文科和部分理科拆分到了 52 年新成立的浙江师范学院。浙江师范学院首任院长为浙江教育厅长俞仲武，副院长为著名心理学家陈立教授。

1958 年浙江师范学院，并入新成立的杭州大学。而后，著名工业心理学家陈立教授出任校长。杭州大学继承了之江大学的文理主体部分；并且英文名也继承了之江大学的 Hangzhou University。由于历史的原因，杭州大学当年在官方宣传资料中都不提自己与之江大学的关系，回避这个“西方基督教文化侵略”问题，更多强调 50 年代而来的官方背景。1997 年杭州大学举行的隆重的百年校庆，没有从 1868 年算起，正是从 1897 年搬到杭州后的育英书院算起，这是严谨的。在六和塔月轮山的之江大学老校园，则于 50 年代交由浙江大学使用。现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于 2007 年迁入此旧址办学。

（2020 年 3 月于浦东然否斋）

[返回目录](#)

## 1956年浙江省筹设杭州大学的三个历史文献概述

——杭州大学外语系59级 许高渝

众所周知，在新中国高等教育史册里第一次出现杭州大学的名字，是在1958年。当年5月，杭州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标志着浙江省创办的首所综合性大学诞生在即。

| 姓名  | 原工作单位 | 原职务 | 原单位  | 原职务 | 原单位  | 原职务 |
|-----|-------|-----|------|-----|------|-----|
| 沈文英 | 杭州大学  | 教授  | 杭州大学 | 教授  | 杭州大学 | 教授  |
| 李日良 | 杭州大学  | 教授  | 杭州大学 | 教授  | 杭州大学 | 教授  |
| 俞子英 | 杭州大学  | 教授  | 杭州大学 | 教授  | 杭州大学 | 教授  |
| 三月良 | 杭州大学  | 教授  | 杭州大学 | 教授  | 杭州大学 | 教授  |
| 夏望如 | 杭州大学  | 教授  | 杭州大学 | 教授  | 杭州大学 | 教授  |
| 顾蔚如 | 杭州大学  | 教授  | 杭州大学 | 教授  | 杭州大学 | 教授  |
| 王德祥 | 杭州大学  | 教授  | 杭州大学 | 教授  | 杭州大学 | 教授  |
| 刘云森 | 杭州大学  | 教授  | 杭州大学 | 教授  | 杭州大学 | 教授  |
| 内勤  | 杭州大学  | 教授  | 杭州大学 | 教授  | 杭州大学 | 教授  |
| 李永林 | 杭州大学  | 教授  | 杭州大学 | 教授  | 杭州大学 | 教授  |
| 俞竹良 | 杭州大学  | 教授  | 杭州大学 | 教授  | 杭州大学 | 教授  |
| 培子芳 | 杭州大学  | 教授  | 杭州大学 | 教授  | 杭州大学 | 教授  |
| 竺梅屏 | 杭州大学  | 教授  | 杭州大学 | 教授  | 杭州大学 | 教授  |
| 李英华 | 杭州大学  | 教授  | 杭州大学 | 教授  | 杭州大学 | 教授  |
| 李凡如 | 杭州大学  | 教授  | 杭州大学 | 教授  | 杭州大学 | 教授  |

杭州大学筹备委员会登记本中新教师报名表之一页

不久《浙江日报》7月5日第3版上刊载了“本省新办第一所综合性大学杭州大学即将招生”的消息。



但许多人并不清楚的是，早在1956年，浙江省委就有建立这所综合性大学的全面设想和规划。浙江省档案馆有三个历史档案记载着那些设想和规划。

第一个文献初名为“筹建一个综合大学的规划纲要”。2月20日草拟时，标题改为“筹建一个综合性的杭州大学的初步设想”。

“设想”一开始对提出筹建杭州大学的背景作了说明。称当年浙江省制订了一个发展文教事业的十二年总规划。根据该规划，在十二年内，本省高等学校将由5所增加到20所；学生人数将由8000人增加到64500人以上；科学研究机构的数量与规模也将大大发展。为了满足发展中的高等学校师资和科学研究人才的需要，以及一部分高中师资的需要，“省委决定筹建综合性大学一所，并定名为杭州大学”。

“设想”计划杭州大学“在1958年开学，先设六系，第一年招生600人，以后发展的最大规模为八个系，学生3200人，均暂为四年制”。“设想”对未来杭州大学的师资也提出了具体数字：“共368人，与学生数的比例为8.15比1。其中正副教授72人，正副教授或讲师100人；助教196人。分二个阶段来配备，第一阶段主要满足1960年前开始招生的六个系的师资需要，共需105人，第二阶段主要满足

在 1960 年发展成为八个系后的师资需要，预计除前已配备者外，尚需增加 263 人”。

“设想”接着列出了第一阶段各系、各课程所需具体人数，并对师资来源考虑了三个方案：[1] 以浙江师范学院为基础，即把该校改为综合大学，再由复旦大学加以援助；[2] 完全依靠复旦大学解决，但根据复旦目前师资情况，58 年开学就不可能；[3] 如果要保证 58 年开学，又不影响本省高等师范教育事业的发展，可由复旦和师院共同抽出一部分师资，搭起架子，以后再视需要逐年补充。具体意见是：第一、教研组长和主要教授是教学中的骨干，拟全部由复旦大学负责解决；第二、一般教授或讲师拟从师范学院中抽调；第三、所需助教拟要求高教部在高校毕业生中调派。“设想”对行政组织系统和干部来源问题也提出了具体而详细的方案。

“设想”中最后的一项问题是成立建校筹委会。“在省委领导下，立即成立综合大学筹备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可由省委文教部、省人委二办、师范学院和复旦大学有关方面组成。它目前的任务是：根据此规划纲要研究本校的具体规划、研究本校的组织机构及人员编制问题、研究本校的师资培养、调配和职工调配问题、研究本校的历年招生计划和教学计划问题、确定校址，争取今年上半年开始基建，研究购置一批图书、校具等设备问题。”

第二个历史文献是省委文教部于 3 月 31 日提交的“致沙文汉同志并报省委的报告”。

该报告指出：“关于本省建综合性大学问题，经我们多次研究，并与本省有关大专学校校长、教务长协商，一致认为是有必要的，可能的，而且是有条件可以尽快建立起来的”。该报告提出的学校名称、设置的系科和“设想”基本一致，如“定名为杭州大学，设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中文、外语、历史、地理八系，总规模为 3480 人，暂定为四年。”所不同的是将“设想”中的 1958 年开学，提前了一年：“除历史、地理两系因师资条件不具备外，其余六系均可于 1957 年开始招收新生”。

对师资来源问题，该报告提出了从本省四所大专学校抽调讲师以上人员和请求中央高教部解决的助教以及少量教授或讲师的方案：

“本省四所大专学校可以抽调讲师以上人员为：数学方面五名，物理方面四名，化学方面五名，生物方面四名，外文方面四名，中文方面三名。（具体名单另附）这些人员调集起来后，一、二年级的课程一般没有问题，可以开得出来，三、四年级的课程略需补充。这六个系的系主任也已有对象。其中物理与生物两系的师资配备与其他大学比较，不能算弱。要求中央高教部解决的除每系派给十五名助教外（外文可不派），只要求增派代数、分析、有机化学、动物生理等教授或讲师各一名，近代文学教授或讲师二名。”

报告最后对学校基建和筹备建校工作提出了具体计划，提请沙文汉同志和省委考虑。“基建方面，按每人二十二方计算，约需七万七千方，平均每方以六十元计，约需四百七十万元，分三年建成，第一年投资一百万元，第二年二百万元，第三年一百七十万元。”“为了使一九五七年把综合大学建立起来，目前就应该进行筹备工作”。报告建议“立即组织筹备委员会，以沙文汉同志为主任委员，另设二名副主任委员（一是准备提升为综合大学副校长的非党教授、一是搞具体工作的党员），并吸收准备提升为综合大学系主任的教授组成，进行购置图书、仪器及基本建设、物色教育人员等工作。此外，要求省拨给一定经费作筹备之用。”

第三个历史文献是“关于建立杭州大学的报告”。该报告于8月23日由浙江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办公室向上级呈交。这份报告明确指出：“现经党中央批准，本省建立综合性的杭州大学一所”。“报告”对学校最大规模则设定为五千人，并定于1957年开始基建，58年开始招生。该报告提出了与筹备相关的多个问题，报请审议批示，其中主要有：一、校址：选定在黄龙洞的前面，土地按每人一分计，共需五百亩。二、经费及建校步骤：按每生25方计算，建筑面积共需12万5千方，平均每方按八十元计算，共须一千万元，外加其他基本建设费百分之十及设备费约二百万元，共需一千三百万元。根据“总体规划、

分期施工”的原则，拟分五年建成。自 57 年开始，要求明年即投资二百万元，兴建二万方房屋，并以四十万元购图书设备等。三、筹备机构：拟即成立杭州大学筹备委员会，并在筹备委员下设立办公室，配备工作干部 25 人，进行教务、设备及基本建设工作。本年九月份即开始办公。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上述三个文献中提出的种种设想、方案大多未能立即及时实施。但需要肯定的是，其中许多规划的内容为 1958 年 5 月正式开始的杭州大学筹建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返回目录](#)

# 杭州大学前身 浙江师范学院的组织和发展

(1952.2-1958.11)

——杭州大学外语系 59 级 许高渝

## 1. 组建

上世纪 50 年代之初，因适应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高等教育事业的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1951 年 12 月，浙江省成立了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委员会。次年 1 月 2 日，决定以浙江大学文学院与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为基础，组建浙江师范学院。1951 年 8 月成立的浙江师范专科学校也同时并入（作为该院的专修科）。

1952 年 2 月 5 日，浙江师范学院正式成立。院址设在杭州市六和塔秦望山上原之江大学所在地。时任浙江省文教厅厅长刘丹兼任院长，焦梦晓、陈立为副院长，刘丹为党委书记。3 月，中苏友好协会浙江俄文专科学校并入该院。

浙江师院成立之初，设教育、中文、外文（英语和俄语组）3 个系和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和体育 7 个专修科。同年 8 月，浙江大学理学院的部分系科调入师院后，数学、化学、生物和历史 4 个专修科随之扩建为系。11 月增设政治专修科。

1952 年 6 月，浙江师院临时院务委员会成立。学校行政领导着手制度建设，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会议制度，使学院的决策制度化和民主化：院办公会议，每周一次；系主任会议，约每月一次；院务委员会或院务扩大会议，每学期召开一至两次；院行政会议，不定期召开。

同年 12 月，上级任命焦梦晓接任浙江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朱子英为副书记，省文教厅副厅长俞仲武兼任浙江师范学院院长。

## 2. 发展

1953 年秋，外文系的英文组、物理专修科扩建为系。1954 年 7 月，地理专修科扩建为系。至此，浙江师院有中文、外语、历史、教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 9 个系和政治教育、体育 2 个专修科。学院除开展本专科教育外，于 1953 年秋开始招收古汉语和古典文学研究生。另还开设过一年制短训班，招收小学骨干教师，将他们培养成为初中老师。1954 年 7 月，成立中学教师进修部。1956 年秋，成立函授教育部。

学校十分重视党组织的建设，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员队伍不断扩大。学校成立之初，党员仅 11 名。到 1958 年，增加到 589 人。1956 年 6 月 16 日，全院召开第一届党员大会，成立了焦梦晓为书记、朱子英为副书记的浙江师院党委会。1958 年 2 月 21 日，举行了学院第二届党员大会，选举陈烙痕为书记、焦梦晓、朱子英为副书记。同年 9 月，省委任命宋思纯为副书记。

学院将思想政治工作置于重要地位，并紧密围绕提高全体师生员工的政治觉悟和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教学改革这一中心进行。为了更好地开展政治理论学习，学校成立了学习委员会。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是进行共产主义理想和道德品质教育以及形势政策教育。通过领导作报告，组织开展一系列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活动的开展，使全院师生员工始终在团结活泼，奋发向上的氛围中学习、生活和工作。同时建立了思想政治工作机构，即学院党委、行政，到系的各级党组织。学院成立政治辅导处，各系科设政治辅导员。

教学改革（包括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材的改革）始终是浙江师院 6 年发展的中心工作。成立之初即开设了政治课（其科目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和文教政策与法令）和军训理论课。专业课的改革主要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同时，把学生的实习和参观也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

自 1952 年初到 1953 年 9 月，开展教学改革的主要措施有：组建教学组织、制定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组织教师认真编写讲义以确保教学效果、开展教育实习。

1953 年 9 月到 1954 年底，教改的内容有：进一步修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建立了教学日历制度，制订每天教学的具体计划；除课堂教学外，还采用了野外实习和见习；在全面推行考查、考试制度的基础上，推行口试。同时进一步调整了教学组织，在教研组内分设教学小组。

从 1954 年 12 月到 1956 年底，全院教改从“全面学习苏联”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转变为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1956 年，全院已成立教学法教研组 34 个，教学小组 2 个。学院组织全院师生开展如何贯彻“全面发展”教育方针的大讨论。大家认为，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格人才，不仅要具有高度的思想政治觉悟，还要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真正做到德、智、体全面发展。为此，学院调整教学计划，压缩周学时和课程门类，增加自学时间。还调整了讲授与课堂讨论、习作等的时间比例。同时，学院改革了行政管理体制，教务处改设教务科和学生科。各系科增设副主任 1 至 2 人。学生的作息制度也作了调整。

浙江师范学院大力倡导科学研究工作。从 1954 年开始，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力度明显增加。学院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浙江师院》报分别发表了副院长陈立和生物系主任江希明的文章，阐述了开展科学研究与提高教学质量的相互关系；制定规划，落实任务。各系科纷纷召开各种读书报告会、专题报告会、学术研讨会，学术气氛空前活跃；学院为教师科研成果发表提供平台，于 1955 年 2 月成立学报编辑委员会，并于同年 7 月出版《浙江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第一期。1956 年 3 月 31 日，学院举行了第一次全院科学讨论会。会议还邀请了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省内外有关大学的专家、教授 80 多人参加。会议提交论文 79 篇。由于学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在广大教师的共同努力下，浙江师范学院科研工作步入了兴旺时期。据统计，当时共提出研究课题 200 项。

学院在六年的发展过程中，教师队伍之中青年教师占有很大的比例。学院始终重视对他们的培养工作，制定“边教边学，教与学相结合，稳步前进”的培养方针。具体采取四种形式：一是师傅带徒弟。选派业务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指导年轻助教。二是边教边学。对于那些必须开又没有现成师资的课程，助教就自己边学边教，以解燃眉之急。三是根据课程需要，选派业务基础较好的助教到兄弟院校或研究机构进修。四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校制订了助教政治学习计划。规定凡助教一律应补修完4门政治理论课。

学院在发展过程中也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向上级推荐优秀知识分子，加强和充实学校领导班子。朱福炘、江希明教授后来被增选为浙江师范学院副院长。陈立副院长在1957年5月升任院长。一批学术上有成就、群众威望高、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优秀教师，则由学院推荐参加人大、政协、科协、文联等组织，扩大学院在社会上的影响和知名度。同时，学院切实解决教师的具体问题：对教师工资进行了全面调整，一部分教师的升级问题也得到解决。另外，学院党委注重发挥民主党派、青年团和工会的作用。

从1952年到1958年，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在校学生数，从1952年底的885人，增加到1958年夏的5638人（含本专科生3084人，研究生5人，函授生2523人和进修班学员26人）。六年里向全国各地输送了四千余名本专科毕业生。教职工总数从244人增加到799人；教师从107人增加到410人。六年多来，不仅秦望山上校舍大大增加，1955年还开始在杭州市松木场另辟校址，建造新校舍。到1957年，累计竣工面积已达3万多平方米。

浙江师范学院在六年多的发展过程中，曾受到“左”的干扰和冲击。最明显的是1957年夏季开始的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和1958年上半年开展的“教育大革命”。由于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造成全院120名教师、干部甚至一批学生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紧接着1958年春开学不久，学院按上级指示开展了为时两个月“双反”（即反浪费、反保守）运动，随后又进行了一场群众性批判教师，特别是老教师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教育革命”：通过“翻箱倒柜”查讲义、

查上课笔记、查老师著作，对许多有名望的一些老师进行大会、小会的连番批判。一些系还汇编了“批判集”。原有的教学计划和大纲，包括教材也遭到批判。在新的计划里增加了劳动的内容，在课堂教学时间里增加了政治理论课的学时。这场教育革命的群众运动中，科学的教育体系被打破，正常的教学秩序受到干扰，也伤害了正常的师生关系。

1957年后，学院成立了勤工俭学指导委员会，组织学生下乡下厂参加勤工俭学活动。由学生、教师、干部三结合大办工厂、大办农场。教师、学生不再是在校园教书、学习，而是离开了校园，走上了社会，把生产劳动作为要务。

浙江师范学院在办学的6年半中，虽然在受到上面所述的“左”的干扰，但是总的来说，在学院党政班子的领导下，尊重和关心广大老知识分子，培养了一大批中青年知识分子；抓教学，抓科研，调动了教职员工的积极性，扩大了办学规模，为1958年后学校各方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8年11月26日，浙江省委下达关于杭州大学与浙江师范学院合并，校名定为杭州大学的决定。作为杭州大学前身的浙江师范学院六年余的发展由此划上了句号。

（注：原载本人编写的《从浙江师范学院到杭州大学（1952—1998）：史料集珍·回忆撷英》第1-6页，标题有所改动，最后一段为新增）

[返回目录](#)

## 我心目中的之江大学

——杭州大学数学系函授生 蒋遂

钱塘江在杭州西湖区珊瑚沙一带流转经过一个大的“之”字。这里被有些人称为“之江”。钱塘江名称繁多，有“浙江”、“折江”、“之江”、“罗刹江”、“新安江”、“富春江”等等。这个“之江”只是一个特定的地理位置。在之江北岸，有一林深茂密之处，那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

我自幼常常听母亲盛静霞说起“之江山”。母亲所说的之江山，是一所学校所在地。这个学校叫“之江大学”。我父亲蒋礼鸿 1934 年经嘉兴秀州中学保送考入之江大学，期时称为“杭州之江文理学院”。母亲 1947 年随父亲回到之江大学。同年，我的姐姐出生在之江大学宿舍。1952 年，我也出生在之江大学宿舍。那时应该叫“浙江师范学院”宿舍了。历史就是那么奇奇怪怪，一个名称也有许多变化。

首先讲一下“之江山”。我母亲口中的之江山，包含了头龙头、二龙头、三龙头，即之江大学的辖地。这三个“龙头”其实是小山包。“‘龙山’是众多山丘朝南的一只巨大马蹄状的手臂，朝东方展开像一块巨大磁铁把西湖和城市吸进她环绕的臂膀中。在南面，这些山呈扇状展开五座山脊，延伸到钱塘江北岸。你从东沿着河堤走，经过六和塔，它高高地建在蜿蜒起伏的第一个山脊上，接下去你就到了叫‘头龙头’的悬崖。”（美籍教授队克勋的《之江大学》摘录）“龙头”之间是深深的沟壑。而头龙头至杭州梵村，一共有九个龙头。头龙头是第一个。古有说法：“十龙九斫头，一龙不斫头，赶到长河头。”长河头在对面的萧山。这里不想做详细的考证，以后也如此，望读者见谅。

之江大学的建筑星星点点地坐落在其中。我在 1955 年随父母下山，搬到浙江师范学院的体育场路 262 号中文系宿舍。那时只有 3 岁，所以对之江山只有朦朦胧胧的映像。但是之江山在父母的口中，实在是对我太神奇了。所以我常常对它魂牵梦萦。

2009年5月1日，适逢儿子出差，妻子郭敏琍说：“我们去之江山吧！”我心里非常激动，所谓“知夫莫如妻”。我们到头龙头，从山路上山。原来朦胧印象中的小径，变成了水泥路。头龙头上，我家曾经住的“十间头”赫然在列。

头龙头上原来是学校为中方教师建筑的宿舍。因为直到1950年之前，之江大学还是由美国教会办的学校。1951年为杭州市军管会接管。1952年，经历了著名的“院系调整”，之江大学正式宣告结束。部分院系加入到新成立的浙江师范学院。

跨过头龙头、二龙头之间的情人桥，我们来到之江大学主教学区二龙头。二龙头还有一个称呼是“秦望山”，相传秦始皇南巡在此系舟眺望对江。实在是秦望山的称谓太令人遐想无限，所以也有专家学者提出异议。于是展开了一场没有结论的大辩论，至今也没有一统天下。其实依我之见，不是历史地理学家，大可不必在意。我在阅读夏承焘先生的诗文时，似乎觉得夏先生把二龙头当成“月轮山”了。而月轮山是杭州六和塔雄居的那座山。三龙头不是主教学区，多是配套设施。

之江大学在这里开展新校区是1906年。在这钱塘江畔选中了一块坟地，约400亩。以后陆陆续续建起教学楼和宿舍。现在国务院认定的历史建筑有22座。在这里居住过的西方人士中有司徒雷登是大家熟知的。还有许多勤勤恳恳在这里为教育事业默默奉献的中西方人理应被人们所记住。

之江大学建立新校区时，注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建立之初，校园内种植桃李4000株。又在三龙头山坡遍植竹林、茶树等等。还把樟树移植到慎思楼等主要建筑物周边。之江有十二景：钱塘江、六和塔、双龙瀑、小桃源、情人桥、小盘谷、临江亭、佩韦斋、健美谷、培园小筑、上清池、秦望顶。所以之江大学有“世界上最美丽的森林大学之一”、“天下最美丽的大学”之美誉。

之江大学溯源从1845年宁波崇信义塾始，由美国长老会海外差会麦卡第博士建立。

1867年，崇信义塾搬迁到杭州，更名为杭州育英义塾。

1897年，育英义塾升格为育英书院。

1920年，之江大学在美国哥伦比亚立案通过。

1928年，向中国教育部立案失败。“鉴于董事会不同意立案，同时考虑到学校严重的财政问题，为重新组织之江大学，暂时关闭学校”。

1929年，经政府同意，大专和高中部获准开学。中国人李培恩代理校长。

1930年5月，李培恩担任校长。

1931年，以“之江文理学院”为名向政府立案。

1936年，成功在政府立案。

1948年，民国政府教育部核准之江文理学院为综合性的之江大学。

1951年，浙江省文教厅接收之江大学。

1952年，院系调整。之江大学宣告结束，历时107年。

之江大学的悠久历史，不是上面这个初略的时间表可以描述的。从麦卡第进入宁波，到之江大学宣告结束，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的办学过程。长期以来，之江大学等教会学校被彪炳为“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几乎成为定势。可是，我从父母亲的嘴里听到的，只是对之江大学的赞扬和崇敬。所以，我慢慢找来极为有限的资料，企图了解之江大学。得出的结论完全是和“文化侵略”相反的结果。

之江大学的美国传教士是一群可以捐躯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把先进的科学技术带到中国，为中国跨入现代文明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即便是传播福音，也无可厚非。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采取尊重的态度。从崇信义塾起，就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设置。育英义塾之际，开设了经训（《春秋左传》）、国文（文义、文体、作文、习字）、历史（中国史）等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之江大学的国文系，其地位丝毫不比其它系科弱。

在张斌所著的《民国杭州国学》中，有这样的描述：“民国时期，特别是1929年之后，之江大学国文系在文学院中地位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英语、政治、教育乃至经济等其他各系，成为杭州乃至江浙地区重要的国学研究团体。”

这里不能不说，之江大学的国文系能脱颖而出，要归功于杰出的文史大家锺钟山先生。“1925年锺钟山应邀担任国文教授，正如我们后来看到的，这是他最幸福的选择”。锺先生担任国文系主任兼教授凡14年，这是国文系发展的鼎盛时期。他广罗人才，前后聘请了邵祖平、祝观如（浙江杭县人，前清举人）、臧承宣（清副贡）、夏承焘、李笠、徐昂、郁达夫、王子慧（之江大学肄业，国文系助教，）、汪锡鹏（东吴大学学士）前来任教。1933年，国文系新聘教员孙智敏、郁达夫、田君伟、王善业、朱建新；1934年，国文系教员有钟泰、余重耀、王善业、朱建新、夏承焘、郁达夫、孙智敏、余铁珊、王子慧；1937年，国文系教员有钟泰教授、徐昂教授、夏承焘教授、胡慥教员、任铭善助教、王子慧助教、李玉书助理，形成了稳定的学术队伍。

国文系成立之江诗社，锺泰、夏承焘、李笠担任诗社顾问，以专研中国古典诗词和新体诗。锺先生创立了一座收藏中国古典文学的图书馆，成为之江第二大此类图书馆、全中国最完备的国学图书馆。国文系开办了《中国文学集刊》，抗战前出版了四期。研究成果叠出：夏承焘《〈四库全书〉曲类提要校议》、陈竺同《金院本与南宋杂剧的比较》、彭重熙《放翁词考证》、任铭善《〈春秋〉驹夹今文辨》、顾敦録《尤西堂的戏曲》、张荃《后村长短句考证》、李笠《目录之名称及其内涵》、吴予天《释舛》、邵祖平《七言绝句榷论》、钟泰《论书传说殷庚五迁数目汤迁亳之误》、夏承焘《词彙》、蒋礼鸿《跋〈纳兰词〉》、邵祖平《诗厄篇》、任铭善《讽字臆记》、刘怀儒《孟子荀子学术异同》、徐昂《韵与声之结合》、余重耀《骚旨诗论》、徐昂《论卦气异同》、钟泰《荀注订补序》、任铭善《辨音臆记》、夏承焘《令词出于酒令说》、钱华《宋代妇女服饰考》、顾敦録《李笠翁词学》、熊化莲《论诗序》、蒋礼鸿《唐会要史馆篇修前代史晋书笺》、蒋礼鸿《荀子余义（上）》、胡才甫《沧浪诗话诗评笺注》、沈茂彰《玉溪生诗管窥》等。

可是日寇的侵略，使之江大学国文系受到沉重的打击。锺泰远走建德、徐昂赶赴上海、夏承焘避祸温州、任铭善回到如皋……。八年抗战是中文系不堪回首的时期。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不忘操守，各自

在学术研究上不断的探索前行。1943-1944年，之江大学部分流亡到贵阳花溪。锺泰时任贵阳大夏大学国文系主任。他还赶到之江大学教授国文。

之江大学的传教士、许许多多的中外人士，都是值得尊敬的人。他们为浙江省建立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高等学府。校长王令赓还为求是书院提供现代教育的具体帮助。107年在历史长河中并不算长，但是他们中有些人甚至把生命抛洒在这片热土上。如夸特曼牧师（Rev. John W. Quaterman）1857年患天花逝世于宁波崇信义塾；殷太素1941年被日寇绑架，从此下落不明。校长王令赓为学校整整服务了41年；校长裘德生为学校服务35年；校长李培恩为学校服务27年，任校长20年；司徒林华任校长8年（服务时间不详）；锺泰14年，夏承焘21年。之江大学为浙江带来了现代化教育理念、现代化的教育模式，现代科学技术、先进的实验设备，一举突破了科举制的封建教育制度。这是浙江省划时代的创举，也是转型期中国的福祉。

之江大学从诞生起，就时时刻刻受到内外忧患的困扰。因为之江大学是纯粹的私立大学，资金上从来得不到政府的支持。为了维持学校正常的运转，学校不断地向外界筹款；由于办学理念的不同，要向教会不断的解释、争取；学校内部也形成不同的意见；由于中西方理念不同面临种种困难。尤其八年抗战中艰难办学、文军长征，其困难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令人动容的。之江人的崇高理想、无私奉献、坚毅不拔，是为后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尤其令人敬仰的是，之江大学留下的颇具特色的建筑群，部分是由个人捐赠的。其中有：东斋，由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甘卜夫妇（D.B. Gamble）捐建，亦被称为甘卜堂（Gamble Hall）；西斋，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维勒夫妇（N.P. Wheeler）、纽约州泡特威尔的维勒夫妇（W.E. Wheeler）和杜森伯瑞夫妇（E.G. Dusenbury）捐建，亦被称为惠德堂或吴窦堂（Wheeler and Dusenbury Hall）；慎思堂，以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捐资人 L.H. Severance 先生命名，也被称为佛伦堂或赛佛伦斯堂（Severance Hall）；天文台，由费城特纳夫人捐献；都克堂，由美国新泽西州东奥瑞治（East Orange）的都克（Nathaniel Tooker）一家捐

款修建，以表对他们父亲的纪念；佩韦斋，于 1925 至 1926 学年开始募捐，1926 至 1927 学年建成；图书馆、科学馆，由之江大学同学会捐建；体育办公室，由校董史量才捐建；材料试验所，由教职员和毕业同学捐建；经济学馆，由史量才家属捐建。

之江大学的建筑群，以欧美风格为主，多数呈现为橘红色，在群山之中格外耀眼。2018 年 11 月 24 日，之江大学旧址被国务院列为第三批中国 20 世纪建筑遗产项目。作为历史建筑自然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然而，如果把它仅仅看作建筑史上的成就，就有失偏颇了。正如之江大学美籍教授队克勋所说：“它是一种精神的东西，而精神的东西是不可摧垮的，是可以继承的”。

1952 年，之江大学被迫解散了，107 年的历史就此结束。可是之江大学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杀的。甚至浙江的新学也得到了之江大学的帮助。之江大学为中国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之江大学建筑系的许多毕业生为抗战期间的滇缅公路做出了贡献。

如队克勋教授所说：“就像一粒橡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一所男童小学从宁波迁到杭州，慢慢地成长为中学、初级学院，然后发展为一所完备的人文学院，直到最终分化出三个不同但互补的学院，1948 年政府正式承认它是一所真正的大学，虽然这承认来得太迟。一句中国谚语说：‘百年树人’，因此，对于之大来讲，它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才长大成熟，从城市狭窄街道的一棵小树长成一棵占地一百多英亩的庄严的大树，人们称之为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之大同它的姊妹院校一样，它从中国人对现代科学教育需求不断增长的内部反应发展起来，并且用西方教会提供的有限资源尽可能地作出最大的贡献。”

参考资料：

1. 队克勋《之江大学》珠海出版社 1999 年
2. 王国平主编《之江大学史》杭州出版社 2015 年
3. 张吉《之江大学旧址建筑史初探》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4. 吴炜主编《之江大学旧址历史变迁》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 年
5. 张凯《民国杭州国学》杭州出版社 2013 年

## 杭州大学，我的母校

——杭州大学中文系 93 级 邹滢颖

1956 年，杭州大学新校舍建筑工程全面铺开。据当时管基建的同志回忆，那时天目山路杭大这块“到处荆莽丛生，坟冢累累，这里原是国民政府一个刑场，在施工过程中常发现戴有镣铐的尸骨。”

杭大教授、国学大师、敦煌学家蒋礼鸿先生的儿子蒋遂也曾经说过，西溪路上的杭大新村“原址是一片墓地，一到夏天的晚上，就会有许多萤火虫在空中飞舞”。但是一栋一栋校舍及周边配套逐渐生成之后，这里开始熙熙攘攘。经过“文革”的凋蔽之后，恢复高考让这儿再次成为全省乃至全国学子的归心之地。当年的他们年龄不一，境遇不一，但一个个意气奋发，拼命读书，为祖国的振兴废寝忘食。



80 年代初城西松木场，现杭大路、世贸中心位置。

左上侧是浙大求是新村。图片提供：章胜贤

上世纪 50 年代左右建的杭大新村（当时叫道古桥宿舍），是浙江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小区：一代词宗夏承焘；国学大师姜亮夫、徐朔方；我国化学史和分析化学研究的开拓者王璉；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浙江

大学终身教授陈桥驿；动物学家董聿茂；化学家周洵钧；“诗孩”孙席珍；研究敦煌学的蒋礼鸿；研究古文献及现代汉语的任铭善等名人都在此居住过。



蒋礼鸿夫妇于杭大新村八幢前合影。

有人记得自己第一天上大学的场景：“1978年3月6日上午，那一天，当我沐浴着初春的阳光，迎着和风，肩背军用棉被，腰挎军用书包，手里拎着不大的提包走进杭大政治系时，全然没有想到映入眼帘的校园竟是那样的狭小和简陋。”（《难忘的文二街杭大政治系》郭占恒，原载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版《岁月如歌：新中国建立后浙江发展亲历》）你至今能感觉到这位新生文字间洋溢的兴奋和失落。因为这个政治系并不在本部。它处于文二街上一处不显眼的院落。门牌号是128号，使用了同样在五、六十年代建成的浙江省财贸干校的校园，所以相对简陋。校门是两垛水泥柱，可能一般人也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后来读杭州大学的人只知道杭大分部就是学军中学边上的生物系。但其实在“文革”前和“文革”后，杭大都有很多分部。“自1956年松木场建校至1987年底止，杭大已经拥有校舍25万余方，校园土地面积641亩，其中本部417.2亩，河南80亩，河东21亩，生物系80亩，体育场路37亩，庆丰村5.8亩。”唉哟，作为在此校盘桓七年半之久的我，当时竟然只知道生物系，不知道连体育场路、庆丰村都有自家地盘啊！你看文二街有政治系分部，文三街有生物系分部，体育场路还曾经有过中文系和历史系分部。这所大学枝枝蔓蔓地塑形了文教区的各个角落，成为文教区的桥头堡。说到文教区，杭大就是一个汪洋。我们会有多少篇文章仔细讲它呢？讲一个消失的学校，讲远去的大师，讲影响了城市和时代的毕业生们，讲讲它和这座城市不可分。

母校睡在我们的体内，封印了青春和梦想。“时间难倒回，空间易破碎。”毕业离校后，我甚至很少再去这个地方。有点怕它变化，但更害怕自己的变化。像结婚后再撞见初恋的人，调整不好呼吸，在这个时代很要命。但是生活在有母校的城市里，这莫名让人心安吧。起码要孩子好好读书的时候，有了可以指点的实物。七、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为祖国的命运而读书；九十年代以后的大学生更多为自己的理想而读书。现在的大学生在为谁读书呢？



你用过的是哪款校徽？

杭州大学诞生过两次，消失过两次。现在称呼这个学校会加个“老”字，老杭大。有些人以此为荣，有些人则只说浙大。这三个字很容易进行人群的区分，甚至是一种价值观的分野。

杭大第一次诞生在纸面上。浙一师（现杭高）的校长经亨颐在他1918年的日记本上写到过这件事（我翻阅到这一段）。他当时还是浙江省教育会的会长。辛亥革命后，当时浙江可称为高等学校的，只剩下教会办的之江大学和法政、医药两个专门学校，是远远不够浙江人才储备和输出的。经亨颐在教育界有识之士的支持下，起草了《陈请省议会设立浙江大学文》。不过此文就是一个大纲，一个提议。除了形成普遍共识之外，并没有什么下文。因为议员们担心建个大学会增加大笔的财政支出，而影响到自己加薪，所以根本就没让通过。

三年以后，一晃啊。省议会通过了一项筹办杭州大学的建议案。为什么不叫浙江大学的名字了呢？因为杭州大学，听起来好像是一所杭州的大学。那么省里各专门学校就不会感到被归并的危险。看起来，取好一个名字还要研究公众心理。提议的人很会拿捏。

议案通过了，正式就进入了筹办。《筹办杭州大学大纲》里列了杭州大学董事会成员名单，名儒大师，赫赫在列：蔡元培、陈槐、蒋梦麟、陈大齐、阮性存、马寅初等等十人。董事会公章都刻好了，办公室在省长公署内。校址呢，圈定了在凤凰山万松岭一带。杭大的校友们，你们差一点要和梁山伯祝英台一起同窗了。

教育大师们非常兴奋，拟定了堪称完美的分步走的计划。从1923年到1931年，8年期间分四步完成，每两年完成一步：第一步建校，第二步建基础系，第三步建其他系，第四步再看还有没有需要建的院系再建起来。整个计划完美，思虑周密，决心也很大。但是没钱。

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个事情在动乱的时局下，更是一只扼住新事物咽喉的大手。杭州大学被掐死在没钱的摇篮里。

但是筹办杭州大学这件事，留下了一个非常高级的精神文本。它在《杭州大学章程》里留下了21个字的“权利”表述：“本大学完全独立。1、学术自由；2、经济独立；3、学校行政独立。”这群董事们的意思是，就算学校经费是政府拨给的，但是对不起，钱怎么花，得

由董事会一起说了算。去买仪器不要报批，去买图书不要报批，给老师的薪水也由学校来定。经济独立之外，行政独立，学术自由，要完全独立。



1923年3月27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了《杭州大学章程》。

杭州大学第二次诞生，应该说是1952年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的产物。它的诞生和浙江师范学院不可分。

1952年，很多中国大学走到此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50年5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毛主席、周总理都出席了会议，与会的还有苏联专家阿尔辛杰夫。在这次会议上，中国高等教育确立了“以苏为师”的指导思想，按照苏联模式重建高教制度。那就是把知识分子的注意力，从社会人文科学转移到培养具体的专门人才方向发展。主要是培养工程师、医生、教师、农业专家、统计专家、采矿专家等方向。全国的公（私）立院校都要进行调整，以便更好地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彼时，老浙大14个学院最后缩成了4个系。很大一部分理学院和社科系都支援给了当时

还很羸弱的复旦大学。而文学院则走上了六和塔边上的秦望山。浙大成为纯工科学校。

浙江师范学院就此应运而生。这个浙师院和现在金华的浙师大是两回事。培养教师是国家建设的重要方向，浙江必须要有这样的院校。

1952 后 2 月 5 日，在浙江大学文学院与之江大学文理学院的基础上，同时合并浙江师范专科学校，正式成立了浙江师范学院。院址在六和塔秦望山原之江大学所在地。我们后来称为浙大三分部的地方。那是个城市秘境，至今十分美丽。



之江大学校区的校园主楼旧照。



1954 年数学系毕业合影，背景即为之江校区教学大楼。

图片提供：章胜贤

但六和塔这个地方受地形影响，发展困难。连喝水都要肩挑手提，下雪天更是崎岖路滑，不易生活。在有关当局的指示下，学院开始谋划在新辟的城西文教区建校。

1955年，经省文教厅、省文委报请华东文委批准，决定在松木场重新建校。

“浙师院的松木场新址，原划定在庆丰村皇姑山附近，原杭州电视机厂以西。该地地形低洼，常年积水，并且离市区又远，经一再要求，才改到了天目山路。1956年，新校舍建筑工程全面铺开，首先开工的是第一、二、三、四幢学生宿舍，接着是饭厅和教学大楼。不到两年时间，到1957年底止，累计竣工面积已达3万多平方米，连幼儿园也造好了。全部工程设计由省建筑设计院负责，校舍总体平面布置，基本上采纳了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的意见。”

所以，最初的天目山路，现西溪校区校舍，是浙师院的。不过在新校舍开建的同时，浙江省制定了一个发展文教事业的十二年总规划。

“省委决定筹建综合性大学一所，并定名为杭州大学”。而负责筹备者则是时任浙师院的党委书记陈烙痕，深深地在杭大建校过程中烙上了浙师院的痕迹。可以说，浙师院这个混血儿把它的基因传给了新杭大。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杭大的师范生依旧很著名。

1958年5月，新杭大筹备委员会成立，暑假开始招生。校址设在文三街232号。校舍是原来的浙江省委党校和浙江省工农速成中学，即现在的学军中学、杭大生物系地块。

不过58年是个膨胀的年份，大跃进马上来了。杭大迅速扩大，文三街的校舍已经完全不能满足需求。

1958年11月26日，省里决定，新的杭州大学跟老的浙江师范学院合并，全称杭州大学。校本部就搬入现在的西溪校区。

原来在六和塔秦望山上的校舍，也和省委党校校舍进行了置换。山上的院系逐一下山搬入新杭大。文三街分部的那幢大屋顶建筑搬入了最后下山的生物系。从此，这个区域充满了有趣的动物和植物，引发本部的学生时时前来探秘。



1956年10月9日,《新民报》上登的有关杭州大学将新建的信息。

“文革”期间,杭州大学的房屋土地纷纷被占、被借,遗留了不少问题。“文革”后,有部分归还,有部分则完全丧失了土地使用权。

1977年后,学校基建进入蓬勃发展期。这段时期,杭大的新化学楼、风雨操场、图书馆、西四教学楼、旅游楼和金融楼都相继造好,学生宿舍多了四幢。1986年,还建成了专家楼。教工宿舍有了30幢,有850余户教工搬进新屋。

从杭大建立开始,这所宝石山下、西子湖畔的大学便风行云从,大师云集、才俊辈出,成为浙江学子向往的圣地。虽然从综合情况看,它还不能和全国一流的大学相比,但它的部分院系却在全国大学里名列前茅。

“杭大就坐落在道古桥北的一片农田中。朴素的校门,不大的校园,三层楼高的教学大楼,远非想象中的大学该有的豪华气派。”(《校园5年琐忆》沈友林)杭大自始至终是朴素的、实在的。

比如说大门，任是谁看到，都不会感到这所学校深不可测。但是据师长回忆，光是这大门当时也是花了不少心思的。杭大老书记夏越炯先生回顾了这个事情：

“八十年代的时候这个校门已经破破烂烂了，一块块补上去，两个柱子中间是门。1989年改造大门，设计的时候主要有三个方案，另外两个，一个方案像天安门城楼一样，一个像浙大一样大的门框，都不行。杭大啊，本身很小了，所以大门呢，要低要矮。大门口到图书馆台阶两百八十八米，这片土地，也绝对不能造房子。这样，从黄龙饭店看起来啊，全部能够看到里面，大家就会认为杭大是很大的。实际上杭大很小，整个学校只有四百亩土地啦，包括生物系还有八十亩土地，总共四百八十亩土地。



80年代的杭大校门，改造前。

改造大门，里面铺了一些地砖，花了四十万块钱。当时一个管文教的副省长打电话批评杭大，说你们杭大花四十万块钱造个大门，你们教室宿舍都没造好呢，大门倒花这么多钱。杭大老书记夏越炯说：我们杭大啊是个知识分子的地方，很要面子。人家一看呢，黄龙饭店造得那么好，世贸中心造得那么好。黄龙饭店和世贸中心会赚钱，我们杭大是不会赚钱。但是一点面子都没有。上面去看看，你们省里面啊，重视黄龙饭店，重视世贸中心，不重视这一个大学，省属唯一一

个综合性大学这么不重视。还有呢，你们政府大楼里面有空调，我们教室里面连电风扇都没有。就是因为面子，我们才造这个大门。”当年杭大的校长、书记们真的是很刚了。他们在各种政策条件下为大学的生存、光大呕心沥血，为一个地方的高等教育发展绞尽脑汁。



90年代的杭大校门，改造后。



校门背后刻着校训。

杭大发展了 40 年，发展得连我们读中文的学生都知道，学校的数学、工业心理学、敦煌学、历史学、法学、地理学等等都很强大，全国知名度很高。但它还是不可避免地消失了。

1998 年 9 月 15 日，早上约 10 点 45 分左右，浙江大学的名字替掉了柔软的“杭州大学”四个字。在换校牌之前，到处都是来和旧大学合影的学子。从此这个地方改称为浙江大学西溪校区。

我从繁复艰苦的高中三年抵达大学校园，在文教区徘徊七年多，见证了学校通过“211 工程”后的喜悦，满心狂喜看到金庸先生来院里当院长做讲座，也与有荣焉地因为百年校庆而吃到了很好的加餐，同样也心情复杂地看到四校合并，杭大消失于江湖。一位位我们喜欢的老师，渐次离开杭大；宝石山上的台阶也不再有一边授课一边爬山的国宝级大师和他的学生；熙熙攘攘的西溪路变得冷冷清清；杭大新村成为野猫们的乐园。我几乎不再回到有紫藤花气息的校园了。



现在杭大新村内已经破败的教授楼。

离开校园 20 年的人，就在杭州城里兜转。有时同城能过成异乡。现在回想起来，杭大可能有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但最好的是什么呢？

春日的阳光很刺眼，湖边的新绿漫山遍野涌来。我想，那个最好的就是一种蓬勃的自由，温暖的宽容。

参考文献：

[1] 《从求是书院到新浙大 记述和回忆》许高渝 编

[2] 《从浙江师范学院到杭州大学 1952-1998》许高渝 编著

[3] 学校基本建设概述（1952-1987），项鹏飞 著

[4] 浙大公众史学“浙江大学校庆 120 周年口述历史”之夏越炯书记口述史节选

（原载“城市秘密”2020年4月26日）

[返回目录](#)

## 叶落芳径：杭大新村的隐秘往事

——杭州大学数学系函授生 蒋遂

从杭大路东拐进西溪路，步行约 200 米，左手边，西溪路 56 号：道古桥宿舍，又称杭大新村。两扇铁门似有若无地开着。一打眼，里面的房子都老了。人迹了了，野猫漫步，是旧故里草木深的样子。可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个通往浙江学术圣地的入口，通往一个传承中国文化的中心。



西溪路 56 号，通往浙江学术圣地的隐秘入口。

图自©城秋特邀摄影师 肖奕叁

时间如果倒回到 1958 年，这个不设围墙的宿舍区里，会迎面走来各式各样的大师，洵洵如，霭霭如，或背手踱过，或两两交谈，目光清远，神情冲和。彼时，此地杭州大学文理科教师渐已集结，名单很长，略举一些：

国学大师姜亮夫；一代词宗夏承焘；化学家王琏、周洵钧、金松寿；生物学家董聿茂、王曰玮、江希明、陈士怡、吴长春；心理学家

陈立、朱锡侯；历史学家沈炼之、胡玉堂、黎子耀、徐规；数学家徐瑞云、白正国；文学家林淡秋、陈企霞；物理学家朱福炘、斯何晚、王锦光；教育学家王承绪、陈学恂；外国语专家鲍屡平、张君川、德梦铁、蒋炳贤；地理学家严德一、陈桥驿、毕敖洪；哲学家严群、沈善洪；语言学家任铭善、蒋礼鸿、郭在贻；古典文献专家沈文倬；古典文学家王驾吾、胡士莹、钱南扬、徐步奎、刘操南；书法家陆维钊；文艺理论家孙席珍、蒋祖怡；社会学家韩常先；体育教育家张强邻、方载震……

这个名单还可以列得更长。2010年，浙大曾评出浙江大学百年文科名家五十多人，有人粗略统计过，其中十多位都曾在杭大新村居住过。他们都是国之栋梁。



老门牌5幢，曾是蒋礼鸿的家。

图自©城秘特邀摄影师 肖奕叁

大先生们除了书籍，身无长物，挈妇将雏，怀揣振兴中华、桃李天下的抱国之志，深耕道古桥。当年党和政府造一个学校，还会造宿舍，造幼儿园、小学、中学，造食堂体育场，造所有和生活相关的公共空间。它把人深深地交织在区域里，用生活锻造一个个全新的白地。

白地日渐葱茏，园子里草长莺飞，孩童嬉戏，俊彦云从。六十年后，多少杭大子女回想起这个乐园，都情深难抑。一起在园子里玩耍

的傍晚，一起爬宝石山的清晨，一起搭伙吃饭的日子，一起上山下乡的日子，一双双走到阡陌上，一双双走到花树望。在他们眼里，大先生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人，比如姜亮夫，“就是一个夏天还要戴口罩的怪老头儿”；比如不苟言笑的蒋礼鸿，调皮捣蛋的娃娃会跟在他后面学他走路。谁家的花儿长得好，孩子们会去讨要；谁家的蔬菜丰收了，邻居家的碗里也会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时有吟诵，间有琴声，优越的住宿环境，和谐的人际交往，这里成了三代人的伊甸园。当然也会有风雨如晦的日子，抄家焚书，以身殉道，谦卑倔强，心存希望。无论处境如何艰难，父辈都会鼓励孩子“好儿女志在四方，晒黑了皮肤练红心”。

杭大新村出去便是黄龙洞，车水马龙。而此地静谧，犹如在青灯下细语，时光凝滞，别有人间。

## 一、杭大新村的四至

如今，杭州直接与“杭大”有关的遗存，大概就剩下杭大路和杭大新村了。杭大新村位于老杭大附近，西溪河南，道古桥东。循着杭大路，过黄龙饭店和宝石山，便是西湖。

杭大新村初时不是这样叫的。

1957年，设在六和塔西，原教会之江大学旧址的浙江师范学院，为谋求更大的发展，从浩瀚的钱塘江边，搬到野趣盎然的松木场，并在道古桥东，建造了教职员工宿舍。



上世纪 70 年代地图上的杭大宿舍 ©城市秘密

当时这里河港纵横、芦荻飞花，位置偏僻荒凉，还属于“乡下”。不远处有个牛奶场，看不到任何高大的建筑物。宿舍南面是大片农田。农田尽头是宝石山麓，山下有黄龙洞。宿舍北面就是浙江师范学院校区。校区东侧道路当年称西溪河下。近在咫尺，教职员工上班很是方便。宿舍与校区之间隔着沿山河和马路。建设初期，黄沙、砖瓦这类建筑材料也通过沿山河运输过来。

彼时河上的道古桥貌不惊人，爬满青藤，名字却显得古色古香，令人遐思飞扬。岂知，这桥这名，端的是有些来历！

沿山河其实是西溪河中游段。西溪河在留下附近汇集了小和山一带的上埠河、东穆坞溪等山溪，从西溪湿地南部流过，一路由西向东又汇集了北高峰、老和山的溪流，进入平地，再贴着杭大新村、沿山河村（省府宿舍）流向松木场附近，最后折向北流，沿着杭大校区东侧一直流向大运河。©城市秘密



“道古”乃是秦九韶的字。秦九韶精通“算术”，与李冶、杨辉、朱世杰并称为宋元数学四大家。这桥为道古先生所建，为世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桥本俗称“西溪桥”，而数学大家朱世杰感其德，命名曰“道古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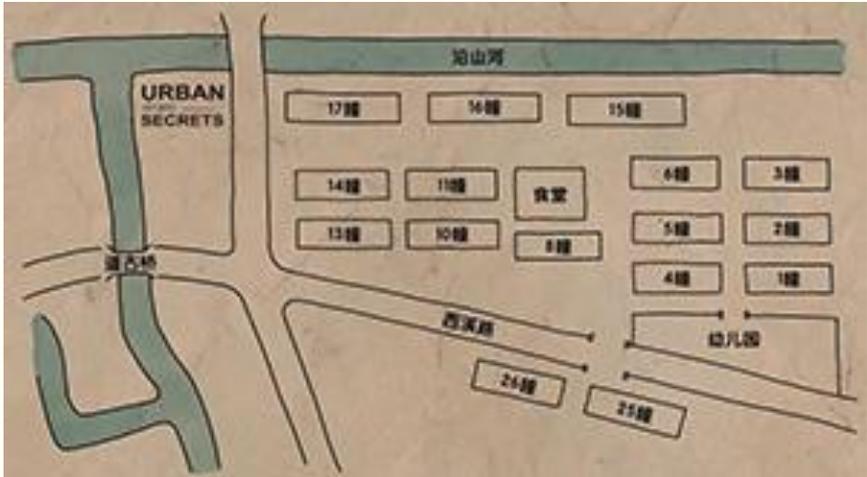
于是浙师院的先生们，自然而然地把新家叫作“道古桥宿舍”。



西溪路与杭大路交叉口西端，就是原本道古桥的位置，南北向，桥不大，名气大。©城市秘密

道古桥宿舍最早由 10 栋二层小楼组成（包括原门牌 1-6 幢、10-11 幢教师宿舍以及马路对面的 24-25 幢工友宿舍）。后又陆续建了 4 栋三层小楼（原门牌 13-14 幢、16-17 幢）。随后又建了 1 栋三层小

楼（原门牌 15 幢）和 1 栋二层小楼（原门牌 8 幢）。有趣的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当时建舍始终跳过了 7 幢和 9 幢两个门牌序号。



旧时杭大新村平面图。据杭州大学校史：杭大新村房屋自 1955 年开始建设，1957 年先建成 8 幢职工宿舍，共计面积 5597 平方米。其中 4-6 幢是二层楼，每幢可住 8 户人家，共可居住 24 户，每户三室一厅（83.8 平方米）。1-3 幢也是二层楼，每幢分 3 个单元，共可居住 36 户，每户二室一厅（62.4 平方米）。接着又于 1958 年和 1959 年分别建成 7661 和 2067 平方米职工宿舍，三年总计 15325 平方米。©城市秘密

其中建筑风貌上最有代表性、面积也最大的是第 4、5、6、10、11 五栋仿俄罗斯风格“小洋房”，共 40 户。据说，当年专门请苏联专家设计建造。造楼所用的钢材，是以同重量大米从苏联换来的。

砖木结构，坡顶黑瓦，小格方窗，外墙用青砖细切，水泥勾缝。既有苏式房屋的陡坡格窗，也有中式民居的青砖黛瓦。楼内厚实红漆地板、宽阔木楼梯、抽水马桶、大理石浴缸一应俱全。

小楼别致实用，前后有院落。每家庭院前都栽有双色桃树。花开粉白相间。文人入住，带来诗情画意。无论从哪扇敞亮窗口望出，或

院外林荫小道望入，家家绽红泻绿，疏影留香，与小楼交融，一派生机盎然。



5幢的“教授楼” ©城市秘密

这些堪比如今联排别墅的小楼，入住之初就云集了王琏、姜亮夫、夏承焘、陈桥驿、王承绪等文理科名师。后来被附近居民习惯性喊为“教授楼”、“专家楼”。其实，这一称呼并不准确。小楼的房间分配更多根据家庭情况，而非职称。像蒋礼鸿和盛静霞都是杭大讲师，也被分配到了5幢4号的小楼中。

如此，道古桥畔自然形成了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聚集的生态群落。如同浙大求是村、农大华家池，各自形成一个工科、农科名师聚集的生态群落。



1957年，第一批进入4幢、5幢的原住民们。©城市秘密

1958年时代膨胀，新生的杭州大学也迅速扩大。省里决定新的杭州大学和搬到天目山路的浙江师范学院合并，全称杭州大学。而后随着河东宿舍（即现在的文三新村）的形成，道古桥宿舍也逐渐被大家称为河南宿舍。

1982年，杭州市地名委员会正式为其定名“杭大新村”。至此，杭大新村已由上世纪50年代的10幢小楼，拓展建成包含西溪路南北两侧的30余幢住宅楼，东连沿山河村，西靠杭大路，南至西溪路，北接天目山路，占地60亩。



现杭大新村平面图。现门牌 5-7、11-13、23-24 幢的二层楼房，原为 1-3、4-6、10-11 幢。现门牌 14、25、29-30、31 幢的三层楼房，原门牌为 15、16、13-14、17 幢。以上信息为蒋遂先生整理，杭大子女孔丽娜、蒋绍心、管敏政、李元，原杭大教务处陈月珍老师等提供。  
©城市秘密



现杭大新村俯视图。©城市秘密

## 二、杭大新村的样子

1957年上半年，周家还住在六和塔西侧的之江山上。周淮水在浙江师范学院教育系任教，儿子周黔生正在杭十中读高二。某一天，母亲叫儿子陪她一起进城去看新房子——浙师院位于松木场的新校舍与家属宿舍刚建好。

他们带着学院分配的钥匙，来到宝石山北的道古桥畔，看到了多幢排列整齐的新房子。找到了3幢4号，是在二楼。走进一看，哇！两室一厅，房间通透明亮，设施也齐全，楼下还有小花园。客厅连着阳台，初夏的阳光晒在地板上，熠熠发光。母子俩满心欢喜。

当年暑假，之江秦望山上的各家各户，陆续搬进了后来被称为“杭大新村”的新居。

家家户户前后都有小院子，用竹篱笆将彼此隔开，几乎每家都栽有一棵碗口粗的桃花树。



6幢3号住的是教育系陈学恂教授一家。如今老楼院前芳草萋萋。

图自©城秘特邀摄影师 肖奕叁

在女儿陈敏记忆里，爸爸特别喜欢花木，先后买了夹竹桃、桂花、蜡梅等为院子添彩。阳台前也种了许多月季，粉红色的“伊丽莎白”、海外血统的“香水月季”，还种红色、粉色的茶花。每年四、五月，书房窗边爬满茂密的蔷薇花。坐在靠窗的书桌上看书，可闻到随风飘来的阵阵花香。



“城秘”小伙伴带着梯子爬上了4幢夏承焘先生故居的墙头，朝里看，庭院深深，杂草丛生，如热带雨林。 ©城市秘密

陈家花园与隔壁6幢4号的严德一教授家的分界线上，种着一棵柳树。这棵树是陈敏哥哥10岁时种下的，到80年代中期已经长成十几米高的大树了。

杭大历史系胡玉堂教授一家是10幢的原住民。女儿胡大苏记得，家前庭院春夏秋冬，花事不断，甚



严德一侄女丁薇（右）与小伙伴们在6幢4号阳台上 图片提供：蒋遂

是醉人。有母亲喜爱的凌霄、君子兰，父亲喜爱的菊花、葡萄藤架，还有胡大苏从宝石山上移植的野白芨。最难忘是那株疏影横斜、黄红双色重瓣的蜡梅树，年年带雪催春，率领群花迎春，经常引得散步路过的老师，进来讨要几枝。

“柳下笙歌庭院，花间姊妹秋千”，说的正是胡家庭院。

放学霞光下，兄妹们围聚在那棵与母亲一起扦插成活的柳树下，在小石桌上画画、写作业，或从里屋浴室水笼头上，接一根长长的橡胶管，拖着管子满院跑，争着抢着边给花浇水，边嬉戏打闹……



胡玉堂夫妇在 10 幢 3 号寓所前 图片提供：蒋遂

如表现好、作业认真，父亲会捧着英文版的书，在葡萄架下给孩子们讲世界史类的故事，有《黑剑》、《基督山伯爵》；母亲则拿着泛黄竖版文言文的聊斋，讲《婴宁》、《狐女》，唱《苏武牧羊》。

哦，父亲还会唱绍兴大板，高亢豪气。这些故事和歌声，让孩子们天天安然入梦，梦中上天入地，神游宇宙……他们的眼界自然是和别处的小孩不一样了。

杭大新村最美丽的庭院，要数胡家隔壁的生物系王曰玮教授家。

庭院里种着各种罕见的奇花异草，几次诱惑胡大苏越矩偷花。胡家种的重瓣蜡梅，就是从王伯伯家移植来的。胡大苏感叹：“以后行走半生，竟再未见过如此雅贵的蜡梅品种。”



2008年，杭大新村建筑群被列入杭州市历史建筑，碑文就在曾经的10、11幢（现在的23、24幢）前。图自©城秘特邀摄影师 肖奕叁

### 三、杭大新村的周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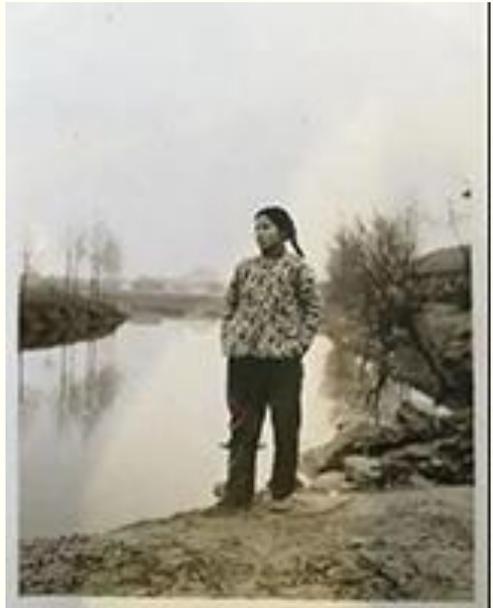
陈敏记忆中的道古桥是一座小小的石桥。桥两边是稻田，随着季节会呈现出不同的景色。春天田野里种植着水稻，望过去全是满眼的绿色，葱郁喜人。而随着秋天的降临，稻田的作物成熟了，一片金黄。稻田的边上，间隔种着四季豆、茄子等蔬菜。

道古桥边，有一家木头房子的小店铺，里面用大的方口玻璃瓶装着重水果糖、梅片、橄榄等零食，是陈敏孩提时代记忆最深的食品店。

店主是一个背驼得很厉害的老头。每次陈敏去店里给爸爸买香烟，他都会笑眯眯地说：“小妹妹，你要买什么？”

道古桥虽然不起眼，但风景很美。桥下流淌着不知名的小河，河水很清，在道古桥北不到 20 米的地方与沿山河交汇，河边生长着一排排高大笔直的水杉和垂柳。

沿山河源自西溪，是西溪河的中段，直通松木场的大水系。当年的松木场河道交叉，碧水连天，来自安徽、浙西的商船经过芦苇、水草茂盛的西溪河，汇聚松木场。有卖蔬菜、水果、水产、海产、山货、特产的，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商贸区。夜晚，河面上波光粼粼，船上油灯闪闪，街上灯火阑珊，颇有“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韵味。



杭大子女周平月在沿山河边 图片提供：蒋遂

到了上世纪 60 年代，沿山河功能已和湿地一样，靠下雨水才勉强溢满。干旱时，水会退下，脱露几坨大石块。低洼处，无处可游的小鱼和蝌蚪随手可抓。河上，横空架一根乌黑粗大的新村排污下水管，为桥。

这“桥”正好与 10 幢、11 幢后门呈直线，平日里小伢儿们上学或去杭大，是一条最近的路。但需走比独木桥更惊悚的黑圆管，通常大家宁愿冒险从河面石块上猛跨大步，跳跃着过河。



从马登桥一侧东望，远处河上管道的位置，就是当年原住民上班上学惯常抄的小路。径直穿出，正对着当年的杭大校门。©城市秘密

8岁那年，胡大苏得了一场大病，长期发烧，持续数月，天天要打针。父亲胡玉堂每天背着她，去杭大校内的医务室打针。为绕近路，常冒险走沿山河的“独木桥”。

“父亲小心翼翼地背着我，屏气凝神，一步挨一步，在圆滑的黑水管上走着。水管两旁盈满河水，需要全力平衡才不会掉下去。父亲紧张地走过水管，又得喘着粗气，走上河边水稻田埂。那泥泞的窄埂，表面上长满绿草，却往往会一脚踩空。父亲需全神贯注地驮着我，走到杭大校门时，才能停下喘息一口气。再耸我上肩，继续走……今沿山河还在，可父亲宽大的后背，已和老杭大一起永远消失。”



父亲的后背与黑圆管桥，后改为竹桥。©城市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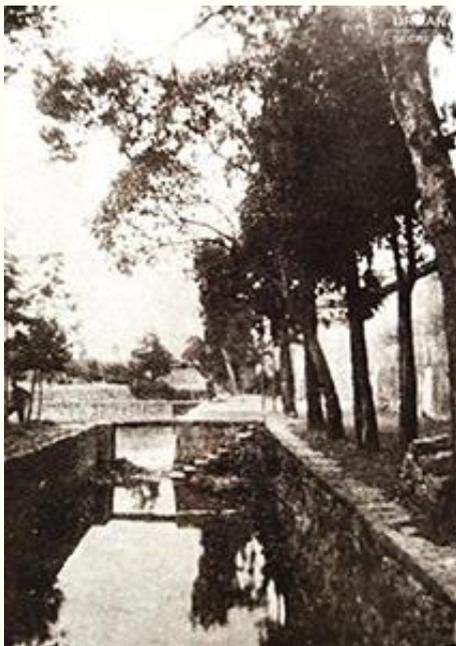
3幢宿舍紧靠沿山河，周黔生在屋内随时可以看到河边风景。沿山河宽约十多米，农民撑着竹篙悠然而过。偶尔也可见水中鱼儿，但几次钓鱼都空手而归。河边有一片小树林。暑假里，周黔生常常拿一张小凳子坐在小树林里看书，安静又惬意。

1958年，周黔生入读杭大地理系。虽然校园离家很近，还是住校。有一个学期，他住的学生宿舍靠近马路，与自家隔河相望。家中有好菜，妹妹就在靠河方向的窗上竖起竹竿，系上红领巾。他看见了，就回家吃晚饭。



现在的7幢（原3幢）、8幢依然靠着沿山河。©城市秘密

陈敏的小学年华在保俶路小学度过。当时到学校去有两条路可选：一条走杭大宿舍南门，前面就是砂石铺就的西溪路。沿路向东走约500米，穿过十字路口就是松木场菜场。再穿过松木场流水桥往东走，沿着铺石板的小路走到尽头，就是学校的正门了。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松木场流水桥

学校正门的小路边上，一面泥墙上用红笔写着“一天等于20年”的大字。陈敏一直纳闷：怎么算数也得不出这个答案呀。问了大人才知道，大跃进年代，大家都与时间赛跑，希望走在时间前面。

上世纪70年代，物资十分匮乏。有一年冬天，陈敏凌晨3点多就起床了，和小伙伴孔丽娜约好一起去菜市场买青菜。当她们冒着雨打着哆嗦来到菜场时，已经有不少的菜篮子在排队“占位置”了。不过孩子们依然窃喜。她们定能买到青菜，回家可以听妈妈的表扬了。



松木场老街 图自©城秘特约顾问 章胜贤

另一条去保俶塔小学的上学路，则是从道古桥宿舍往东走。反正没有围墙，沿着沿山河村（省级机关的家属宿舍），过一条小马路（现在的保俶路），就是一大片田地。穿过田地，尽头，就是保俶塔小学的后门。

陈敏与小伙伴们更喜欢这条路，踏在田埂上，心情格外轻松、美好。每年三、四月份，春天的田野上，到处都是色彩明艳、花香浓郁的油菜花。远远望去，成了一片金黄色的小海洋。孩子们背着书包，跳跃着、奔跑着、互相追逐着、嬉戏着，尽情放飞着童年。

再接下去就是蚕豆花开的时节，小伢儿们轻轻摘下几片蚕豆叶，放在嘴里，努力吹起一个大泡泡。再接下去，随着蚕豆的慢慢成熟，大家会采下新鲜的蚕豆，放入嘴里，慢慢品尝鲜嫩清香的味道。这种味道一直留在陈敏的记忆中。奇怪的是，长大后吃蚕豆，却再没有小时候的味道了。



杭大新村门口的烧饼油条店，开了有 18 年了，有人吃过吗？ ©城市秘密

#### 四、杭大新村里的先生们

宿舍住的大多数教师，在儿时的蒋遂眼里，与父母差不多，也没什么特别。

对面四幢住着一位高高个子的先生，父母让蒋遂叫太老师。太老师夏承焘是蒋礼鸿之江大学国文系老师。蒋遂记得爸爸曾笑着摇头，说1934年被嘉兴秀州中学保送到之江大学时，夏先生并不看好他，说了一句不咸不淡的话：“文章书法俱佳。”以后被夏先生赏识，是蒋礼鸿这位贫家子弟的刻苦用功和才华。



夏承焘先生与妻子 图片提供：蒋遂

1937年底，日寇攻陷杭州，蒋礼鸿随之江大学撤退到安徽屯溪。不久屯溪被中国后撤军队占满，之江大学不得已宣布解散。蒋礼鸿又辗转到温州投奔夏承焘。夏先生一面为他解决起居，一面把他介绍到温师院教书，开启了他从教57年的经历。

等到他毕业时，夏先生已是对他刮目相看。翻翻夏先生的《天风阁学词日记》，赫然有“云从、化莲翘楚也”。化莲，蒋介石先生私

人医生熊丸的妹妹，后远走欧洲。云从，蒋礼鸿的字，属龙取自“云从龙”。夏先生被尊为“一代词宗”，奖掖后进不遗余力。

1947年，蒋礼鸿被中央大学解聘，妻子盛静霞随之一起回到之江大学。盛静霞早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得吴梅、卢前、唐圭璋、汪辟疆、汪东、钱子厚等先生欣赏，喜好诗词。

蒋礼鸿将妻子诗词手录一册，取名《碧筱词》呈给夏先生。夏先生阅后在日记中记载：“早阅盛静霞词卷，为评泊一过。最爱其《鹧鸪天》云：‘近来处处成酣睡，何必佳人锦瑟旁？’《蝶恋花》云：‘的的心膏煎复煎，信他一刹能明汝。’望其能躬身实践，乃是真词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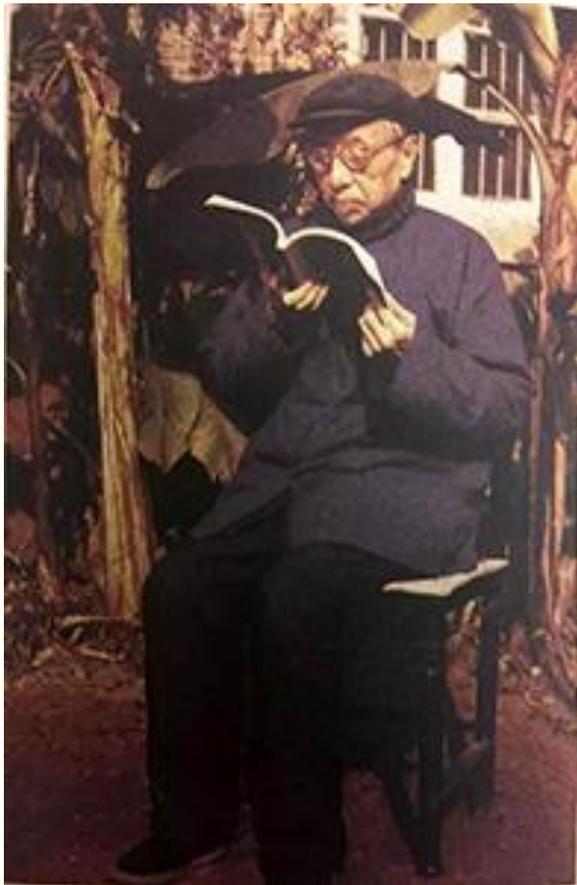
1960年代，夏先生和盛静霞先生合著了一本《唐宋词选》，被人称颂是“真知灼见”。



盛静霞与女儿 图片提供：蒋遂

还有夏先生隔壁的姜亮夫先生。

在蒋遂记忆里，姜先生不修边幅，有些邋里邋遢的。经常是头上捂着帽子，脸上带着口罩，一圈又一圈厚厚的玻璃眼镜里却透出智慧的光芒。姜先生大多数时间从后门进出。他家三室一厅，夫人陶秋英先生住主卧，女儿姜昆武先生一家三口住书房，独独把他挤到八平方米的朝北小屋。小屋离后门近，他自然常常开后门呗！



姜亮夫先生在杭大新村寓所前所照

小房一桌一床以外，皆是书，说姜先生是书虫也不为怪。姜先生硬是在这故纸堆里，写出了煌煌 1400 万字的巨作。那可是一笔一划，

带着深度近视眼镜在纸上钩划出来的，哪是用电脑拷贝粘贴这样稀松平常的？



姜亮夫先生寓所当年的四幢三号现状 图片提供：蒋遂

后面六幢还住着一位“苏联妈妈”。

“苏联妈妈”是一众小孩子对德梦铁先生的称谓。德先生是白种人，高高大大的，说不上特别漂亮。大约前苏联女人都有这一特点：做姑娘时婀娜多姿，变成妇人就横向发展。

德先生是前苏联拉脱维亚犹太人，二战时六位亲人被德国法西斯杀害，只身来到中国。她嫁给了著名化学家王琏先生，1949年后成为

第一批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德先生精通多国语言，在浙大、浙师院、杭大教授外语。



德梦铁先生，1954年加入中国籍，杭州大学俄语学科奠基人。

蒋遂曾看到德先生早年学生写的一篇记实性小说，对德先生刻画得入木三分。德先生显然没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温良恭俭让”的熏陶。上课时，对没听懂又理解不了的学生大吼大叫，恨不得生吞活剥。下课了，学生眼泪汪汪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十八层地狱。她却没事人似的一把抱着，吹着热气在耳边说：“孩子，你咋滴啦？”休息日，她把学生请到家，做一桌丰盛的异国大餐，跳起奔放的吉卜赛舞蹈。

德先生对中国情有独钟、对故国又念念不忘。她把中国的国粹古典诗词翻译成俄语，架起了一条友谊的纽带。



德梦铁先生与学生们在之江校园里的留影 图片提供：王文中

说起德先生，不得不说她的夫婿王璉先生。王先生是1909年第一批庚子赔款赴美留学生，中国化学史和分析化学研究的开拓者。

可是，这样一位在杭大新村，乃至全国闻名的泰斗级学者，却在1966年12月份惨遭劫难！

那天德先生与保姆因事出门，留王先生独自在家。一位凶狠的劫匪闯进来，残忍地杀害了王先生，洗劫一空后又迅速逃离现场。半年后，劫匪出售赃物（一枚欧米迦手表）时，被公安机关抓获。劫匪竟然是浙江农业大学的学生。

王先生的不幸离世，给无忧无虑的杭大新村留下了巨大的、深深的阴影。



老底子居民区没有围墙分隔，入户抢劫更是闻所未闻。

图自©城秋特邀摄影师 肖奕叁

1950年代，中文系徐朔方先生住在不太优越的老17幢宿舍。徐先生与宋珊葆阿姨结婚那晚，爸爸妈妈带蒋遂去参加婚礼。满屋子挤满人，水泄不通，只有蒋遂像鱼一样在人群中钻来钻去。

一位年轻教师拽住他小胳膊问：“小家伙，哪位是新娘新郎？”蒋遂顺手指着宋阿姨说“这位！”又指着一旁的徐叔叔说“那位！”全场大笑，众口赞曰：“不亏是语言教研室主任的儿子！”爸爸在一边也满意地笑了。

徐叔叔则拿出一匹白瓷小马送给蒋遂。一段时间，这匹小马成了他绘画的模特儿。直至摔断了一条，两条，三条腿，才光荣地完成了它的使命。

改革开放初期，日本横滨国立大学波多野太郎教授来杭大学术访问。早在1950年代末，波多与蒋礼鸿就通书信往来。时其著作《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刚刚问世，波多著文称赞是“研究中国戏曲小说的指路明灯”。

蒋遂还记得，老友来访，爸爸和徐叔叔都很兴奋，商议如何请波多撮一顿。也说不上是如何丰盛的家宴，蒋家烧了西湖醋鱼，徐家烧

的是金银蹄。席间波多感叹曰：“你们真好，住着学校的房子，我现在还没买得起房子！”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当年的5幢，蒋礼鸿、王承绪、王驾吾、陈桥驿、董聿茂等教授在此住过。©城市秘密

化学系的周洵钧教授更使蒋遂难以忘怀。周先生1950年获美国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化学系硕士学位后，回国任教。在蒋遂眼里，他简直就是杭州大学的钱学森。但周先生儒雅温和，不以小字辈视蒋遂。

周先生得知蒋遂在杭州砂轮厂工作时，便和他讨论磨料磨具的化学成份。有一次杭大九三学社搞活动，周先生以家属身份参加其中。席间夫人唐慷说：“他担心吃不上饭！”大家惊愕，随之哄堂大笑，更为周先生公私分明的态度所折服。

粗粗算来，五栋二层楼房，便住过四十户人家。更有历史原因造成一户挤过几家人家、一家搬过几处住处。杭大新村的文化名人、高级知识分子，远非扳扳手指数得过来的。



杭大子女在 15 幢前合影 图片提供：蒋遂

## 五、永远的伊甸园

杭大新村童年“阴阳怪气”的趣事很多。

“阴阳”说的是宿舍场地。这里原来是片墓地——有蒋祖怡先生小园里一块“富望公墓”石碑为证。蒋遂还记得，小时候懵懵懂懂看人起墓，从棺木里扒出来的尸体和衣衫尚未烂光，长袍马褂拖着长长的辫子。有人迫不及待光着膀子把手伸进嘴里乱挖，据说是掏什么宝物。反正小毛孩也拎不清，看着玩！



西溪路上现存的八十八师阵亡将士纪念碑坊 ©城市秘密

那么“怪气”呢？午睡时间，附近农民挑着担桶不声不响来到新村，打开化粪池盖子倒腾积肥，居民怨声四起。后来易树清部长出来大声批评他们，才平息风波。而今这一带农民早已致富，今非昔比。

胡大苏的发小多在 10 幢、11 幢。十几个年龄相仿的孩子，从四、五岁开始，天天相处，感情不亚于亲兄弟姐妹。很快，这里成为了杭大子女们一生难忘的童年伊甸园。



如今越过围墙和栏杆，尚能瞥见已然废弃的杭大幼儿园一角。©  
城市秘密

小伢儿们会不约而同，聚至小楼和西溪路间茂密的小树林里，爬树、过家家、聊天。夏日晚上，大家则卷着芦席，到隔壁 8 幢（已拆除）前大草坪乘凉、讲故事、打虎跳、翻跟斗。胡家有五兄妹，父母又好客，孩子们嬉戏打闹，经常从胡家前门冲进、后门窜出……

11 幢还住着林淡秋一家。林家周末常有小晚会。林妈妈唱“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歌声，林家隔壁徐瑞云阿姨弹奏那架漂亮钢琴的琴声，交织混和，优美动人，至今绕耳。



林淡秋夫妇在 11 幢 1 号寓所前 图片提供：蒋遂

陈敏的小伙伴则集中在 5 幢、6 幢附近。每天早晨，孩子们往往从最远的一个同学家开始，一个个挨家叫，凑齐人数后结伴上学。路上三三两两讲些前一天发生的趣事，比如“谁家的小猫怎么顽皮”、“谁家的隔壁邻居干了什么错事被他妈打了”等等小道消息。就这样，道古桥宿舍的家长里短，在小伙伴嘴里谈论起来别有滋味。

小学二、三年级时，孩子们会经常去 5 幢的俞小薇家，兴奋点集中于她家院子里的葡萄。五、六月份，当葡萄架上刚长出一串串青涩的小颗粒时，就成为大家经常记挂的话题。孩子们经常编造各种理由去采几颗放入嘴中品尝，结果一般都是酸得皱起眉头。尽管如此，小薇家的葡萄往往还没等成熟，就早已进了这些馋嘴猫的肚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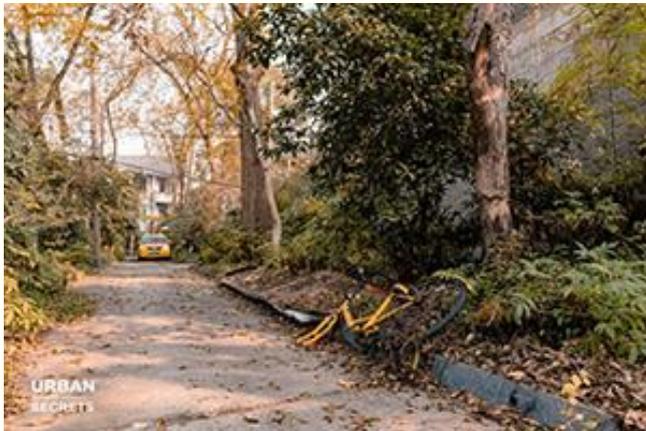
那时候的文艺生活十分贫乏，最大的奢侈就是隔半个月看上一场在杭大操场上放映的露天电影。大伙儿会在放电影的前一个星期，就兴奋地打听要放什么电影，研究电影中演员的名字。《英雄儿女》、《地道战》、《小兵张嘎》、《冰山上的来客》不知看了几遍，仍百看不厌。

电影要到晚上7点左右才开始放映。小伙伴会在下午四、五点钟就兴奋地手提肩扛着沉重的方凳、条凳，早早地去占个好位置。一次看了《尼罗河上的惨案》，印象深刻，接连几天，大家都在上学路上一直讨论着剧情中的人物，为真正的凶手是谁争论得脸红耳赤。

十二、三岁时，小伙伴们刮起了学自行车的风。陈敏曾在一个周六的下午，努力把家中的一辆黑色的“永久”牌24寸自行车擦得闪闪发亮。以此作为交换条件，希望哥哥一周教她练习两、三次骑车。

哥哥看到焕然一新的车子，欣喜地问她用了什么技术。没想到陈敏得意地告诉他用了凡士林机油后，被哥哥批了。凡士林是机油，用它擦自行车，骑车人裤腿会不时蹭到油，洗都洗不掉。后来哥哥还老拿这事开陈敏玩笑。

在哥哥的教导下，陈敏很快学会了骑车。随着车技不断提高，陈敏的自行车后座上还会坐上好友。淑英啊、小青啊，沿着老杭大的操场绕圈子，或在道古桥宿舍的小区里，边骑车边留下一路欢声笑语。



如今破败的杭大新村里，留存着岁月的痕迹。图自©城秘特邀摄影师 肖奕叁

那个纯真的年代，孩子有许多时间玩耍。离家不远的黄龙洞和保俶塔，就是陈敏与小伙伴经常去的“景点”之一。

那时的黄龙洞是一处极幽静的地方：一条林荫道从曙光路一直通到黄龙洞的山门。进山门，有石板小径贴着小池塘，穿过浓密的树林蜿蜒而上。再进一道门，眼前豁然开朗，在你面前呈现的是一座精致的小园林。园中有山有水，水边亦有亭有廊。在水榭尽处，有泉水从山崖流出，崖底有几块石墩。进到这里便可以听泉戏水。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黄龙洞游人不多，这里实在是一处寻幽探胜的好地方。

大家也会沿着黄龙洞边上的小径，一口气登上宝石山顶，俯瞰西湖全景。在葱茏的树木和鸟语花香中深呼吸，体验视觉盛宴。在山顶上看白堤和华侨饭店，又转身从众多的楼房中寻找道古桥宿舍。玩疯了，玩累了，就地躺倒在山顶草地上，让暖暖的太阳照在身上。

## 六、一生的教养

大约杭大新村的专家、学者对子女成长抱有兩種态度：或严格教育、悉心培养，或放任自由、任其发挥。

任铭善先生即属前者。公子任平品学皆优，在父亲督促下，童年遍览四大名著，阅尽家藏碑贴，为以后走上古典文献研究、书法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78年，任平报考杭大中文系。其时任平和母亲马素娥老师住在杭大体育场路宿舍，中文系徐朔方先生住一街之隔的杭高宿舍。某天徐先生穿过马路到任平家造访，送给任平一份惊喜——他被杭大中文系录取了。

盛静霞先生对蒋遂则是放马南山，只对德育教育抓得极紧。

蒋遂记得，60年代初，饥荒弥漫华夏大地。虽然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国家有特殊照顾，却还是常常饥肠辘辘。实在饿得慌，蒋遂偷了家里的馒头票，放在鞋底，鞋是姐姐退下来给蒋遂的，略显大，走着走着一不小心票子掉出来了。



蒋礼鸿先生一家在杭大新村寓所前合影 图片提供：蒋遂

妈妈见了很生气，拿着补袜子的“鞋底板”，拍打蒋遂手心。一边打，一边含泪问：“以后还偷东西吗？”血丝顺着手心稚嫩的纹路渗出来。从那以后，蒋遂认准了做人的基本准则是诚实。

物理系教授王锦光先生教孩子也是杭大新村里的独一份。儿子王岳洛说他父亲虽然脑子里知识不少，但是，对子女的教育却惜字如金，从来不解答孩子们提出的任何具体问题，总是一句话：“看一下参考书不行吗？”由于了解父亲的脾气，孩子们就不找他提问了，而是自己找书看解决问题。他支持孩子沿街卖瓜、送去少体校打乒乓球。为了试种油菜，大冷天孩子们跳进上宁河挖河泥给油菜堆肥，到春天喜获丰收，做父亲的喜笑颜开、大为赞赏。由于有如此特别的教育方法，他们家的孩子个个成绩优秀、表现良好、体育扎实，每年都是三好学生。

1969年3月9日清晨，钱塘江边白塔岭的铁道旁，停着杭州市从此铁路道口发往北大荒的知青火车。早春二月，寒风凛冽，云层低

徊，一千多名杭州知青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杭大附中的知青有近一百二十位，坐满整整一列车厢。有四、五十位杭大子女，不少还是兄弟姐妹。如盛逊、蒋遂姐弟，王岳洛、王维洛兄弟，娄彦飞、娄健兄弟，王心田、金曼玲舅甥，张辉与表姐李琳。送行的人员达到三四千人，刹那间把整列火车包围得水泄不通。交谈声、道别声一浪高过一浪，甚至传来阵阵悲伤的啼哭声。

在拥挤的人群中，王教授又开始了自己的特殊家教。他从穿了十几年，颜色已经泛黄的中山装衣兜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本折叠平整的书给两个儿子看。那是一本刊载他写作的《中国石油史话》的科学画报。他对着兄弟俩动情地说：“今天你们就要走上新的道路，可能是一辈子种地耕耘，也要开辟一条新路。只要不断探索，总会有新发现。过去讲东北有三宝，现在又多了石油一宝。你们在农村种地之余，也可以关心一下石油。总之要敢于走别人不敢走的路，做自己能够办的事。”

蒋遂童年好友任燕平曾说过：“杭大子女情商不高，智商高”。蒋遂颇认同：“我们这些人往往不会钻营拍马，却要守着一份真诚，甚至宁愿牺牲情商。”他们从父辈身上看到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形成了独一份的生活意志和家园情怀。

## 后记：叶落芳径

杭大新村自从2002年计划改造，大部分居民已搬离此地，目前基本人去楼空。可即便离开了，杭大子女也总要回去瞧一瞧。

渐行渐远的岁月，总会不经意地留下些许痕迹。那斑驳的矮墙、随风摇曳的门窗、一闪而过的小松鼠、萋萋芳草、落叶满径……

走在一幢幢老房子间，看到墙面被爬山虎覆盖，巨大的芭蕉遮天蔽日；昔日院子里的几株桂花树在风中摇曳着，庭院里无人修剪的蜡梅花树枝伸出围墙；看到二层楼的屋顶瓦楞上布满青苔，青砖外墙上的砺灰随着年代的流逝而跌落……你会很感慨这里昔日的荣光，落花流水春去也。

“一抬头，仿佛看见老先生吴长春手持工具奔向他钻研一辈子的植物领地；仿佛听到陶秋英先生看着扫马路的孩子说‘好同志’；仿佛看见任铭善先生家谈笑皆鸿儒的场景；仿佛听见吕荣山先生高昂的声音‘好啊。’”

只是恍惚一声轻轻的咳嗽，镜头就会定格到先生们挑灯疾书、漏夜著述的书斋里，那个情牵一世的杭大新村。



老杭大数学系 97 岁的姜志渊教授现今还住在五幢 ©城市秘密

（原载“城市秘密”  
2020 年 5 月 28 日）

[返回目录](#)



## 一、猫的世界

杭大人一直认为，自己家的老教授，从层次、成就、数量、影响看，并不亚于当年的西南联大。

相比姜亮夫、夏承焘、蒋礼鸿，现在的年轻人自然更熟悉易烜千玺、李现、王一博。但在当时，他们可都是国宝级的人物。

彼时的杭大新村，于杭大学子来说，这里是他们梦中朝拜的圣地。“单位智力产值”奇高，可谓江南的“文眼”。常年住在里面的孩子，一定像小燕子那样，在大人玳瑁圆框支撑的厚厚镜片里，叽叽啾啾，飞来飞去。五月到了，院子里开满蔷薇，一朵一朵，仿佛等待着“猛虎”细嗅。

此时隔壁传来钢琴声，“一条大河波浪宽”之后，就是贝多芬和巴赫了。更有“苏联妈妈”或留过洋的教授，悄悄地煮起了咖啡。或者在厨房里忙碌的父亲，应母亲的突然邀请，解下围裙，套上西装，在小小的客厅里跳上一支华尔兹……当然，这是不可能的，那是非常时期的中国。

去“朝圣”那日，一位穿戴整洁的老者在阿姨的搀扶下，搭着轮椅，步履蹒跚。松下拜夫子，今年尔高寿。阿姨回答 95，数学系的。我问可不可以合个影，老人这回听见了，似乎有点警惕，嘴里嘟囔：“拍什么照片啊。”他问我是哪里的？我说杭大的。“杭大都没了呢……”老人说。最后那个“呢”字拖得长长的。



故人已远去，摄于去年 12 月份。图自©城秘特邀摄影师 肖奕叁

7 幢附近，梧桐树下有只猫，倏忽而过。不远处，又有一只，诡异地看着我。我突然想起夏衍研究专家陈坚收藏的一张夏公的照片。那灵异的眼神，和刚才那猫几乎一模一样。早年我在景云村学画，也见过类似的眼睛。在古埃及，猫是神圣的。在中世纪的欧洲，猫是魔鬼。而在古代中国，人们认为猫有九命。

我坚信，好的大学里都有猫的，而猫都是老先生变的。他们由猫成虎，爬上屋顶，雄据四方守夜。

现在的杭大新村住户不足五十户，大部分房子空置，成了松鼠鸟雀小猫小狗的乐园。

我在杭大路下了车，往东进入西溪路。步行两百米，见一铁栅栏。便把手机伸进去，随便摁了一张，发给曾是这里原住民的黄小裕。她说那是严复的侄子严群的。对，就是那个严复。

再往东，左侧有条路可进小区。到门口了，保安穿着不怎么平整的深色制服，坐在皮革油腻、露出点海绵的黑色椅子上，专注地看着手机。传达室对面，摆着小摊。有人卖袜子，10 元 4 双。有人询问菜刀和马桶刷的价格。





2019年12月底，城市秘密摄影师子夷去杭大新村拍照，在小区门口碰上了正好坐在黑皮椅上的保安，小区入口左边的小菜场很多大伯大妈正在买菜。©城市秘密

进得小区，渐渐安静。眼前出现一幢别致的青砖小楼。我似乎在哪见过，便又拍了照片请教小裕。她说这是蒋礼鸿的。而前面那幢是夏承焘和姜亮夫的。再往前面，则是陈学昭的。

蒋遂说，当时1幢住有陈企霞，2幢有刘操南、倪士毅，3幢有蒋炳贤，4幢有蒋祖怡、姜亮夫、夏承焘、胡士莹、钱南扬、陆维钊，5幢有蒋礼鸿、王承绪、王驾吾、陈桥驿、董聿茂，6幢有王璘、德梦铁、任铭善、陈学洵、周洵钧、严德一、焦梦晓，10幢有黎子耀、叶作舟、胡玉堂、沈炼之、王曰玮、白正国、陈烙痕，13幢有严群，15幢有韩常先。



1961年语言文学研究室师生在杭大新村合影

## 二、夫子吉祥

杭大新村原住民黄小裕记得，每到大年初一，身为学校党委书记的父亲黄逸宾，第一件事就是上门给各位夫子拜年。

他们一家当年住的是老8幢，也是二层青砖小楼。上世纪90年代拆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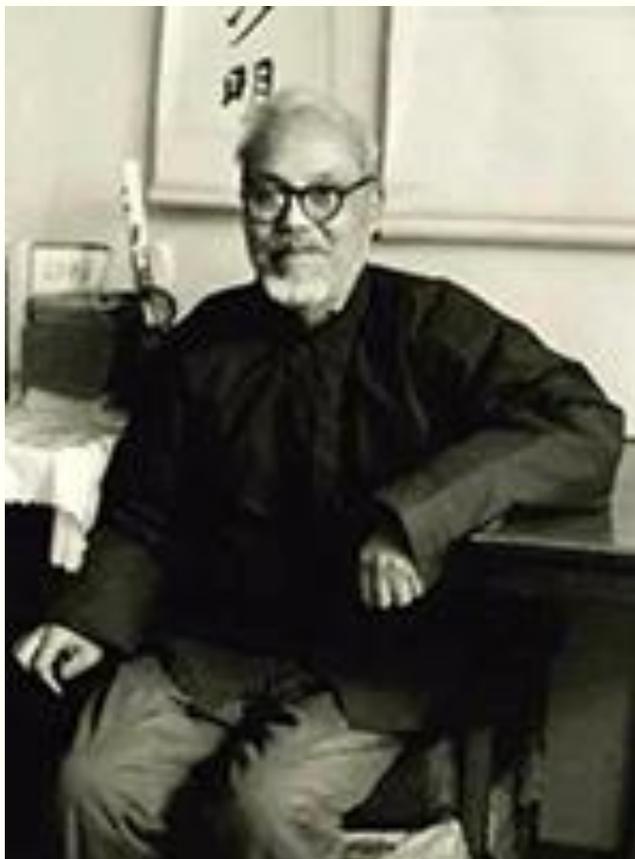
冬日里的杭大新村 ©城市秘密

黄家住楼上。楼下便是杭大古籍研究所。原先门口有棵桂树的，大孩小孩都往上爬。我来杭州不久，便听说了黄逸宾的名字。本人应该也见过，我好像还在美工团临过他酷似黄宾虹的画。

改革开放初始，人们都说浙江有两个“重灾区”：温州和杭州大学。特别是杭大，知识分子扎堆，思想活跃，学术体系亟待重建。

省委就把黄逸宾从绍兴地委副书记的岗位上调了来，因为他解放后一直担任宣传文化系统的领导。反右之初，黄逸宾为了保护别人，自己倒成为“右倾”被革了职。

### 1. 那些夫子之夏承焘



夏承焘（1900-1986），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

黄逸宾先去夏家。序齿不序爵，夏承焘年龄最大。从 1957 年迁入杭大新村，到 1975 年 7 月底搬离，夏承焘在这里住了 18 年。我一直认为，最具杭大中文系气质的老教授就是夏承焘：清醒、达观、学问好，有湖山气。



当年的 4 幢，现在的 11 栋，蒋祖怡、姜亮夫、夏承焘、胡士莹、钱南扬、陆维钊等教授都在此住过。©城市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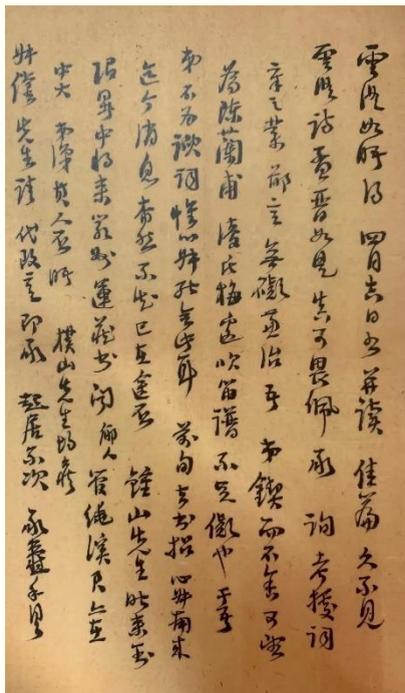


我们爬墙看夏承焘先生的故居时，一个小伙伴不小心掉了进去，

于是他从里面拍下了夏家庭院。说它如热带雨林，好像不为过…… ©  
城市秘密

夏承焘出生于温州谢池巷一个渐趋破落的小商人家庭。现在鹿城区登选坊 66 号辟有旧居。他小时候酷爱读书。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既无家学渊源，又无经济实力，更无社会背景，出人头地谈何容易。1918 年温州师范毕业后，他通过自学、交友与讲学，数十年如一日，潜心词学，继往开来，终成一代宗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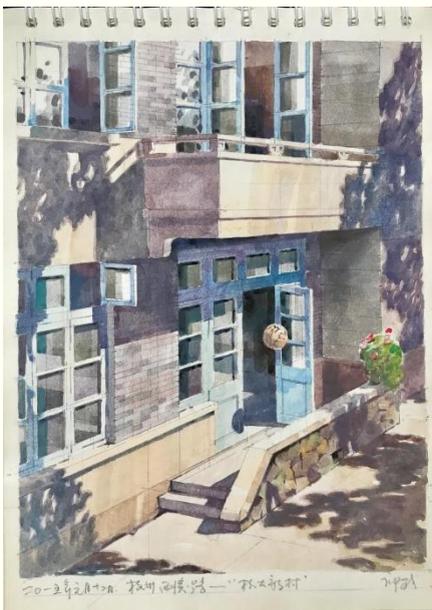
当年有名的“江熊坚”中的陆坚，是夏承焘 1961 年招收的研究生。我曾有幸由时任系主任的肖瑞峰引荐登门拜访。记得陆家的书房里挂着夏承焘手抄陈师道的芍药诗：“九十风光次第分，天怜独得殿残春。一枝剩欲簪双髻，未有人间第一人。”如今，已届耄耋之年的陆坚想念老师，偶尔还会用点温州方言唱上两句。他说自己的唱法，是当年夏先生教的。



夏承焘先生于 1943 年写给弟子蒋礼鸿的手札

夏承焘教人读书，总说既要多读书，又要戒贪多不精。读书要分主次，不能没有轻重，泛览无归。一个人一生能真正读懂读透一、两本书，也是很不容易的。与其十件事做到七分好，不如把一件事做到十分好。要把案头极少的、天天读的书读好，自然腹中的书也会多起来。读书的同时，也要勤动笔头。

他根据自己的体会，概括了读书笔记三字诀：小、少、了。所谓“小”，是指笔记的载体要小。早年夏承焘用大本子做读书笔记，结果不易整理和携带。后来改用小本子、小纸片，装在口袋里，随时随地记。常常是一事写一张，好比现在的卡片，便于整理和检索。所谓“少”，是指笔记的内容要精。读书笔记不是摘录，而是要通过自己的思考，经过咀嚼，才能落笔。如果不经过消化，一味抄书，抄得再多，也是徒劳。夏承焘所说的“少”，也指每条读书笔记字数少。随着阅读范围的扩大，条数自然也会多起来。孤立的一小条也许看不出学问，许多条汇集起来，就能成一个专题，甚至可扩充为一篇论文。所谓“了”，是指笔记的目的，要有助于解决研究工作的实际问题，也就是“读一书，写一文，了一事”。



当年教授们住的房子 图自©城秘网友邱戟 手绘

另一方面，他要求学生在学习时要多诵读、吟诵，要培养对吟诵的兴趣。通过吟诵，不断加深对作品和作者感情的领会。据陆坚回忆，夏承焘上课讲到具体作品时，一般多是要吟诵的。有时应学生要求，还要吟诵数遍。那时候，杭大语言文学研究室没有录音、录像设备，很可惜没有录下他的原声。

关于诵读方法，夏承焘没有给学生系统讲过。只是，他在吟诵诗词时，顺便说几句。其一，要用各人自己的家乡话朗诵。上世纪五十年代，夏承焘曾向国家教育部提议：“请各地老先生用各地腔调朗诵旧体诗词，把它录下音来，便可作为诗歌朗诵的百花齐放”。其二，诗眼、词眼之处，吟诵速度不宜过快。这些地方咬音吐字尤要清朗明晰，让听者有更为深刻一些的印象。其三，词过片处的吟诵，要把作者的感情充分表达出来。前人填词都特别注意这关键之处，因而吟诵时不能辜负作者的良苦用心。

布衣素袍，一生为师。夏承焘从教五十多年，一直坚守教学第一线。他认为，教书是平生最大快事。作为词学大家，他出版的二十余种、四百多万字的学术著作，都是在坚持教学的同时完成的。

夏承焘交游甚广。从故乡温州辗转西北，再到杭州，又西迁龙泉，复返杭州，最后到北京，结交了一大批朋友。

书法家任平的父亲任铭善既是夏承焘的学生，也是其挚友。任平上初中时，曾在夏家“搭伙”。“要说夏先生家里的饭菜，一是干净，二是简朴，以素食为主。印象中，吃到的荤菜主要是带鱼和鲫鱼。带鱼是红烧的，切成的每段大约只是一至两公分。太师母的简朴早有耳闻，这次也得到了印证。”温州当地家烧带鱼习惯清蒸。如果红烧，常常切得窄一些，猛火收了汤汁，配饭方能入味。按照他们当时的收入，估计亦非刻意简朴不可。夏承焘的章草很见学养。他还喜欢画点花鸟小品，意趣、构图俱佳。他的诗集里有一首《为心叔画荷》：“事事输君到画花，墨团羞对玉槎桮。不如听我说旧梦，湖月圆时船到家。”就是写给任铭善的。

夏承焘有过两次婚姻。二十六岁时与游傲昭结缡。1972年，游夫人去世后，迎娶吴无闻。吴无闻是夏承焘好友吴鹭山的妹妹，早年入

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曾受教于夏承焘。与夏结婚后，她悉心照料夏的生活起居，并为其整理著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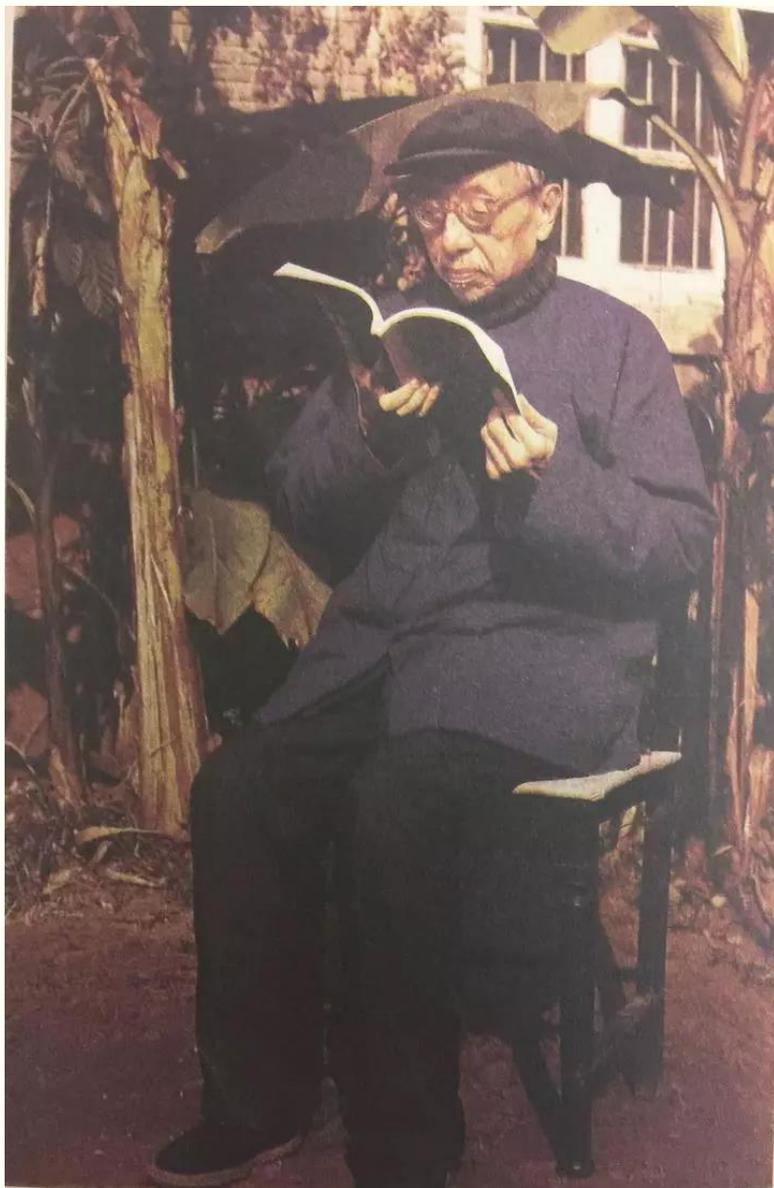


夏承焘所绘《西湖荷花图》

有一篇《“五四”以来词坛点将录》的文章，把夏承焘排列在“天魁星呼保义宋江”的位置：“‘五四’以来词坛，公推夏翁瞿禅为一代词宗。”作者认为在民国词坛中，夏承焘当坐第一把交椅。“……夏则精进不止，老而弥健。《天风阁词前后编》存词四百五十余阕，渊深海阔，霞蔚云蒸，具稼轩之雄奇无其粗率，白石之清峭无其生硬，碧山之沈郁无其衰飒，复间有秦郎之婉秀，东城、于湖之超逸，集诸家之美以臻大成。”

1984年12月5日，“夏承焘教授从事学术与教育工作六十五周年庆祝会”在北京召开，央视新闻联播刊发新闻。夏承焘去世后，有关部门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新华社刊发长篇消息。有人称其为“一代词宗”，有人称其为“文坛先进，词学宗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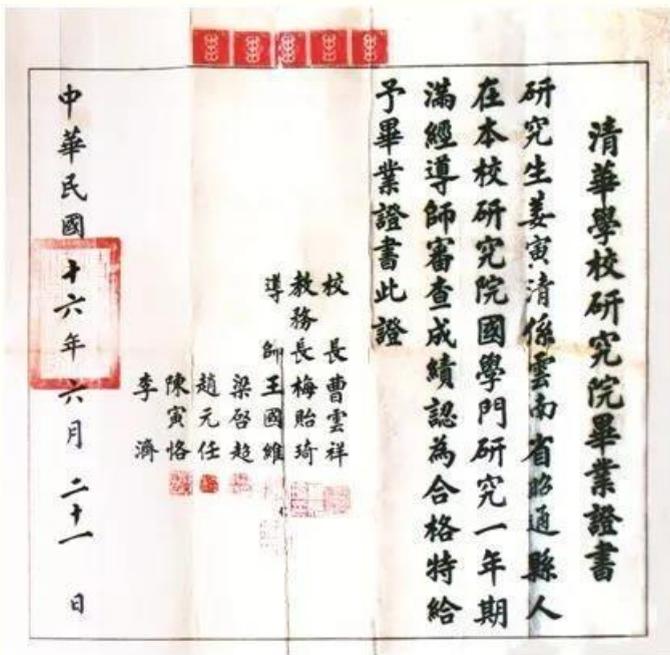
## 2. 那些夫子之姜亮夫



姜亮夫教授（1902-1995），杭州大学中文系主任。  
这张照片是在杭大新村寓所前拍的。

黄逸宾再去姜亮夫家。姜夫子资格最老。

现如今，人们谈天不说点“国学”，仿佛很丢分。似乎会说点论语，弹两下琴，便是国学大师了。要看真正的国学大师吗？喏，长这样的。



看看导师的名字，最牛毕业证，没有之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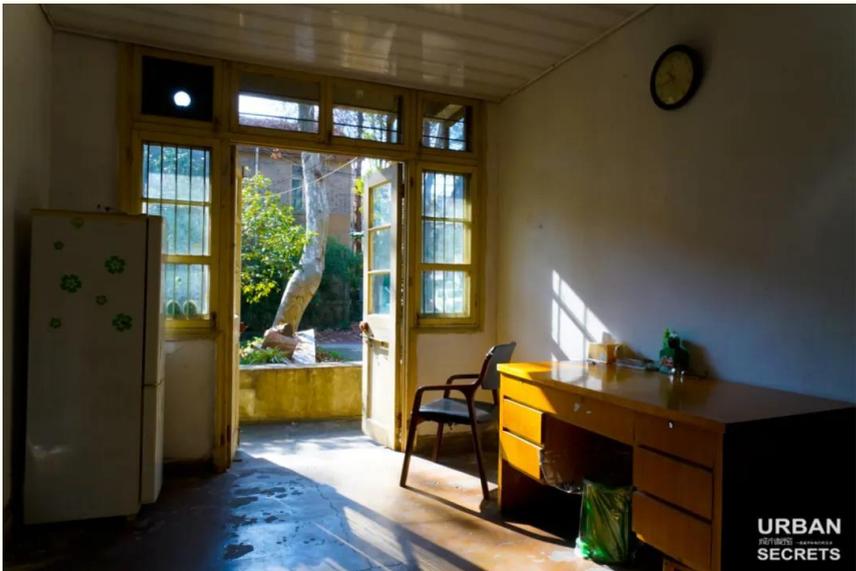
姜亮夫 25 岁考入清华国学院，成为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的弟子。梁启超曾以“海燕飞来窥画栋，薄荷相依满横塘”相赠，对他褒奖有加。1935，他赴法国进修，艰苦卓绝收集祖国文物资料。解放前，他还做过云南教育厅厅长。

姜亮夫 1953 年到杭州大学，至 1995 年 12 月 4 日去世，四十余年一直住在杭大新村四幢三号。在他诞辰 110 周年之际，家人将其毕生心血——生前收集的 1300 多件学术史料捐赠给浙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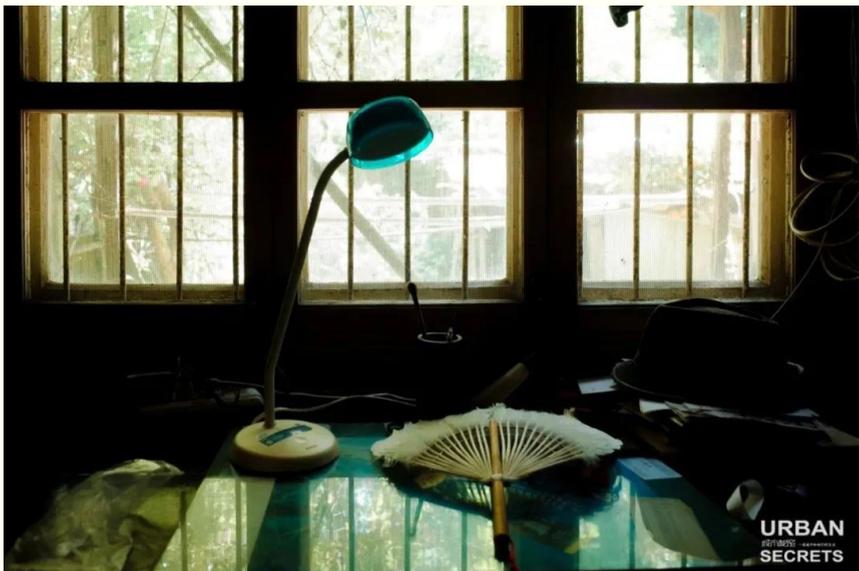


姜亮夫先生寓所当年的四幢三号现状

姜亮夫先后任杭大中文系主任、杭大古籍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姜昆武曾这样回忆父亲：“（杭大新村）十平方米的房间，三书架、一床。书占三分之一……一桌是个‘公共’场所：吃饭时将书移开，是餐桌；来客奉茶是‘茶座’；写稿时一尺见方，放纸笔搁手……在外面不论多大的烦恼，一上书桌，便见眉目舒展，渐渐‘入定’。而看书之后，最大的消遣是到附近的黄龙洞散步。”



因为其他小楼的房间进不去，只有蒋礼鸿先生家里因为成为新村管理处，可以让我们一窥究竟，遥想当年。©城市秘密



杭大新村数学系姜志渊教授的书桌，看这蒲扇和台灯，都是老底子的款式。©城市秘密

姜亮夫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希望读者不要把我看成是什么专家。我只是一个人文科学的爱好者，只是一个种瓜种豆的人，所生产的不过是瓜、豆而已。”

入室弟子王云路说：“他说做学问就像在水塘里打桩。打得越深，旁边的东西就越来越吸附到一起，学问的根基就越来越深。否则就像浮萍一样没有一个归属。”“姜先生这是告诉我们，学问重在打基础。而且从一本书、一个领域入手，这个研究方法是相当重要的。”

姜亮夫曾说自己的学术道路历经四变：考大学时被成都高师国文部录取，初步定了人文科学的大方向，为第一变。在林山腴、王先生、梁任公的建议下，不再作诗词，继续走“小学”的路子，钻研文字声韵学，这是第二变。章太炎希望他“从杜佑通典入手”多读史，“文章合为事而著，歌诗合为时而作”、“不要作空疏之学、哗众取宠之学”，这是第三变。因病遵医嘱到了巴黎，参观博物馆、图书馆，大量抄写珍贵图表、说明，摄制照片，又时时与欧洲学术界人士接触，吸收国外学者综合研究问题的经验，突破了数十年单一的研究方法，把“方法论”放在科研中第一位，此为第四变。



姜亮夫与学生崔富章的合影，崔先生也曾教过“大倾城”版本目录学，在孤山浙图古籍部直接拿出实物教我们怎么看古书，认知什么是蝴蝶装，什么是金镶玉

“我五十岁时，正是全国解放之秋。我虚心学习了许多新思想。新思想中尤其使我感到重要的是超逻辑的辩证唯物主义。”看事物不仅要从那平面的现象来看，同时得全体来分析，正、反、侧来看，还得从它那变动不居、前后因果、来龙去脉来看。于是思想考虑更周全、更细致，使一切事物都“莫得遁隐”。

随后，他例数自己的“缺点”：“记忆太差”、“目力”不逮、“脾气有些焦躁”、“多少有些狂妄之习”等，并进一步与后辈学人们分享了宝贵的经验：一是自己先认识一下个人的“天秉”，譬如体魄、性情、脾气、迟缓与急躁、记忆悟解能力、感情深浅、兴味所在；二是认识环境、家庭、社会、亲友、邻里乃至经济条件可能发展的道路；三是尤其要深知自己的缺点及对一切学科爱恶的情况，不要冲动。然后，将三者结合，作一个初步的定向。这是一种细磨工夫，不可焦躁，总得要在进大学后或有了相当基础，作一定的准备才能肯定。一旦肯定下来，就得坚持下去。

显然，这篇短文写得比较谦虚。那些“瓜啊豆的”，皇皇 1000 多万字，老先生在没有电脑的年代，超级近视几近失明的情况下完成，简直不可思议。老人曾在课堂上说：“我这一生结了两只瓜：一只是《楚辞通故》，另一只是办了楚辞班。”《楚辞通故》被誉为“当今研究楚辞最详尽、最有影响的巨著”。记得当时的中文系学生，不管看不看得懂，都会入一本。现在讲讲第二只“瓜”。

1979 年，教育部委托姜亮夫办一个“楚辞进修班”。生源都来自全国重点大学的中、青年教师骨干。9 月份开学了，12 位幸运的学员来到杭大。姜亮夫每周讲两次，一次上午，到学校讲；一次下午，在家里讲。他讲课时，从来不用讲稿。每到课前，学员的录音机就摆满了讲台。他讲课还有个习惯，喜欢闭着眼睛，但思路异常清晰，头头是道，一副超脱自然的样子。



1962年杭大中文系58级毕业合影

每讲完一课，他会问：“听懂没有啊？”然后开出一串参考书目，要学员自学。参考书目有必读和选读两种。他要求学生在必读书中选择一本精读细读，然后写出论文或者学术报告。他说：“搞学问么，人人都可以搞。我建议你们要发挥自己的优势。才气大的人，可以从文学方面发展；才气一般的人，可以从训诂、义理方面发展。取长补短，学有所成。”

在进修班12个学员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日晚饭后，会有一个学员陪他到户外散步。乘散步的机会，他会给学员开点小灶。一年后，进修班完成了学业。结业那天，他请学员吃饭，大家频频举杯。老头端坐中间，吃了不少绍酒。回家后，被夫人狠狠训了一顿。

### 3. 那些夫子之陈立

随后，黄逸宾到陈立、陈桥驿家拜年。



陈立教授（1902-2004年），原杭州大学校长。

陈立是中国工业心理学的奠基人，曾任杭州大学校长、名誉校长。还担任过浙江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全国副主席等。我们还在杭大的时候，常常看到他戴着一顶颇为考究的帽子，被学生搀扶着在校园里晒太阳。老人和蔼可亲，脸上随时都有要笑起来的样子。

他是湖南人，狮子座。1930年夏，考取官费留学名额，进入英国伦敦大学心理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在做博士后研究期间，他曾到伯明翰一家电话机厂实习，一口气写出了6个研究报告。其中一个关于钻头的分析报告，1933年发表在英国工业心理研究所的《人的因素》月刊上。这可以说是中国人在国外发表的最早的“人因工程”研究论文。而我国21世纪后，才在一些工矿企业推行“人因工程”。

工业心理学主要探讨前苏联也在研究的劳动心理学，即人在劳动过程中心理活动的特点及规律。一段时间，他遵照中国心理学会部署，转向认知心理学的实验，发表了一批学术报告。此事惊动了姚文元。他用“葛铭人”的化名发表文章《这是研究心理学的科学方法吗？》，否认人类心理有共同规律性，否定用实验方法研究心理。陈立奋起抗辩，写了《对心理学中实验法的估价问题》，捍卫科学的尊严和论证实验法是研究心理过程的重要方法之一。两人的文章先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史称“葛陈辩论”。姚文元认为陈立不懂“黄金分割”和“文艺心理学”。其实陈立文章的英文摘要就有 golden section (黄金分割) 一词，而写《文艺心理学》的朱光潜在留英时正与陈立同堂听课。

改革开放后，陈立精神振奋，壮心不已。1978 年恢复招收研究生；1980 年杭州大学成立心理系；1981 年杭大获批工业心理学博士点。他这一脉衍生了很多人才，包括后来的朱祖祥教授和现在城市大脑的王坚院士。

陈立在杭大新村住的时间并不长。1983 年初，因为建杭州市府宿舍楼，施工中影响到陈家的地基下沉、墙体开裂。为抢修住宅，陈立搬迁到杭大新村原蒋礼鸿家（当时是空着的）暂住，共计 3 个月时间。

他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工作能力和创新活力，条理清晰，逻辑严谨。每日在书斋勤奋写作、指导博士生和接待来访者。陈立的工作，还被女作家张洁写进了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

陈立喜爱运动。在 96 岁之前，每到夏天，他都要坚持游泳。正因为爱活动爱自由，印象中，他隔几年就会摔一次跤，但一般都无大碍。

他的大儿子亦凡高大英俊，但行为天真。原因是当年陈立携全家随浙大西迁，在贵州湄潭，儿子发高烧为条件所限，耽误了治疗，造成了脑损伤，行为举止一直停留在了孩提时代。等孩子大了，陈立一方面和工厂商量，让亦凡无偿为工厂干活；另一方面，为了不伤儿子的心，他每月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 20 元钱请工厂作为工资发给亦凡。就这样，亦凡实际上无偿为工厂工作了 20 年。

对于大儿子亦凡，陈立虽然觉得很惋惜，但他仍很欣慰，因为亦凡很乖，尽力做到了最好。



从左至右：陈立先生、陈立儿子、陈立女儿、陈立夫人、王驾吾先生、蒋礼鸿先生。

#### 4. 那些夫子之陈桥驿

如果说陈立因留学欧洲是“海龟”，而没有留过洋的陈桥驿是“土鳖”，那就错了。尽管陈桥驿所从事的历史地理研究的确十分“本土”，事实上，陈桥驿的英文毫不逊色，莎翁名著英文对白常常脱口而出。



陈桥驿（1923-2015），杭州大学地理系教授。

陈桥驿是绍兴人。1957年入住杭大新村。先后在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地理系和浙江大学地球科学系任教。陈桥驿一生，堪称传奇。10来岁就醉心《水经注》，出版各类著作逾70部；曾参加“青年远征军”，任英语翻译；90岁高龄记性超好，每天写4000多字年谱。2015年2月11日，陈桥驿在杭州逝世，享年92岁。



五幢二号，陈桥驿先生寓所现状。



现在散布于杭州新村的大芭蕉树，最早是从黄龙洞移种过来的。©城市秘密

陈桥驿年轻时写的《祖国的河流》，4年内再版9次，成为当时最畅销的地理书。1964年，陈桥驿被认定为反动学术权威。他的研究工作从“地上”转入“地下”。身在“牛棚”，他竟用红宝书的封皮包着《水经注》看。事情暴露后，记录他几十年研究《水经注》成果的十多本笔记要上交。妻儿得知消息，马上分头抄录，终于抢救了下来。

70年代初，时而有外国友人来浙江。那时候翻译人才缺，陈桥驿便被人从牛棚中拎出来“废物利用”，任浙江省外语翻译组组长。

“文革”结束后，陈桥驿重获学术自由。1985年，《水经注研究》出版。1990年，《水经注疏》出版，谭其骧称：“此书问世，实为郦学史上一巨大里程碑……如此好书，百年难得有几种。”

20世纪90年代以后，陈桥驿在深入研究春秋战国时代浙东运河的基础上，精准还原了其承担海上丝绸之路功能的历史，从而为“中国大运河”的申遗成功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百度“陈桥驿”词条，有一个附件，按通识地理学、郦学、吴越文化、方志学、城市历史地理、点校翻译作品六个部分，罗列了他正式出版的70余部著作目录，计2000万字。

蒋遂曾应郦学专家陈桥驿亲属邀请，赴水乡绍兴参观了他的事迹陈列馆。陈桥驿与蒋家同住在老5幢，陈家住二号，蒋家住四号。在蒋遂印象中，陈伯伯瘦瘦的，看不出精力有多旺盛。但是，看着他一扎扎字迹娟秀的手稿，不由赞叹那是付出了何等的精力！蒋遂感叹，不要说两千万字，即便是两百万，恐怕这辈子都读不完。更何况，这两千万字的学术论文要做到言而有信，查阅的资料何止十倍二十倍！如今陈桥驿已然驾鹤远游，生平宏愿托付后人……



你看杭大新村里的松鼠 ©城市秘密



已被杂草包围的小路 图自©城秘特邀摄影师 肖奕叁

记得进杭大后，我第一次听到“历史地理”的提法时，很不以为然。正如书法是好的，中国画也是好的，连在一起叫“书画”，就会有江湖气；文学是好的，历史也是好的，连在一起叫“文史”，就会有没落气。后来才知道，历史地理其实是另一个概念。这一领域，几乎被陈桥驿“凿空”了。谁家要是有这么一位满肚子学问的老人，那该多好啊。

### 三、那些“富农们”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有位中央首长说过：北大中文系是“地主”，杭大中文系是“富农”。而“富农”成员，有许多都曾是杭大新村的住户。



左起：邬武耀、陈坚、盛静霞、蒋礼鸿、倪宝元、吴熊和。

蒋礼鸿被学生称作云从大师。1957年入住杭大新村，5幢4号。三室一厅一厨一卫，80多个平方米。家里有个小院，被夫人盛静霞收拾得井井有条，里面种了桃树、柳树、芭蕉。早饭后，他便坐在书桌前开始修书，旁边就放一杯茶。午饭后，休息到两点半。到晚饭，吃完继续到10点半。无论春夏秋冬，不管节假日，大年初一也是如此。蒋礼鸿去世后，家属将他的部分藏书捐给学校。系里让我喊几个同学一起搬。那些古籍捧在手上很轻的，里面有不少眉批，偶尔还会掉下张把写着红字的小纸条。



50年代，蒋礼鸿在杭大授课。

蒋礼鸿的夫人盛静霞，在杭大中文系教授古诗词。她是扬州才女，和夏承焘合著过《唐宋词选》，是夏老眼里的真词人。他们夫妻俩是道古桥畔的神仙眷侣。傍晚时分，常携手散步，前往黄龙洞。边走边吟诗，要么是古诗你背一句我接一句；要么互相对对子、做诗联句。他们去世后都捐献了遗体。



蒋礼鸿和妻子盛静霞

徐朔方，1923 年出生于东阳，是古典文学家、汤显祖研究专家。1947 年，毕业于国立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先后在省立温州中学、省立温州师范学校、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任教。他 1957 年入住杭大新村，而后就一直在杭大中文系教课。每次在校园里看到他，都像刚晒完太阳似的，脸上红红的、火辣辣的，发着光。一次大概流鼻血了，坐在传达室门口的板凳上，鼻子里插着一根粉笔似的纸卷。

徐朔方雅好昆曲，自己也会唱。喜欢收集不少老旧的胶木唱片，其中大多是戏曲唱片，但也有不少西洋音乐。“文革”时，他把自家钢琴捐给了保俶塔小学。因为他发现儿子对钢琴很感兴趣，为了不让儿子玩物丧志，就下决心把钢琴处理掉。他总是说，弹琴是没有出路的。因为他自己学琴的时候，每天至少要花一小时复习，再要花一小

时学习新的曲子，这样才能保证进步。每天两个小时，对于一个不准备以弹琴为生的人来说，实在是太过奢侈了。这是大师们的断舍离，非常有控制力地掌控自己的精力，一门心思走上了学术巅峰。

林淡秋是浙江三门人，左联时期的老作家、翻译家，在上海与鲁迅有过交集。1958年，由《人民日报》调到杭大，任副校长，分管中文系。他平易近人，关心知识分子，和教师关系十分融洽。林淡秋和黄源、陈学昭同年。2006年，“三老”百年诞辰纪念会在杭州召开。省委宣传部是主办单位之一，领导让我张罗些具体工作，这样便认识了林淡秋的夫人唐康。《黄源传》出版后，社会反响还好。我曾有过再为浙籍文化人写点什么的念头。



林淡秋教授在杭大新村寓所前合照

吴熊和，1934年生于上海，1957年毕业留校并入住杭大新村。2012年辞世。吴熊和是“一代词宗”夏承焘的学术传人，“江熊坚”中的熊。吴熊和是我们入学时的系主任。一本《唐宋词通论》是当年中文系学生人手一本的著作。在学术上以专驭博，卓然自立，构建了独特的词学研究体系。继他老师之后，又坐上了当代词学史研究的头

把交椅。上文提及的夏承焘赠任铭善的诗中，槎枒指梅枝。吴熊和上课时常常拿着一把纸扇。依稀记得上面也写着“墨团羞对玉槎枒”。现在想来，可能也是夏承焘写的。



吴熊和教授，杭大中文系主任。

“富农”当然还包括任铭善、蒋祖怡、郭在贻、孙席珍……也包括肖瑞峰、黄征、吴秀明、廖可斌、沈松勤、方一新、张德明、吴笛这些年轻教授。还有更年轻的陈晓云、楼含松、盘剑、周明初、陶然……

不管他们是否曾入住过杭大新村，是否在四校合并后黯然神伤、前往别处，他们都曾在杭大留下过自己的印迹。

上世纪80年代初，杭大数学系一位老教授在开会时指着墙上的马恩列斯问：“这几个大胡子是谁？”大家哄堂大笑。有人问黄逸宾怎么看，黄说：“政治系老教授这样问就有问题了。数学系老教授不奇怪。可能他太专注学术。很多时候不闻窗外事，才能真正做好学问。”他

还经常说：“知识分子可能往往政治上有点幼稚。正因为如此，知识分子更需要被我们保护。”

天上的雄鹰在飞，地上的蚂蚁在跑，没有谁天生不爱故土。笔墨当随时代，是杭大人的优良传统。大学是学术的故乡、爱的家园、文明的高地，是战场与阵地，更是原野与乐土。即便是杭大新村里晒太阳的猫，既能奋起如钢叉，也可温婉如春泥。

#### 四、亦生亦死老杭大

“人文”二字，最早见于《易·贲象》：“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二手知识”泛滥、思想“统一”即可、学习只为升职加薪的当下，为什么还需要人文素养？还需要阅读远离我们的庄子、康德、莎士比亚以及马克思？谁能讲明白此中道理。

文艺理论家王元骧1958年到杭州大学中文系工作。1981年，获批副教授。学校分“高知房”，不少讲师都分到了，而他没份，依然住在“老鼠夹能同时夹到两只老鼠、抽水马桶里能钻出蛇”的20平米的房子里。浙大校长路甬祥得到消息，亲自赶到他家里，为刚成立的中文系“挖人”。当然，杭大没有放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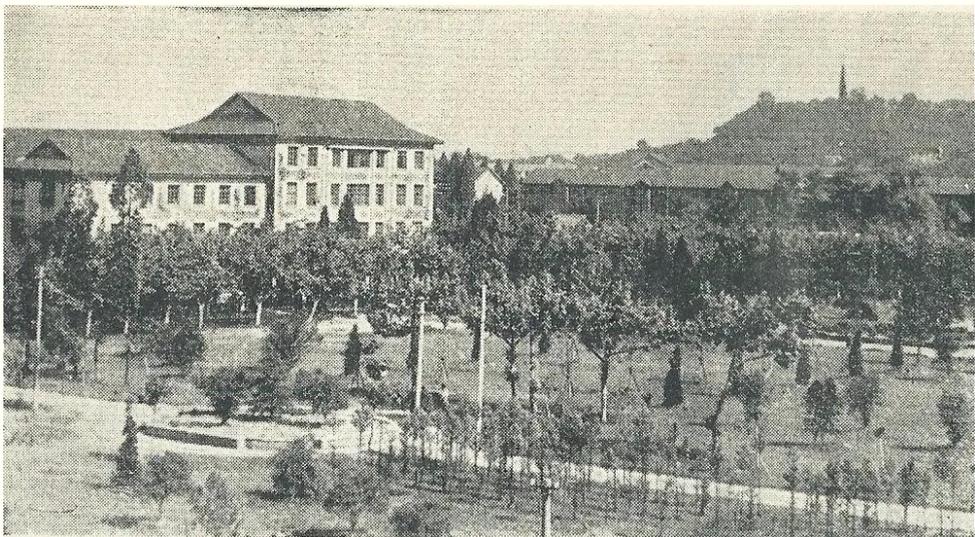
时任杭大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的徐朔方劝王元骧，浙大是理工科院校，“对文科未必重视”，还是留在杭大为好。校长目光如炬，教授讲话儒雅，他们深谙“人文”的价值。



徐朔方教授（左）与王元骧教授（右）

只是今天，人文学科在高度讲求实用的大气候下，显得“无用”，门庭淡泊，是一个全球性现象。过去 10 多年，哈佛大学主修人文学科的人数跌了 20%；不少大学在面对财政困难时，首先向文科学系开刀，将之关门大吉。如何做到“无用之用”，的确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在杭州的某个政府机关、宣传文化单位、房产公司或者西湖边的群山里，你碰到一位中等身材、带个眼镜、走路比较慢、说话音调不高、不喜欢凑热闹、见面时常常微笑的中年人，说不定他（她）就是老杭大的。有时候，他们腹有诗书，充满自信；有时候，他们也会迷茫，甚至像孤魂野鬼般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游荡。而更多的时候，他们集体怀念母校。



老杭大校园一角

母校，没了。

这么好的文科大学，说没就没了。

这被称作江南“文眼”的杭大新村，如今一片沉寂。陈企霞屋檐下的燕子杳无音讯，孙席珍院子里的石榴树不见了踪影，夏承焘爽朗的笑声凝固了，徐瑞云的钢琴声戛然而止。

有人写了一首《清明》，写给老杭大群：

今天是关于昨天的  
那个清廉的老教授  
埋葬在一座简易的山上  
猕猴流变  
墨汁走亲  
年年清明雨水迷蒙家园又瘦了一圈

也有幽魂，于午夜集体散步  
我习惯性地给南方发去问候  
杭大，你在那边还好么

文科生割下腿上的肉  
理科生活不多，却是奔了主义去的  
十八年铁马冰河凝于一瞬  
凝于这个虚拟的“微信群”  
孩子们都睡了  
大家都出来荡荡吧

风华依旧，表情不同  
好奇，憧憬，坚定  
怀疑，诡谲，迷茫  
池塘春草生否  
你给个信儿

今天是关于未来的  
大家还是说点开心的事吧  
后来重耳找到介子推了  
他在丛林里享用老虎与巨蟒  
一侧放着箱啤酒  
是杭大西门小店里那种绿瓶子的

杭大不死，你相信吗？

此刻，我还是不情愿地想起十余年前拜谒过的拉雪兹公墓。它位于巴黎东部。那里埋葬着过去 200 年为法国文化做出贡献的人。他们是音乐家肖邦、比才，作家莫里哀、巴尔扎克、王尔德，舞蹈家邓肯……只是，他们的墓志写得漂亮，不像杭大新村，唯有松鼠鸟雀。

这些年，杭大新村要开发改造的声音此起彼伏。中文系一位年届八旬的老教授在朋友圈里发微信：“听说有关部门准备对小区进行改造。我不知道改造的方案怎样，但如果把杭大新村作为一般的城中村那样去改建，就太遗憾了……”社会各界也纷纷发声，呼吁政府保护好这块宝地，顾及这些已养了厚厚包浆的老房子。因为，此地是杭州、浙江乃至全国的一个精神空间。

参考文献：

- [1] 《烟雨西溪——杭大新村记忆》 蒋遂 主编  
公众号“老杭大”系列文章
- [2] 姜亮夫：《我是怎样摸索进入人文科学这一行道的》
- [3] 许康、苏衡彦：《管理心理学大师陈立教授》
- [4] 王湛：《陈桥驿昨日驾鹤》

作者简介：

包新旺曾是杭大中文系的才子、诗人。当年行为处事特立独行、出人意表。毕业后，他进入宣传文化系统，与诸多艺术家倾盖如故，惺惺相惜。他说，真正的文化人、艺术家都是很善良很可爱的。他们需要获得更多的尊重。

（原载“城市秘密”2020年6月3日）

[返回目录](#)

## 西溪河畔的芳华岁月

——杭州大学中文系 59 级 潘慧惠

2013 年 10 月，杭州大学中文系 1963 届毕业五十周年同学会上，大家纷纷吟诗、演讲，抒发对母校和老师的深切怀念和感恩之情。我也仿刘禹锡《杨柳枝》作一首，曰：

西溪两岸柳千条。  
五十年前道古桥。  
昔日盘桓吟诵地，魂牵梦绕到今朝。

是啊，从 1959 年 9 月到 1963 年 7 月，我们在这西溪河畔，度过了美好的大学生活。虽然，这四年只占我们以往岁月的二十分之一，但却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最难忘的芳华岁月，值得永远的怀念。

### 一、菁菁校园莘莘学子

1959 年 9 月，天高气爽，金桂飘香，我们怀着热烈的向往和无限的遐想到杭州大学报到。校门两侧柱上各四个金黄色的“杭州大学”舒（同）体大字，十分显目。连接两端的横幅上，“欢迎新同学”五个大字，使人感到格外亲切。

迎新的学长帮我们办好了入学手续，开始热情地介绍校园环境。我们立刻注意到，校园的一切建筑都是新潮时髦的。

学校的中心部位是教学区。一幢幢高大的教学楼都有一个宽敞的门厅及其气派的大屋顶。教学楼周围有几个大小不一的操场以及食堂兼礼堂。最后面就是一排排学生宿舍，青砖黛瓦，整洁而简朴。校园的道路两旁种满高大的梧桐树，绿叶葱茏，生机盎然。每幢房子前后都铺上青翠的草坪，周围种植灌木，整洁漂亮，赏心悦目。

校门南面，隔着一条马路及其紧贴的沿山河，是教职员宿舍。因为在著名的道古桥东，所以称道古桥宿舍。相传此桥为宋元数学四大家之一的秦九韶所建。九韶，字道古，热心公益事业，乐意为世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亦是四大家之一的朱世杰感其德，就命名此桥为道古桥，赋予其特有的历史内涵和文化色彩。

而杭州大学教工宿舍的建造，更使这一带成为西溪地区的文化圣地，因为这里居住着一大批有卓越成就的文化名人。就中文系来说，有国学大师姜亮夫，一代词宗夏承焘，语言学家任铭善、蒋礼鸿，古典文学家王驾吾、胡士莹、徐步奎、刘操南，书法家陆维钊，文论家孙席珍、陈企霞、蒋祖怡等等。

记得我们读高三时，毕业于解放前浙江大学中文系的王鸿礼校长在升学指导中介绍杭州大学，曾多次提到过这些学术权威。

现在，知道这些名人就住在这里，不由得对这块学术圣地产生无限的崇敬之情。后来，同学们常常结伴去道古桥附近散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希望能在不期之中，遇到和目睹这些名人、大师的风采。当然，这是后话。

入学后的第一课，是学习八届八中全会精神，满脑子都是三面红旗、矛盾论、实践论。各组都有一位比一般同学大五、六岁或七、八岁的人主持讨论，起初还以为他们是老师呢！时间长了，才知道他们也是同学，只不过是“调干生”，就是原先是干部，现在带薪做学生。如我们班的老毛，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原先是安吉县梅溪镇的镇长。这些调干生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员，工作能力很强。时间长了，我们这些幼稚的“普高生”都自然而然地接受他们的领导，自觉向他们汇报思想。他们也很乐意与同学谈心，帮助同学进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起到老师的部分作用。

我们年级 230 多名新生，大约有 20 来名调干生，其他各系各年级也都类似。莘莘学子中，这批年龄较大、气质沉稳的调干生也为菁菁校园增添不少成熟、厚重的韵味。

校园中，还有一批学子颇受新生关注，那就是学校文工团的演员。

我们读高中时，小说《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红极一时。杨子荣、少剑波、林红、林道静是人人心中的偶像。杭大话剧团自编、自导、自演《青春之歌》在全省巡演。我们曾特地跑到省军区礼堂去观看，对精彩的演出崇拜得不得了。演出结束时，长时间热烈鼓掌，久久不肯离去，直到演员们走下舞台，与大家一一握手，才把大家送出剧场。

到杭大后，在交谈中，知道许多人都看过巡回演出，都是《青春之歌》话剧的忠实粉丝。于是，有意无意地形成一批小小的校园追星族。一旦有人发现“王晓燕”或“白莉苹”的身影，几个同学就会拥在一起，望着他们叽叽喳喳边说边笑。“王晓燕”或“白莉苹”也心领神会大家的善意，报之以会心的一笑，同学们才心满意足地去各做各事。后来，演“江华”的陈坚老师居然还给我们上课讲赵树理的《三里湾》，课堂气氛当然更显融洽和热烈。

受校文工团的启发，我们年级也早早成立了文工队。年级党支部还让我做队长，倒不是我有什么文艺特长，只因为我是年级团总支书记，又是党支部青年委员，好像是“当仁不让”。好在年级里各色人才济济，创作、演奏、表演、剧务等等，应有尽有。像吴亚南、王湄若、潘伟文、陈德来、金章才、郑爽明、毕炎英、杨彩金等等，都各有特长，是文工队的骨干。在他们的带领下，文工队的工作开展得非常顺利。在宣传党的政策、丰富文化生活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值得高兴的是我们年级文工队还得到高年级学长的特别关照，有的还成为我们的义务辅导员。我们的文工队员有好多被校文工团选中，在话剧《卧薪尝胆》、《愚公移山》中扮演重要角色。另外，文工队还受到全年级同学的关心和支持。例如，自编自演的舞剧《徐双喜》的主题歌，由杜方剑作词，杜方剑、张甲秀、韩长庆谱曲，沈洪保指挥，几乎全年级的同学都会唱。

## 二、艰苦的年代高涨的热情

六十年代初，我们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粮食供应尤为紧张。党委书记在大会上说：“我们杭大，与抗大只相差一个‘点’。因此，更要发扬抗大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领导一声令下，大家立刻行动起来。

首先是节约粮食。学生的定量由原来的每月30斤，压缩到每月27斤，用节约下来的粮食支援山东兄弟。

其次是开荒节流。同学们不知从哪里借来了锄头铁耙，把寝室附近的草坪翻掘成畦，准备种菜。学校领导闻讯赶来说：“同学们，你们知道这些草种是哪里买来的吗？是从日本进口的！不知要值多少担青菜呢！”同学们这才停下手来。后来在西溪河岸找到一块斜坡，松土种菜，分组管理，等菜长大了送给食堂。

此外，各班还利用星期天组织同学们翻山越岭去挖葛藤、采野果。有的到农民挖过的番薯地里捡下脚料，背回来让食堂熬成粥给大家充饥。来回可都是步行的呵，大家都不叫苦和累。

一、二年级时，除了上课以外，劳动的机会比较多，大家的热情也很高。

有一次，到耐火砖厂去学习打砖。女同学被分配做辅助工，搬搬运运，觉得不过瘾。后来就抢着去打砖。由于不熟练，被评为“质量高，产量低”。大家卯足干劲，顾不得腰酸手痛，咬紧牙关拼命拍打，产量逐日上升。不到一个星期，每人都完成了每天72块砖的指标。大家都高兴得跳起来，高呼“乌拉！”还即兴编唱《打砖歌》呢！

因为校园建设尚未完全竣工，所以我们还参加了一些“建校劳动”。譬如，在大操场和大礼堂周围种植白杨树，把男生宿舍后面的荒地开辟成公路等等。

最难忘的是到西湖大队去参加双抢劳动。因为以前也参加过，而且好多同学都来自农村，所以，对双抢并不陌生。感到新鲜的是那台收割机，随着齿轮的转动，会“唱”出不同的歌。有时候是“扭秧歌，

扭秧歌”，有时候是“拖拉机，拖拉机”，非常有趣，把大家都逗乐了。

有段时间，一些同学得了浮肿病。学校连忙给这些同学配吃麦麸皮增加营养，又向省里申请恢复学生的粮食定量，暂停举行运动会，并提前放暑假，推迟学期考试。又语重心长地劝导同学注意劳逸结合等等。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同学们的健康状况有了很大好转。

其实，虽然在困难时期，大家的精神状态还是很高涨的。每当周末，学校放的露天电影是《红色的种子》、《我的一家》、《青春之歌》、《老兵新传》等等，大家看得精神振奋，激情昂扬，对英雄模范充满着无比的崇拜和敬仰。

有一次，系里组织同学与诗人徐迟、金近、福庚等联欢，气氛无比热烈。

徐迟说：我们要热爱江山，热爱文化，热爱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关键在“热”字。有的人对生活是冷的，有的人是热的，有的人是火火热热的，我们一定要火火热热！

金近说：让我们都燃烧起火！

福庚说：让我们都烧得像焦炭一样！这样写起来线条可以更粗、更刚健！

诗人们慷慨激昂的演说，大大鼓舞了同学们的热情。纷纷成立红专小组，修订红专规划，树标兵，立红旗；开展比学赶超帮，提出要“开门红，月月红，红到底！”总之，大家以最大的热情在那个时代所倡导的“又红又专”的道路上努力奔跑着、追寻着。

### 三、勤奋读书向科学进军

1961年，教育部发布的《直属高等学校暂行管理条例（草案）》（即“高教六十条”）。不久，周总理、陈毅、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又在广州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号召大家奋发图强向科学进军。校园内很快掀起了勤奋读书、刻苦钻研的学习高潮。当时的舆论是：要把政治挂帅落实到业务学习中去，以业务学习的态度

和成绩来衡量一个人的觉悟水平。“三点一线”、“夜以继日”成为常态。图书馆人满为患，大教室要抢座位。除了个人修订学习计划提高目标以外，还成立了各种学习小组、互帮小组等等争取大面积提高学习水平。

学校领导一方面鼓励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另一方面尽量安排有经验的老教授上讲台、开讲座，把他们宝贵的治学经验、专业知识传授给嗷嗷待哺的青年学子们。可以说，老教授亲自讲授期间，是同学们在大学中收益最多、印象最深的学习阶段，而且回味无穷，终生不忘。

一代词宗夏承焘教授在介绍治学经验时，特别指出：要正确处理好专与博的关系，“十事懂一事，可；一事懂九分，不可”。“做学问强调一个‘笨’字”，“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要“笨鸟先飞”、“脚踏实地”，“其入愈深，其所见愈奇。”这些金玉良言，真如醍醐灌顶，使人茅塞顿开。

夏教授在讲唐宋诗词时，更是神采飞扬，妙语连珠，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听他的课，真是如饮甘泉，如坐春风。

任铭善教授讲古汉语则思路清晰，逻辑严密。如果把他所讲的内容完整地记录下来，准是一篇完美的学术论文。更令人称奇的是，他的板书设计特别精妙。讲课过程中，时不时在黑板某处写下要点。等最后总结时，小括弧、大括弧一钩，这堂课的内容脉络就非常清晰地呈现眼前。同学们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刘操南老师上起课来，有时像说书，有时像吟诗。他的背诵功夫尤其了得，一首二千八百多字的《离骚》，竟能背诵无误。有时，看到他讲解告一段落，略作停顿后，右手伸出两指，我们就知道他要背诵原文了，就聚精会神地静候精彩时刻的到来。

值得庆幸的是，系里的老教授和中青年才俊几乎都给我们上过课。如蒋礼鸿、胡士莹、王驾吾、孙席珍、马骅、陈企霞、徐步奎、盛静霞、张同光、吕漠野、蒋风、蒋祖怡、王维贤、张仲浦、王荣初诸先生以及祝鸿熹、平慧善、吴熊和、王元骧、傅国通、刘云泉、倪宝元等老师，都是我们的业师。我们能聆听这么多专家学者的直接教诲，真是三生有幸。

中文系的老师讲古代诗词，往往边讲解边吟唱，引起同学们的极大兴趣，下课以后纷纷围着老师学唱。盛静霞老师还利用课外活动时间到男生宿舍去教同学们唱诗。从李颀的《古从军行》开始，盛老师一句一句教，同学们一句一句学；教者认真，学者用心。唱了一首又一首，个个乐此不疲。对声乐颇为擅长的韩长庆同学有感于此，主动向系里要求把老师们的吟唱录下来，由他配上曲谱，然后到印刷厂打印装订成册，分发给同学。这就是我们年级特有的、大家喜爱并珍藏的《诗词朗咏谱》。书中共收录 75 首古代诗词曲，吟诵者除文怀沙（3 首）、常青（1 首），其他都是我校中文系的老师。可以说我系老师吟诵古诗词的声韵神态赖此已存大概。同学们得此谱如获至宝，爱不释手，睡前、饭后，寝室、走廊，摇头晃脑，吟咏不辍。如果因势利导，真可算得上半个世纪前风行于杭大校园的一次“经典咏流传”。

随着专业水平的提高，创作之风也渐趋高涨。《百花园》、《论坛》频频翻新，“新作”、“唱和”此起彼伏。有些同学还在省市报刊发表文章并获好评。最突出的如周荣新同学在《浙江日报》上发表的《一张毕业照》，在社会上的反响，远远超出本省范围。后来，我到山东大学读研，还时有人打听作者的情况呢！

#### 四、同学情深师生谊长

日月如梭，四年时间弹指而过。但四年间累积的同学、师生情谊却是终生难忘。

仅以个人感受为例略述于后。

进校后的第一个冬天，同班的女同学发现我没有棉衣，就向班里建议向学校申请补助一件棉衣。申请很快被批准了。我马上去松木场商店买了一块劳动布面料和一块较薄的里子布，回来落水后晒在宿舍走廊西端窗口的竹竿上。为了让它多晾些时候，晚饭后先去教室自修。不料回来时发现晾的布料不翼而飞了！六个女同学立即分析棉布的去向。正七嘴八舌议论间，忽然听到黑暗处有响声，不知谁说了声“小偷！”，大家吓得连忙逃进女厕所，因为只有那里亮着灯。平静下来

后才感到很可笑，好像是我们偷了别人东西似的。后来，张馥媛想起回来时好像看到二楼那一头的窗口晾着一块布。于是大家抱着“不妨去看看”的心情一起跑过去了。一看，果然是那块面料。估计有人拿了布料后，把薄的已经晾干的里子“笑纳”了，居然把比较厚还没干透的面料继续晾晒在自己这头走廊的窗口。同学们边说“还好，还好”，边惊魂未定地回到了宿舍。事情的原委时过境迁，已经如过往云烟，不萦于怀了，而当时一帮同学一惊一乍而又群策群力的场景，却一直历历在目。每每思及，都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同学情谊。

有一次，我发烧到 40° C。室友们急坏了。有的连忙把我换到下铺，有的跑到医务所请医生，一直帮我配好药才去上课。一连几天，每当下课时，又轮流来人急急忙忙跑步回寝室帮我上厕所、倒水服药。至于打饭打水，更是细致周到。由于大家的悉心照料，我的病也好得很快。同学们亲如家人的深厚情谊永记心间。

四上年级，我们到杭七中去实习。我代表我们小组在高二年级教学。事先大家一起集体备课，一起认真地钻研教材，反复地修改教案，可以说是“挖空心思，绞尽脑汁”。经过无数次的试讲试练，自认为准备工作已经十分充分了，但临上场时仍然十分紧张，脸憋得通红，心跳得厉害。同组实习的同学也跟着一同紧张，却仍想了各种办法来缓解气氛，讲些轻松的话。预备铃响了，大家一个个上来和我握手，好像真的要上战场一样。幸好走上讲台的一刹那，看到同学们都微笑地端坐着，露出期待的目光。我竟立刻放松下来，很快进入了状态，有条不紊地完成了整个过程。当我走下讲台时，同学们又一次与我热情握手，庆贺我们共同的胜利。

大学四年，同学的友爱之情，一直萦绕心间。同样，领导和老师的教导和培育之恩，也是永志难忘。

我们年级的级主任先后是姜丽珍、孙毅明老师。党支部书记先后是窦毅男、袁丰俊、庄筱荣老师。虽然大学的管理不必如中学般具体琐碎，但他们都恪尽职守，关心爱护学生，处理事情稳妥得当。使我们年级始终处于积极向上的状态，常得到系领导的认可赞许，也受到同学们的由衷爱戴。

好多老师除了上课以外，与同学接触也较多。如盛静霞老师，我们一进杭大就给我们上古文选，而且教的时间最长。她不仅课上得好，而且对学生和蔼可亲，大家都很尊敬她。有时还到她家里去请教问题。她总是热情接待，有求必应。我准备考研的那个寒假，课代表邹志方还出面向她借马茂元的《唐诗选》给我。她不但欣然答应，而且还热情勉励，使我非常感动。毕业后，我与她长期保持书信往来。我向她汇报学习、生活情况。她则予以热情鼓励。盛老师的最后几年，是在福利院度过的。我和张馥媛去看望她。她虽年事已高，但仍很清秀优雅，高高兴兴地拍了合照，平静地告诉我们，她已安排好后事，包括与蒋老师一样捐献遗体。

2003年我们年级毕业40周年同学会上，吴熊和老师曾动情地说：“我在63届有很多朋友”。把学生当朋友是老师的谦虚，但也说明他与学生关系的亲密与深厚。

其实吴老师当时的年龄与我们年级的调干生差不多。但他作为系里的青年才俊已出版了《怎样读唐诗宋词》和《读词常识》，同学们都特别佩服他。尽管开始时，觉得他比较严肃，不苟言笑。后来熟了，感觉到他其实很诚恳很坦率，非常和善。吴老师给我们讲中唐文学，深受大家欢迎，课后常有許多同学围着他交谈探讨。记得四年级快结束的时候，有天上午只有两节课，我便到教师阅览室去看杂志。过了一会儿，吴老师进来了，脸上带着神秘的笑容，对我说：“考研的成绩来了”。我问他：“有录取的吗？”他说：“有！但还不能讲。”我当然不敢再问，他就笑着走开了。谁知这一别，竟然直到15年后得相见。

1978年初，我被调筹建杭州师范学院。虽有杭师为基础，却只能解决部分师资与校舍问题，大量的事情都要从头做起。向谁请教呢？幸好，较早调来的老师中相当部分都是杭大出身，于是很自然地奔向母校求助。于我来说就是向母校中文系的老师求助请教，而母校的老师确实给了我们强有力的支持和帮助。首先，回校听课。平慧善、蔡义江、吴熊和、刘操南等老师的课都听。既找回了当年在读时的感觉，又领略了老师现今的风采。接下来，用什么教材又是个新问题。文革

甫定，各高校纷纷修订教材。杭大是十三院校古代文学史和作品选的参编单位，吴老师主动邀请我列席讨论，使我获益匪浅。以后凡有有关的学术活动，母校的老师都不忘带上我们。

以古代文学而言，省内有好几所新办院校，急需解决一些共同的问题。我们自发以教研大组的形式定期举办研讨会，请吴老师作主旨报告。他做了认真的准备，剖析古代文学教学中一些重要问题，给大家以很大的启发。为了满足同学们对名师的向往，我们还请吴熊和、蔡义江、刘操南等老师亲自来校上课，大大鼓舞了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

呵！回忆的思绪绵延不绝，当年的青葱年少已成白发翁媪，但老师同学的音容笑貌犹如还在眼前。

感恩老师！感恩母校！

杭大，杭大！你是我们心中永远的记忆！

[返回目录](#)

## 让我们回到金桂飘香的老杭大

——杭州大学经济系 86 级 陈广胜

三十年来半甲子。

三十年过去了，人生又有几个三十年？

记得那年开学，整个校园都是桂花的味道。我们来了，从天南海北走到了一起。

当时的我们，是真的年轻。那四年，我们在杭州大学相识、相交、相知乃至相恋，一切都是免费的，而所有这些都无价可买。更有幸的是，我们同窗的四年，正处于一个充满希望与探索的时代，并且是众多年轻人洋溢着匹夫血性、家国情怀的黄金岁月。我们庆幸在最好的时点遇见彼此，也在最清朗的大学锤炼着自我。

后来，我们走出了校园，那是一九九零年。不久的中国，掀开了市场经济的大幕，也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不断留下深刻的印记。伴随着时代的洪流，我们在不同的职业迈开了各自脚步，也在不同的城乡组成了各自的家庭……

在转型中国的历史变迁中，每个人都自主或不自主地改变着。有的改变，是顺着自己的心愿；又有太多的改变，背离了曾经的梦想。但这就是人生，是未被粉饰过的真实人生。其实，大家来到这个世界，又何尝自主选择？进入社会的人生，又怎能苛求完全的自主？

身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杭大经济系的读书人，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所学正当其用。可究竟用得怎样，毕竟会有差异。但不管你赚没赚钱、赚多赚少，有无当官、官大官小，评没评职称、职称是高是低，这些说来重要，又都不重要。它们终究只是标签，却取代不了做人；仅仅代表现在，却包办不了将来，更涵盖不了人生的无限丰富与人格的独一无二。

在所有的标签中，有一个永远属于我们，那就是杭大八六经管班。因为这个班，我们成了同学，继而有了了一辈子都断不了的缘分。

那么，三十年的大学同学，又有着怎样的价值呢？

还是让我们回到那个金桂飘香的老杭大校园，回味《故乡的云》、《大约在冬季》、《三百六十五里路》那些老歌，回忆当年的讲座、

沙龙、辩论会和图书馆；回想那草坪的身影、楼道间的畅谈与擦肩而过的回眸一笑……我们这帮同学，有着太多的共同记忆。

那时的校园是平等、开放、和善的。人心还不太拜金、功利、浮躁。在如此环境和氛围中结下的情谊，就少了许多杂质，更会是心灵之交。所以，大学同学的价值，就不是一种工具，一种生意，一种热闹。而是一种精神的陪伴，是一种蓦然回首的“原来你也在这里”。

如今，当我们蓦然回首的时候，不得不承认，自己比校园时代老多了。人是脆弱的，尤其是在三十年的时间跨度面前。但试想再过一个三十年，当大家再聚会，一定将回忆今天的场景，也一定会感叹二零一六年的自己是多么年轻。因此，今天的我们，虽然已到中年，甚至依稀添了白发、多了皱纹，但真的不算老，还从头到脚年轻着。

感知并坚信年轻，不是为了欺骗自己，而是因为：生活需要不老的心态，需要我们善于并勇于保持在大学时代的那份热情。岁月毫无疑问在改变着我们，但她不可能改变一切，尤其难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气质与精神内核。

作为杭大八六经管班的你我，尽管普普通通，却堂堂正正，又怎能随随便便老去？！

人生有几个三十年呢？大约二、三，至多四回。

让我们一天一天地生活，累积着一年一年的生命，不管今后遇上怎样的运气，又面对怎样的曲折，都实实在在、从从容容。因为无论好的或者不好的，在流水般的时间面前都会过去。而能够穿越岁月留存下来的，终究是精神层面的东西。至于真正让人感到幸福的，也必定是内心的宁静与充实，唯此才是生命意义上的成功。

当然，即使我们不随便变老，迟早总会有离去的一天。但可以肯定的是，不管再过多少个三十年，杭大八六经管班仍不会消失。此本纪念册就是我们的见证，是整个集体凝聚力的永久承载——虽然这本册子并不见得能在世间留存太久，可八六经管的番号依旧会留存。而那个散发着桂花芬芳的校园，无论她当初叫杭州大学，如今叫浙江大学，未来或许还换了别的名字，都永远是大家的圣地，是我们每个人心中不灭的精神家园。

[返回目录](#)

## 央视新闻“夜读”专题推介杭大老教授

——杭州大学中文系 80 级 伊建新

2020年7月23日，央视新闻“夜读”栏目播出了《什么是大学》专题。专题片以占总篇幅近三分之一介绍了杭州大学的老教授们的辉煌事迹。篇幅仅此于闻名中外的西南联大。

以下是专题片播出的有关杭州大学的内容：

初建于上世纪50年代初的“杭大新村”校舍，是原杭州大学的教师宿舍，“户与户之间没有隔离墙，仅低矮的绿篱作间隔。茶余饭后，教授们门前即可交谈，或探讨学术问题、或交流治学心得”。没有了西南联大那般的战争背景，这幅场景竟让人有一点“学术桃花源”的感觉。

很多人可能对“杭大新村”并不熟悉。但在教育领域，它有一串闪亮的名字：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词学宗师”夏承焘先生、先秦文学研究专家王驾吾先生、明清白话小说专家胡士莹先生、语言和文献学家任铭善先生、训诂学和辞书学家蒋礼鸿先生、文艺理论家蒋祖怡先生，以及被学生戏称为“爱情教授”的孙席珍先生等……他们，曾经都住在杭大新村。许多人也因此将这片校舍称为“教授楼”。

“孙席珍教授讲外国文学，随身携带的仅仅是一张小小的香烟纸。孙先生烟瘾大，顺手利用空烟纸写几个字也可以理解。但他仅凭烟纸上提示性的几句话，就能非常生动地讲一两节课，并且让学生听得如醉如痴。

“徐步奎教授上古典文学，可谓要言不烦。他的每句话后面，似乎都是句号。徐先生给研究生上课更别出心裁。他不是让学生在室内坐着听讲，而是让他们伴他散步、陪他爬山。其间谈课题、谈观点、谈资料收集、谈论文架构。两个小时爬山回来，课也就结束了。

“刘操南教授上《西厢记》，未见其面已先闻其声——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随即，

教室门被缓缓打开，门口出现一个略显瘦小的先生。他缓步走向讲台，边走边还学着舞台上崔莺莺的表演手势，正好走到讲台前吟唱毕。”

1998年四校合并后，杭大成了浙大，但杭大新村还在。2008年时，小区中的两幢建筑被列为杭州市历史建筑。对许多“老杭大人”来说，它是一个难忘的精神空间。而“先生们”深厚的学术功底，不拘一格的教学方式，也依然让人怀念。

如今，新时代的许多“师者”，虽没有“大师”和“先生”之名，但仍然以自己的方式应和时代的脚步，孜孜不倦地在教育事业里耕耘。



杭州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们

上排左起：夏承焘、姜亮夫、蒋礼鸿、任铭善、郭在贻

下排左起：王驾吾、胡士莹、徐步奎、沈文倬、吴熊和

[返回目录](#)

## 杭州大学求学记

——杭州大学地理系 58 级 周黔生

### （一）入学报到

1958 年，我考取浙江师范学院地理系。报到第一天，我早早拎着铺盖从道古桥家属区来到马路对面的校区报到。大门口设有接待站，摆着几张桌子。一位学长接待了我，帮我拎铺盖到校内的学生宿舍楼。地理系新生分配住在一楼，就这样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

当年考大学，我的第一志愿是浙江大学。虽然浙江师范学院地理系是第三志愿，心里还是挺高兴的。而且学校离我家又那么近，只隔了一条马路，比上中学还近。同年，我大姐（周杭庆）也被保送入浙江师范学院生物系。她是名调干生，已经在杭州工作了，再保送读大学。

### （二）浙江师范学院与杭州大学合并

地理系大楼就在学校大门口东侧，外墙下部暗红色，上部乳黄色。楼前是草坪，隔着围墙就是马路。前方可以毫无阻挡地望见宝石山和保俶塔。

一个学期还没有读完，十一月里就传来浙江师范学院要与刚刚新办的杭州大学合并的消息。师范学院变成综合性大学，发展前景更广阔，名字也好听些。自然受到大家一致好评和欢迎。由于合并过程短促，“杭州大学”校徽春节后才全部发到我们手中。“杭州大学”四个字是请书法家舒同题写的，字体娟秀。



图 1：1960 年冬，地理系同学杭州大学门口合影



图 2：1959 年初春，地理大楼前，远景是老和山

### （三）课程与教师

由于改成综合性大学，需要分专业。我们年级先是分成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两个专业，后来自然地理专业又分成地质地貌专业和陆地水文两个专业。

大学四年，读了二十多门基础课和专业课：

一年级时有：普通自然地理、物理、数学、化学、地图学及地形测量、政治、俄语、体育。

二年级时有：矿物岩石学、动力地质学、古生物地史学、普通水文学、普通地貌学、气象气候学、俄语、体育。

三年级时有：土壤地理学、植物地理学、水力学、水文地质学、水文测验学、中国自然地理、俄语。

四年级时有：浙江自然地理、应用数学、径流及水文计算、水利计算及规划、水文预报、哲学等。

物理课由副校长朱福炘讲授。他个子不高。记忆中，他着重讲解了地球自转中产生的偏向力——科里奥利力。他说科里奥利力与地理科学关系很密切。例如，科里奥利力对河岸冲刷有很大的影响。地球由西向东自转，受科里奥利力作用，在北半球，从南向北流的河流，河水冲刷东岸；从北向南流的河流，河水冲刷西岸。此外，科里奥利力对天气系统也有很大的影响，例如台风的形成。

近年翻阅浙大 1947 年的师生通讯录，才知道朱福炘校长在浙大时与束星北、王淦昌等人是物理系同事。

地理系主任严德一给我们连续作了几次“长江三峡工程”专题讲座，论及长江三峡工程的发电能力、输电范围，以及对我国华东等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等。他讲话声音洪亮，在校时就听说过，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穿越横断山脉，为查勘滇缅公路作出过贡献。

地貌学由冯怀珍先生讲授。他对河流三角洲演变及我国河流三角洲形态分类，讲得十分透彻。还详细介绍了苏联萨莫伊洛夫的观点，印象相当深刻。

数学老师姓沈（孙？），是数学系的教师，讲授“微积分”。讲课带有绍兴口音。讲课有条不紊，板书端正清晰，面目清秀，头发梳理得整齐光洁。

植物地理老师是生物系的女教师项斯端。有一次，她带领我们全班同学去“杭州植物园”实习，辨认各类植物形态与特征。大家比较感兴趣。我们逐步明白了植物与土壤、地质的关系。有一些植物，如映山红、松树，它们容易生长在具有酸性土壤的山丘上，于是就成了酸性土壤的指示性植物。

俄语老师是外语系的女教师何美莲，娇小文气。她和公共外语教研组同事一起编撰了一本词典——“俄汉对照地理专业常用词汇编”（商务印书馆 1961 年出版）。她送了一本给我，我至今还保存着。她家和我家是邻居，同是道古桥河南宿舍 3 幢。

普通水文学和水文测验学由毛发新老师讲授。他是我们的班主任，比我们早几年毕业，与同学们接触比较多，和蔼可亲。毕业后拜访过他。

矿物岩石学老师林大厦。学期考试时采用口试。每位同学被分别叫进办公室，需要认出 3 块矿物岩石标本，并且说出它们的成分、特点、用途。我记得 3 块都认出来了，其中一块是“辉绿石”，比较难判断，结果得了 5 分。那时学习苏联教育制度，考核采用 5 分制：5 分优秀；4 分良好；3 分及格；2 分不及格。

动力地质学老师邓博，讲课生动，可惜英年早逝。

体育课由体育系老师担任，是位年轻的女教师，本校体育系毕业不久。

哲学课由哲学系老师担任，课本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总之许多课程都是由其他系科老师担任的，这也是综合性大学的优势吧。

1962 年 6 月，我们去新安江水电站实习。那时，新安江水电站刚建成，对参观新安江水电站厂房的人政治上审查很严格。据说，连我们的档案都要看过，这也是时代特色。



图 3：1962 年春，地理大楼前

#### （四）外聘教师

陆地水文专业课有十几门。因为是新开专业，教师不足，只好去外校聘请教师。

“水文预报”教师是从华东水利学院（南京）请来的，名赵人俊。他在水文学界声望很大。他主持研究的“蓄满产流”理论及“新安江流域（水文预报）模型”获得广泛应用。

“水利计算”教师是浙大请来的。当年浙大土木系有一个专业——水电站枢纽与水工建筑物，所以水利方面的教师比较多，能支援杭大新学科建设。从浙大请来的是位年轻女教师，名汪希美，身材高挑，

衣着讲究。她来杭大讲课有时候坐公交车来。当年，16路公交车从浙大（玉泉）出发，绕行杭大门口过。那时两校之间一片农田，视线开阔，站在杭大门口能看见老和山麓浙大高层建筑。

学校还请过水文计算方面专家陈家崎、金光炎为我们讲课。金光炎是浙江人，早年浙大毕业。地理学家丁锡祉先生也为我们作过地貌科学方面的学术报告。

### （五）地质实习

二年级时的地质实习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邓博老师带领下，我们全班同学早出晚归，行走在西湖周围的群山之中，考察地质构造和地层年代。北高峰、飞来峰、丁家山、玉皇山、石屋洞、栖霞洞、宝石山等等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也领会到每一个风景点其实都是群山地质构造与岩层的出露点，可以揭示其中的奥秘。至今我还保存着当年的地质实习作业——西湖周边地层剖面图。每到一个考察点，邓博老师就停下来详细、生动地讲解岩层特点、地质年代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使我们知道了西湖群山是一个复向斜构造，玉皇山和北高峰是地质年代比较老的泥盆纪砂岩，而它们之间的烟霞洞和飞来峰是地质年代比较新的石炭纪石灰岩；丁家山是二叠纪页岩，而宝石山是白垩纪火山岩，多处有暗红色粗面岩裸露。中午时分，学校用汽车将饭菜送到预先约定的地点，大家狼吞虎咽，胃口大开。这次野外实习，同学们学习情绪高涨，效果也好。

地理系对地质实习历来比较重视，早在国立浙江大学时期就如此。1947年12月7日，竺可桢、李四光、孙鼐、陈吉余等人带领四十多位史地系三、四年级学生，一同去九溪十八涧一带考察第四纪冰川遗迹。

## （六）赴海宁观潮

1960年秋的一天，我们全班同学在老师带领下坐大客车去海宁观潮。这是一堂教学实习课。客车一直向东开到杭州湾澉浦。我们下车来到江边观测。这里是钱塘江涌潮起始处，江面开阔，宽约20千米。对岸景物已模糊不清。站在岸边，只觉得海阔天空，江水浩淼。然后车子折回，开到海宁盐官镇。这里的河宽已渐渐缩窄至约2千米，形成一个外宽内窄的喇叭口。正是喇叭口形状和巨大的河底沙坎造就了举世闻名的钱塘江涌潮。中午时分，同学们终于盼来了期待已久的涌潮奇观。远远望去，江面上有一条白练在浮动，慢慢向我们靠近。只十多分钟时间，已变成波涛汹涌的排浪，急匆匆迎面扑来，瞬间在脚下海塘掀起壁立的浪花。一会儿工夫，怒潮又向上游奔腾而去。大自然的力量真是神奇！许多自然之谜等待地理学科的新兵去探索。

当天还发生了一幕小插曲。忽然，有人发现盐官镇上一家小商店里有糕点出售，不用粮票。于是大伙儿一拥而上，抢购糕点。把小柜台挤得咯咯作响，店主大为吃惊！当时，杭州粮食供应已趋紧张，商店里糕点稀少。对于每月粮食定量不足的杭州大学生，也顾不得斯文和矜持了。

回校的路上，秋雨阵阵。车厢里灌满了凉爽的风，也充盈着年轻人欢悦的笑声。

## （七）洪水调查

我们班两次生产实习内容都是洪水调查。第一次是在新昌、嵊县境内的曹娥江流域。第二次是在乐清县等地。这两次生产实践与专业课紧密结合，收益很大。

二年级去曹娥江流域进行洪水调查时，大家都自带铺盖行李，还有测量仪器多件，肩挑背扛十分辛苦。每到一处，先在当地公社或者学校把住宿安排好。一大早，就去河边查勘地形，选择调查河段。接着去村庄寻找老农，请他们指点遗存下来的历史洪水痕迹。而后再进

行调查范围内的地形测量和洪水痕迹高程测量。携带来的平板仪、经纬仪、水准仪统统用上。晚上也不休息，大量内业工作需要及时完成。如，计算洪水痕迹高程和大断面，清绘地形图。最后，根据洪水比降和过水断面面积，计算出历史洪水的洪峰流量。调查完一个河段，又立马转移到下一个河段，工作紧凑、艰辛。不过大家都年轻力壮，也就挺过来了。

工作过程中，翻山越岭、涉河过水是常事。在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也深深感受到祖国河山的壮美。有一天，很晚了才到达澄潭江（曹娥江支流）畔一家小客栈留宿。清晨一觉醒来，只见窗外云雾飘忽，“哗！哗！哗！”的响声不绝于耳。出门一望，原来客栈濒临溪流。溪水不断地从河床上的一个个碛步中间流淌而下。清澈的溪水，瞬间变成了白色的水花翻腾不止；水面上雾气蒸腾，景色迷人。难怪众多唐代诗人（如李白等）喜欢游历会稽山水，并且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流传至今，造就“唐诗之路”。

四年级是去乐清县雁荡山等地洪水调查，由范启清老师带队。记得我们曾住在乐清县招待所。招待所紧邻山崖。宁静的夜晚，只见圆月的月亮从山坡后冉冉升起。而月亮在渐渐移动、升高过程中，始终紧贴着山坡，就好像月亮慢慢不断在爬坡。感觉与人很亲近。

调查河流地处雁荡山区，地势崎岖，景色秀丽。有幸见识了大龙湫瀑布的雄姿，也意外在景区看到了中文系夏承焘先生（温州籍）早年书写的楹联：

欲写龙湫难着笔，  
不游雁荡是虚生。

## （八）华侨同学

我班有位马来西亚华侨同学，名苏本贤，与我同住一间宿舍（8人一间）。几年相处，友情不浅。50年代，有许多像他这样的南洋华侨青年向往新中国，投奔国内求学。杭一中、杭二中、杭女中等学校都接受了不少华侨学生。后来，他们中一部分人继续留在国内读大学、

工作。当年华侨同学留给我们的印象是有点洋气，喜欢穿拖鞋；爱干净，爱洗澡。男同学也常穿花的上衣。这也许和他们从小养成的生活习惯有关。苏本贤同学比较朴素，学习也努力。他当时有架德国牌子的照相机，双镜头。拍照取景时从上往下看，这在当时并不多见。现在这类照相机似乎已不再受青睐了，成了收藏品。

我们班到西湖边搞活动时，他会给大家拍照片，留下不少珍贵的资料。他也曾将照相机借给我拍全家照。毕业时，苏本贤同学分配在浙江省水电设计院工作。他爱人也是华侨学生，分配在南昌工作，一直想调到杭州来团聚，却因杭州户口难进，迟迟未成。苏本贤只得调去南昌。不久有了新政策，华侨工作调动可以照顾，但为时已晚。我们也为他感到遗憾。他的许多华侨同学都在杭州工作。他弟弟一家也在杭州。

### （九）国庆游行

每年参加国庆游行，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有一年，我与许多同学一起参加民兵方阵游行。国庆前多次演练正步走。到了10月1日上午才发枪给大家，每人一支上好刺刀的老式步枪，感觉有点重。大家一律穿白衬衫、蓝裤子，把枪背在右肩上，枪枝背带不是皮带而是帆布带。民兵方阵列队来到大街上，行进过程中，队伍忽快忽慢。一旦后面的队伍离前面队伍的距离较大时，就要追上去。于是惊险的一幕就发生了：只听“啪嗒”一声，一支步枪重重摔在地上，明晃晃的刺刀刚好在后排同学眼前划过，怪吓人的。大家都说好险啊！幸亏没有划到脸上。估计这批步枪是从仓库里领出来的，久未使用，极少数背带有点发霉发脆，跑步时受冲击力过大，才会突然断裂。民兵方阵行进过程中不止一次发生这样的险情，好在都有惊无险。

1959年国庆节游行，我是参加军乐队，轻松一些。先在校内集体练了一段时间，学会了敲小鼓。敲大鼓当然要挑身材魁梧的同学担任。

每次参加游行都很兴奋、愉悦。现在国庆节似乎成旅游节了，不用游行而是到处游玩了。

### （十）听志愿军作报告

一次全校同学集中在大操场上，听志愿军英雄讲述抗美援朝故事。演讲人在开场白中说道，能够到首长工作的单位作报告，感到非常高兴。他又说，陈烙痕书记是我的老上级，是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上级领导。大家听了都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样我们才知道，校党委陈烙痕书记原来去过朝鲜战场打仗。以前只听说他是部队转业的师级干部。他平时作报告广东口音很重。

### （十一）义务劳动

1959年国庆节前夕，我和许多同学一起被派到杭州饭店（现香格里拉饭店）参加义务劳动。饭店刚装饰完毕，房间、走廊里堆满了施工后剩余下来的建筑材料，需要及时清运。也不知怎么会派到我们这些学生。大家被分配到各层楼面上去搬运各种不规则的多余的木料，统统集中堆放到屋外空地上。上上下下，来回忙碌了两天才算完成任务。

还记得去半山义务劳动，是参加半山铁路（连接杭州钢铁厂）路基的修筑。也去过植物园搬运树苗。还有一次去虎跑路参加植树活动。沿途树林下、小溪旁，到处是青年学生的身影。我们忙碌地挖坑，然后把根部包裹着草绳的苗木栽入树坑中，最后再浇上水。个个都干得十分起劲。也许植树劳动的成果能立即见效，所以大家劲头特别大。现在只要路过这一带，望着郁郁葱葱的水衫林、杂木林，都会回忆起往日义务植树的美好时光。

刚入学便遇到“大炼钢铁运动”。学校球场上垒起了好几个小高炉，通宵达旦炼铁。我们低年级新生派去运“紫泥”（用作建小高炉的耐火材料），地点在石屋洞附近。我们几个同学拉一辆大板车，从

四眼井到赤山埠有一段长长的下坡路。骑自行车的话，不用踩就可以一口气从坡顶溜到坡脚。这种路况拉大板车难度可不小，速度和方向控制不好的话，容易发生翻车。虽然我们没有经验，好在把舵的叶兴林同学身强力壮，大家齐心协力总算完成任务。

## （十二）教工人师傅数学课

大约二年级的时候，班里分配我和吴翔高同学一个任务，到武林门一家汽车运输公司为业余学校的工人们上课。我教的是初等数学，每星期一次。那时候，晚上从松木场到武林门没有公交车，只能步行，路灯也较暗。到了车间里，工人学员都已陆陆续续到了。车间里临时架上一块黑板。学员中有男有女，有四十岁左右的，也有二十岁左右的。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很高。大跃进年代，全民办学，各类工人夜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到如今还记得讲课内容是解方程式（一元一次方程），课本内容虽然简单，相当初中程度，但我还是认真备课。因为这是第一次给别人上课，情绪难免有点紧张。也算为工人师傅提高文化水平作过了一点努力吧。

## （十三）课外体育活动

学校对课外体育活动还是比较重视的。每天下午 4 点多，是课外体育活动时间。各个班级根据学校统一安排的体育活动场地进行锻炼，使用证件借用体育用品，如篮球、排球等等。一到下课时间，同学们就奔向运动场地。操场上、健身房里到处活跃着年轻的身影，喊叫声此起彼伏。我们班宿舍后门正好对着篮球场，只要轮到篮球活动就全班出动，个个争着上场，直到晚饭喇叭声响了，才肯罢手。

#### （十四）分大、小系的校运动会

1959年春，举行杭州大学第一届运动会。考虑到大系与小系学生人数相差较大（有的甚至超过10倍），所以按大系（如中文系、数学系）和小系（如地理系、历史系）分别进行比赛。这给小系的学生运动员带来更多的获奖机会，提高了积极性。我们班的王敦宗、叶兴林、周庆林等同学在田径比赛中都得了奖。我当时参加了小系的铁饼和标枪两项比赛，结果获得了第一名和第二名，得到了奖状，真是喜出望外。要是不分大小系，就难以取得好名次。

还记得中文系有个男同学名字叫李寿福，高高的个子，戴一副眼镜，短跑特别快，一百米成绩优异，只要11秒多。



图 5：1959年春，地理系、教育系运动员在校田径场上

### （十五）实弹射击

1958年10月，在“全民皆兵”的形势下，学生中开展了“射击手”达标活动，要求人人达标。先上理论课，学习射击学理和兵器机件，然后俯卧在垫子上练习步枪射击要领与姿势，反复瞄准星、扣板机。连续多天，等到熟练后便去射击场真枪实弹上阵，射击场地点好象是在小和山一个山坳里，集体坐卡车去的。射击用枪是“55式—1小口径步枪”，每人射击5发子弹，第一次体验到射击时后座力的感觉。结果我命中30多环，及格了。后来又领到了杭州市国防体育协会发的“普通射手证明书”。单位一栏填的是“浙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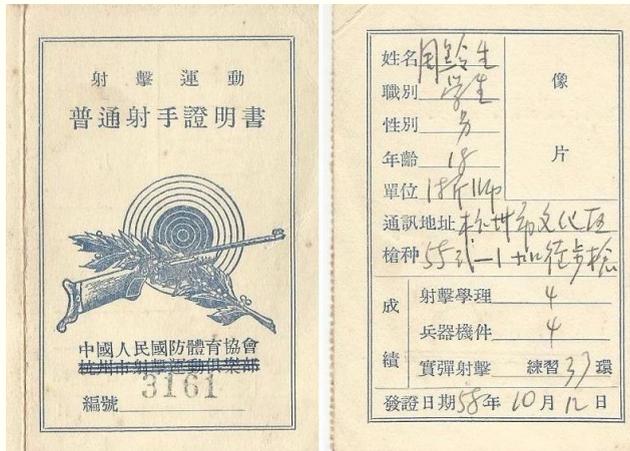


图 6：普通射手证明书

### （十六）“劳卫制”证书、证章

上世纪50年代，国内盛行学习苏联老大哥。体育方面也模仿苏联的一套经验。“劳卫制”就是一例，全名是“劳动卫国体育制度”，目的是要青年人努力锻炼身体，使自己成为优秀的祖国保卫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体育项目的内容包括田径活动等，如100米、1500米、跳远、手榴弹等，分一级和二级标准。二级比一级标准要高一些。我

短跑过得去，长跑可就困难多了。当时要求大学生达到“劳卫制”二级标准。经过一番艰苦锻炼，我终于在1958年12月测验及格，达到了“劳卫制”二级标准，而且领到了“劳卫制”二级的证书和证章。

### （十七）杭大广播站

二、三年级时，我报名参加了校广播站播音工作。说实在我的普通话并不标准，只是个人爱好而已。广播站工作人员全部是学生，播音组12人（男女各6人），编辑组12人，音乐组6人，机务组数人。每天晚饭前播送稿件与通知。为了讲好普通话，我特地去买了一本汉语拼音字典。遇有读不准的字，先查一下字典，以免误读。没想到那段时间的汉语拼音学习，却为今天上网打字带来了方便。

1959年国庆节和1960年秋天，校广播站全体同学先后去西湖风景区搞集体活动，分别在西山公园牡丹亭与杭州饭店前合影留念，记录下我们青春的风采。如今还记得两位担任校广播站编辑工作同学的姓名：中文系骆祥发（曾任浙江师范大学校长）、地理系汤文权（曾任浙江省地矿厅长）。



图 7：1959 年国庆节，西山公园

## （十八）周末露天电影

有一段时间，星期六晚上经常在健身房南面的操场上放映露天电影。晚饭后，同学纷纷把宿舍里用的方凳子放在银幕前不远处早早占位。凳子上往往放上一本“中国青年”之类的杂志以利辨认。家属区的老师及家人也会过来观看。有新的影片，我也会通知父母过来一同观看。这时，我就会并排放上三张凳子，等他们一起过来。临近放映时，操场上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同学们比较喜欢外国影片，如法国影片《勇士的奇遇》，大家都称赞不已。片中男主角芳芳由英俊潇洒的钱拉·菲利浦扮演。影片中击剑场面很精彩、刺激，对话也很诙谐幽默。

## （十九）西湖划船活动

集体到西湖上划船是同学们最喜爱的周日活动。有一次（1960年9月）全班同学划船到三潭印月，大家纷纷爬上石塔拍照留念。我也拍了一张（如今石塔四周水面设置了栏杆，已不能攀爬上去了）。那时风景区不需要买门票。我们先在三潭印月上岸游玩，之后又划船上湖心亭游玩，然后到中山公园“西湖天下景”游玩。还记得1959年也去孤山放鹤亭游玩过一次。

## （二十）西溪从学校门前流淌而过

当年我家住在道古桥家属宿舍3幢4号，两层楼。屋后是一片水杉林。水杉林北面，沿山河静静流淌而过。它是西溪的末段，从西边老和山北侧流过来，向东流入松木场河下。河水清浅，偶尔可见农民撑着小船通过。沿山河北面隔条马路就是杭州大学校舍，一排排房屋清晰可见。1966年，我在屋后沿山河畔为母亲拍了张风景照，无意间留下了名副其实的“西溪校区”旧貌。



图 8：1966 年冬，杭大校舍远眺

### （二十一）白乐桥疗养院

毕业班时，不幸患上肺结核病，无奈被送入位于灵隐白乐桥的杭大疗养院。杭大怎么在这里会拥有一座疗养院？我至今也不清楚。疗养院外便是九里松风景区，环境幽静。两排平房，中间是院子，有病房数十间。

60 年代初，学生营养不良，体质较差，不少人患上肝炎、肺结核、浮肿病。与我同住一室的是物理系毕业班的小朱。时值春天，我们两人天天在九里松、石莲亭、灵隐寺一带散步、闲游。上下午各一次。医生说，慢性病只要心情愉快就会恢复得快。我们也难得这么放松过，过着神仙般的生活。每天服用雷米封药片，营养餐也不错，两个月后就基本康复了。其间，我母亲来疗养院探望我两次，叮嘱我安心养病。还到灵隐寺去拜菩萨，保佑我平安。母亲的这番心意我是领悟的。

## （二十二）毕业前夕入团

说起来不好意思，到了大学四年级时，我还不是一个共青团员。大约政治上表现不够积极吧？

毕业前夕，班里开座谈会。大家围坐在草坪上谈毕业感受。我谈了自己愿望，说大学没有能够入团，毕业以后再到单位里去入团。大约这几句话感动了参加座谈的系团总支负责人。过了几天，班里团员找我谈话，希望我争取入团。于是，我写了一张入团申请报告。不久，班团支部开会，通过了我的申请。校团委批准的日期是7月16日。团费从1962年7月起交纳，每月5分钱。就这样，我终于在毕业前夕加入了共青团。内心还是有点激动与欣慰。

## （二十三）拍毕业照

1962年毕业前夕，校方要求每位毕业生上交两寸的半身照，用于毕业证书。于是，大家纷纷去照相馆拍照片。那时，杭州比较有名的照相馆有“慧光”、“大华”等。因为是毕业照，大家都很看重，也有点兴奋。当年不授学位，没有学士帽和学士服之类的。学生中穿西装的极少。我就带上我父亲的西装与领带去拍照，也不忘把校徽挂在胸前。我的这张西装照后来就贴在毕业证书上了。那个年代毕业证书上采用西装照的极少。我这一举动还算是胆大的。



图 9：1962 年，杭大毕业证书

## （二十四）毕业分配

1962 年正处于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经济结构调整、收缩。许多建设项目下马，毕业生分配同样遭遇难题。本校有些系科部分毕业生只好改行。许多同学集中到省财贸干校学习培训，然后分配到全省各地财贸系统去工作。

我们陆地水文专业还不错，全部分配到全省水利、水文系统工作，有机会发挥自己所学专业知识。地质地貌专业同学改行去了财贸系统工作。

那个年代，大家完全听从上级安排。个人就业、前途与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紧密相连。个人回旋余地很小。

## （二十五）母校情结

从母校毕业已 50 余年，心里却时常回忆大学时代的美好时光。是老师们辛勤的教诲，为我们日后走上工作岗位打下了良好的从业基础。我感恩母校！许多有关母校的资料都保留至今。这是永久的记忆。

[返回目录](#)

## 梦想生处 —— 杭州大学中文系求学追忆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张涌泉

我是在义乌农村长大的。虽然爸爸是一所中专学校的老师，但由于妈妈在农村务农，所以命运注定我一出生便是一个农民。小学、中学碰上文革，喧闹十年，并没有学到多少有用的知识。1973 年底高中毕业后，用不着响应谁的号召，我就自然而然地回到了老家当起了正儿八经的农民。干了一段时间农活后，为了谋生，我后来又当过搬运工，做过砖瓦匠。由于我身体比较单薄，其实并不太胜任这些强体力劳动。夜深人静，揉揉酸痛的肩膀，想到一辈子就要这样与泥巴为伍，心里充满了悲凉。不过，那是个连梦都不敢做的年代。面对现实，我和大家一样，只能忍受再忍受，并不指望有什么奇迹会发生。

然而，奇迹竟然发生了！1977 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作为这一制度的第一批受益者，第二年春天，我跨进了杭州大学中文系的校门。昔日的砖瓦匠、搬运工，一下子成了大学生。这一切来得如此之快，这转变如此之大，真的？假的？一切恍如梦中！

初入校门，一切都是新的：同学，老师，环境……什么都想试一试：诗歌？散文？古代文学？

当时的中文系，名师云集：姜亮夫、夏承焘、王驾吾、蒋祖怡、蒋礼鸿、徐朔方、沈文倬、刘操南、王维贤、倪宝元、蔡义江、吴熊和、郑择魁、王元骧、陆坚，等等，是一长串熠熠生辉的名字。现在看来，都是一代宗师了。他们的课，他们的书，精彩纷呈，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又一扇通向多彩世界的大门。同学们如痴如醉，很快便迷恋上了屈原、陶渊明、李白、苏东坡；迷恋上了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凌晨去书店排队买书成了当时一道亮丽的风景，读书求知成了我们共同的精神追求。很快，“诗人”、“作家”们便纷然诞生了。记得当年食堂入口的黑板报上，经常发表“诗人”们的新作，其中的一句“快把窗户打开，多放进一些春风阳光”，至今仍令我难以忘怀。

不过我却是一个丑小鸭式的人物。默默无闻，不善言辞，不好交际。这些词搁在我身上大概都很合适。说起来也有些可怜，大学四年，我连个小组长、课代表都没有当过，是我们 140 多个同学中最不起眼、最没有浪花的一个。开始的两、三个学期，我基本上是围绕着课本转，充实而忙碌。不过我心中也时不时闪动些许火花。比我们稍晚一些，系里进来了文革后入学的第一批研究生，如陈植锷、邵敬敏等。他们是我仰慕的对象。每天下午四、五点钟，他们准会出现在我们寝室窗下操场的网球场上。看到他们意气风发的样子，自己虽然有时也会冒出“彼可取而代之”的狂妄念头，或生发“大丈夫当如此也”的雄心，然而“乱花渐欲迷人眼”，面对五彩缤纷的世界，面对纷繁的学科知识，我似乎有些迷茫，不知道目标是什么。虽然年级主任刘一新老师时不时训导我们“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织网”，但我并不知道自己的网该怎么织。

转变发生在大学二年级。大约第三个学期，我们开设的一门新课是古代汉语。任课老师有一个叫郭在贻。郭老师中等的个子，说话带有浓重的山东口音，看起来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但他那渊博的学识，生动的讲授，极大地激发了同学们求知的欲望，也激起了我对古汉语的兴趣。每次听郭老师上课，就像是一种艺术享受，我总是早早地赶到教室。从那时起，我就成了郭老师的信徒，尽管当时郭老师并不认识我（那时我们上的是大课，全年级 141 个人挤在一起听课，像我这样的无名小卒，任课教师是不可能认识的）。两个学期结束，古汉语期末考试我竟然得了个全年级最高分。这使郭老师感到意外。他专门把我找了去，对我取得好成绩表示祝贺，并说了一些勉励的话。

这次意外的“出人头地”，尤其是郭老师的鼓励，给了我自信，使我明确了今后努力的方向。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的心中萌发了成为郭老师这样的语言学家的梦想。此后，我便有事没事去向郭老师请教。在郭老师的指导下，我开始阅读一些古汉语方面的名著。诸如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王念孙的《读书杂志》等等，都是我涉猎的对象。这为我今天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1980 年上半年，我开始阅读杜甫诗及其他一些唐诗的选注本，其中如明王

嗣爽的《杜臆》、清仇兆鳌的《杜诗详注》、杨伦的《杜诗镜铨》、施鸿保的《读杜诗说》，我都仔细地读过，并认真地做了笔记。一次，我把阅读杜诗的一些札记送给郭老师看。郭老师亟表赞赏，并提了一些修改意见。后来我把它们整理成文，郭老师专门写了一个书面意见，推荐给杭州大学首届文科学生论文报告会，后来又推荐给《杭州大学学报》发表。那几年，我还写了另外几篇读书札记，每一篇郭老师都仔细地看过，一字一句也不放过。记得我在一篇文章中把单人旁的“俗”写成了双人旁，郭老师用红笔在旁边写了个大大的正字，并加上方框。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别看错个字是小事，编辑看了，就会觉得作者的基本功不行，文章自然也不会给你发表了。”郭老师还把他写的论文手稿拿给我看，只见毛笔小楷，一笔一画，极其工整；所有的引文都详细注明书名、版本、卷次、页码，显示了郭老师谨严朴实的学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几年，我还有意选修了一些语言学和文献学方面的课程。诸如蒋礼鸿先生的“目录学与工具书”、王维贤先生的“语法研究专题”、郭老师的“楚辞研究”，都使我获益良多。蒋先生讲课极富条理，一字一板，娓娓道来，生动而有趣。他十分重视基础知识的掌握，强调治学要打好基础，练好基本功。但我当时已热衷于所谓“著述”，先生的话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并没有放在心上。期末考试，只有一道题，就是标出十来个字的四角号码。由于我事先重视不够，缺少准备，一时手忙脚乱，胡乱标注一通，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事后，我上蒋先生家，先生问明原因，并没有多加责备，而是破例允许我补考一次。这使我既惭愧又感激，铭记终生。后来我又和计伟强、郑良根一起在蒋先生的指导下撰写题为《〈太平广记〉引书考》的毕业论文，增长了许多文献学方面的知识。当年我写的一些“札记”、“商榷”性的所谓“论文”，蒋先生也都认真看过，并且丹黄杂下，几乎每页上都留下了先生红笔或蓝笔楷书的批注，或指明结论正误，或改正错字错句，或指示写作方法，或补充资料，使我知道了自己文章的问题所在。其中有一条关于陈子昂诗的札记，我的原稿约 340 字，而蒋先

生的批注却有 370 余字。先生对后学的殷殷关怀之情，先生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都洋溢于字里行间，令人感动，促人奋进。

正是在蒋先生、郭老师等母校老师手把手的教导下，我一步步走上了治学之路，并曾在《杭州大学学报》、《浙江学刊》、《语文园地》、《中国语文》等刊物发表过或长或短的论文，算是掀起了些许浪花。

1981 年底，我结束了四年的大学生活。虽然郭老师极力推荐我留校任教，但由于种种原因，我还是被分到了远离杭州的一个小县城工作。对此，郭老师十分惋惜，但他劝我不要灰心丧气，并用毛笔写下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十四个大字送给我。在我悲观的时刻，是郭老师的临别赠言，给了我按既定目标继续前行的信心与勇气。

告别母校，我踏上了新的路途。虽然世事多艰，前路难料，但四年的大学生活，给了我知识，磨练了我的意志，孕育了我人生的梦想。有梦想就有希望，我已作好准备，去迎接新的更大的挑战！

作者补记：

1984 年 9 月，在义乌图书馆工作两年半以后，我考回母校杭州大学读硕士研究生。1986 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后又去四川大学、北京大学读博士、做博士后；现为浙江大学资深教授。曾获中国社科院青年语言学家一等奖；2011 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张涌泉卷》。大学读书期间孕育的人生梦想，正在努力成为现实。谨补叙于此，以志铭感。

[返回目录](#)

## 杭大杂忆

——杭州大学新闻系 94 级 陈欣文

1994年9月21日，一个平淡无奇的上午。天似乎还很闷热，以致于我骑着那辆伴随我高中三年学习的26寸凤凰自行车，从吴山脚下赶到宝石山北的杭州大学时，一身大汗。

在9幢前面的体育馆里报完了到，却无处可去。所有杭州籍男生被告知，因为大学第一年扩招，所以宿舍不够用；杭州男生先走读，以后有宿舍了再说。杭州女生倒是有宿舍，据说推迟报到就是因为4幢女生宿舍上加三层，来不及完工所致。

于是看着未来四年的同学们领着自己的宿舍用品，忙着打扫房间，布置新床，认识即将同居四年的室友。自己一个人有点无所事事，干脆报完到就骑车回家了。

这是我的杭州大学生活的第一天，感觉还在读高中一样。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是每天骑车上大学的，直到后来教育系寝室里有了一个空铺，我成了94级教育男生寝室里的一员。那又是另外一段故事了。

那一年的我们是中国最后一届公费生。一年学费450元。而第二年我弟弟考上杭州大学旅游系时，学费迅速攀升到了三四千元了。印象中，曾在毕业时算过一笔账，大学四年拿到的奖学金，似乎付完学费后，还有得多。想来这真是一个美好年代。

### （一）我与沈师

第一次见到沈爱国老师是在第一次专业课——新闻采访与写作上。这一相识就是师徒24年。

记得那是第一节课间休息，沈老师和我们几个坐在第一排的学生闲聊，问我们名字。当知道我来自于杭四中时，他脱口而出，说你有一个九零的师兄，叫楼坚，认识不？也是你们四中的。当时就很崇拜

这份记忆力。后来才明白这是遇上新闻系活字典了。那时，活字典沈老师不仅记得住学生的人名，籍贯，甚至于学生高中毕业哪所学校、父母做什么的都记得住。当然，上完采访课后，我也大体明白沈师有这手绝活的原因了。在沈师的采访训练里，专门有要求我们能迅速找到与采访对象之间的共同话题，拉近距离。正是得益于这一招，让我从一个不太会和人聊天的人，变得在别人眼里成为一个见面熟的人。

新闻采访其实是一门很能难上的课。上得不好，容易把一门好端端的实践课上成枯燥的理论课或者是套路课。但沈老师行，因为他从读书开始到在新闻系上课，都一直没有离开过新闻采访一线。从《杭州日报》实习，再到后来兼任《义乌小商品世界报》老总、《浙江青年报》副总等等，让他有讲不完的采访经验。在我看来，采访其实哪有什么多的理论？其实就是和人说话，让人愿意和你说话，不愿和别人讲的事愿意和你说。然后，就是有办法进现场。脑子要活，要能随机应变，想方设法地钻入现场，拿到第一手材料。因为，采访除了用嘴外，还要用眼，用鼻。

当然，如同黄旦老师那时在课上说的那样：新闻其实无学。系里强调，我们这些学生一定要实践，听半天课不如上场练一练。于是大一暑假，我和大二的水康、翼飞二位师兄就随着沈师南下义乌，参与到《义乌小商品世界报》的合作项目中去了。那一年暑假，可以说是每天跟着沈师混，跟着参加谈版会，跟着看老师如何与陌生人打交道，然后吃住在一起，一同来回义乌杭州两地。所以说，要说后来为什么在专业上这么有自信，我想完全就是得益于那段经历。新闻其实是一个很适合用传统师徒制教授的学科。很多东西是要你自己在师父身边跟着自己领悟的。

那一年实习对我的另一个意义是接触到中国城市的不同面。我永远忘不了和沈师二个人挤着一辆严重超载的火车回家的场景。那是一辆人从窗户里爬进车厢，连上面行李架上都横躺着人的列车。我们二人挤在两节车厢之间，空气闷热无比。边上一个乘客的蛇皮袋里大概装着金华火腿这类的东西，往外泛着油，透着难闻的味道，并混合入二步路距离的列车洗手间味。很多年以后，和沈师回忆起那一天的场

景时，我们都会说，真是全靠一瓶白花油续命。我想，这对于从小到大未离开过杭州的我来说，这真正是叫长大。

毕业后，常被沈师叫回系里给学弟学妹分享鲜活的新闻事件采访经验。每次都能在师弟师妹们的眼里，读到当年我们上沈师课时的兴奋，因为真的很精彩。所以，沈师也理所当然的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

但对于新闻系来说，沈师的意义在于：他是恢复高考后，新闻专业的第一届本科生，而且毕业后一直在新闻系任教。三十六年来，贯穿所有学生。在我眼里，他就是新闻系的文脉所在。无论新闻系前面被冠以什么样的大学名字，只要沈师和那一批老师在，新闻系就还是那个新闻系。

回过头去看，1994年的杭州大学新闻系的确可以称得上拥有当时中国新闻教育最为强大的阵容之一。教传播学、新闻学的黄旦老师，教报纸编辑学、通讯写作的吴飞老师，教新闻采访与写作的沈爱国老师，教新闻摄影的徐忠民老师，教广播电视新闻的俞虹老师、朱菁老师，教广告的潘向光老师，教外国新闻史的刘青老师……这些八十年代毕业后留校的大学生，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后，正进入他们各自的第一个思想高峰期。后来，这些老师中出了复旦、北大、浙大的新闻院系掌门人，出了当下传播界的“南吴”。想想这样的授课阵容，大概连博士生也不过如此，堪称豪华。

## （二）杭大青年报

大学第一年就要去《杭大青年报》实践。而且，这样的实践甚至被系里老师提升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某些时候甚至比上课还重要。这大概也是当时杭大新闻系的创举。于是从大一到大三，《杭大青年报》成了我呆得最多的地方。我伴随着《杭大青年报》，从西二搬到东横，再搬到游泳池后的小平房。

现在回头想来，那时的《杭大青年报》不仅担负着让新闻系学生真枪实刀干新闻的任务，更是新闻系上下几届相互熟悉的重要场所。

在里面实践，上可认识前三届的师兄师姐，下可识后三届的师弟师妹。我想，到今天毕业这么多年后，师兄弟相见还是如此亲热，就是得益于在校园里这份友情。

记得当年我们入报时，正是92级师兄师姐当总编。我们几个一年级新生的稿子，要么被心直口快的小个子程洁批得鼻青眼肿，要么是看到另一位老总师兄老六露出诡秘的笑，让人发毛。因为这肯定是稿子又写得不好了，被笑话了。但被批评了，大家也觉得开心。整个《杭大青年报》讲究的是评报对事不对人，大家纯业务交流。以至于当时分管这张报纸的杭大团委书记刘军有事没事就爱溜达到《杭大青年报》来看贴在墙上的评报，因为实在好看。当然，评报这事对我个人造成的严重后果是，在我最初工作的几年里，还沉浸在学校对事不对人的评报风中，以至于得罪了不少人。

当然，《杭大青年报》每天最好玩的时候是晚上九点后。各路神仙或酒足饭饱回营，或因错过打水，赶来蹭电，用热得快烧水。还时不时会有已工作的师兄师姐回来坐坐。那是报社里最热闹的时光。记得，现贵为省报集团领导的某师兄每每喝多，必到《杭大青年报》社小坐。开场白必是，话说天下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听到这个开场白，我们就基本上不和他辩论了。那要一辩论起来，就是黄河之水连绵不绝了。

当然，和《杭大青年报》一样，占据校园媒体重要地位的是校广播台。那儿有着另一帮新闻系的同学在实践。1994年的杭大新闻系，刚升为新闻与传播学院。学院里希望他的学生都是专家型记者，鼓励我们去旁听其他系的课。然后还没有把学科分得很细，我们是什么都要学，广播、电视摄像、新闻摄影、编导、暗房技术。二十年后来看，那真是全媒体记者的套路呀。

我们这一届人毕业，大多去了媒体，既赶上了纸媒最后的黄金十年，又赶上了传统媒体因互联网冲击大衰退而转型全媒体。所以，命运其实早就替我们在大学时代就做好了铺垫。该学的也都学了。

1998年，新闻系毕业的我去《都市快报》，参与了创办。一高中同学去了《东方通信》，当时待遇好的吓人。另一高中同学因学外贸去了阿里巴巴，当时都不太怎么有名的一家公司。二十年后……

### （三）酒肉时光

新闻系脱胎于中文系。中文系当然是有文人之风。是文人就少不了喝酒。喝酒就一定会有喝醉的时候。

记得某一次喝酒，喝光了整条西溪路店里的口子酒。当时，杭大海鲜楼的口子酒喝光了，又去西溪路上小店买，一直到买到没有存货。那一天回宿舍的后果是，第二天醒来，发现老爸坐在宿舍床头，告诉我昨天喝多去医院打醒酒针了。另一醉酒的后果是，半夜起来上厕所。不想早拐一半米路，直接拐进历史系寝室，对着历史系兄弟的床撒了一泡尿。弄得历史系同学第二天一早就去道观求符，因为我并不是惟一个提早拐弯撒尿的人。

记得那时后门的阿林刚因开酒楼失败，带着老婆开了一家饺子店，叫来师傅。一盘饺子，一盘花生米，无数啤酒，伴随不少新闻系的人度过了美好时光。

回望1994年的杭州大学，感觉如同整个社会一样，还处于八十年代的纯朴惯性。老师与学生更像是旧时的师傅与徒弟。除了课堂上授业解惑外，还在平时生活里言传身教，可谓师生融融。像我们一批新闻系的学生，平时没事就往老师家窜。除了请教学习外，就是打老师牙祭。尽管1994年的他们其实收入不高，14元一份的葱油扁鱼其实对他们也是不便宜的。

至今还记得沈师做的红烧大排的味道；记得老潘炒菜的样子，记得老潘家书架上一排排对我来说本本都是未知新世界的书。

几天前，因为教育系室友回校参加毕业二十周年活动，重回校园。晚上九点多的校园里冷冷清清，大草坪的灯光树影下，只有我们几个人在放肆欢笑。已为北师大博导的室友落寞地说，这好像已不是当年那个热闹活跃的校园了。

我们所在的四年，或许真的是杭州大学最后的黄金年代。

那是平平淡淡的 1994 年，中国工程院院士才公布第一批名单。此后二十年，本科从杭州大学毕业的院士有 8 名之多。只是江湖上已再无杭州大学之名。

[返回目录](#)

## 我的大学，我的芳华

——杭州大学中文系 78 级 杜文庆

考上大学那会儿，我刚满 19 岁，正是现今大一新生的年龄。所不同的是，此前我已然在江湖中闯荡了两年。此江湖乃真江湖，姚江甬江奉化江东钱湖是也。干的是跟《水浒》中浪里白条差不多的营生。不过，未曾像张顺那样，有过什么勾当。

赴杭前一天晚上，近在邻村的几位姐姐都来了，手里拎着烧饼之类的“路彩”。她们在母亲的指挥下，七手八脚地帮我整理衣服，一件件装入箱子，仿佛为出嫁的姑娘整理嫁妆。小姐姐还手把手教我怎样折叠衬衣和裤子。以至于多年以后，每每折叠衣服时，我就会想起那个秋天的夜晚。

进校后才知道，中文系 78 级 102 位“同科进士”中，多数年龄比我大。最大的 31 岁，最小的才 15 岁，21~23 岁的居多。同学中有两位从临海来的亲兄弟，同在二班，演绎的是现实版的“兄弟连”。据说，全校还有母女双双考上大学的。这显然是十年浩劫，高考停摆和中小学学制缩短造成的乱象。也是清末废科举、兴学堂以来，罕见的“风景”。学历也参差不齐：有“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的，有仅上过小学的，但更多的是“文革”时读完初、高中的。与年龄和学历不一伴随而来的是，过往的经历呈现多样化：除了极少数应届高中毕业生外，下乡知青、回乡“知青”、中小学代课教师、复退军人、带薪上学的工人、城镇待业青年……这各色人等中，当然也包括我，江湖人士，长年在水上漂流，以船为家。

当初入住时不曾想到，110 这个宿舍号，于我有什么寓意。大学毕业回上虞，在总工会、人事局和组织部转过一圈后，被调到公安机关从事政治工作。从此，竟终生与 110 有缘。不得不令我感叹命运的神奇。

那时，杭大中文系在分部，即今省总工会干校之所在。教学和生活设施也许比总部更简陋些。宿舍没电扇，更遑论空调。公共浴室无

热水供应，冬天洗澡须自带热水瓶。麻辣豆腐和青菜大块肉是食堂的当家品种，也是大家的最爱。就餐时，个个像穿着长衫的孔乙己，围住四方桌站着吃。那时上大学没有学费一说。家境不太好的，还可申请人民助学金。我享受的是一等助学金，每月 18.5 元。至大四时，鉴于物价上涨因素，已调到每月 21.5 元。以现在的眼光看，这点钱才够吃一顿早餐。可在那时，足以维持我一个月的开销。而且寒暑假照发不误。假期里还能得瑟得瑟上街买些菜，与母亲相依为命。

尽管当年的学习和生活条件不比现在，但大家都很有知足。我们中的大多数，都曾饱尝失学的痛苦，都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更何况，“文革”过后，百废待兴，“四化”建设急需人才。因而，大家都有一种时不我待的感觉。排队打饭，拿出小本子默记外语单词；一边走路，一边念念有词地背诵古诗词；去校图书馆借书，不把书包填满不罢休……

至今记得部分老师的讲课风格、音容笑貌和习惯性动作。抗战时随浙大西迁、艰难求学的刘操南先生，讲屈原的《离骚》时，讲着讲着，便手舞足蹈地吟诵起来，让我们见识了老一辈文人吟咏古诗的风貌。教“古代汉语”的蒋礼鸿先生，有时几乎整堂课就讲一个词，讲自己的考证如何取得突破，成就感和自豪感溢于言表。教“文学概论”的 W 老师，讲课时永远是目视前方或左右两边，从不正视清一色坐在前排的女生们一眼。讲“中共党史”的 H 老师，讲课一会儿后，必定是满嘴的白沫。好在他事先准备充分，迅即从裤袋摸出手绢一擦，便兴致勃勃地继续讲下去。教“政治经济学”的 C 老师，上课时，每隔一阵子，就要将松褪的裤子往上提一下，引得眼尖的同学暗暗发笑。

最受大家欢迎的老师，无疑是主讲“古代文学”唐诗宋词部分的吴熊和先生。这位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的嫡传弟子，身材魁伟，天性洒脱，谈吐不凡。他来上课，不带任何东西，除了手表。每每上得讲台来，从手腕上摘下手表放好，便开讲，便旁征博引，便挥洒自如。令我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充分体味到了唐诗宋词的美妙和瑰丽。听他的课，常常让我们忘记了时间。

在规定课程之外，校系两级举办的各类讲座，同样让我们受益匪浅。高科技知识系列讲座，让我们这些文科男、文科女，对当时全球高科技发展的概况和趋势有些许的了解。曹禹的讲座，让我们领略了这位中国现代著名剧作家的风采。美学家王朝闻，音乐人沈逸亭和周大风，电影导演岑范等大家的讲座，对加深我们的艺术修养，提高我们的艺术鉴赏水平，有较大的帮助。安徽劳大沈敏特教授的“思考在进展”，则引领我们不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紧张的学习之余，各种文体和联谊活动时有开展。开学不久，受改革开放浪潮的推动，在校团委和学生会的倡导下，同学们挣脱传统思想的束缚，兴起了学跳青年交谊舞的热潮。男女同学手拉手，随着《青年圆舞曲》激越和欢快的旋律而舞动、旋转。有的显得灵巧，有的显得笨拙。我自然也被裹挟进去。当拉住一位女同学的手缓缓起舞时，一种异样的感觉袭过我的心头。瞬间，羞涩写在脸上，甜蜜涌进心房。跟我同室的一位同学，随后还去学跳国标舞，回寝室后意犹未尽，把自己的枕头当舞伴，搂着枕头跳起来。周末晚上，我们常去邻近的文二街露天电影场看电影。不过，跟别的系和专业不同的是，我们看电影不仅仅视为业余生活，还视作课堂的延伸，即把它看作学习艺术创作的好机会。

那时候，“振兴中华”这一口号在全国喊响，各行各业的人们对中华民族的腾飞充满憧憬和期待。当从电视上看到中国足球队主场以3:0的比分，干脆利落地拿下科威特队，进军罗马世界杯希望大增时，挤在系行政楼小小的黑白电视机前观看直播的同学们沸腾了，个个欢呼雀跃。我和一些同学兴奋得赶紧回宿舍，将自己的热水瓶往楼下扔。许多同学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将寝室里的扫把充作火把点着，连夜上街，一直到保俶路才返回。

在共同的学习和生活中，一些男女同学，尤其是年龄稍大的同学，渐渐互生爱意。西溪河边，杨柳树下，偶尔能见到一对对男女窃窃私语。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最后一个学期开学不久，我和一位来自余姚的同学在教室看书。其间谈到同学恋爱，他说：“我们年级的女同学都

被分光了呢！”我愕然。许多年以后才知道，当时全年级 20 名女同学并未被“分光”，最终牵手的仅一半。

转眼到了毕业季。大家手捧同学录，在一个个寝室间转悠，互相留言，互道珍重。有的还去公园空旷处野炊。有两位家境稍好的同学，叫上我，跑到解放街天香楼这个高大上的酒店，享用“最后的晚餐”。除了西湖醋鱼和龙井虾仁等杭城特色菜，还要了 12 瓶鲜啤酒。边上的服务员看我们喝得晕乎乎的，好言相劝。我们三个借着酒劲，开起了玩笑：“我们大学毕业了，被分到边疆了！”服务员信以为真，脸上露出深深的同情。

临别的前夜，篝火晚会在礼堂南侧的空地上举行。夏日的夜晚，繁星闪烁，暖风劲吹。柴堆越垒越高，火苗越窜越旺，映红了一张张青春的脸。《青春圆舞曲》缓缓地响起。大家唱啊跳啊，尽情地抒发着同窗四年所凝聚的深深的同学情和将要各奔东西的依依惜别之情。此时此刻，大家的心底里无不升腾起一个美好的念想：愿我们的青春永驻！愿我们的芳华在这里定格！

### 返回目录

## 东学西渐 —— 我的大学

——杭州大学新闻系 95 级 朱晶

二十多年过去，我还清晰地记得 1995 年 9 月大学入学的那一天。

各个院系都在杭州大学校门口摆上了迎接新生的摊子。男生们簇拥在摊前，期盼见到新入学的师妹。我们这一届新生规模特别壮大，新闻学院第一次设立了广电新闻班，加上原来的新闻班和广告班，人数创下历史新高。这也是新闻学院史上第一次女生人数超过男生人数，而且是美女众多的一届。

广电班的女生比较耀眼。有主持达人袁露、校园十大歌手陈蕾等。而新闻班的女生则显得比较霸气，印象中的女汉子有章苒、汪文等。我可能也能算上一个吧！我们这样大大咧咧的，就只能被称为“某妈”。全班 41 人，只有 11 位男生。每次班级活动都需要“某妈”屈尊去男生寝室邀请。可是，等到第二年我们迎接大一新生的时候，班里的男生都激情高涨，从没骑过三轮车的，都急急忙忙赶着去学车。现在回想起来，又郁闷、又好笑。

新闻班女生的另一个特点是喜欢读书。315 寝室的“娃娃”，皮肤雪白，温柔而闲静，总是买很多文学名著，大方地与大家分享。我们 316 寝室，有两位来自外省的同学，其中来自海南的室友赵瑜，和湖州美女邹银惺热衷于言情小说。冬日午后，阳光洒进屋内，两人总爱躺在床上，慵懒地读着《上错花轿嫁对郎》等后来演变成电视剧的名作。另外两个女生，分别来自河北的朱静和绍兴的郑英，是好学生搭档，不仅酷爱言情，而且每晚总是结伴去图书馆学习。爱读书的同学，文笔自然都不错。每当课上需要互相点评作品的时候，我都有些紧张，羡慕郑英的细腻和赵瑜的风趣。

比我们高一届的 94 级，有许多非常活跃的男生。新闻系的同学都记得《青年报》，这是我们校园实习的圣地。我的直接领导是《青年报》的两位老总——东悦杭和陈欣文。东总少年老成，白白净净，手握香烟，很符合文学作品中的书生形象。他貌似高冷，其实很风趣幽

默，那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更让人印象深刻。陈总则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是方言里热情的“人来熟”。而且人如其名，热爱新闻事业，多年来也一直执着于新闻事业，现在已是杭城媒体界名人。

通过他们，通过《青年报》，我有幸认识了走下讲坛的新闻学院老师和校园里其他名人。吴飞老师的两个弟弟，在校园里开办了一家文印室。一个弟弟圆圆的脸上永远带着笑容，另一个弟弟白净而安静。吴飞老师有空也来文印室坐坐。《青年报》的编辑们每周都要去文印室校对稿件，检查印刷品质。他的两个弟弟陪我们熬了无数个夜。

新闻学院另一位赫赫有名的老师，是教授新闻采访写作的沈爱国老师。他开始是陈欣文的偶像。经陈总广为传播，等沈老师从义乌兼职《小商品世界报》副总编一年以后归来，他已是95级女生的偶像了。除了他风趣的讲课，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火眼金睛。某晚下课后，他走进吴氏兄弟文印室，顺手拿起待校对的《青年报》，一眼看到头版上的照片，就忍不住哈哈大笑。那时候打印机清晰度不高，照片里参与校园活动的男生，看起来像是手里提了一条大裤衩，很不雅观。他建议我们赶紧更换照片。

许多年后，当我在异国研究、参与国际经贸法律制定时，大学生涯的印迹依稀可见。也是无数个夜晚熬夜到凌晨，也需要像记者那样擅长与人打交道、客观公正地摆明事实。更需要像编辑那样斟字酌句、苛刻地挑剔自己的文章和其他政府机构、企业提交的意见。因为一字之差，就可能影响一个行业未来的发展。

教会我这些道理的，还有一位老师，那就是教授新闻史的何扬鸣老师。新闻系的其他老师都紧跟时代发展，而何老师却是属于一心一意象牙塔钻研学问的人，清贫而严谨地治学。作为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他“逼迫”我静下心来走进图书馆，反复翻阅《申报》，研究《申报》对西安事件的报道。我的大学图书馆居然珍藏着整套《申报》，而且这套古籍任我翻阅，真的让我有些吃惊。那时的《申报》，评论犀利，报道及时生动，就连征婚启事都很有文采，让我深深体会到文字的魅力。

### 返回目录

## 众多的思想政治教育

——杭州大学中文系 62 级 熊恩生

上世纪 60 年代初期，当时国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中苏关系又不断恶化，加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指导，故各级党组织都非常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高校思想工作和政治学习也抓得特别紧，也特别多。我们不时可以听到校系领导的时政报告。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吕志先校长和陈烙痕副书记就多次给全校师生做过国际国内形势、树立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反修防修等报告。政治系主任也为我们做过关于“三面红旗”和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报告。系里也时常组织时政学习，如通报 1962 年浙江的灾情、学习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和《人民日报》九评重要文章等。除经常性的时政教育外，学校还不时组织学生参加一些社会上的政治活动，如参观公安展览会、参观军事展览馆，参加“于子三事件十五周年纪念会”、参加“声援古巴人民，抗议美帝侵略”大会，听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英雄报告、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晚会等。

除校、系组织的一些活动，当时学校的党团组织和年级、班委等基层组织非常健全，也非常活跃，往往是一些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具体组织者。我们这个年级，有 3 个学生党员，建有一个党支部。党支部书记是教我们外国文学的华宇清老师；后又成立了年级委员会，由华宇清、许婉薇、丁茂远、蔡良骥 4 位老师组成。我们班还有 11 个团员，入学后建有一个团支部；根据团中央关于高校学生团支部书记不连任的决定，我和林崇明、沈永欣先后担任过班团支部书记；班里还有一个班委会，毛五星、孙炳勋和唐森灿先后担任过班长。班团支部虽是学校的一个基层组织，但因我们这个班，学校、系里都特别重视，是学校领导的联系点，省委书记处书记、杭大党委书记、校长吕志先专门为我们班题词，校团委更是把我们团支部列为全校联系的重点支部。班里的主要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不少都是在校团委直接领导下由

团支部、班委组织开展的，故组织的活动不仅多，也格外认真。记得当时党中央发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和“全国学习解放军”的号召。特别是学习解放军，在高校里也是风行一时。回想起来，主要有这么几项活动：

学习雷锋活动。1963年2月，雷锋的先进事迹已陆续见报。根据校团委的部署，班团支部即专门召开了座谈会，座谈学习雷锋事迹之后的感想和体会。班里更掀起了一个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高潮，组织听雷锋生前战友的报告，观看浙江民间歌舞团的歌舞演出《雷锋》和反映雷锋生平影片《伟大的战士》，参观校团委举办的“学习雷锋展览会”等。班团支部把学习雷锋作为团支部组织生活会的重要内容，并与班委一起联合召开了一次“像雷锋同志那样生活和战斗，做一个优秀的大学生”的主题班会。一时间，同学们还联系实际，向雷锋同志学习，互帮互助，助人为乐，做好人好事。雷锋的事迹深深感染了我们那代人，在我们心灵中烙下了抹不去的印记。记得当时我曾专门写过一首《学雷锋》的诗激励自己。

开展阶级教育。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当时解放军曾从忆阶级苦、民族苦入手，开展了“两忆三查”活动。1963年下半年开始，学校也全面开展了阶级教育。对这次阶级教育，学校和团省委都特别重视。吕志先校长、朱子英书记和系总支书记魏佑功、校团委书记杨招棣都亲自参加了我们的座谈。吕志先校长和团省委副书记胡一元、学校工作部张贤志部长还参加了我们的班会和小组会。为配合这次阶级教育，中文系还举办了“回忆对比，忆苦思甜革命歌曲大联唱”晚会。阶级教育主要是回忆对比，忆苦思甜。先是分小组谈，每个人都谈，再召开主题班会谈。我也在小组里和主题班会上谈了自己的家史，讲了童年时代的苦难生活。除忆苦思甜，阶级教育还要进行“自我革命”，结合学雷锋活动，开展“三查（查思想、查根源、查危害）一比（比雷锋）”。干部带头检查自己的不足，清除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思想建设。

进行摆好评功。这本是大庆人的一条重要经验，目的是依靠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1964年上半年，全校都开展了这项活动，还专门

组织我们听了一天关于大庆油田的录音报告。我们班也是一样，主要是自己先摆，以自己摆为主，然后再相互摆。个人摆后，再摆小组，最后摆班级。真是人人动手，个个上阵。班里还布置了摆功台，开了两次主题班会。第1次是班集体给个人摆，第2次是给班集体摆。第一次班会，班集体摆了4个人，有何明春、楼月芳和姒乘法同学，我也是被摆的一个。我所在的小组代表和其它同学给我摆了好多条好和功，我也一样给其他同学摆了许多条好和功。摆好评功虽有点片面，只看到好的、优点方面，但也说明，每个人身上都会有好的东西，都会有一些闪光的长处和亮点。“三人行，必有我师，”对于一个善于吸收别人长处的人，他在任何人身上，都会找到自己可以学习的东西。做人的思想工作，就是要唤醒和激发他身上的正能量。当然，人不能只听好话，应时时正视自己的不足和缺点。差距就是潜力，就是进步的压力和动力。

众多的思想政治教育，正是我们这代大学生经历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也是与当时我们所处的整个大时代环境有关。现在回头反思，除活动过多之外，针对学生的特点也不够，往往上下左右一个样。但有一点我觉得还是好的，那就是坚持在上述教育活动中注意正面教育，激励学生上进。虽也不时要联系思想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但从不整人，而且要求党、团员和学生干部带头。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又红又专、入团入党、积极向上，成了我们班当时不少同学追求进步的目标。也正是在校、系和年级党团组织的培养和教育下，我和林崇明同学先后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徐静茜、陈景煜、唐森灿、杨仲坚、潘中和等同学也先后被吸纳为共青团员。如果不是搞文化大革命，我想我们班会有更多的同学入团入党。

回忆大学的政治思想教育，有一位老师特别值得我怀念，他就是时任校团委书记的杨招棣老师。我们班的许多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基本都是在校团委直接领导下开展的。杨招棣书记及校团委的干部也成了我们班的常客，班里许多重要活动他们都亲自参加。杨招棣老师和蔼可亲，工作作风非常深入，一点架子也没有，能与学生打成一片。有两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刻：一件事是，1964年2月农历年初二上午，

他约了我班家住杭大附近和寒假仍住在学校的林崇明、毛五星、庄炳基同学到我家来看望、拜年。随后我们又一块去了家住杭州的另 2 位同学家看望、拜年。这件事很出乎我意外，学生看望老师，给老师拜年是常有的事。但老师看望学生，给学生拜年却不多见，足见杨招棣老师之平易近人。另一件事是，为了开展班里的思想工作，他曾一度亲自到我们班的寝室里住了一段时间，搞调查研究，与同学们谈心，亲自做班里同学的思想工作。这样的工作作风，即使在那个火红的年代也不多见。

特别让我敬佩的是，在那个“左”的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年代，他并没有过左之举，总是坚持正面教育、与人为善，坚持鼓励、帮助为主。我们班有一部分同学出身非工农家庭，但他从不歧视，总要求团支部、团员要与他们交朋友。如我们班有位同学，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平时生活比较散漫，思想比较消沉，班里有的同学也不太要看他。但杨书记并不嫌弃他，而是要求我们班干部多同他接近，并特地在我们班寝室蹲点时，亲自做他的工作，鼓励他上进。见他平时爱睡懒觉，还鼓励他早起参加晨间锻炼。上文说到的杨书记年初二给学生拜年之事，其中就有这位同学。正是在杨书记的启迪之下，1964 年上半年，在班级评功摆好会上，班里也把位同学作为 4 个人选之一，集体给他摆了好几十条好的方面，对他鼓舞很大，班会上还做了中心发言。

杨书记与我们班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不仅班团支部是他和校团委的联系点，而且文革前在诸暨湮浦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他同我们班同学也在同一个工作队。不久前杨书记因病去世的消息传到我们班这个微信群里后，大家都非常悲痛和怀念，商定以原杭州大学中文系 1967 届一班全体同学名义送个花圈。我和林崇明、唐森灿等几位杭州同学还参加了杨书记的告别仪式。一个校团委书记、一个政工干部，时近 50 年，我们班的同学还这么崇敬他、怀念他，不正印证他工作之敬业与人品之高尚吗？

[返回目录](#)

## 可爱的同学 可爱的老师

——杭州大学新闻系 91 级 叶靖

从杭大新闻系毕业，已经有 23 年的时光了。所以当沈爱国老师“命令”式地来征稿时，四年的大学往事，便似吉光片羽在无垠夜空中划落地球，冲撞着我的心灵大脑。有些离幻恍惚，却又铭心真实。大学四年虽是短暂，但余生漫长，而记忆更是深厚绵长。

记得 1991 年新生开学典礼的前两天，张梦新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代表 91 级全体考入杭大的新生在开学典礼上发言。当年的发言内容我已记不清了，只记下了开学伊始，素昧平生的张老师对我的看重、信任和培养。

当年，91 新闻一共只招了一个班 30 个人，班主任是刘清。刘老师把全班同学召集起来，很直率地说：“叶靖是杭州人，相对各方面熟悉一些，为大家服务也方便些，所以先指派她为班长。一个月后，大家熟悉了，再民主推选。”

刚开学就被老师寄予希望，让我不严格要求自己都不行。之后，班主任刘清的一句话更是震撼到了我：“叶靖，对人真诚是需要的，但你也不要委屈自己，对人太好。”天啊，还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这甚至有些颠覆了我从前受的教育。我在想，这老师怎么这么直白。但我心里知道，老师是真心为我好，没有一丝丝虚伪，带我客观地看待这个世界。从这句话中，我悟到了很多很多，感觉正是从那个时候，我真正长大了。

在刘老师的指导支持下，我这个“指派班长”工作做得很顺利。记得有一次义务劳动，帮助系办公室搬迁、打扫卫生，我要求全班同学下午准时到场。结果全体女生都到了，而男生不见一个踪影。于是，我二话不说，骑上自行车来到男生寝室，一脚踹开房门，大吼道：“上午不是动员过了吗？你们怎么还没反应，为什么这么自私！”说完扭头就走。没想到，一群男生乖乖地跟来了，还抢着干活，说着好

话逗我开心。哈哈，同学之间的情谊就这样变得越来越深。一个月后，我全票当选，成了“正式班长”，而且，一当就当四年……

有人说过，同学间的友谊因为单纯、美好，故而更为牢固长久。的确不假。那个时候，大家一起上课学习、一起嬉笑打闹、一起挥洒青春……

我们班的徐少杰，如今是浙江教育科技频道的节目部主任。当年因为弹着吉他唱《阿西们的街》，被我们取绰号“阿西”。“阿西”很有能耐，在我们开学还认不全同学的时候就已经“骗”上了同班女生王晓宇，并一直“骗”成了老婆。而其间的过程中，比如遇上两人拌嘴使性子时，自有身边好事同学们耐心地“劝和不劝离”。

王俊，如今是浙江广电集团编委、浙江卫视总监。当年在他自编自导的戏剧《葛朗台》中扮演“葛朗台”，还偏要让我演他女儿，管他叫“爸”。

周婵瑾，温莫邪，如今一个是绍兴广电总台广播中心总编，一个是湖州日报新闻办主任。当年可是明晃晃偷吃我老妈从家里给我送来的私房菜，还嚷嚷“带得太少，不过瘾”。

管哲晖，我们班的团支书，和我并肩战斗。干啥？为全班同学“请愿”。记得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们摸到了王兴华老师的家里，说我们都是大学生了，学习不能死记硬背，所以要求老师给大家开卷考。没想到王老师还真的答应了。记得王老师很认真地嘉许了我俩“直言”的精神，但也表明有些知识点是需要记忆的，要我们回去把这层意思传达给同学们，同时表示他会为了我俩的请愿再出一份试卷，全是论述题。“我同意开卷考。但论述题，开卷了也没用，哈哈。”王老师最后这么来了个调皮。

咱们新闻系的老师就是这样。他们倾听学生的意见，尊重学生的想法。他们可爱、开明。还记得有一次系里推荐优秀班主任。当时，其中一项是让所在班级的班长，结合全班同学的意见，给自己的班主任写推荐材料。我记得是用抒情散文的形式，给我们的班主任刘清写了一篇情真意切的推荐文。当时那份发自内心、饱涨的真情，直到今天我都记忆犹新。结果，后来系里有位领导对我说，本来考虑到年轻

的刘清还是第一次担任班主任，而且时间不长，他们打算推选另一位老师。但看了我的推荐，看了同学们的意见，真的是被感动到了。于是决定一致推荐我们的班主任。看，这就是我们可爱的新闻系，可以因为学生的一篇文章而改变决定。我还记得后来刘老师拿来奖金，全部交给我做了班费。

那时候，天空总是很蔚蓝，日子总是很简单，师生总是很融洽。我们很喜欢上沈爱国老师的“新闻写作”课。因为在课堂上，我们总是能听到最有时效、最鲜活、最生动的例子。记得有一次，我与周婵瑾因为和沈老师讨论一个课题，误了食堂的饭点。结果，沈老师叫上潘向光、洪沿两位老师，带我们一起去了学校对面的小饭馆。吃完结账，一共105元。三个男老师每人掏了35元。饭后，我们还去了潘向光老师的宿舍喝茶打牌。哈哈，很感谢这些亦师亦友的老师。每每回想，心中便充满美好温暖。我知道，直到今天，沈老师依旧是一届又一届师弟师妹们眼中的“大哥哥”，为他们的学业与生活传道、解惑、帮忙。

不过，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对老师还是毕恭毕敬，不敢造次的。治学严谨的张梦新老师，给我们上的是“中国古代文学”。张老师学养深厚，备课极其细致，授课十分认真。厚厚的四本教材，我在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听课笔记和心得，打下了扎实的文字功底。也正是老师这样的教导，使得杭大新闻系毕业的学生在日后从事新闻工作，既能做即时性报道，出手很快；也可写深度大专题，走得更远。

写到这里，忽然想到一件趣事。那是张梦新老师的公子张进，后来也就读于杭大新闻系1994级。大四在“钱江都市频道”实习。跟着记者出去采访时，别人皆把他当成了记者，把记者当成了实习生。我们都说：“这是继承了乃父沉稳持重、底蕴深厚的气质呀”。

杭大新闻系里还有一位“永远的文青”——徐忠民老师。与徐老师的认识还挺充满戏剧性的，牵线人是我的师哥、如今“新蓝网”的总监视云光。当年，四年级的祝师哥来邀请一年级的我，让我为他们的毕业晚会伴舞。他们要和班主任徐忠民合唱“一块红布”。师哥的话怎敢不听？于是，傻不愣登的我自己认真设计了舞蹈动作，拿了一

块红纱巾上场了。我挥舞着红纱巾东突西走、左盖右擦。他们唱得前仰后合、声嘶力竭……

后来，教摄影的徐老师又来到我们女生寝室，和我们谈理想、谈爱与生命。他要我们学会有情、学会敏感、学会悲悯，去认识和看待这个世界。如今，常有朋友夸我，随手用手机一拍，都能看出构图取景很有想法。我想，这是徐老师当年不仅教了我摄影技巧，还教了我用心灵去感受与捕捉世间美好。

新闻系很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种专业实践。校内有我系学生自己办的《杭大学生报》，有以我系学生为骨干的广播电台、《杭州大学学报》等。同时，系里老师也会帮助我们联系各大新闻单位进行实习。因为之前在报社、电台、电视台都实习过，所以我在毕业时已经非常明确自己想去哪里就业。但那一年我心仪的就业单位浙江电视台只招主持人，没有招收记者的名额。

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我，凭着新闻系给我的底气，直接找到了总台台长梁雄的家里：“梁台长，我知道您，但您不认识我。我是杭大新闻系的应届毕业生。在学校里，我年年是一等奖学金获得者、省级优秀毕业生、韬奋新苗奖获得者；在浙江台下辖的钱江台实习，我已能独立上手，所作报道获得省好新闻奖。听说您是一个爱才的人，我不敢说自己是人才，但我有一颗极其渴望进入钱江台、努力做一名优秀记者的赤诚真心……我的父母都是普通人，我也没有任何关系可动用。我只能冒昧跑来，向您当面表达。”

没想到，原本紧闭的就业大门，竟被我生生掰开了。与此同时，刚成立的钱江台也向总台打报告肯定了我——来自杭大新闻系的学生在实习期间的表现，并提出了急需招收专业院校毕业人才的要求。于是，那一年，浙江台特别为我和另一名杭大女生增加了两个记者名额。

记得我们那届之后，原来侧重在广电院校招生的省市电视台，开始越来越多地招收杭大新闻系的学生。一来有广电事业蓬勃发展的原因，二来也因为一届又一届新闻系学生的优异表现，为母系创造了好口碑。“我是杭大新闻系的”这话常常会令听者竖起大拇指。

我时常在想，从当年踏上工作岗位，到一步步走到今天，和我在新闻系求学的四年是分不开的。这四年，除了收获知识和技能之外，更多的是给予了我思想上的启发、眼界上的开阔、人格上的完善。

世间所有的相遇，从来不是久别重逢，而是今生的选择与缘分。感谢今生与杭大新闻系的相遇，且行且珍惜。

[返回目录](#)

## 我的大学岁月

——杭州大学经济系 78 级 罗卫东

转眼进大学读书就整 42 年了。几天后，新一届大学生即将进入校园。这两个时间点，相隔差不多半个世纪，抚今追昔，新旧对比，激活了我的很多记忆。诚然，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时尚、不同的约束，但大学必有着共同的一面。作为塑造人生的关键四年，大学本科的体验、感受是值得珍惜，应该珍藏的。只是，限于记忆的残缺、模糊和选择性保留，很多场景都难以真实而完全复原了。文章所记下的一些事情或许还会与史实有出入。很遗憾也很无奈。只好请各位看官批评、指正、补充、包涵了。

### 一：入学

1978 年 10 月 14 日，一个秋高气爽、大雁南飞的日子，我在父亲的陪同下，经过陆路水路，辗转两天，到达了杭城。两天前的那个凌晨，村里乡亲们举着火把送我出发的场景还历历在目，兴奋而激动的心情也没有完全平复。当晚借宿在杭州大学本部的 2 幢宿舍，接待我们父子的是教育系的方克明老师。他是我父亲解放前开私塾时教出来的得意门生。次日天刚放亮，父亲把我叫醒，匆匆吃了点东西就出发去杭州大学政治系报到。当时的杭州大学政治系、中文系、生物系都不在本部校园内。生物系在文三街以北，学军中学以西，教工路以东的那个区块；中文系租借了海洋二所以北省总工会干校的校址；政治系则租借了杭州外国语学校对面、文二街以北省供销学校的校址。我和父亲各挑着行李从杭州大学本部出东门，沿着西溪河一路向北，横穿上宁桥，到下宁桥后再走几十步左拐入文二街，就到了 128 号的杭州大学政治系。行李里面，除了铺盖、脸盆、热水瓶和装着日用杂物的木箱外，还有三套书：一套四卷的《马恩选集》精装本，一套同样是四卷精装本的《列宁选集》，还有一套是五卷平装本《毛泽东选集》。这些都是入学通知书上注明必须自带的。八点不到，我们就到

了系门口。由于来得太早，大门还关着，我们只好在路边等候。大概过了个把小时，一位鹤发童颜的老人开门，我们才得以进入。这位开门的老人，看上去应该有七十来岁了，一看就是一个知识分子。我恭恭敬敬地叫了他一声“老师好！”没想到，他却不好意思起来。不久我就知道，他并不是老师，而是工友。我心想，一个工友，看上去都像个教授，那真正的教授岂不更是仙风道骨。办完入校手续，住进宿舍，父亲就和我告别了。我这个从未出过远门的少年大学生正式进入了大学本科的时代。

## 二：同学

入学后的最初几天，主要是熟悉校内外环境，分班分组、推选班干部团干部、确定寝室长小组长、助学金评级、饭菜票发放、教材申领等事务，以及按照学校的安排参加新生体检。记得当时我的身体参数是：身高 147 公分，体重 78 斤。很可能是杭州大学七八级新生中年龄最小，最瘦弱的。那个时代的大学生堪称稀有物种，被视为天之骄子，社会地位很高。同学们对自己的大学生身份都感到十分光荣和自豪，爱戴着校徽去校外活动。我稚气未脱，身形瘦小，尚未发育，说话也还没有开音，一副儿童的模样。有时佩戴校徽单独到校园以外活动，常常引来市民的围观，四面八方投射过来的目光，透着好奇或者怀疑，仿佛他们遇到了一个怪物，弄得我很不自在。还有一些人爱刨根究底，七打听八打听。我每次总要费口舌解释自己的大学生身份真实不虚，迫不得已的时候，还得掏出学生证来证明自己并非假冒。这令我不堪其烦。后来凡是外出一定要拽上一个同学，为我做证。这种情况大概持续了近一年。再后来，身体发育了，长出了胡子，我干脆留起来，果然到街上再没有人问这问那了。

七八级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届学生，和七七级之间其实也就相差半年多时间。由于这一年高考的政审制度放松了，没有资格参加 1977 年高考的不少老三届学生加入了这一年的高考大军。所以，事实上，这一届学生的年龄差比七七级还要大。比如我们这个政治系七八级，两年制理论专修班同学，年龄最大的好像是 1942 年出生的 W 同学，比

我这个 1963 年出生的小同学要大 21 岁，简直可以做我的父辈。那一年，W 同学的儿子就是和他一起考上大学的，父子同年上大学，一时传为美谈。我和老 W 同学关系很好，吃饭、散步经常在一起。每次和 W 同学到校外散步，都会被人当做是父子。遗憾的是，由于一次不慎的犯错，大二那年，W 同学被学校开除学籍，失去了无比宝贵的读书机会。他离开学校后，就和我失去了联系，至今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样了。每次想到他，我既思念，也很唏嘘！年龄越大的同学，人生经历往往坎坷，阅历也越是丰富。他们中，有的来自农村人民公社，有的来自工厂，有的来自商店，有的来自部队，而从插队知青考进大学的，占的比例最高。班里同学的政治成分也就比七七级要复杂的多。相当部分同学家庭出身不好，按当时的说法，是从“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家庭走出来的。如果没有国家政策的开明，他们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我们家是中农成分，父亲解放前曾经加入过三民团，差一点成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就因为土改时期不遗余力地为新政府工作，政治表现很好，才得以宽大。若无改革开放的好政策，我也是断然得不到考大学的机会的。所以，同学们大多数都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勤奋学习，惜时如金。和不同年龄、不同阅历、不同成分，来自五湖四海的人聚在一起读大学，这本身就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件事。除了我们很少几位应届高中毕业生，其他的同学个个都有经历、有故事、有绝技在身。班里有三、四名现役军人同学，其中有两名是海军战士，风华正茂、英气逼人，穿着海军军服上课，真是酷毙了。尤其是夏天着海魂衫，海军帽后面的飘带被风吹起来，整个帅呆了！听他们讲部队的事情，也是我们这些毛孩子的一大期盼，Yu 同学是东海舰队的一名电报员，因常年发报，他的食指肚面，结上了厚厚的老茧。摸着这老茧，我们既崇拜又羡慕。有的同学几乎干遍了工农商学兵每一个行当，真是见多识广。从黑龙江插队的地方考来的就讲中国东北的风土人情以及知青点故事；从汽轮机厂、叉车厂、锅炉厂考来的就讲工厂的运营；从人民公社、生产大队考来的就讲中国基层状况……，形形色色的经历和感受，不一而足。大家

相互交流切磋。平日在教室里、在寝室里，就学习上的问题扯着嗓子争论。哪怕是郊游或者晚饭后一起散步，也都是争得脸红耳赤。

当时的杭州西北角，南到天目山路，西到学院路，北至文一街，东至教工路的这个区域，集中了当时浙江好几所有名的大学：杭州大学、浙江丝绸工学院、杭州电子工学院、杭州商学院、杭州师范学院……等等，是当时的杭州市大学生聚集度最高的区域。黄昏的时候，几乎每条马路上都是络绎不绝散步的大学生，此起彼伏的都是讨论问题的声音，真是一道靓丽的风景。

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的黎明期，各种社会思潮已经开始复苏。长期被屏蔽在国境线以外的西方理论思潮也开始渗透进来，人心逐渐活络，思想次第解放。书本上的、时政的、社会的、人生的……，各种话题都可以拿来讨论。有的同学在读队、服役或者工作的时候就已经通读过《马恩全集》、《列宁全集》，甚至也有几位自学过《资本论》这样的硬书。他们之间的讨论，就擅长引经据典，比较深入，其他人很难插话。尤其是我们几个应届高中毕业的小屁孩，虽然亦步亦趋跟在后面，但听得一头雾水，不知所云，更别说参与讨论了。大二后，随着自己理论知识逐渐丰富，也开始加入到讨论的行列，唇枪舌战，锻炼自己的思维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一部分干部家庭出身的子弟，见多识广，喜欢传一些真真假假的时政内幕。他们爱讲，其他人也爱听。刚入校时，我们这些出身农村的天真少年，小乡巴佬，完全没有辨别真假的能力，他们说我们就信什么，结果也闹了不少笑话。听多了，也渐渐学会用自己的脑子思考，逐步会甄别哪些是谣言，哪些是事实。班里的高干子弟群体，内部差异很大。有的十分朴实低调，读书也很用功；也有的奇装异服，理飞机头、留大鬓角、戴蛤蟆镜、穿细腿宽口大喇叭裤，拎着卡式磁带机，播着刚传入不久的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在校园里显摆，一幅那个时代反叛青年的标准形象。起初，对于这些流里流气的“阿飞”同学，我当时不仅心有嫌隙，简直就是厌恶恐惧，避之不及的。后来接触多了，就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到快毕业的时候，发现了他们身上也有一些特殊的优点，见多

识广，行为自主，思想活跃，三观时尚，待人处事开合自如，不役于人，不滞于物。

### 三：解放思想

进大学才一个多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即召开了历时 35 天的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在闭幕会上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次会议之后，紧接着就召开了极为重要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反思文革，高度评价真理标准大讨论，正式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的政治哲学命题。中国的巨轮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航程，驶进了新时代。高层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是很大的，校园里、课堂上，洋溢着活泼的、新鲜的、激扬的空气。教学、研究中一个个禁区被打破，原来不能公开讲的现在都能讲了，原来不允许碰的问题，现在也可以研究和公开讨论了。扉页上标注“内部印行 供批判用”八个字的那些管制书，普通学生只要到系办开个介绍信，就可以借阅。只是，这些内部印行的书，实在太受学生欢迎了，有限的复本根本满足不了借阅需求，常常是中原逐鹿捷足者先得。记得当时有人推荐我看一本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滕维藻先生翻译的节选本），我去图书馆一打听，全被人借走了。后来，借者一直就没有还回去。也因此，我没有能够在大学时代读到这本著名的“黑书”。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个别的，有不少书被借走后，超期归还或者不归还。借者宁可为此缴纳罚款，甚至高出书价若干倍的赔偿。我从图书馆借来了一本译者署名为绛枫的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似懂非懂看了好多遍。超期了，也一直舍不得还回去，被图书馆罚了款。当时并不识得这个绛枫是何许人，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顾准先生。学校还组织观看了一些“禁片”或者有争议的影片，如《武训传》、《山本五十六》、《中途岛之战》、《虎！虎！虎！》、《望乡》、《苦恋》等等。政治系校园边上的露天电影院里也开始放映以前被定性为反动文艺作品的老电影，如《一江春水向东流》、《柳堡的故事》、《柳毅传书》之类。新拍摄的，

如《小花》、《庐山恋》等反映人性论、人道主义立场的电影。虽然有人质疑，但受到广大青年学生的欢迎。一些以前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性质的外国文艺作品也悄悄引进国内，供大家观赏。《简爱》、《巴黎圣母院》、《白夜》、《上尉的女儿》、《红与黑》、《被侮辱和被欺负的人》、《追捕》、《砂器》、《大篷车》、《人证》、《金环蚀》、《幸福的黄手帕》、《远山的呼唤》、《故乡》、《华丽家族》。顺便说一下，那个年代译制片的水平真的是高，配音演员的杰出表现让影片大为增色，尤其是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的那些配音演员，毕克、邱岳峰、尚华、乔榛、刘广宁、童自荣、李梓等，真是棒极了！不少同学平时说话都爱模仿这些著名配音演员的声音，可毕竟没有那么高的艺术素养，何况又不是在贴切的场景中，听上去总觉得拿腔拿调，有些滑稽。我们的宿舍与文二街露天电影场只有一墙之隔，在二楼走廊东面尽头，打开两大扇窗户，站到凳子上，就可以看到虽然变形但是还完整的电影屏幕——一堵刷白了的长方形巨大水泥墙。窗边这块可以看免费电影的风水宝地，满满当当可以挤下十来个人。而我们这幢宿舍，住着两百多名同学。碰到好电影，这里就挤得水泄不通。讲究的人不屑于在这里苟且偷看，更愿意买票去电影院舒舒服服地欣赏。那个时代的电影多半根据文学名著改编，思想性、艺术性都很强，看电影并不是简单的娱乐和消遣，而是接受教化。比如，我关于真善美的很多理解，都是看了《巴黎圣母院》才超越了被样板戏形塑的简单认识；对于正义与爱情的认识，则受到了《追捕》的启发；《望乡》使我摆脱了以前大而无当的宏观视野，以新的视角来审视战争的残酷性，阿崎婆的命运让我很长时间都无法平静下来；《金环蚀》、《阿西们的街》、《华丽家族》等电影加深了我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本质特性的认识。《柳堡的故事》中解放军战士李副班长和农村姑娘二妹子的感情故事，把革命与爱情的主题做了既现实而又浪漫唯美的演绎，十分动人。在当时的我眼里，陶玉玲饰演的二妹子是世界上最美的女性了，一颦一笑都拨动心弦。总之，从山村到城市，从样板戏时代一步跨入全新的文化多样性时代，我内心发生的反应是非常强烈而深刻的。

大学第一学期，我们开始上“中共党史”课程。这是每周六学时的大课。我记得并没有正规教材，系里只发给我们一套党史教研室老师编著的油印讲义。到第二学期，又补发了八厚本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汇编》。大名鼎鼎的《联共布党史》也曾成为我们的参考读物。胡华教授的《中国革命史讲义》是一年以后才出版的。这时候《中共党史》这门课程已经上完了，我们这个年级就没来得及使用。授课老师是黄汉升和王学启。黄老师是政治系七八级的年级主任。他是上海崇明人，对同学关心备至；可是面相冷峻，重眉沉脸；平素嘴角紧抿，不苟言笑。我们每次见都有点怕他。黄老师烟瘾极大、讲课乡音很重，北方人是很难听懂的。王学启老师在党史学界已经崭露头角，有一定的影响力。他在上课中结合了自己的研究，对江西瑞金红色政权、中央红军长征、遵义会议、延安整风、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反右等都做了不同于主流观点的大胆讲解。这些在今天看来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新颖的内容，却与当时的主流观点迥异，给我们极大的震撼。课后，同学们之间的讨论也异常热烈，实在不亚于解放思想的大讨论。1979年，北京的民主墙和年底开打的那场自卫反击战战争，也是我们这些同学极为关注的事件。记得当时杭州大学各系科有十来名同学自费创办了一份刊物——《思考》。他们自己筹集资金，组织稿源，刻钢板，油印，发行，在校园各处的宣传栏张贴。上面刊登的文章对我们这些没怎么见过世面的农村娃来讲，那是相当火爆的。有揭露文化大革命的阴暗面的、评论时政的，还有一些新的文学体裁作品，朦胧诗等。舒婷、北岛、顾城、芒克、食指这些新派诗人的作品也是首次从这些校园刊物上读到的。我本来喜欢文学，大学报的是中文系。但因为高考语文成绩不如政治，服从志愿调配，被划到政治系录取了。内心一直有一个文学的梦，对各种文艺题材的作品都有兴趣。这些新诗引发了我深藏于心底的“诗人梦”。大学时代的四年，也试着写了不少。当时是敝帚自珍，后来再读觉得十分可笑，简直就像是记录下来的梦话，乏善可陈。很讶异于当年自己的沉迷。现在这些所谓的诗稿都已经不知所踪。

1980年，随着潘晓那封名为“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著名信件发表，全国大学生中掀起讨论人生价值、人生意义的热潮。我们学校自然也不例外。这个讨论催化了存在主义哲学在中国青年中的大流行，萨特、加缪等人的作品开始广受关注。另外一个全国性争论，则缘起于我们年级的Xu同学。他与女友的故事，被《中国青年报》做了长篇报道，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个特殊年代，婚恋自由的事件所引发的大讨论，前后持续了差不多半年时间。因为就发生在身边，我了解的情况就更多，感受和体会就更深切生动。可以说，全国的青年人都对此十分关注，围绕Xu同学的言行，支持和反对的两派组成针锋相对的阵营，彼此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大批书信从四面八方寄到Xu同学这里，传达室的老师傅都疲于应付了。不同信仰体系、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人生经历、主观偏好和感受各异的大学生，积极参与了这样热点话题的大讨论。有些同学还写信去《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甚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表达自己的意见。报纸和电台的“读者来信”栏目的内容，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我这个稀里糊涂混进七八级的、来自闭塞山村、少不更事的所谓大学生，刚进大学时，三观简单，是非感强烈，评论人和事，非黑即白，非对即错，嫉恶如仇。几年下来，哥哥姐姐们自身的阅历、感受、思想、行动开始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使我逐渐学会理解各种复杂的人与事，认识到社会历史潮流下人类个体命运的确与不定，对多元价值持有越来越深刻的同情与包涵。可以说，三观方面的反思与深化，是我大学本科时代的一个重要进步。

#### 四：阅读

我喜欢看书，小学时，遍寻各种读物，甚至连有印有铅字的纸片也不放过。父亲当时是大队会计，有条件看公社为各生产大队订阅的《参考消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浙江日报》、《红旗》杂志等。只是由于山区交通落后、邮路不畅，邮递员常常是一周送一次，一次一沓。好在，那时候报纸大多数时候是每日对开四版。特殊的日子，最多也就是八版。几份报刊一周的量也不太大。这些报纸取来后，基本上是放在大队屋里。父亲有时候会带回一、两种，我

近水楼台搭便车看看。知道很多当时的国际国内的时政新闻和议论文，西哈努克、阿拉法特、齐奥塞斯库、卡翁达、金日成、霍查这些外国人的名字都是看报纸才印在脑子里的。

儿童时代，最喜欢看的自然是连环画和小说。我有一个关系好得不分彼此的发小。他爸曾是我父亲的得意门生。解放后不久就去部队服役，喜欢买书看书。家里因此有不少藏书，五花八门。发小本人不怎么喜欢读书。他家的这些书，基本上都是我的菜。记得家里有一部已经被翻烂了的民国时代印行的《康熙字典》，有几寸厚，封皮都已脱落，书脊粗糙的麻线网格若即若离地罩在密密匝匝的纸楞外面。这本字典一直摆在父亲卧室的床头，实在没有书可看了，我就只能去翻它。

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去大姐工作的公社卫生院玩。瞎走瞎撞，进了购销站的废纸仓库。里面居然胡乱堆放着很多捆从各处收缴的图书，按惯例这些书都将送到纸厂化浆。我偷偷从里面捡回了十几本感兴趣的，主要是翻译进来的国外文艺作品，童话、小说、科普书等。记得其中大部分是苏联人的作品，如《呱呱叫的旅行家》、《乡村女教师》、《列宁在十月》、《列宁在 1918》、《卓娅与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马雅可夫斯基诗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此后，抽时间把它们都读了一遍。因为文化差异太大，囫圇吞枣不求甚解。

中学阶段，读了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红岩》、《红日》、《铁道游击队》等新时代革命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的小说，以及杨朔、刘白羽、秦牧三大家的散文集，勤快地摘抄了很多精彩句子段落，比如刘白羽的写景状物、秦牧的谈天说地、杨朔的叙事抒情。冯德英的《苦菜花》、孙犁的《风云初记》、曲波的《林海雪原》、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等长篇小说，当时尚未开禁，只能私下偷偷传阅。

总的来说，进大学之前的课外阅读条件和环境对我这样的书呆子来说是太不理想了。小学阶段自不必说，真是要什么没什么。连“五七”中学，也没有图书室。读课外书，基本上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嗷

嗽待哺。我同桌方秀峰同学的爸爸曾是语文教师，家里有不少好书，时不时会带一些来学校与我分享，稍稍缓解了“书荒”。

进了大学，读书的条件简直可以说是鸟枪换了炮。别说是杭州大学本部图书馆的浩瀚藏书，就是系资料室里藏的一两万册书也让我叹为观止了！

对我这种喜欢胡读乱看的人来说，此后的几年里，真好比是鸬鹚落到鱼群，老鼠掉进了米缸，饕餮大餐摆在了饿鬼眼前。大学四年时间，除了课业，我的时间绝大部分都泡在了系阅览室和学校图书馆里，花在读自己喜欢的书上面了。饥不择食，什么都读。文史哲艺的、科学技术的、社会时政的等等，真可谓读得如饥似渴、废寝忘食。

文学作品读得最多，几乎那时系资料室里借得到的文学作品我都看过。我看过的小说中，大部分是外国小说的中译本。小说家里面，我最喜欢的是契科夫。他的短篇小说集，我不只看了一遍，一度起意要模仿他的风格写短篇小说，终因学业紧张没有时间而作罢。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和雨果的《悲惨世界》、《九三年》看得我十分难受，一遍后就再不想看了。梅里美和夏多勃里昂等这些浪漫主义作家的小说，让我着迷，如《卡门》和《阿拉达》。不过我更喜欢后者里面透出来的那种带着颓废气息的乌托邦浪漫主义，很有一种梦境般的优美永恒情调勾引住我的思绪。那种调性，三言两语说不太清楚。几年后，我在卢梭和夏加尔的画中，似曾相识。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讲述的故事实在太动人了。只看一遍，那种精彩的情节和对白就印在脑海里了。我对蒋学模先生的景仰，源自他是这本书的译者，而并非他主编的那本发行千万册的《政治经济学》。蒋先生的译笔如此生动流畅，实在不服不行。只是，他如此好的文学功底，转行去做枯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教学工作，真是可惜了！

英国、德国的作品，比如歌德的《浮士德》、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等，总觉得过于理性和晦暗，阅读体验不太好，不是令人内心沉重，就是一头雾水。美国人的作品，则有一种说不出的土气。故事过于单纯，讲述的多半是残酷而执着的人生奋斗、逆袭之类的故事。杰克伦敦的也好、海明威、

德莱塞的也好，这个路数的东西，并不十分合我的口味，因此也谈不上喜欢。在复杂性与深刻性的统一上，美国作家似乎缺乏技巧。不过，麦尔维尔《白鲸》是个例外。头一次是慕名而读，不甚了了。后来倒是读出了一些自己的体会。随着岁数的增大，对于这本书的理解深化了许多。贯穿全书精彩绝伦的场景叙事，以及其中潜藏着的宗教气息都是相当具有冲击力的。以海洋的波澜壮阔澎湃恢弘与人类的庄严崇高意识作为演绎的两个对比鲜明的场景，将白鲸的强悍、吊诡、神秘，与主人公亚哈自我救赎般的坚定意志和决绝行动嵌入其中，使其充分演绎和创化。

我高中最后一个学期的同班同学，也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W 君，与我同一年考入杭州大学。他进了中文系。我常常抽空去他的寝室玩，也因此而受到了中文系学生阅读时尚的影响。当时他们上外国文论课，要看别车杜（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散文文艺理论家的合成）的东西。我这位同学的室友中，有别林斯基的狂热崇拜者。睡在上铺的他，靠墙一面摆着一套刚出版的《别林斯基选集》。他们在聊体会，我便若无其事地在边上听。或许是受到那种氛围的感染，我后来也去学校图书馆借了一卷《别林斯基选集》来看。老实说，我除了对其中充满激情和富有文采的超长句子印象深刻，其他就再也没什么体会了。这大概属于东施效颦、附庸风雅式的阅读。

传记类的作品，也读了不少。最喜欢的是卢梭的《忏悔录》，真是读得不忍释卷。这部故事性、艺术性、思想性俱佳的传记，阅读体验是难以形容的。不知为什么，常常不知不觉地将自己代入进去，思绪和情感都与传主同频共振。读完后，心情久久平静不下来。我是如此喜欢这部书，几次起意不归还图书馆，想要据为己有，哪怕罚款我也认了。后来新华书店有得卖，我就买了一套，把借的还了回去。

大三那年，一次在课堂上偷偷地读刚出版的《彭德怀自述》，感动到不能自己，居然涕泗滂沱，狠抽鼻子，发出的动静差一点引起老师的注意。与此完全不同的阅读体验是读俄国人古留加写的《康德传》、《黑格尔传》。这两本书读得我至为沮丧，实在是枯燥，时断时续，最后还是半途而废，没有读完。梅林的《马克思传》，是当时

课程指定的阅读书，大家都说好，我却是备受煎熬才勉强读完的。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明白为啥那么多重要人物都推崇这本传记。

本国的文学作品，除了大一大二开设的《中国古代文学欣赏》这门课布置必读的各种体裁文学作品，课外还阅读了四大名著加上《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七侠五义》、《老残游记》和《廿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三言两拍》因为故事性强，篇幅又长短适中，自然是最爱看的。其中有不少篇目看了还不只一遍，比如“赵匡胤千里送京娘”、“卖油郎独占花魁”之类。大一下学期，配合中国通史课程，我把蔡东藩的《中国历朝通俗演义》通读了一遍。

那个年代，真是文学的年代。不喜欢文学的大学生简直让人侧目。班里有几位惜时如金的年长学生，从不看小说之类的文学作品，认为那是浪费时间。他们起早贪黑，不是背外语单词就是背专业课的书本讲义。对与课程无关，不能增进考试成绩的其他事情毫无兴趣。

文学是用来建构理想、塑造气质和滋养精神的。所以，那个时代的大学生，不论来自城市还是乡村，多多少少都有一种理想主义者的文化气质。无论理想的内涵多么不一样，这种气质都是动人的。每当我翻看当时的黑白照片，都会重温并感动于这种精神气质，为后来大学生群体的世俗化、物质化、平庸化、现实化而叹息。

学的是与文学毫不搭界的政治经济学，可不少同学有作家的梦想，沉溺于文学创作。比如，三组的 Sun 同学，四年里面一直坚持写小说。当然都是短篇，写了改，改了投，投了退，百折不挠、矢志不渝。似乎终究也没有正儿八经地公开发表过作品。他只比我大两岁，属于可以聊得起来的同学。知道我喜欢看文学书，就引为同道。有时，他也会把部分章节给我看看，让提提意见。可我哪里提得出来？

小说外，艺术类，特别是绘画艺术类的书，也是我很喜欢看的。大型画册，系资料室是没有的，必须去学校本部的图书馆才能看到，而且概不外借。所以，一周就要抽一两个晚上，吃完饭后步行两、三里路去本部图书馆过过瘾。艺术类的书，有几本书，我读得认真，印象也深刻。一本是迟柯写的《西方美术史话》，一本是丹纳的《艺术哲学》，还有就是《罗丹论艺术》、《达芬奇论艺术》这类的。迟柯

的书今天看来相当浅显了，没有什么学术深度和创新性。不过基本知识梳理得不错，也有一定系统化，讲解很浅显，适合我这个外行作为入门读物。那时候记性好，书读得很快，也还记得住。这本《史话》上面讲到的内容，很多年后我还派上了用场。2009年，我和几个同事去西班牙马德里出差，待了几天。期间参观美术馆，里面有丰富的委拉斯凯茨以及戈雅的作品。这一伙人中，只有我津津有味地观赏，而且还能讲出点子丑寅卯来。这都是拜大学时代读过的迟柯先生的《史话》所赐。

丹纳的《艺术哲学》恐怕是我看得最沉浸的一本非文学类著作。当时只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那个绿皮本，傅雷先生的译笔。

这书的版式很普通，纸张也不太好。书中的文字凡是地名、人名和术语的底下都画上黑线，一页纸的整体效果相当之奇特。这断断续续的黑线是持续整本书的，我并不清楚为何要如此处理，或许是为了引起读者对这些划线部分的特别关注。限于印刷条件，书中的插图都是十分粗糙的黑白照片，谈不上任何的色彩层次和饱和度，阅读的视觉感受确实不太好。但所有的这些奇奇怪怪的感受都被文字内涵的价值掩去了。该书，大二就看了一遍，感受极为强烈。所谓的“受益匪浅”这四个字，用在这里再贴切不过了。后来的几年里，我又对其中特别感兴趣的部分断断续续地重读了几回。每次读，都感受它的美妙，开首的文字就把我带到那碧空如洗、屋舍如诗、阳光灿烂、明艳耀眼的爱琴海沿岸。丹纳从风土角度解释希腊文明的起源，引人入胜。

由于喜欢书法，也借了不少字帖来临摹。除了草书，各体都有。介绍书法艺术的书籍，能借到的，我都看过。印象深刻的有尉天池先生的《书法基础知识》、费新我先生的《怎样学书法》、沈尹默先生的《书法漫谈》等。以今天的标准看，这些书都是大众读物，学术含量不高。不过，我关于书法的相对系统的认识，就是它们建构起来的。书法史方面，当时似乎通史类的书不多。好在上海书画出版社刚出了一厚册《历代书法论文选》以及差不多厚的一册《续编》。繁体竖排的，看着吃力，但也获益很大。尤其是对书法的鉴赏和评论，遣词造句方面，很有助益。这两本书不仅很贵，而且一出版就售罄。借到后

还是让我激动好长时间。此后个把月，我就边看边抄。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邓散木先生研究书法史及指导篆刻艺术的书，我都是边看边抄录的。手眼相应，印象就比较深刻。

看邓先生《篆刻入门》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按照他的指导，刻了一方自己的藏书印，用的是细线阳文。当时条件差，买不起专门的刻刀，我用的是最便宜的那种削铅笔的小刀，石料也是最低档的那一种。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枚自刻的私章，虽然不登大雅，但也保留下来，成为那段岁月的一个见证。班里喜爱书法篆刻艺术的同学还有几位。他们的兴趣要比我更加强烈、专一而且持久，下的功夫要比我多得多，后来取得的成就很大。其中杰出的代表就是在书法创作上守正创新、别开生面，已经跻身著名书法家行列的T同学。

大约是在我读大二时，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了一套介绍古代画家的丛书。几年里，陆续出版了几十种。作者都是当时有名的学者。每一种大概只有几十页的篇幅，有几页铜版纸插页，印着这位画家的代表作。这些小册子，篇幅小，表述简精，读上一册就对一个画家的方方面面都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和理解。这套书不少册，我都读过，收获不小。其中的《郭熙》的这一册，很是喜欢。特别是插页上的《早春图》，要比此前看到的要精妙很多，印象自然很深刻。

本科时代的博览群书，那真是名副其实。兴趣面广、求知欲强，啥都想看，啥都能看。这里值得写一写的一件事：我在图书馆里找到了一本看面相的书。具体名字记不确切了，但不是《麻衣神相》。还是民国时代以前印行的本子，不知怎么给我借到了。暑假之前我借到这本书，回家过暑假。白天参加双抢，只有夜里有点时间，先读后抄。一个多月，把一套两本书的文字全部抄下来了。相书里面插图很多，人的脸型、五官、各种纹路等等，我索性下功夫把里面的图也都临了下来。那个年代，这类属于封建迷信的书，是管得很严的，很可能还回去就再也不出借了。非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全部抄录，不能占有那些有趣的知识。

书读得杂，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一些重要的经典倒也很下了些功夫去理解。其中，特别值得说一说的的是《资本论》。大三第一学期，

我进入经济系读书后，《资本论》是首当其冲的一门大课。整整一个学年，每周六学时。系里为这门课安排了两位老师，D老师和W老师。由于原著实在太难理解，有些地方老师也讲不太清楚。我们只能去找课外辅导书。苏联人卢森贝、日本人河上肇，本国人张熏华、漆其生、俞明仁、陈征等撰著的，轮着借来比较；比来比去，我最喜欢的是河上肇的《资本论入门》（上下）和陈征的《资本论解说》。靠了它们，我这个未成年人才得以大约读懂了《资本论》这部硬书。为了读懂《资本论》中的典故，还去借阅了斯威布的《希腊的神话与传说》、沈志求等编著的《资本论典故注释》、张熏华先生的《资本论难句试解》等。

图书以外，不少杂志也是同学们的宠儿，如《人民文学》、《小说月报》、《钟山》、《花城》、《当代》、《收获》、《诗刊》、《大众电影》、《电影画报》、《中国青年》、《八小时以外》、《健力美》等。想要了解国际学术动态，可以看《国外社会科学文摘》、《国外社会科学》等刊物。

回想起来，读大学的几年里，除了上课、吃饭和休息锻炼，其他时间几乎都在图书馆和自习室度过。即便在课堂上，我也是一心两用。耳朵竖起关注讲台的方向，眼睛盯着自己带到教室的课外书。为了不让老师发现我的小动作，就设法躲在大个子同学的身后。幸运的是，同班的WJ同学，身形高大宽厚，为人诚朴大度，乐于为我遮掩。所以，凡是不喜欢的课，我就躲在他的身后。大多数老师都不点名，我的这种隐身读书大法，终究没有穿帮。当然，也许是老师宅心仁厚，即便发现了也没有制止我吧。

## 五：逛书店

改革开放之初，书店里好书不多。我们的求知欲又是那么旺盛。每当有新书问世，都会在新华书店漏夜排队买书。

大约是1978年农历的年底，快要放寒假了的时候，《现代汉语词典》和《天安门诗抄》这两本书上了新华书店的书架。消息传来，大家呼啦啦地涌到书店门口。但是书店存货不足，首批告罄后要去别处

仓库调货。后来的顾客只好乖乖排队等候。我记得，那次是头天晚饭后开始排队，一直到次日上午书店开张才买到。大家轮流排了整整十来个小时的队。《现代汉语词典》当时定价五块四角，差不多是一个月助学金的三分之一。在绝大多数书的定价都只有几毛钱的年代，这本词典的价格实在是太贵了。排队的时候，我思前想后，总舍不得下手，后来心一横才掏钱的。买到以后那种快乐真是无法形容，其强烈程度，恐怕连果粉买到新版苹果机时的感受也不能比拟。很长时间里，这本辞典都是放在我枕头边的，闻着清新的油墨香，翻开书，摩挲着那又白又薄又有韧性的纸张，不必看其中的内容，都已经醉了。

当时还有一本风靡一时的小说，是张扬的《第二次握手》。这是一本言情小说。今天看来是满满的正能量，可当时的思想环境下，书里不少情节都被认定为是小资产阶级倾向的。该书流行的时候，我还未成年，因此不能理解为何比我们年龄大的同学会迷上它。

嗜书如命的我，常常利用周日去城里的大新华书店和古旧书店淘书。去的最多的是解放路新华书店和中山中路的古旧书店。前者在当时是杭州最大的新书书店，当时在中山中路上。古旧书店不止一家。我在这些店里，淘到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书，包括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出的一些书，如龙布罗梭的《犯罪学》，还有《颅相学》、《五用英汉辞典》以及一些旧版日文书籍。到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已经用自己省吃俭用积攒的人民助学金购买了百来册图书。

从文二街到解放路和中山中路书店所在地，没有直达的公交车。要先坐11路公交车，去武林门换乘151或152路电车到官巷口下车。再向南步行，经过邵芝斋笔庄、边福茂鞋庄等老店铺，左手拐进一条稍窄的巷子，才到达目的地。倒腾在路上的时间，至少一两个小时。来回，光是花在路上就得三、四个小时。去一趟书店，得用一整天时间。起早摸黑，披星戴月，但却一点也不嫌辛苦。每次去之前，内心充满了期待。离开时，则是心满意足。

## 六：课堂教学

七七、七八级这两届学生，除少部分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外，从小学到高中，差不多都被政治运动耽误了。这一代人在基础教育阶段，从学校和课堂上得到的知识训练很马虎，科学知识和文化素养双双短缺。读上大学以后，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基础方面的缺陷如果不弥补，不仅对他们个人，对国家，都是非常不利的。

杭州大学在弥补恢复高考后几届学生的基础教育缺陷上，是下了大功夫的。虽然我们就读的是政治经济学专业，但入学后两年内，学校给我们安排了大量的基础公共课、文史哲通识课、素质提升课等，请来了高水平的教师授课。

“中国古代文学”课，我们请了一位年逾古稀的李姓老先生主讲。他骨瘦如柴，牙也不齐活了，嘴巴凹陷，说话漏气。但吟诵王勃“滕王阁序”和白居易“琵琶行”等名篇时，陶陶然如登仙境。那种享受，深深感染了我们。

记得李老师讲唐代文学的时候，正值天寒地冻的隆冬季节，教室冷得像冰窟。老先生衣着单薄，陶醉在古诗文意境中的他，被冻出了长长的鼻涕而浑然不觉。此情此景，同学们想笑，但又感动得要泪目。对老先生油然而生出一种敬意。

著名历史学家和文物学家毛昭晰先生给我们讲“上古史”（“史前史”）课程，各种史料信手拈来，夹叙夹议，声情并茂，引人入胜。他介绍东非大峡谷的考古，著名的考古家族大里脊（利基）、小里脊（李基）父子的辉煌成就，人类起源于东非的考古学证据等，绘声绘色，还不时插进一段古典音乐赏析的内容。听他的课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毛先生是国立浙江大学龙泉分校数学系教授毛路真先生哲嗣。他本人也是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的高材生，师从考古学家夏鼐、田汝康和体质人类学家吴定良等名师。八十年代初期，毛昭晰先生创办了杭州大学历史系文博专业。几年后，离开杭州大学历史系的教学岗位，调往浙江省文化厅当厅长。任期内对浙江图书馆新馆建设、浙江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后来荣任全国人大常委，一直在为国家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事业而奔走。

郑国平老师的“辩证唯物主义”、薛克诚老师的“历史唯物主义”、胡玉堂先生的“世界史”、杨树标、赵世培老师的“中国近现代史”、余式厚老师的“逻辑学”等课程都深受同学们的喜爱。老师们上课的口音和口头禅也是茶余饭后大家逗乐的谈资。

胡玉堂先生本科和研究生都就读于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很早就担任了杭州大学历史系的领导，是世界史学科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为人宽厚，德高望重，深受同学们的爱戴。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应该已经过了花甲之年。当时讲课的具体情形，我已经不太记得清楚了。印象最深的就是他那可恨的烟瘾。他几乎是片刻也不离卷烟的，身上的烟草味，老远就闻得到。今天估计很少有人知道胡先生其人了。不过大家不会不知道他那个著名的外孙——大疆无人机公司的创始人汪滔。

那时候当老师还不需要普通话测试。授课老师来自五湖四海，口音千差万别，教室简直可以说全国方言集市。我从开始的时候听得云里雾里，后来渐渐摸到每一种方言的理解门道。再后来可以模仿说两句，简直就像是学一门新的外语一般。或许是那时候练就的本领，现在我一听某人口音，大体就能判断出他是某籍人士。

余式厚老师是温州平阳人，带着温州口音上课，有一种特别动听的效果。他上逻辑课，是极受欢迎的。举的例子都是当时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故事，比如刘三姐与莫老爷对歌、阿凡提和巴依老爷斗智的故事。大家听了，就会明白逻辑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他上课爱将左手按住自己的右胸部位，右手拿着粉笔在空着画着圈比划。温州人说话“F”“H”不分。有一次，不知讲到一个什么逻辑原理，他突然说了一句“发儿~，为什么这样红？！”弄得大家面面相觑，莫名其妙。因为，我们班里无人有红头发。见大家木然，他又高声重复朗诵了这一句，还是没有产生他预期的反应。只好在黑板上写下了刚才饱含深情朗诵的这句话。原来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下引来了全班的哄堂大笑。后来，这句名言就被用到了各种场合。大家一言不合，就开始模仿余老师的口音朗诵“发儿，你为什么这样红？！”

郑国平老师是嘉兴人，上课中气很足，声音在空气中传得很远。很难相信，这样洪亮的声音来自如此瘦骨嶙峋的身体。很有激情、很有水平的郑老师，上起课来，简直有气吞山河力量。可如果你听不懂他那一口嘉兴土音十分浓郁的“普通”话，这效果就要打折扣了。刚听他讲“辩证唯物主义”的头几次课，我承认是彻底懵圈的。记得有一次，他用非常有力的手势和富有激情的语调说：“我们不仅要开辟第一裤裆，还要重视开发第二裤裆。”我听了吓了一跳，觉得这个老师胆子这么大，居然在哲学课上说如此不堪入耳的流氓话，真的非常愤慨。可是看看边上的同学并没有我这么强烈的反应，就满腹狐疑地继续往下听了。后来才知道，嘉兴话说“课堂”这个词，发音就是“裤裆”。郑老师说的是第一课堂、第二课堂的意思。又有一次，他非常肯定地说，我们搞调查做研究，一定要用“素鸡”说话。我不明白，一个研究者如何才能让一只“素鸡”开口说话。原来，他说的是“数据”。这类今天当做笑谈的话题，当年比比皆是。

据说，连中文系教现当代文学的老师在讲解正宗京腔京味的《骆驼祥子》时，也是操一口的原生态绍兴土话。我没有那个耳福现场聆听，想必效果一定相当之奇特。一般来说，老师的口音、土语，同学们都是能包容、理解和接受的。顶多就是茶余饭后调侃调侃。不过，也有例外的情况，一度因为老师的口音而引起师生关系的紧张。

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李普国先生，学问很好，个性也很拽。一口四川话，讲得既流畅还很享受。他的口头禅就是“千故文章一打操，看腻操得号不号”（千古文章一大抄，看你抄得好不好）。他的话，我虽然不完全懂，但我觉得蜀语的音调很美妙，倒是蛮喜欢听的。但有些同学觉得上李老师的课很吃力，又没有教材，听不懂。这门课就等于白上了。于是，就结伙去系里提意见，希望系领导做做工作，让李老师尽量讲标准的普通话。否则，就要求换一位普通话说得好的老师。系领导找到他，诚惶诚恐、小心翼翼地提醒。没想到，李老师勃然大怒。第二次上课的时候，当着全班同学的面，义正辞严地向大家宣告：四川话是正宗的北方语系，比江浙人的吴语要更接近普通话。同学们的意见是无理取闹。还愤愤地说，若是再要求他改口音，这课

他就上不了。或许是他的态度如此强硬，让系里为难了。后来此事不了了之。他继续操着满口正宗北方语系的“四川话”，而且操得更加理直气壮了。这下，轮到同学们努力学习尽快掌握蜀国语言的规律。毕竟，李老师真要一怒之下罢课，那就惨了。这门课当时是决计找不到顶课的备胎的。“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一门硬课。首先，授课教师得精通古文，还要懂经济理论。两样都通的人很少。让青年教师来临时抱佛脚去应对的套路，其他水一点的课或许还勉强对付的过去。在这门课上彻底不管用的。同学们一个学期课听下来，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掌握到什么程度，我不敢妄言。四川话倒是学会了不少，彼此插科打诨的时候，还用一用。最后，教学相长，皆大欢喜。我估计，杭州大学七八级政治经济学班是全校四川话整体水平最高的班级！这是特殊历史阶段的特殊风景。随着大学老师入职三门课考试和普通话测试制度的推行，这道风景就再也见不到了。

后来，我在回想当年老师授课的情形时，觉得那些口音很重的老师的授课，总有一种特别的韵味和气质在里头，其实很动听的。方言和口音的消失，也带走了一部分课堂教学的魅力，对此我心里还有一丝遗憾！

改革的春风吹拂课堂，老师们讲课也放得很开。大一第二学期，我们开设了近现代史课程。主讲老师是杨树标和赵世培两位先生。赵老师主讲近代史部分，杨老师讲现当代史。以政治的标准看，虽然当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却还没有出台。不少历史问题的研究和讲授是有禁区的，特别是现当代史部分，雷区更多。杨老师以大陆率先冲破禁区，第一个研究蒋介石这个“人民公敌、独夫民贼”而扬名学术界。他性格率直、热情奔放，说话不绕弯，像放连珠炮一样。他对蒋介石的评价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但是同学们却非常喜欢听。杨老师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在北伐战争中的辉煌胜利，在十年建设中的巨大成就，特别是国军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巨大牺牲和历史贡献等，进行了全新的讲解和评价。这些都是此前教育中不可能让我们知道的内容。他在讲三反五反与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时，介绍了我们看周而复先生

的代表作《上海的早晨》，用小说中很多场景来描述民族资本家的复杂心态，比如“白天敲锣打鼓，晚上痛哭流涕”之类的，很形象，很生动。

与他不同，讲近代史的赵世培老师，就像马三立先生的气质：清瘦，木讷，冷幽默，说起话来慢悠悠的、鼻音很重、细声细气。他和杨老师长相、气质、表情、神态大相径庭，但都是深受学生喜爱的好老师。

1980年9月，也即大学三年级第一学期，我进入刚恢复建立的经济系，开始接触难度较大的专业基础课，如“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西方经济学”（微观、宏观）、《资本论》、“国际贸易与金融”、“财政学”、“货币银行学”、“会计学”、“统计学”等。这些都是硬课，知识点非常密集，而且以数据数量数学的内容为主。课程的压力就一下子增大了。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开放和国际化也开始启动。当时杭州大学经济学的课程设置当中，已经排入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等课程。课虽然排进了教学计划，本校却并没有能够开课的老师。系里只能采取外聘的方式来解决师资短缺问题。

我们这一届，因祸得福，反而幸运得到了名师的授课。“微观经济学”请来了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厉以宁教授讲授，全部课程压缩在一个月时间里讲完，课业安排非常紧张。厉老师青年时代因言获罪，在反右运动中被调离教学第一线，变成了北大经济系资料室的管理员，一待就是二十年。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刚刚被解放，回归到教学一线。这时的厉老师以近知天命之年，重拾教鞭，意气风发。长期放逐资料室，使得他有大把时间博览群书，深入系统地钻研了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史等领域，可以说学富五车。他授课完全不看讲义，深入浅出、旁征博引，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展现了极高的课堂教学技艺和魅力。他对西方经济学体系的熟悉和理解，令人觉得这些理论简直就是他自己创造的。他如此享受讲课带来的快乐，这一点尤其动人。

“宏观经济学”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吴易风老师讲授的。吴老师授课的特点是思路清晰、表达准确、言简意赅，把基本概念梳理得十分清楚。

此外，还就近从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等请来了胡寄窗、宋承先、张熏华、蒋学模、洪远鹏、陈观烈、洪文达、余开祥等知名学者来系里做学术演讲，开阔了我们的眼界和思路。

胡寄窗先生是国内“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领袖人物，早在国民政府时期就出任过私立教会之江大学的国际贸易系主任，给我们做讲座的时候已经快80岁了。老人个子矮小，还佝偻着身子，坐在讲台前的椅子上，刚刚只能露出一张脸。但他温雅厚润的气质、慈祥的神态、非同寻常的学养让同学们顿生敬意。

《资本论》课程请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俞明仁先生开设专题。俞先生国学功底十分深厚，业余从事红学研究，也是有一定影响的红学家。

“统计学”请来了杭州商学院的汪贤进老先生。“价格学”请来了杭州商学院的金家林先生。这些先生都是当时全国范围内该学科的翘楚，道德文章都深受好评。

给我们上“高等数学”课的洪宗华老师，年逾花甲，是退休后返聘的。他毕业于西南联大，是熊庆来和华罗庚先生的学生。洪老师高度近视，手持放大镜看讲义、推导方程的时候，眼镜和鼻尖差不多要贴着黑板写板书。期末考试，实在看不清一大教室学生们的所作所为，老先生监考时居然用上了望远镜。但单拳难敌四手，对这帮把数学当作天敌的超龄大学生肆无忌惮的抄袭行为，他也无可奈何。只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自寻烦恼了。这位老先生从不穿袜子，即便天寒地冻，也是光着脚穿解放鞋。人很胖，走路外八字，速度不快，看着很卡通可爱。他住在老城区的望江门一带，到系里上课要倒几班公交车，路上需要一两个小时。虽然旅途劳顿，可每次上课都是笑呵呵的，对着这一帮教不出来的老童生，从不发火。课堂上，时不时会插进他当年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候的见闻，比如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那时候的先生们的言行等等，十分深情，令人感动。洪老师的课是真有西南联

大的风格，天马行空、自由散漫。这种风格，令我们这些希望中规中矩学习的人反而不适应。这门课用的是樊映川先生的《高等数学讲义》。老先生对这本教材赞不绝口。可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始终不明白到底好在哪儿。记得洪老师的数学课是七七、七八两个年级合上的，用的是可装下百来人的大教室。洪老师宅心仁厚，对学生要求不高，考试给分很慷慨，估计全班同学有一半多都拿了九十以上的高分。

本校的名师更是悉数给我们亲自授课。前面已经提到的李普国教授，是刚从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调入杭州大学经济系的。他主讲“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王亚南先生的高足和助手蒋自强教授主讲“外国经济思想史”；百岁棋王谢侠逊先生的哲嗣谢瑞淡教授讲授“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等。

当然，由于师资总体短缺，一些新课，特别是国际金融、国际贸易这类改革开放后才重视的课程，虽然排进了教学计划，但专业教师全国奇缺，连兼聘的也找不着。那只好让中、青年教师突击参加国内组织的学习培训，临时加班备课，火线顶上再说。这些课的水平总体上只能说差强人意。但在当时能够开出就难能可贵了。哪还顾得上质量？

中、青年教师临阵磨枪，面对七七、七八这样量级的学生，诚惶诚恐，战战兢兢的。那种紧张忐忑的情绪，我们坐在前排的同学是一目了然的。授课过程中，有老师由于紧张或者确实基础不扎实而出现错误。同学们是会毫不客气当场指出来的，弄得老师羞赧不已。记得有一位老师在讲“国际金融”这门课的时候，把直接标价法和间接标价法意思讲反了。H同学立马就站起来，毫不客气地指了出来，弄得任课老师当场下不来台。事后，还到学生寝室来向提意见的同学道歉和表态。

讲哲学原理这门课程的X老师，是苏北人，有苏北腔。第一节课老讲“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这类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八股套话。受新哲学思潮影响的同学非常不满，闹到系里去，要求换老师。X老师知道后，当晚就到学生寝室来沟通，希望同学们理解和包涵。我当时在场，看到这个情形，实在非常难受。自小

受到师道尊严教育的我，做梦也不可能想到老师会向学生道歉。X 老师的道歉和请求没有什么效果，系里还是把他从讲台上换下了，由 Z 老师代替他主讲。

我们这一代读本科的时候，还没有实行学分制，课程的数量远不如今天这么多，类型这么丰富。不过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每门课的课时很充分，老师讲得比较尽兴，学科知识的系统性很强。“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资本论》、“微积分”这样的专业基础课、主干课、核心课程，要上一整个学年，也就是 108 个课时。

这样的学制，对学生打好扎实的知识理论基础是有益处的。相比之下，现在学生面临太多的课程，每门课的课时缩水厉害。老师来不及展开仔细讲解基础知识点，只好偷工减料；学生做练习的时间也不充分，基础打不扎实。这个情况有点误人子弟。很像是建筑上赶工期，只好投机取巧、粗制滥造，容易产生豆腐渣工程。

那时候，我们每一个班都还有固定的教室。上课、自习，同学们都在一起。教室四周的墙上也可以布置和装饰表达班级文化的东西。期末那段时间，教室里坐满了复习课程的同学；盛夏时节，教室里闷热无比。那时候没有啥空调，教室天花板上几支吊扇在造风降温。窗户和门都大开着，便于空气对流。寒冬腊月，大家都是裹着厚厚的军大衣蜷在扶手椅中，聚精会神地自学。

## 七：体育

第一学年，我人小力薄，很多体育项目都不能达标。无论是体能类、球类、田径类，和那些在广阔天地里锻炼过的、身强力壮的大哥大姐相比，更是自惭形秽。第一学期的体育课，有一个项目是扔手榴弹。练得右胳膊都肿了，还是扔不到 30 米的达标线。第二学期补考了才通过。

大概是年级太小就读大学的原因，我入学不久就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经常彻夜失眠。不敢用安眠药，怕产生依赖，损害自己的记忆力。只能长期服用补脑糖浆，再就是大量的体育运动。整夜整夜地睡不着，熬到凌晨四、五点钟，索性起床去运动。一个人沿文一路、教

工路、保俶北路、文二路，绕行跑步。看着自己的影子在路灯下反复地拉长缩短，脑袋里数着脚步，也就不思考，得到稍许的休息，可以去对付一天的课程了。

医学杂志上介绍，洗冷水澡有利于增强体质。大二第一学期一开学，我就开始洗冷水澡。当时文二街附近没有公共浴室，最近的要去卖鱼桥，步行差不多要个把小时。只好在与厕所一体化的男生集体盥洗室冲澡。到了冬天，天寒地冻，也咬着牙坚持冷水澡。一边洗一边跳着脚，嗷嗷大叫，来缓冲彻骨之寒。且不论跑步和洗冷水澡是否有利于体质，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大大地增加了我的饭量。

跑步加洗冷水澡的体育锻炼方式，大概持续了有大半年。到次年初夏，就不得不突然停止了。大概是1980年初夏的一个清晨，我照例在四、五点钟去外面的马路上绕大圈跑步。一圈四、五千米跑下来，天已经大白。跑到杭师院大门附近的11路公交车站时，开始减慢速度，改为快速步行。不知怎么就看到了站牌下面的烂泥沼里，有一个大骷髅，上下颌咬合在一起，牙齿十分整齐，头盖骨上似乎还粘着几个头发。因为太早，四周一个人也没有，只有这个骷髅。巨大而空洞的黑眼窝斜望着天空，两排白牙森森发着银光，似笑非笑，那样子实在太恐怖了。我被这一幕吓坏了，像触了电一般浑身战抖。发疯似地逃回了寝室。此后的一个多星期，只要我一闭眼，就会出现这可怕的图景。好像还发烧了几天，估计是被吓的。此后就再也不敢大清早一个人去跑步了。

不能跑步了，只好开始学习各种球类。受中国女排精神的感染，系里排球运动非常兴旺。只要下午不上课，也不安排开会或者集体自修，我们几个铁杆的运动分子就会约上一帮同学去操场打排球。体育设施差，坑坑洼洼的地面是靠黑煤渣碎成沙子大小的颗粒铺在上面弄平的。一场球下来，手掌、手臂都是乌漆嘛黑的。如果摔倒在地面，那就会蹭得皮开肉绽。文二街的这个校区没有足球场，喜欢踢足球的同学只能走远道去本部。大学时代，我对足球没什么兴趣，总觉得动作太过野蛮，令人生畏。毕业后的几年里，倒是和系里的年轻老师一起踢过几年。

我们读书的时候，西湖的自划船是可以出租的。班里团支部活动，也会选择去西湖游船。第一次泛舟湖上，是入学不久。时值深秋，天朗气清，清风徐来，一叶扁舟在三潭印月、阮公墩、湖心亭一带悠然游弋，感觉非常美好。团日活动，除了远足，就是划船比赛。按照寝室分成不同小组，每组六人。从六公园码头出发，一直划到湖心亭，谁先到谁赢。第一次划船，两手如何持桨，如何用力，这些都无人指导，动作全不得要领，只凭感觉操作。结果用力过度，差不多有一个星期，全身酸痛，连走路都不利索了。

#### 八：文艺

我们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基本上都是听着革命样板戏的唱腔长大的。要我们唱个京剧现代戏的段子，那是张口就来，毫不打疙瘩的。可以说人人都是“你点我唱人肉卡拉OK机”。“智斗”、“迎来春色换人间”、“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誓把那反动派一扫光”、“临行喝妈一碗酒”……，一字不漏、一点不走调地唱下来，是毫无问题的。但是会西洋乐器和歌曲的人不多。一部分同学会拉二胡、吹笛子、吹口琴什么的，有几个会拉手风琴，会小提琴的凤毛麟角。至于会弹钢琴，大学四年我没有遇到过一个。

每年元旦，我们也会举办文艺晚会，大合唱、小合唱、男女声二重唱、独唱、相声、独幕话剧、戏曲、小品、哑剧、乐曲合奏、独奏，等等，节目丰富多彩。班里有位姓林的女同学，是杭州本地长大的，会拉小提琴。在我们这些土包子眼里，那实在是太女神范了。她一上场，一招一式引来大家艳羡的目光。她因为文艺方面突出的技能，一进大学就被选为年级文艺委员。

年级举办的文艺联欢会，全班所有人都要参与。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同学，几乎无人会玩乐器。我父亲能拉一手漂亮的京胡，却从未教过我。干农活和读书长大的我，除了凑合着吹几首简单的口琴曲，其他啥也不会。可口琴吹得比我好的人在班里有好多，哪轮得到我上台。于是，只能勉强凑合着唱个歌，陪衬别人说个相声，讲个笑话之类。大多数情况下，是混在人堆里滥竽充数，做做南郭先生。大二那

年，身体开始发育，嗓音变得低沉有磁性，说话唱歌方面的项目，班里的文艺委员也会拉上我。想起来，还和另外三位同学练习了无伴奏男生小合唱，模仿黑鸭子合唱团表演过《邮递马车》之类的曲子。有一次系里的迎新联欢晚会上，居然还和 Liao 同学搭档合演过一次相声。不过我是捧哏的角色，话不多，就是“唉？哎……，啊？嗯……”之类的，十分傻朴。Liao 同学逗哏，但也不怎么好笑。我们俩个人按照同学写的段子，原原本本很默契地完成了表演任务。除了上台前和结束后两次掌声以外，再无喝彩叫好鼓掌之类的动静。不知道是段子没写好，还是我们没演好。说实在的，即便段子写得再好，我们俩长得一点喜感也没有，天然就不是说相声的料。

周末，几个喜欢跳舞的同学在食堂里因陋就简布置出一个舞场，呼朋引类，不少时尚的男女同学集中在这里跳舞。起初是交谊舞，后来花色品种越来越多，灯光也越来越暗，放的舞曲也越来越像是靡靡之音。跳舞者的穿着打扮越来越奇装异服。

我们政治系的这个食堂舞池，在附近还有一定名气。本部的同学或者社会青年也会慕名聚集到这里。对于我们这些农村娃，这简直是另外一个世界的娱乐。刚开始，我确实很好奇，被人撵掇去在附近遛着边看看。后来，场地上灯光越来越暗淡，氛围越来越暧昧，男女在一起抱得越来越紧以后，就不好意思在边上当灯泡了。系党总支书记觉得这样下去非出事不可，就一直想要取缔，但总也找不到正当理由。终于，有一次，本系同学在舞场里与几个流里流气的社会青年不知为何事，大概是为某舞伴争风吃醋吧，相互动起拳头，彼此都伤了几个。这事的性质和影响很是恶劣，系里总算找到机会把它取缔了。喜欢跳舞的同学后来就只好去外面找场地了。

## 九：学习外语

本科四年，时间花得最多的是学习外语。

我的第一外语是日语。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一外不选英语。这里面，既有无奈，也有自愿的因素。

我是五七中学的毕业生。在中学里，根本就没有学过英语。穷乡僻壤的学校，会教汉语拼音的老师都不太遇得到，哪还有会教英语的老师？！我考上大学的时候，连英文的26个字母都认不全，是真正的英语盲。进大学第一学期，系里要大家选一门外语，有英语和日语。当时城里的同学多多少少学过一点英语，有基础，大多都选择英语班。要是和他们同班学习，我哪儿跟得上。日语对大家来说都是零基础，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应该不会有问题。加之当时刚改革开放，中国和英、美国的关系尚未走上正轨。上海公报也还没有签署，对美国的了解很少。相反，我国与日本在1972年就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双方关系虽有起伏，但总体上是向好的，来自东瀛的先进经验常常见诸报端。中日之间的友好往来十分频繁。懂日语有利于学习日本先进的经验。众所周知，中美两国要到1979年初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比中日建交迟了近七年。中美建交的时候，我们的日语课已经上完了第一册。

日语是入门易、提高难的语言。即便我这种博闻强记的人，学习日语也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可以说是大学时代花费时间和精力最多的一门课。教日语的李恩赐老师，为人极好，责任性很强。他原来是学俄语、教俄语的，后来因需要而转为教日语。他备课非常认真，语法讲得十分仔细，对同学的问题有求必应。奈何条件所限，把大家的日语水平提上一个台阶的任务，对他来说实在是太重了。背单词、记各种惯用型就已经精疲力竭。遇到挨千刀的敬语，我们这帮人都是强弩之末了。这日语中，最难掌握的就是敬语，自谦也罢、他敬也好，真的是需要审时度势、八面玲珑，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功夫。

我在班里的日语能力应该算是比较强的。可实战时，就掉链子了。大学毕业后第一次去日本做客员研究员，走的是东京的成田机场。一下飞机，来接我的梅林真吾君咿哩哇啦的一番话，我彻底懵圈，一句也听不懂。感情日本人平时压根儿就不按照中国日语教科书的规矩说话。日常对话中，各种俗语、省略，五花八门的时尚语、外来语等等，几乎没有一样是在国内学日语时学习过的。此后的一年里，我单枪匹马以教科书般规范的书面口语应付各种考验和挑战，终于在回国前说出日本人听得顺耳的日语了。我相信，在那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

的中国式标准日语都足以让日本朋友忍俊不禁。只是他们很和善，不会形于声色来表达自己的真实看法而已。

我们那个时代学外语的条件很差。除了老师的满堂灌，教学资源几乎没有。大二开始有点《新しい日本語》的录音带可以听。大二时候，家里为了支持我学校外语，专门给我买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中央台的日语广播讲座、美国之音的英语九百句以及外国音乐欣赏是每天都要收听的节目。

总体上，那时候学外语就是背单词、背语法、背课文的“三背”。一大早就起来，各自找一处幽静的地方，人越少越好，自己抱着单词本诵读记忆。政治系的校园不大，几百个同学早上都出来找地方背单词，院子里就熙熙攘攘，效果不好了。一部分同学就出校园，穿过文二街去到正对面的外国语学校。那里的空间比较宽敞，主楼是一幢苏式的建筑。穿过这幢楼，在它南面偏东一点，是一块设有简易跑道的操场。操场的三面都有一些小树林。正南面的那堵墙，中间开着一扇门，可以通往设在总工会干校里面的杭州大学中文系。我因经常去中文系同学那儿玩，走这条路可以抄近道，少走很多路。

这一带，幽静处多，背外语单词的同学就比较多。早上锻炼完毕，先到这里学上个把小时，再去吃早饭，听上午的课。

杭州外语学校当时是一所高中中专。和一切外语类学校一样，女生比例很高。往来于食堂、教室和寝室之间的成群结队的女生，青春飞扬，飒爽英姿，十分迷人。不少同学起大早到这一带出没，不去幽静的地方，而是在校内主干道上来回溜达。恐怕也是借学习之名，顺便偷偷欣赏美女吧。隐约也听到班里有某同学与对面外语学院的年轻女教师谈对象的传闻。我未核实，不知真假。

#### 十：小海娃与鸡毛信

七八级大学生的感情生活也是复杂多样的。由于年龄差距极大，阅历很不一样，感情状态各不相同。有一部分同学早就成家，甚至有了孩子；相当一部分同学有对象，也有不少是感情赋闲的，在等待或

寻找机会。还有几个和我差不多大小，乳臭未干的应届高中生，对谈情说爱之事，基本未开窍。

班里同学男多女少。尚未分系的头两年，我们班三十多个同学中还有五、六位女生。大二下班学期末开始分系，选择读经济的女生很少。两个班，拢共也才五、六个人，还分得不匀，女生全部分到二班。我们一班30个同学，清一色的男生。或许是当时杭大唯一的“和尚班”了。当时有一位同学形容，我们这个班是“漫漫黄沙、茫茫戈壁”，一丝春意都没有。

七七级的情况似乎要比我们稍微好一些，不过也好不到哪里去。物以稀为贵，女生短缺，于是十分吃香。女生的面相、气质、身材，只要有一样好，追求的人很多。今天的人谈恋爱、追女友，用的方法是请吃饭、请看电影。当时即便想请也没条件，而且人言可畏，一旦被同学发现了，可是不得了的风闻。一般人也没有那个胆。

方便而惯用的手段就是以情书暗送秋波。写情书可是一门学问，动人的情书常常会成就一段美好的爱情。情书写得好不好，自然有很多要素，但第一要紧是文笔，第二是情感真挚，第三是字写得好。三好做到了，情书就会打动人。不然，你绞尽脑汁白费功夫不说，还挫伤自尊心。虽然是大学生，也不是人人都写得一手好情书的。班里的情书圣手就有了用武之地。受人所托，成人之事，为同学代写情书，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我们寝室有一、两个文艺青年，是写情书的熟手。听他们彼此交谈情书写作的秘诀，知道这玩意也是套路活。知识面和修辞是基本功，谈人生、谈感情、谈事业、谈家庭，样样都需要旁征博引；征要征得精准可靠，引要引得巧妙贴切。中国方面的，文心雕龙加三十六计；外国的，最好是信手拈来普希金、歌德、莱蒙托夫、马雅可夫斯基等等作品中的名言金句。当时，新诗正在流行，舒婷《致橡树》这首诗中的句子恐怕是情书中被引用最多的了，比如下面这句“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情书写完后，要递到女同学手上。这件事在当时也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女生和男生住在不同的宿舍楼。我记得，老师们的宿舍也在

女生那幢楼里面。男同学光天化日之下直接往那儿跑，万一碰上老师问起来，不太好解释。男女同学单独接触的场合不多。上课、吃饭等等都是大庭广众，实在不便。后来不知道哪个同学先想到的，开始盯上我们几个未成年的同学。以连哄带骗的方式诱使我们为他们传递情书，既高效又安全可靠。我也未能幸免，被发展成了送鸡毛信的小海娃。不仅是送信，有时还要为已经对上眼的哥哥姐姐打掩护。

吃完晚饭外出散步，孤男寡女出校门，总会让非常称职的老门卫疑心。万一反映到系党支部书记那里，轻则被找去谈话，重的可能要吃警告处分。女同学就更加小心了，生怕三传两传，弄假成真。最巧妙的办法就是外出散步的时候，忽悠一两个像我这样的小大学生，结伴一起出校门。半道上，再编个理由把我们支开，他们成双成对去更远的地方。

据说，有的小同学知道这个奥秘之后，也就要借此“勒索”哥哥姐姐出点血，买支冰棍或者其他之类的，当作封口费辛苦费什么的。此事，老实如我，是后来听人吹牛才知道的。我一直是兢兢业业地履行着海娃的职能，可是从未想过要这些支派我的同学付出代价。

同小组的某同学，比我大十岁，擅长替人写情书。攒了几本类似于“名人名言录”之类的必备宝典，曾经连续代一位他的好哥儿们写了十几封情书。据说把女生感动得一塌糊涂，可最终事情穿帮了。他后来到处宣扬给我买冰棍让我送情书之类的故事。他这是彻头彻尾的胡诌。抠门如他，怎么舍得花钱买棒冰。

### 十一：饮食生活

恢复高考后的最初几届大学生，享受了人民助学金制度的恩泽。因为出身农村贫困家庭，我获得了一等助学金的资助，每个月可以拿到17.5元人民币。这笔钱，足以解决我日常生活之需了。也因此，四年大学，我没有给家里增添太大的经济负担，只有在发生大一点的开支，比如买一台收音机学外语和购置一块手表，才有必要请求家里的支援。

说来不怕大家笑话，今天的孩子厌吃的学校食堂餐，在当时的我看来，简直好吃得像是天天在过年。正处于长身体阶段，胃口大得出奇，觉得食堂的饭菜，没有不是美味的。早餐二两饭票一个大馒头，我得吃三个，肚子里才有充实感和安全感；或者是两份炸得喷香的芝麻糯米大麻球和糯米糖糕加一碗粥。午餐和晚餐，红烧大肉加菜底，一毛五分钱一份，简直可以吃上三份才过瘾。走油肉、回锅肉、糖醋里脊、糖醋排骨、油豆腐烧肉、红烧排骨、大排、红烧仔排、红烧羊排……，这些菜常常让我直流口水，但单价太贵，舍不得花钱。早餐用来下稀饭的酱瓜因为有咸有甜，不符合山民的口味，起初不太吃得惯，后来越吃越好吃。

照我的饭量，当时估计得需要每月 45 斤粮票。每月定量的 28 斤饭票根本不够吃，需要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获得额外的粮草。姐姐和姐夫省吃俭用，省下来全国粮票和浙江省粮票接济我一部分。再不够就通过其他方式来弥补。常见的办法就是拿自己不用的布票之类交换女同学吃不完的饭票。互通有无、各得其所。

文二街校区的食堂，以我的标准来衡量，那是办得相当好了，可还是有不少同学有意见。有一次，几个同学策划了一个展览，从饭菜中挑出各种遗留在里头的青虫、蜗牛、大屁虫、蜘蛛、绳子、头发、稻草之类，用图钉固定在黑板上，又收集了杂在米饭中的小石子，集中摆在桌面上，抗议食堂的劣行。弄得负责食堂事务的 Lu 老师灰头土脸，只好公开向全体同学道歉。我是农村出身，对于饭菜里面有这些东西，尤其是不慎混进的一些小活物，并不太介意，觉得同学们的示威有点过分了。

## 十二：人鼠大战

本科时代的寝室，居住条件完全无法和当下大学生相比。我们一般是每个十五、六平米的房间放三张高低双层铁架床，住六名同学。靠房门的两侧放两个竖起的木架子，可以用来搁置同学们装日用品的箱子。另外是门两侧竖着的脸盆架。

寝室平时挤得满满当当的，很少有同学愿意在寝室里学习。

当时的文二街，虽不算是郊区，但也不是热闹的城区，各种房间都很接地气。宿舍楼四周长满了杂草和藤蔓灌木，人与自然贴得很近。通常，公共盥洗室都是藏污纳垢之所，但却是鼠类的天堂。大学前两年，我都住在一楼朝北阴暗潮湿的房间。老鼠在房间里窜进窜出，那是令人熟视无睹的。鼠药、老鼠夹，各种方法都解决不了。鼠国的人口如此众多，兵源充足，区区几个大学生根本不是对手，后来也就听之任之了。宿舍楼是砖木结构，梁柱楼板楼梯都是木头的，隔音极差，上下左右任何动静，都听得清清楚楚。夜深人静，老鼠在楼板的夹层里活动十分猖狂，动静大的有点过分了，同学会用拖把柄捅捅天花板，以示警告。鼠们也就老实那么一小会，等到大家睡着了，又开始放肆地撒欢了。

十一点多熄灯，卧谈结束。室内鼾声响起，老鼠便准时开始集体活动。我都怀疑鼠界也会开大会，先是天花板与三夹板之间的夹层里，密集、兼具尖锐和沉闷的跑步声响过后，就开始嘈杂的吱吱声，似乎是在研究什么问题，有交谈、争论甚至厮打。然后声音开始变得有规律，那是鼠爪在天花板上行走奔跑的声音，清晰而有节奏。我推测是某种集体仪式，祭奠、运动会、或者狂欢。总之，这一场活动前后要持续一两个小时，同样的流程每晚都要重复几次。我那时整夜睡不着觉，就全程倾听和欣赏老鼠们整出的表演。可惜我不是生物系的，对鼠类的活动也没有兴趣。否则，有可能写出很有意思的研究论文。

文二街的生态堪称是“原生态”。伴随着大学生们的是各种野生的动、植物。春天，四周蛙声一片；夏天蝉鸣震耳欲聋，秋天，各种虫子不停地呢喃；只有冬天，似乎少了这些活物的动静。四季轮流的日子，老鼠和蟑螂这两样是大家最忠诚的伙伴。

寝室与外面长满野草的荒地是一墙之隔。有时也会有些奇特的不速之客光顾寝室，比如蛇、黄鼠狼之类。幸亏女同学都住在二楼以上，否则见到这等令人慌兮兮的活物，还不吓昏过去！

大二第一学期，开学不久，中秋刚过。一天晚饭后，天色已暗，我正在寝室里收拾书包，准备去系阅览室看书。忽听到对面朝南寝室响起来喊声，我赶紧过去看个究竟。只见三、四个同学手里抄着拖把

之类的家伙对着窗台下面在使劲杵着什么。一问，才知道，刚才有一只黄鼠狼串进房间了。这家伙躲在靠窗那张铁床的底下，四周都被大家堵住，已经无路可逃，蜷缩在最里面的床脚处。这几个人就想把它给弄出来，人多势众，动静又大，那小家伙已经吓坏了。一个同学就趴下身子，想要从床底下接近黄鼠狼，打算活捉它。没想到，他头刚钻进床下，就没命地往外退行，大叫不好了，赶紧走。话音未落，一阵令人窒息的奇臭便迅速弥漫到整个房间的各个角落。那种臭味，我是熟悉的，以前在乡下割稻子时闻到过几次，感觉不到强度。这次在封闭的房间里，总算领教了。那是一种要命的巨臭，似乎无数的臭界战士蜂拥而上，拿着小针尖在戳你的神经，铺天盖地、笼罩一切。你根本不能呼吸，每个同学都憋得满脸通红，只得撤出寝室。那天晚上以及随后的几天，这间寝室就像是被核浪席卷过一般，房门必须紧闭。不然，整个楼道都会洋溢着黄鼠狼对人类的亲切问候。黄鼠狼的屁，不会无缘无故地消失在空气中，而是非常亲密地附着在任何物体上。衣被、墙壁、木头缝、毛发、书本，总之，所有物品，都打上了黄鼠狼胜利的印记。大约在三天左右的时间里，这一寝室的六名同学都像难民一般被班里其他三个寝室安置。

那只黄鼠狼最后也不知所踪，弄得大家此后都不敢开窗。生怕它躲在更加隐秘的某处，随时出来表演绝活，或者得胜归朝后，何时胡汉三又杀回马枪。我甚至想象着，这小家伙看到人类的狼狈样，或许在某个角落里得意地狞笑呢！

毫无疑问，人类在与黄鼠狼的战争中完败了，输的很惨。万物之灵、天之骄子，居然抵不过黄鼠狼的一个无声无息的屁，实在让人啼笑皆非。

### 十三：大学生竞选人大代表

1979年7月，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对选举制度作了一些重要改革。其中一条是把直接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范围扩大到县一级(以前只在县以下基层选举)。

杭州大学的属地是西湖区，根据刚颁布的《选举法》，杭州大学所有具有选举权的师生都可以成为选举人和候选人，投票直接选举西湖区人大代表。于是，1979年下半年开始，人大直选就在学校铺开了。选民登记的时候，我只有16岁，没有选举资格，从头至尾做了一个旁观者。不过，我的一些同学都以高昂的激情投入到了竞选活动中去了。以当时杭州大学的选民规模，大概可以产生两名人大代表。这次选举在中国政治史上应该是很值得记住的一次，因为那真是类似于西方发达国家选举地方议员那样的政治实践。公民自己报名，资格审查，一轮一轮竞选，最后选出代表。

参加竞选的大学生，要争取同学们的选票，就必须有自己的施政纲领，还要广为宣传。公开演讲自然是必须的作业。

初选那一轮，各系杀出的几位口才最好的同学，各显神通。有一次，好像是秋天，一场辩论会设在杭州大学东三（外语学院）楼前的大草坪上。这个草坪东面的办公楼好像是地理系的，南面的东二是教育系的办公楼，邵逸夫科技馆那时还没有建造。三幢房子围成的那片开阔的草坪就成了竞选聚会的最佳场所。那场辩论有四位参加者：外语系的Wu同学、中文系的Yang同学、政治系的Ye同学、数学系的Tang同学。其中，Ye和我都是七八级，都属兔子，但他的岁数比我大整整一属，已近而立之年。Ye同学一表人才，具有强烈的政治激情。在我们这批同学中，属于各方面都很成熟的先行者，尤以文笔和口才见长，特别擅长在大场面上演讲。他在杭州的民间社会，早已经是颇有影响力的民间政治领袖，甚至在全国也都有一定影响。他在初选中脱颖而出，大家都很高兴，为他自豪。这次公开演讲，我们系里不少同学都自发地赶去那儿为他捧场助威。

仲秋时分的正午，阳光明艳而不毒辣，金风和煦，十分舒适。当天下午没有课，我们自己带着搪瓷碗在本部东门的食堂打了饭菜，到草坪上，或站或坐，边吃边听。四个系的部分同学围拢在一起，作为演讲的听众。轮到自己的同学上场演说，一定会使劲鼓掌吆喝。我记得，当时好像是Wu同学，在演讲中声嘶力竭、慷慨激昂地承诺，如果当选，就一定会取消周六半天的政治学习，引起了听众热烈的掌声；

还有演讲者承诺当选后废除香烟票证、改进大学生住宿条件、放松校内纪律管制如夜里寝室不熄灯之类。总之，五花八门的施政纲领都摆到了大家面前，主要内容还是为大学生争取权益。

这种不是打砸抢的，和平地参与公共事务的政治生活实践，对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实在是非常新鲜而有吸引力的。当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国民的权利意识开始觉醒，有着极强的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意愿与激情。但不得不承认，我们并不具备驾驭选举民主这头猛兽的应有能力。事情似乎在朝着失控的方向发展，这引起了相关方面的高度忧虑和紧张。

众所周知，这场直选后来的结局是一个令人感伤的故事。不过，作为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次宝贵探索，它留下了一道深刻的印记。而在我的脑海中，它的印象也是一直新鲜而不褪色的。

#### 十四：一次震撼心灵的遭遇

1979年的农历年末，快要放寒假了，我去湖滨的杭州书画社买一些回家要用的年画之类的东西。经过延安路与解放路十字路口，正在专心走路，突然被人用力拽住了手臂。因为毫无心理准备，真是吓了一跳。定睛一看，眼前是一个不认识的中年妇女，衣衫褴褛。她身后，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席地而坐，前面摆着一只破搪瓷碗，还有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字。她们在乞讨，在大庭广众之下。这让我无比震惊！此前我从未见过乞丐。虽然农村的生活很艰苦，但是村里没有一个人外出要饭的，而且书本上也从来不承认我们国家有乞丐。因为实在过于突然和震惊，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回应这两位乞讨者的请求。我口袋里的钱都已经在刚才的采购中变成了年画之类的，搜遍全身的几只口袋也只凑了一两毛钱，交给他们。口袋里还有几张粮票，愿意给他们。但他们只要钱，不要别的。我似乎被刚才这一幕震晕了，都不知道是怎么回学校的。我至今不清楚，为何当时的反应会如此强烈，脸色苍白，浑身发抖。

回到寝室后，告诉大家这件事情，同学们的反应很不一样。有的和我一样震惊和不解；有的则是疑虑，认为我遇到了装成乞丐的骗子；

还有的居然认为这是阶级敌人在背后操纵故意给国家抹黑，激化人民内部矛盾。叽叽喳喳，讨论了半天，似乎也没有定论。

事情虽然过去了，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脑子里总是思考着这件事。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的城市大街上还会有乞丐？！带着这个问题，我学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财政学、农村经济学等课程。当时还没有开设发展经济学这门课程，不可能知道有托达罗模型这类解释性的理论，可以为我解疑释惑。一切也只能靠去图书杂志上找材料来学习，试图找到一个让自己满意的解释。这或许是引发我此后几十年一直从事发展经济学教学与科研的最初的问题意识。

### 十五：激情大游行

我们读大学的那四年，中华儿女的精神面貌正在蓬勃向上，民族的振兴和国家的复兴，是那一代大学生非常关心的大事。

1979年，中国女排在亚洲女排锦标赛中，以三比一战胜东道主日本女排，取得亚洲冠军。在电视机前收看比赛实况的同学们高兴地忘乎所以。比赛是在北京时间晚上，地点是在东京代代木体育馆。中央台实况转播，宋世雄解说。我们匆匆吃过晚饭就簇拥在系里那台唯一的老式黑白电视机前面，为女排姑娘加油助威。每当中国女排打出一个好球，激起的都是山呼海啸般的叫好声。这叫好声不仅是在我们看电视的现场，而是来自四面八方。每一次失分，都会引来一片沮丧的哀叹。随着中国队赢下最后一局，以三比一拿下整场比赛，大家都兴奋得跳了起来，抱在一起欢呼庆贺。随后就是扔啤酒瓶、罐头瓶等一切可以发出爆裂声的物品，点燃拖把，敲搪瓷碗、搪瓷脸盆庆祝。

1981年1月4日，足球世界杯亚大区预选赛，中国队加时赛时以4:2击败当时的亚洲强队朝鲜队。当年的10月18号，在亚大区四强赛中又3:0将亚洲杯冠军科威特斩于马下，并两胜亚洲新锐沙特阿拉伯。

在对科威特的那场比赛中，国足守门员李富胜扑出了对方点球的那一刹那，大家的情绪达到了高潮。那一刻，李富胜是我们心目中最伟大的民族英雄，被誉为中国铁门、中国门神。

对阵亚洲强队沙特足球队的那场比赛，堪称中国足球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场激战。1981年11月12日，在中立国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的这场世界杯预选赛亚太赛区的出线争夺战，异常激烈精彩。中国队在被对手连进两球，逼到悬崖边上的危急关头，苏永舜教练换人成功。随后，古广明、陈金刚、左树声、迟尚斌四位队员分别进球，最后以4:2实现了大逆转。这场比赛打得惊心动魄、荡气回肠。所有同学的视线和心情都被那台黑白电视机左右住了。当终场的哨声吹响，我相信全中国都沸腾了。人们寻找各种手段和方式表达自己的激动和快乐。

就在这一场比赛胜利后，政治系（当时已经分为哲学系和经济系）七七、七八、七九这三个年级的几百名同学都组织起来上街游行庆贺了。我们举着蘸了煤油点燃的拖把当火炬，敲着搪瓷饭碗和脸盆，走保俶北路，到文三街右拐进从杭大后门，与本部的主力部队会合。然后，浩浩荡荡南下出杭大南门，走杭大路、体育场路、环城东路，到西湖边的六公园，再沿湖滨路进入南山路，到虎跑路过钱塘江大桥，最后一直走到六和塔才折回。我记得回来走的是近江路、望江路，经过解放路东头进到环城东路，再到艮山门西折环城北路天目山路，回到保俶北路，最后到文二街的校区。这一圈，全长应该有三、四十公里。回到文二街宿舍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去的时候，月亮还在屋顶上；回来的时候，东方的天空开始泛白。我当时还没有手表，也不知道那天晚上到底走了几个小时。拿在手上的搪瓷脸盆，走的时候还是崭新的，被忘情的主人当铜锣一般用力敲击，还没到中途，搪瓷早就碎落，剩下灰黑色的铁皮内胎。继续敲，到后来干脆扔到马路上。你一脚我一脚地朝前踢，铁皮底子也被磨脱落掉了，只剩下一个铁圈。拖把上的布条烧尽后，剩下木棍当拐杖拄。

我当时才18岁，血气方刚，心中充满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义无反顾地加入到这个游行的行列之中。在召集人的引领下，所有的同学一边走一边齐声高喊“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声浪似乎要把杭州的夜空都掀翻。激情如此高昂，场面如此感人。今日回想起来，依然心潮激荡。那一晚，几乎所有的

人都沉浸在其中不能自拔。此后的几天，同学们仍然沉浸在激动兴奋的心情之中，用沙哑的嗓子继续津津乐道。那几天校园里，一瘸一拐的同学有不少，都是因为长途游行脚上磨出了血泡。

#### 十六：发表论文

大三那年，受到“改革开放、振兴中华”口号的强大激励，我开始狂热地迷上了学术研究。当时最感兴趣的是借鉴其他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来推动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我一外学习的是日语，对日本的情况相对熟悉，兴趣也更加大，所以就阅读了很多日本史尤其是战后经济高速成长的学术著作，比如赖肖尔的《日本人》，帕特里克和罗索夫斯基合编的《亚洲新巨人》（上下册），吉田茂的《激荡的百年史》，梶西光速的《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远山茂树的多卷本日本近现代史等。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我下笨功夫做了数百张资料卡片，手工制作表格，积累了比较多的数据，才动手开笔，几易其稿，终于在大三的下半学期写出了平生第一篇万余字的“学术”论文：“战后日本的经济起飞与教育投资”。这篇处女作得到了王福英老师的赏识并由她推荐到《管理者》杂志。事先，王老师并没有告诉我这篇文章会正式发表。1982年过完春节回学校，传达室的老师傅告诉我有一张汇款单和一个邮件。那是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最新一期《管理者》杂志，和一笔标注为稿费的18块钱汇款单。我当时完全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以为是哪里弄错了。反复验视，确认是我的文章和我的名字。那种狂喜，真是难以形容！我觉得自己的脑袋一片空白，但却无比开心。这不仅因为这笔钱足足可以支付一个月的生活费，更因为它是我那稚嫩的学术能力得到认可的标志。好长时间，我都没有从这个巨大的快乐中平静下来。

今天看来，这篇所谓的“学术论文”实在非常幼稚，但它在我心目中一直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正是因为它，我才真正明白了学术事业的甘苦，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朴实真理。而且，作为一个大学三年级学生，还不到19岁，就公开发表了学术论文。这件事情给我带来了巨大的自信，是难以估价的。为此，我对王福英老师一直怀着深深的

感恩之情。如果没有她的举荐，我就不可能年纪轻轻就发表论文，也不会感受到学术生活的魅力和乐趣。此后我的人生之路或许完全大相径庭了。

### 十七：毕业分配

1982年六、七月，是七八级同学的毕业季。才不到四个月前，七七级刚毕业走上社会。当时行政企事业单位没有今天这么大的规模，对大学生的消化能力不太强。进了七七级，留给七八级的机会就少多了。所以，与七七级相比，七八级的分配要差得多。

当时关于大学生分配，还有各种管制性政策。比如，来自山区、海岛以及国家级贫困县的毕业生，如无特殊的理由必须回原籍工作等等。六月、七月这两个月，对于很多同学而言，内心十分焦虑。他们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被杭州的单位要走，能不能留在大城市工作。

一些早已成家、带薪读书的同学，和我们这些无忧无虑的小青年，是最不关心自己的工作的。前者基本选择回原籍；留下来不走，就意味着夫妻两地分居。家属要解决杭州户口比登天还难，不如回自己的老家县城。准机关的各级党校于是就成了那一届同学就业的大户。

我自己对毕业分配的事情，虽不能说毫不上心，也可以说不知从何上心。几乎就是一种心态主宰到底，那就是等待和服从系里的决定。系里也征求过大家的工作意向，成绩排名相对靠前的同学，可以优先选择留校或者去中央部委工作。

我记得，当时有五、六个中央机关部委来要人，分别是财政部、冶金部、商业部、煤炭部、粮食部等。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还不错。如果愿意，是可以选择去其中的一家工作的。但我确实对从政这件事，不但毫无兴趣，反而还是有一丝恐惧和厌恶，因此断然放弃了选择权。

系里分管分配的领导征求我本人意见的时候，我只要求去学校教书，能够就近最好。我暗自希望自己能够留在杭州大学教书，但又觉得这个愿望有点奢侈，也就不抱实际上的希望。心理的底线是，只要在华东一带，只要不离父母亲太远，只要能让我教书，哪儿都可以。比如，已经做好准备去江西财大或者安徽财经学院等。班级的那些民

间组织部长也在不断传播系里变动不停的应届毕业生分配方案，弄得大家心浮气躁的。有一次，班主任 W 老师把我叫去他房间，预告我可能要去南昌或蚌埠。我虽然有些失望，但还是做好了心理准备。

七月上旬，杭州已经盛夏，酷暑难耐。一天，我正在浑身冒汗地坐在门口通风处看小说，一位同学跑来通知我去系主任徐崇云老师办公室，说是要找我谈话。这四年里，似乎从未有系领导找我谈过话。这次让我异常紧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战战兢兢地去了那儿。一进门，连坐都没坐下，徐老师就简明扼要地给我下达了通知，说，系里决定把你留下当老师。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的大脑被一片灿烂的光明笼罩，无边的幸福涌上心头。我不仅留在了杭州，还留在了这里最好的大学，从事我梦寐以求的工作！要知道，有多少同学希望得到这个岗位啊！一个来自偏远山区的农家子弟，在杭州没有任何社会关系。读书四年，也从未想到去要和系里的领导套近乎、拉关系。即便有同学提醒我要去领导家里走动走动，我也是不知所措。终究最后还是连领导家里的门朝哪儿开也不知道。除了读书还是读书，其他实在完全不擅长。平静下来以后，我内心忽然涌起了一丝感动。与其说是为了我的运气，毋宁说是为了那时候领导的清正。正是因为系领导秉公处事，严格按照毕业生的综合表现，特别是学习表现，来安排分配方案，我才能够凭借较好的学习成绩留在省会城市的好大学，做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在正式得到报到通知书和证明文件之前的那段时间，我和另一位也已经被确认留在本校马列部教书的 L 同学，过得十分开心。我们俩本来就是同寝室的，年龄相差也不大，一起说过相声，四年里彼此很合得来。这个时候，两人更是天天混在一起，除了各自看些感兴趣的闲书，就是一起去文二街东头的冷饮店和菜场买自己喜欢的吃食。买得最多的是五分钱一支的麻酱棒冰和红心李子。两人轮流买，然后共享。同时也抱着极为复杂的同情心，分担着等待分配的其他同学的喜怒哀乐。懵懵懂懂的我，完全不知道，在那段时间，发生在同学们之间的爱恨情仇和悲欢离合。

几十年以后，老同学聚会，才从他们口中得知。那个夏天的江湖，原来是那样地扑朔迷离，甚至骇浪滔天。“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如今绝大多数已经过上退休生活的老同学们聚在一起，尽释前嫌，笑谈往事。时间会抚平创伤，人生最终返璞归真。此情此景，也让我十分感慨和感动！

1982年7月中旬，我们这批七八级的毕业生陆陆续续办理了离校手续，回到原籍，等待规定的时间去工作单位报到上班。我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回到家乡，在那里待命。两个星期后的1982年8月初，我从老家返回杭州，来到自己学习了四年的母系报到。那天以后，距离19岁生日还差一周时间的我就完成了从一名本科毕业生到大学老师的瞬间身份转型，成为一名幸福的大学老师。此后，我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校园和讲台。

#### 返回目录

## 两枚钉子

——杭州大学数学系 77 级 沈加红

1978 年 3 月 3 日，因为我的右手臂尺骨骨折，不能用力，是姐姐帮我提着木箱和行李，挤上了拥挤的公交车。

不记得是到了什么站我们下的车，也不记得我们是怎样走到位于杭州天目山路杭州大学大门口的。只记得有几位老师和学生非常热情地迎了上来。我无法知道他们是高年级的还是我们同年级的同学，但我看到他们不分专业的在接待所有来报到的新同学。当他们看到我的右手绑着白色的绷带，搬运东西有所不便，于是其中的老师就对姐姐说：按理非本校的教职员工不得入内，你就进去帮一下吧。同学们拉来了一辆三轮车。姐姐将她下乡时用了三年的、再熟悉不过的这个木箱放到了三轮车上，同学们也将我的行李提上了三轮车。

经过第 7 宿舍，我们来到了第 8 宿舍楼前停了下来。又有同学过来一起将木箱和行李搬到了三楼的房间里。那房号我现在也不记得了。房间里左右两边分别靠墙放着四张布满尘埃的高低床。有同学说，你随便选个床吧。我选了一个上铺。同学们要找抹布给我擦床，姐姐一定不让他们做。于是，他们礼貌的告退了。姐姐和我一路谢谢地将他们送到这筒子楼的楼梯口。

当然是姐姐帮我搞了清洁卫生。这是 41 年前的事，我依稀只记得这些了。

我从房间内向南面的窗外望去，法国胡桐树树干匀称粗壮，不多的叶子让更多的阳光照射了下来，使得树枝上的深色树皮斑纹清晰可见。金色的、棕色的树叶在第 7 宿舍外墙灰色的立面前不知疲倦的摇曳着。我走到窗前，向下看了一眼，模模糊糊的。我去拿了一个半副无框银丝眼镜，也就是单个镜片，再向地面看去。阳光下的草地，丝丝入扣。我知道，我眼睛的近视度数确实加深了。

这个半副无框银丝眼镜是我 1977 年 9 月份开始启用的。突然恢复高考，杭七中选了部分已经毕业离校的学生再回校复习，因为我们学

校有许多老师是杭州市教育局多个学科教研大组的成员甚至组长。在回校复习班里，当我坐在最后一排，发现黑板上的字已经看不清了。这是我近一年多来，用沾钢笔笔头斜的剪去头部，偷偷的抄写了许多小提琴练习曲和曲谱所造成的眼睛近视。为什么要夜以继日地去偷偷抄写呢？因为开塞的《小提琴练习曲 36 首》、赫利美利的《小提琴音阶练习》、克莱采尔的《小提琴练习曲 42 首》等这些无标题音乐在当时是被称为封资修的东西。如果被发现甚至被举报对此有偏好，那是会被认为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政治风险的。加之这些稀缺的乐谱都是通过熟人从专业剧团里临时借出来的，在手时间极短。正因为杭七中高考复习是临时通知的，而我没有眼镜，只好用我继母的这一副眼镜了。这副眼镜因为年久，断了。所以我也只能用手提着用半副使用，绝对不是用手持单片眼镜以装逼贵族。

人心所思，苍天有道。冥冥之中，毫无能力的继母竟然会凭借她那半副眼镜帮助我通过了高考，获得了大学的《入学通知书》，把我送到了人生的高速公路。

这时，我还要做一次选择：留城还是读书。因为姐姐下乡三年后被推荐到杭州师范学校就读中学文科师范专业。按照上山下乡政策的规定：每个家庭的父母身边只能留一个子女。所以姐姐的回杭就意味着我还得去下乡。我们家也通过远亲，为我联系落实好了杭州郊区九堡的农村。后来，上山下乡政策有所松动，母亲也在退休时与单位讲好了接受我的顶职，留城有希望了。而如果上大学读书，四年后还要面对国家分配，有离开杭州的风险。经历过母女分离的母亲试探着对我说：留城吧。倔强的我坚决地回答：我要读书！后来我们家里经常说：在草鞋（农村）、布鞋（打工）、皮鞋（读书）之间，我是宁可穿再烂的皮鞋（任何专业），也不去穿好的草鞋、布鞋。

当我拿到《入学通知书》的时候，卧床 2 年、骨瘦如柴的父亲笑了。这笑容历历在目，刻骨铭心！

重病卧床的父亲、患精神病的继母、退休又高血压冠心病的母亲、尚未出嫁而社会生存能力很弱的姐姐，在这样的家庭里，我作为男子

理应成为了家庭主要的帮手：门窗修补、桌椅加固、捉漏盖瓦、灯电维修、补墙修路、劈柴挑水、看病跑医院。

所以，入学不久，当走读生们都希望能够在学校里休息甚至睡觉的地方时，我却不呆在学校里老是往家里跑。整个大学期间，我几乎都没有很多时间参加课余的社团活动，只是偶尔的踢踢足球，参加过一次小提琴演奏（学习雷锋好榜样等）和一次男生四重唱（哎呦妈妈）。还有，最后一个暑假从山海关骑自行车到上海（约 1500 公里），为上海自行车四厂的“飞达”牌自行车做试车实验。

正是因为这样，在大学生活里，我和许多同学交流甚少，不少同学对我平时的印象也不会深的。但是，我对发生在 8 舍的故事还是记忆犹新的。

中学的同学常常来 8 舍，与其说是来看我的，不如说是去外语系养眼的。

一次，中学同学和我在 8 舍房间里聊天，朱兴福正好自修间隙回一下宿舍。阿福与我中学同学相互也都很熟，见过几次面。当阿福拿起杯子，用瓢羹舀了两勺麦乳精，正准备冲泡时。我中学同学坏笑着说：阿福，不要这么客气么。阿福一边笑着回答：你们难得来的。一边去找牙杯当茶杯给他们泡麦乳精。当阿福正要舀麦乳精时，我中学同学又说了：那就我们自己来吧，太麻烦你了。于是，瓢羹也不用了，笑声中两个杯子直接倒入了约五杯的量。这位中学同学后来成了分管财贸的副省长的秘书，与省府办公厅任职的李纪宁是同事。40 年后，他们两位在我家相遇时说起此事，仍然大笑不止。

8 舍里，类似麦乳精的故事何止这一例。8 舍每个房间有两张大桌子，每张桌子两边分别有两个抽屉。这样 8 个抽屉正好供 4 张高低铺 8 个人使用。所以，抽屉是底对底的。一般来说大的瓶子盖好盖子放到抽屉里，抽屉锁住了，瓶子里的食物也就无法取到了。于是，将自己的桌子抽屉拉出来，用手通过对面抽屉的底部伸进去，将瓶口拧开，用调羹把麦乳精、白糖之类的舀出来，做这样的事大有人在。更有甚者，将对面抽屉里的云片糕取出，将板刷包好放回。不知道那半夜回宿舍想美美地品尝点心的同学现在还记得当时感受吗？我们都记得该

同学当时说：好了，我抽屉不锁了。你们这样做，把糖弄得抽屉里到处都是了。

在 8 舍中，丰富、风趣又火焰般的学生生活已经成为了我们的记忆。相比之下，枯燥、苦涩又修行般的专业学习，让我的文字少了许多。就“做做《吉米多维奇》”这七个字，就包含了我们多少的内容、时间和变化啊！大家在 8 舍调整过多次小组和房间，最后在大四还搬出了 8 舍。但是，从理工科的角度看，8 舍对我们数学系的学生来说，停留时间最长，帮助最大，印象最深刻，感情最浓厚。因为数学只要笔和纸，不需要实验室。所以，8 舍不仅是我人生的站点，也是我记忆的驻点，更是我思维的拐点。在这里，我获得了数学的专业思维训练。这对于今后在工作中的抽象、研究、简化、抓本质、讲逻辑、建模型等方面能力有极大的帮助，受益终身。

1981 年 4 月 22 日上午，我从 8 舍冲到家里。母亲、姐姐和我送走了卧床 5 年的父亲。他最终还是看不到我的毕业和我的分配，带着担忧走了。阿福等同学也来我家安慰我。

我懂父亲的想法，我要读书！毕业前后，我想去美国留学，去考托福。可是这谈何容易啊！

首先是资讯不够。那时，所有信息基本上是靠书报杂志、通信、广播。有深度的资料还是靠书。所以，那时的书也是盗版、影印横行。托福资料和模拟考试卷也都是用影印的。国内电话、电报是紧急情况的奢侈品。国际电话、电报是打不起的。什么互联网，那是连科幻都意想不到的。图书馆里的美国大学介绍，真的是简介。专业课程和教学内容，我只能凭着想象去理解，认知肯定是错位的。

其次，经济原因。我毕业前没有收入。毕业后，收入也只能维持国内生活。当时杭州市的五保户最低生活线标准据说是每月 8 元钱。有的五保户获得的实际补贴只有 3 元、6 元。菜场里，日用品都是以角分计。杭州最好的电影院——太平洋电影院的冷气大片也只是一角五分。钱币最大的是 10 元。但是，向美国寄一封厚一点的航空信是以元计的。研究生申请不是一个学校一封信可以解决的。当时真羡慕美国的折叠式印刷信封，信笺信封合为一体，分量减轻不少。邮寄还可以

在邮局的国际部通过人民币来支付。后续的跟进，就需要美元了。国家外汇是非常紧张的。我们私人是无法换取外汇的。哪里来的外汇指标和美元啊？

最主要的，还是我的思维方式、语言能力怎么能够与国际接轨！

但是，青葱岁月的愣头青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我找到了父亲在休斯顿的堂弟沈敬文，厚着脸皮让他给我支付去上海考托福的美元考试费。我还给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写信，索要留学资料。

敬文叔叔是稠油开采世界顶级的权威，作为资深研究科学家（Senior Research Scientist），在台湾曾获得政府颁发的工程师最高荣誉景星勋章一座。他到美国后，一直在大公司研究中心工作了 21 年。先在盖蒂（Getty）石油公司；德士古（Texaco）收购盖蒂后，又在德仕古主持采油研究工作，特别是热力增产石油技术。1972 年 2 月尼克松访华后，他就开始和中国联络。1978 年 12 月改革开放后，他就和中国石化部、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联络，自 1979 年起先后 9 次应邀访问中国，受到了出入境免检的国家礼遇。他亲自为北京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实验室设计和安装了先进的蒸汽采油实验设备，让美国同行大为惊叹。他帮助中国第三大油田——辽河油田采用蒸汽吞吐采油，成果很好，并推进蒸汽驱油计划。同时他表示无条件支持辽河稠油实验室。因此，他受到了任职公司的巨大压力。敬文叔叔态度坚决的说：大不了提早退休。我不能辜负那么多人对我的期望。他把 40 多年的石油经验带给了许多年轻的中国工程师。

这样的叔叔哪有不支持我的！但是，他也告诉我美国的文化和理念：所有的借款都是要还的。他明明知道我还不起，还是在思维上提醒我说：你用什么来还？事实上，他对我的支持是无偿的。

美国驻上海领事馆 David Hess 领事给我寄来了美国新闻总署出版的《留学美国指南》，对美国的留学做了权威而全面的介绍：从美国的教育制度到大专学院入学手续，从在美国的衣食住行到在美国读书，还有美国高等教育参考资料目录、准备赴美求学步骤表、留学美国申请表格。这就是我的留学扫盲和起步。这本书后来成为了我的收藏书了。

当我获得美国三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理想与现实又有了矛盾。出国的钱呢？机票是一次性的可以求人。那生活费呢？房租呢？还有，我真的走得了吗？虽然叔叔答应帮助我，但是我还是在主观上和客观上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最后做出了暂时搁置的决定。世上有许多事，没有比暂时更加永久的了。叔叔生胆管癌去世了。

1981年6月到1982年9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了领导人员要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被强化为干部队伍的“四化”，并正式写入党章，大力推行。所以，1982年3月我参加工作后，就被安置在核心部门的重要岗位加以培养。改革的方向和内容非常多，工作量极大，工作和家庭已经不能兼顾了。在我当了办公室主任以后，才得到了友人的帮助，将我的继母送入福利院。三年后，继母在那里走完了她艰苦的人生之路。

虽然我兑现了对父亲的承诺，遇到各种情况都守住了底线。但是后来的各种原因，使得我的全日制读书愿望也就在这里打住了。

我的继母，出生时间不详，在我出生前就发病。她是伴随我长大的亲人，如同一枚钉子，在我人生的路径中牢牢的锚固了一个点。

也是在我出生的前后，杭州大学始建于1956年竣工于1959年的长条状、“一”字形内廊式3层楼青砖建筑，犹如一枚钉子，在我的精神成长轨迹上，高高的固定了一个点。

在历史的大河中，当世界万物的流动（flowing）奔腾而过时，继母和8舍是我遇到和看得最清楚的两滴水珠，仿佛两枚钉子，牢牢地钉在了我的记忆里。

凯文·凯利（Kevin Kelly）在《必然》中说：科技在本质上是有所偏好的，决定科技发展的物理和数学原理，他们就一定会青睐某一些特定的行为。那么，两枚钉子背后的本质——基督教、数学，对我是不是也有行为偏好呢？我是一个生物体，在我完成了工作经历，现在已经退休了，我可以回答：是的。在混沌的，甚至是失控的过程中，还是这两个物理存在在主导。因为这两枚钉子是精神基因，是真正的乘客，而我的肉体只不过就是个车厢罢了。

不知入世时间的继母，到终点后，就只留在了我的心中；已知建成时间的 8 舍，还健在并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8 舍连同 7 舍一起共 5450 平方米。整个建筑风格统一，体型稳重、青砖黑瓦，形象古朴、简洁明快，为建国初期建造的杭州城市优秀教育类建筑之一。2005 年 7 月被列入杭州市第二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单。

2017 年杭州正式启动了 8 舍、7 舍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工程。2017 年 7 月保护修缮方案经杭州住保房管局组织的专家、部门论证通过，11 月修缮工程启动。

2017 年 12 月 10 日，为了筹备“四十周年同学聚会”，邹卫华和我专门去杭大拍摄素材。这时的 8 舍开膛剖肚，将所有的“内脏”、结构、材质，全部展现在我们面前。我甚至拍到了一楼到三楼三层的解剖实景、盥洗室水管的解剖实景、8 舍走廊和室内的解剖实景。那房屋、楼梯、隔着法国梧桐树观看 7 舍的景观、外墙拉毛的黄色油漆、青砖和勾缝。不变的一切，把我又带回到了 40 年前氛围中，甚至可以闻到了 60 年前的气味。

2019 年 2 月 7 日，我再次来到 8 舍时，这里已经是杭州西溪七舍酒店(Qishe Hotel)了。携程价格 282-398 元。

对我来说，两枚钉子的作用和意义永存。

(2019 年 3 月 11 日于森林小屋)

[返回目录](#)

## 杭大芳华

——杭州大学新闻系 87 级 黄国宏

杭大，  
少年时，你是我的梦；  
青年时，你是我的家；  
中年时，你是我的魂。

——题记

转眼间，杭大毕业已经近三十年了，倘若再不写点回忆的文章，恐怕会对不起母校，更对不起我们曾经的芳华。

### 一、我们来了

1987年9月11日，那天大清早，我与考上杭大法律系的高中同学邢健，在他母亲的带领下，从瑞安出发，在雨夜里坐了一整夜的长途车，到达了杭州。那是我第一次远离家乡，来到梦寐以求的杭州。杭州那天清早迎接我的是一场绵绵不绝的秋雨……我如今脑海里记忆最深刻的是大街上滚滚的自行车车流，以及我们在雨中提包背箱的狼狈形象。

我们一行叫了一辆运货的人力三轮车，把大小行李装在货斗里，自己就蹲在车上，在吱吱呀呀的车轮声中，从下车处抵达杭大南门。据说从城站火车下来的新生，可以得到校车接送的服务。那时，温州还没通火车。所以温州、丽水、台州来的新生，应该都遭遇类似的尴尬吧。

我们冒着雨，在杭大校园里四处问、到处走，独自办理了入学各种手续、独自布置了床头被褥。面对刚入大城市的考验，内心还是有所准备，有点小顽强，毕竟将来想当大记者嘛。

当天，就给家里父母写了一封报平安的信，其中一句至今还深深记得：“校园很大，我如同进入了迷宫。”

开学啦！记得开学典礼是在校大礼堂举行的。那时一届也才招2000来人吧。礼堂在校园东南角女生宿舍前，约1000来个位置，平时周末放电影。礼堂左右侧，有两幅标语，左边似乎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右边似乎是“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当时的校长是研究哲学的沈善洪教授，党委书记是薛艳庄女士，副校长有董如宾、姜新茂、夏越炯等先生。

开学典礼上，有个环节至今难忘。就是新生发言代表是一位从老山前线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回来，特招进中文系专科班学习的战士——陈灿。他似乎是安徽人，战前就是驻留下部队的战士。上战场负伤，如同电影《芳华》中的情节一样，在云南蒙自野战医院躺过。在大学里，他的寝室就在我的寝室边上，言行一向比较自律。他业余一直坚持写诗，如今是中国作协会员。有人赞他为“佩剑诗人”。如今据说在某地级市当纪委书记吧。

那时，从西一到西七教学楼，分别是经济、旅游、法律、物理、历史、化学、外语等系。西1教学楼(原旅游楼)，当时还是行政楼，是校领导的办公地。行政办公室我去过一次。我读大二下学期时，八十年代末年的暮春时节的一个下午课后时分，被当时的党委副书记童芍素女士单独约谈过一次。童老师对学生还是爱护的，后来当了浙大党委副书记与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从东一教学楼到东五教学楼（是否有东六教学楼记不清了），分别是中文系、地理系、计算机系、体育系、数学系等。那时的所有班级的信箱在东二教学楼，木制的一排排信箱在悠长的廊道里显得有点幽暗。我们87新闻班的应该是312邮箱吧。东三教学楼也叫老外语楼，应该是外语系以前的教学楼。我们的公共英语课就是在那里上的。一楼有个小小的书店；在东三与东四的过道上，设立了杭大邮政所。家里汇来的生活费，都要去邮政所拿。

当时的邮政所里，帮我们办理业务的是一个年轻的姑娘。因为我的大学同寝室同学吕小利担任杭大晨钟诗社社长，提到她也会写点东西，所以我留意过她。

多年后，这位姑娘对媒体回忆道：“上课铃响之后，邮政所安静下来。坐在带高高铁栅栏的柜台内，耳边传来读书声。作为同龄人，内心的失落感不言而喻……或许是‘痛苦出诗人’，那会儿我的内心生发了高玉宝‘我要读书’那样的念头……杭大中文系的飞白、金健人、徐岱老师，取好稿费，也会在栅栏外跟我聊一会儿文学。”

后来，她破茧成蝶，获得了浙大新闻系文学学士学位。她就是卢文丽。如今，她已是知名诗人，中国作协会员，杭州某周报副总。

这样的励志故事，似乎也证明了杭大文化积淀的巨大感染力。

东二、西二、西三教学楼以及7、8幢宿舍楼都建于建国初期。在2005年被列入杭州市第二批历史保护建筑，认定它们是当年杭州高等教育设施的实物见证，弥足珍贵。这也是杭大文化积淀的物证吧。

## 二、那时的概貌

先说住。位于校园北侧的7、8幢，那时住的主要是研究生，大概是四人一房，让我们这些住八人房的本科生很是羡慕。本、专科男生都住在9-12幢。每幢都是一条长走廊，串连着许多个单间；每间住八人，走廊两端通风——典型的筒子楼，没有风扇、没有独卫，更没有热水。但是，已经算是新式的公寓，建造年代大概也是八十年代初。开学时，发统一的蚊帐、草席、床单。环境比女生宿舍好多了，至少走廊上不会有酸臭味。

女生宿舍在校园的东南侧，大概有6幢，编号也是1到6吧。房子肯定是五十年代建造的老房子，破旧、阴暗、潮湿……最尴尬的是一进去就能在走廊上闻到一股酸馊味。一位81届毕业的女生这样回忆当年的宿舍生活：“当时杭大的卫生条件，尚属初级阶段。每幢共三层，每层有个公用卫生间，还有个无门的盥洗室。夏天，大家穿着短裤在盥洗室冲凉。冬天，学校的浴室开放后，大家赤身露体地合用几个莲蓬头淋浴，毫无隐私可言。冬天洗热水澡是项奢侈，一般一月一次。平时每天只能到食堂打点热水洗脚。”所以，当时女生对男生宿舍的条件应该是很羡慕的。

87级中文系的杭州女生诸肖岩如此回忆1987年开学第一天：“当时去了高中同学警校崭新的宿舍再到杭大报到，走进六幢一楼湿哒哒黑乎乎的走廊，内心是有点崩溃的，不过比起后面的经历都是小意思了。我们的宿舍对着洗漱房，是老鼠们最喜欢光临的地方。开始常常是吃饭时余光一瞥就看到脚边一只黑老鼠在东张西望，接着就是尖叫声一串，一屋子人都到处想逃窜。但到后来即使常常听到室友在翻箱子时突然发出的尖叫声，大家也都变得越来越淡定了。11幢的男生宿舍相比之下简直就是天堂。我们当时特别羡慕87外语系的女生。她们有那么好的居住条件，可以住到11幢1楼！”

如今，六幢女生宿舍荡然无存，四校合并后被推倒，修建成了“启真名苑”，让杭大的老教师家属住。房价上到每平米六万元！是啊，楼盘坐落在宝石山下西溪河边，老杭大人文宝地。一出门，不是马路，而是美丽的杭大中心草坪与典雅的杭大图书馆。房价不高才怪。只是，从今后，在杭大中心草坪上散步的，基本消灭了大学生们青春的身影，平添了一批踟躇步行的老人、大声嬉闹的儿童与眼神茫然的保姆……

如果杭大还在，怎么会有这样自戕的规划？如果杭大还在，怎会有老父亲占领女儿闺房的憾事出现？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楼盘名称——启真名苑，取得还算有文化味，没有辱没老杭大的人文气质。

那时，冬天若能洗个热水澡，是个比较奢侈的享受。女生宿舍边上，就有一所冬天开放的澡堂。我们男生，包括老师，也会光顾澡堂——其实也就是有几个热水喷头。我第一次去澡堂是与同班一位来自山区的朴实同学一起的。他大概也是首次去公共澡堂，犹豫再三才在我们催促下脱光衣服。他当时很是窘迫、很是犹豫的神情，让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们班一个杭州的同学，有一次去那里洗澡回来后，笑嘻嘻地说，在澡堂碰到我们班的体育老师。刹那间彼此赤身裸体，身份平等，有点尴尬……

记得保俶路上，如今的宝石社区一带，也有公共澡堂，我也去过几次。

那时，杭大图书馆与南大门间的大片园林，我们习惯叫大草坪。很朴素直白的名字。图书馆前，是一个篮球场，每天都有人在那里玩篮球。篮球场再往南，就是一片大草地。再往南就是桂树、松柏、腊梅和水杉；一条幽径横穿草坪，串联起东西教学楼。园子四周是灌木围成的栅栏、法国梧桐。

从南大门一进学校，见大草坪之幽静，顿感市井已远，当安心读书了。这一带，是当年学校的中心广场：白天夜晚，草上树下，男女学生不断如流水，看书的、恋爱的、唱歌的，望月怀乡的，曝胸中诗书兼看宝石山的……今天大草坪多了雕塑寒竹、假山流泉，多了个文雅的名称——“竺园”。

只是，旧主已走，新来者不像主人。

从图书馆出发，到校正门的東西两条梧桐大道，犹如母亲的手臂，环抱着中心大草坪。我们集体活动时，是从梧桐树下踏过；我们上下课时，是从梧桐道上骑过；我们集体行动时，是从梧桐树下走过……记得有一次初春晚自习结束后，我往大门那边逛。那天是月圆时分，银辉洒满校园。头顶上的梧桐枝桠都被铺成了银白色。银辉穿过嫩叶，在如霜的路面上形成了斑驳树影。这里，分明是一个洁白的世界，与不远处天目山路上的车水马龙形成迥然不同的世界。

除了中心草坪，大操场与篮球场也是学生的主要活动场所。当时有两个大操场：一个在校园东门附近，一个在校园西北侧的男生宿舍边上。都没有如今很普及的塑胶跑道，是沙土操场、煤渣跑道吧。记得我有一次踢足球摔倒后，手掌上立马就是一片青乌与血痕的。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操场上都不缺人：清早，很多外语系的女生会到西北操场的台阶上背单词（1987年后，男生宿舍的一、二层，开始有外语系、经济系女生住进来了）。白天，主要是体育课、足球赛、田径训练。晚上，操场上陆续有人来散步，其中不乏成双结对的情侣。

### 三、文化生活 杭大“六多”（上篇）

文科生居多的杭大生活是有独特的浪漫传说与文化气质的。

我归结起来，体现在“六个多”：舞会多、社团多、沙龙多、晚会多、讲座多、媒体多。

虽然学习生活条件艰苦，物质资源相对匮乏，但是那个时代也很注重精神的享受。除了听歌曲、读哲学、下围棋、弹吉他、写诗歌、撰书信，还有就是参加风靡校园的周末舞会。

八十年代，周末舞会成了大学校园中的一道风景线，成了学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杭大当时由于文科科系齐全，所以女生特别多，尤其是外语系，早已拥有英语、德语、日语、俄语等语种，基本是女生的天下。舞会办起来自然不缺女伴。

杭大的舞会，最著名的是在第四食堂（男生食堂）举办的大舞会。八十年代，杭大几乎所有的男生都在第四食堂就餐，它的两侧是两个小卖部，一侧卖杂货另一侧卖冷饮。它前面的小广场，饭后人群熙熙攘攘；它正门的墙上，贴满了各式海报。杭重大的事件几乎都发生在第四食堂处。它在杭大的地位，相当于纽约的“时代广场”、北大的“三角地”。

第四食堂是两层结构（其二楼也叫第五食堂），外表粗糙，就是简单的水泥涂抹石英，但里面空间面积特大。每当周六的夜幕降临时，它会发生华丽地转身。

晚饭之后，略略打扫，把条凳拖到边上，围成一圈。在售菜窗口前放上几只大音箱。用几张桌子在二楼门口一拦，就可以卖舞会门票了。几毛钱一张吧。

食堂灯光本身就一般，整个舞场笼罩在一种昏黄的弱光下，空气中还弥散着淡淡的食堂饭菜的特有气味。

请女生跳舞，当然要紧的是高帅。没有这些，有气质风度，谈吐佳，也可弥补。再不行，舞技好，也是一个亮点。女生学舞容易多了。站在边上，男生邀请，你说不会，那男生就自会应对：“我带你！”

也有女生带女生练习的。记得有一次在第四食堂，一对女生在快三舞曲中练习，没想到彼此撞腿，双双跌倒，满场哄堂大笑。她俩难为情的立马跑走了……舞场上自然还是男的比女生多。除了少数人自

带舞伴外，大多数人是在舞场上临时找的，当然这需要勇气。所以，舞曲一响，胆子大的、舞技好的男生，都会抢先走到女生跟前，伸手邀请。女生市面好了，极个别女生也会对舞伴挑三拣四；刚借口累了拒绝张三，立马又接受李四，弄得张三有点尴尬。

那时基本上是跳慢四，偶尔插一下慢三、快三或迪斯科。那时的伴奏除了舞曲外，有时干脆是流行歌曲直接上火线，比如千百惠、王杰、苏芮的原唱；尤其是千百惠的歌曲，幽怨似泣，慢三标配。舞会结尾时，基本是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悠扬的乐曲一响就知道“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了。偶尔，也有学生乐队伴奏，不会跳的，干脆就盯着人家吹奏一夜。除了健身娱乐，希望在舞会上邂逅意中人或接近平日里难以接近的梦中情人，也是一些情窦初开的八十年代大学生们的目的吧。

根据担任过校文工团团长的历史系徐剑鸣回忆：当年一张舞会门票大约 5 毛钱。一场舞会大约都有两百多人参加。当他们组织乐队去伴奏时，会邀请一些校园歌手前来助唱。比如 87 级外语系的朱永红。她的一曲《玻璃心》往往会唱碎很多多少男少女多情善感的心。

杭大舞会多的名声传开后，附近很多学校，比如商学院（如今的浙江工商大学，当时坐落在教工路）、杭州师范学院（如今的杭州师范大学，当时坐落在文一街）、省幼儿师范学校（坐落在如今的省外国语学院文三街校区）、省化工学校、省建筑学校的学生周末都有人慕名而来。我还记得，大约在 1987 年的冬季，杭大首届文化艺术节开幕，历时一周。在校学生会前的篮球场上，还举行了一场篝火晚会。

除了食堂里的大型舞会，有的班级还在教室搞舞会的，似乎在西二教学楼一带比较多。这种小舞会跳多了，也就偶尔跳出了出格的事情来。

1987 年 5 月下旬，《人民日报》如此报道：“杭州大学在加强对学生进行理想教育的同时，加强纪律教育，从严治校，搞好校风校纪建设。最近，学校对 33 名参加赌博和其他违反校纪校规活动的学生分别作出了开除学籍、勒令退学、退学、留校察看、记过和警告的处分。”该报道似乎还是新华社发布的。

据传，违纪中包括个别跳黑灯舞的。这消息固然给当时的杭大带来了负面影响，但也说明了杭大治校的严格。我进校后，就根本没发现有这个现象了。

杭大当时就有法律、旅游、心理、新闻等门类齐全的科系了，都是全省最拔尖的专业（其他省内高校，还根本没有这些科系，最多只有同专业的高等专科学校，比如学法律除了杭大只有浙江政法专科学校，学新闻除了杭大只有浙江广播电视专科学校）。所以，杭大校园内社团也很多，有 29 个社团协会。在 1989 年春，杭大内有 7 个社团被评为“甲级学生社团”：法学会、科普协会、经济学会、树人文学社、未来教育家协会、经济学会、财金学会、晨钟诗社。

为了加强管理，学生会社团部还专门从学生会剥离出来。于 1987 年 4 月，成立了社团活动中心。由校团委、学生会、研究生会共同指导。

不好意思了，当年的公关部长是鄙人我。从文件上可以看出，当时，大伙没有传呼机、没有 QQ、更没有手机。所以，各自的标识是系名与寝室号码。也正因为我曾滥竽充数过这个角色，所以我才有幸知道很多杭大名人他们芳华年代的模样。

当年的校团委坐落在校东门，是二层楼结构，介于女生食堂与东操场之间，简洁而不失闹中取静。校团委书记是何文炯老师，杭大数学系 1982 届毕业，如今是国内研究社会保障学、保险学、精算学的知名专家；当年的校团委副书记是沈满洪老师，是杭大化学系 1984 届毕业生。当年，他晚上经常在校团委办公室里看书办公，见到我们学弟也挺和蔼的。当时与我也算较相识吧。他后来还获得法学学士与经济学博士学位，如今是宁波大学的校长了。当时团委还有一位老师叫王咏田，戴着眼镜，办公室在沈老师隔壁。他有音乐特长，印象中他能亲自带领校学生文工团上台演奏的，后来似乎当省教育考试院办公室主任。

当时的学生会就在团委边上，主席是王巨华，法律系的学生；副主席是计算机系的钟绍军，如今是少将了；文艺部长是陈坚，弹得一手好吉他；女生部长是龚和艳，如今似乎是省某厅的副厅长吧；文工

团团团长是吴诚。我大学毕业回老家后，还是机缘巧合地碰到过来我老家的其中几位，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大笑忆杭大吧……

扯远了，话题转回来。讲了舞会多、社团多，再讲讲沙龙与辩论赛多。八十年代，文革的阴影基本消去，改革的势头越来越猛。从1984年开始，大学生是文革后恢复高考制度之后，受过没有中断的完整的基础教育的高中毕业生，小学五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在这之前的中学毕业生高中仅仅上两年）。有人形容当时的高校是：“自由之风扑面而来，学术追求蔚然成风；学说观点，并行不悖；讲座晚会，层出不穷。无股票知识之乱耳、无炒房之风之侵扰，唯希望之充盈。青春昂扬，不知阮囊羞涩；甘苦共享，更怀远大前程。”

辩论赛，就是杭大儿女各抒家国情怀的最好论坛。1988年4月30日晚上，省大学生辩论赛决赛就在杭大西一教学楼305阶梯教室举行。那次，夺冠的就是杭大队（亚军是计量学院），中文系研究生葛伟获得最佳辩手的称号。

我自己最早参加的一次自由辩论沙龙是在团委一楼。那次时间是1988年8月28日，主题是讨论当年轰动一时的电视纪录片《河殇》（央视1988年6月播出，在大学校园引起“河殇热”）。9月3日晚，校方在校电化教室组织重播，学生们热情讨论中国未来的出路与发展。后来，该片因存在问题被禁播。如今看来，该片给当时大学生带来了热烈思辩国家未来的思潮，也存在意识的误导。

我所在的社团中心公关部，在团委的领导下就先后承办了杭大第三届学生辩论赛（1988年12月）和“问春杯”辩论赛（1989年4月）。模式应该是校团委发动各系报名，我们负责海报制作、张贴、校广播台宣传、现场布置（两次场地都安排在新外语楼一楼西侧阶梯大教室）。记得评委中除了团委老师何文炯、沈满洪，校党委宣传部领导蒋希宁，还有哲学系的余式厚老师。余老师是逻辑学教授，每次都会上台点评，没有架子，很会“与民呵呵同乐”；辩论赛的主持人是一位叫张茹的学姐，教育或心理系的，另外中文系叶翔也与她搭档主持过。

唯一遗憾的是，辩题我都没记下来，反正感觉是八十年代中后期，人们思想空前活跃。《乌托邦祭》、《自由备忘录》等书籍在大学里比较流行。当然，还有席慕蓉的诗歌，以及床头上张贴的刘晓庆、潘虹、斯琴高娃、胡慧中、林青霞、龚雪、高仓健等人的身影。

有人讲，八十年代后半期的高校，撩拨着不安，按捺着希望，隐藏着骚动。

#### 四、文化生活 杭大“六多”（下篇）

文科生多，艺术细胞集聚的地方，文艺晚会自然也多。一般每年的五四青年节、“一二·九”或元旦，校园都会举办大型晚会。校文工团会倾巢而出。此外，歌手赛、演讲赛也不少。新外语楼一楼的一次唱歌比赛，住我们楼下的一位临安籍的小女生，平时看上去很不显眼，但是那次唱的《路灯下的小女孩》，让我至今记忆犹新。有一次，87级化学系的王啸上台演唱齐秦的《九个太阳》，抬头盯着大礼堂上的几盏射灯高歌，引得满堂大笑……多年后，当我见到米兰的斯卡拉大剧院时，我脑中回想的是杭大简陋的大礼堂（电影院）。因为，礼堂里没有社会上影剧院里常有的孩子哭啼声、聊天声、零食声。安静时，大家一起安静；发笑时，大家一起发笑。这该怎么解释？应该是物以类聚，有共同的鉴赏力吧。

蝉声中那南风吹来，校园里梧桐叶又张开，无限的离情充满心怀。每年的初夏季节，又一批师兄师姐该走了。于是各系毕业晚会接踵而至。1988年6月3日，是八四级外语系毕业晚会；6月5日，是中文系毕业晚会；6月8日，是体育系毕业晚会……嫩绿的梧桐叶遮盖着长长的马路，却遮不住满园的离情别绪。如果当时大伙知道他们的母校最终会被吞并，有人会哭晕过去吗？

1988年9月新生进来后，具有文艺细胞的学弟学妹不少。新生入学后，各系一般会举行迎新晚会。外语系余露弹吉他演唱《爸爸的草鞋》、中文系张凌演唱《烛光里的妈妈》的情景至今令人难忘。教育系的余祖军，那时就显示出了朗诵的才华，如今是杭州电视台的大主

持了。每当听到《毕业生》的歌曲，我就联想到那梧桐道、那大礼堂、那小池塘……

那时门票分发是先分到班级，班级再分到寝室抓阄。由于僧多粥少，出现了一票难求的情况。大礼堂的入口检票的保安，也成了大家求情的对象。（1988 左右，校保卫处大概从缙云农村一下子招来了十名左右的保安）

八十年代，整个国家经历十年文革之后，骤然开放。大学生们青春激荡，理想飞扬，校园里弥漫着人文气息。学者、艺术家和思想家频频受邀来访，举办讲座与交流互动，打开世界的一个个新鲜的窗户。

当时最能打开我们的眼界的是各类讲座和名人的演讲。各种讲座的海报布满校园，尤其是第四食堂的门口墙上，内容五花八门包括气功、读书、昆剧、电影等等。

记得新闻系 1988 年请来过香港《大公报》的总编与师生们交流。1988 年 1 月 13 日，在西一教学楼，我们还听过著名导演谢铁骊的讲座。因他是电影《红楼梦》导演的原因吧，那天来的女生特别多。印象中，规模最大一次讲座是 1990 年秋天。第 11 届亚运会在北京举行后。10 月 15 日晚上，杭大师生数千人在校长沈善洪带领下，到校门口迎接亚运健儿黄志红（著名铅球运动员）等，并在校大礼堂举行了现场问答会。第二天的《钱江晚报》，还专门刊登了这个见面会。

数学系还请来了著名华裔数学家陈省身来校讲学。他在 1985 就开始担任杭大名誉教授了。

记得经济系的史晋川老师有一次开设讲座，提到一个观点：杭大要发展，建议把黄龙饭店隔着杭大路的对面的地拿下来。那块地那时还是田野，如今是世贸国际展览中心与黄龙体育中心，绝佳宝地！那块地如果能拿下来，那么电影院、女生宿舍这里就能保住了吧？

前面已经提到，当时浙江省唯一开设有新闻系的大学就是杭大。所以，作为新闻系学生们练笔的场地，杭大校园内媒体业的发达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当时校园内，就有七、八家媒体共存，分别是《杭大校报》、《杭大团讯》、《后勤信息》、《杭大学生报》、杭大广播台、《大

学时代》、《杭大校友通讯》。另外，还有专门供老师发表学术文章的杂志《杭大学学报》，分哲学科学版与自然科学版。

《杭大校报》是办给全体师生看的。地点就在邮政所楼上的位置，当时主编是宋建勋，他后来到省人大常委会任职去了。相比校报，在学生中最有人气的应该是《杭大学生报》，它是学生们自己办的，隶属学生会。办公室在东一教学楼后面的平房里。从我保存的1989年4月份的报纸上，我们可以看出编辑与记者基本是新闻系的学生，顾问也是新闻系的吴工圣老师。报纸是通过信箱，分发到全校每个寝室的，大约半个月一期吧。

版面分要闻版、群工版、副刊等。细读之下，感觉当时的办报风格还是比较开放的，能对校方提出建设性批评意见。比如，针对1989年3月27日正式开放的新校门，我采写的《千呼万唤始出来 犹抱琵琶半遮面》放在第二版显著位置。文章假借同学之口，对新校门进行了讥讽，认为不够气派吧。此外，报纸对学校取消春假，对女生第五食堂早餐供应不足，也都提出了建设性批评。除了新闻系的同学，政治系的苏沧桑与历史系马遥平也经常《学生报》上撰文。后来成了知名作家的苏沧桑那时就以发随笔见长吧。当时的编辑中除了潘向光、张帆、沈迦等新闻系同学外，法律系的郭晓红也参与了《学生报》的编辑工作。

当然，学生报刊登的观点，有时候也会引发不同的争议。1989年1月13日，刚好是学期期末考结束时，11幢103女生寝室（大概87经济系的），在第四食堂前贴出大字报，反驳学生报上的一个观点。当时引发热议与跟贴（跟贴的原意就是跟着贴大字报吧？），驳斥学生报上的某观点。后来，记得当时新闻系的学长慎海雄、俞平也参与了风波的平息调解工作。

除了学生报，另一个影响较大的新闻渠道（严格讲，那时不流行“媒体”这一称谓）是校广播台。播音员是来自各系的。我们寝室有两位同学当新闻编辑，办公地点在女生宿舍的楼上。播出时间是中饭与晚饭时间，一次约1小时。主要播放校园新闻与朗诵、乐曲等文艺节目。每次的课间休息，它也播放音乐。我最难忘的片段是，课间休

息时，在音乐的伴奏下，师生们走到大草坪上散步聊天的景象。有一次，刚好播放八十年代巨星费翔的歌曲《飞扬的青春》，那蓬勃昂扬歌声霎时弥漫菁菁校园。那情那景，永驻我心！尤其那歌词，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不会过时。

《杭大后勤》，是一本杂志，主要是针对食堂、卫生、医疗等后勤工作，是校方与学生方搭建沟通的桥梁，也由新闻系学生运作。

《杭大校友通讯》由校方的杭大校友会编辑，不过也有稿子是特约新闻系学生，回原籍地采访知名杭大校友后撰写的。比如，当时，杭大中文系 1962 届毕业生张鹤鸣先生，在瑞安越剧团工作拔尖，获得中华全国总工会“五一”劳动奖章。杭大校友会编辑就找到原籍瑞安的我，利用寒假去采访他。

《大学时代》杂志是团委办的，当时负责的俞继抗学长，中文系 86 级的，如今在绍兴社科联当领导吧。《杭大团讯》是一张不定期的小报，似乎一位叫俞涛的经济系同学在参与，基本宣传杭大学生团校的资讯。

1989 年 8 月 8 日，杭大出版社也正式成立了。

## 五、校园杂忆

八十年代，高考升学率低，能进入高校的都是好不容易走过高考独木桥的读书胜出者。比如在 1987 年，全国高考才招 62 万人，录取率才 27%（而 2017 年，浙江省高考录取率达 90%以上）。那时候的大学生，也叫“天之骄子”，国家包分配，政府有补助，所以有更多的精力与更大的兴趣去考虑社会与国家的命运：不乏仰望星空的思索、不乏忧国忧民的热血。

与更远大的精神追求相比，物质生活就显得艰苦了……我们那时候，生活条件比文革刚结束时自然好多了，毕竟改革开放政策已经搞八、九年了。但是，衣食住行还是比较艰苦的。

先说行，当年温州交通落后，只有一条水路通往上海公平码头，一条公路通往金华、杭州。这条公路是一条典型的沙石路，雨天坑坑

洼洼，晴天沙尘飞扬。温州地区的车，一般是傍晚五、六点出发，顺利的话，第二天清早五、六点钟到。那时大巴里面没有卧铺、没有空调，整车人直挺挺坐十多个小时，在晃荡晃荡中到了杭州，人已经晕晕乎乎了。因为一路颠簸劳累，抵达终点站时骨头简直都散架了。更有趣的是，车到半途——永康时，很多人要被敲一笔的。怎么讲呢？因为，车半夜开到永康农村马路饭店时，两个司机变身如今的某些导游角色，要带大家下车吃宵夜。司机是到小包厢里隔开吃的。乘客呢？肚子饿了，除非省钱不吃，否则呢，呵呵，要花翻倍的价格去吃宵夜。一碗饭是5毛钱（白天才2毛钱），一碗番茄炒蛋是3块钱（杭大食堂是5毛钱）。另外呢，有人要洗把脸提提神是吧，一瓢水舀到脸盆里，要一块大洋，相当于如今的一大块排骨的钱。那时农村治安管理也薄弱，再说又是半夜。于是，在饭店门口，还衍生了设摊赌博玩老千的把戏。半个小时的停车期间，乘客若上当了，设局者会追到车上讨钱。

车在凌晨抵达杭州都算顺利的。有时路阻了，那就不知道啦。我记得有一次下午才到达杭州，路上开了二十多个小时。印象深刻的是放暑假回家路上，汽车有时被困在青田的瓯江山谷里。由于是夏天，闷热难耐、唇焦口燥。青田农村里的大妈大爷们，手提水果、鸭蛋，围着汽车不停叫卖，真是彼此都不容易啊！所以，温州的同学，那时还是很羡慕宁波、嘉兴、金华、绍兴等地的同学，有绿皮火车坐坐呀。

我们在校园内，基本是骑自行车。基本上是男生骑车的多（女生宿舍离教学楼近点）。一辆旧车，大约六十元左右吧，相当于大人当时三分之一的月薪了。由于贵，所以盗车之风刹不住。我有一年暑假回家时，特意把旧车放到生物系宿舍的二楼走廊上。9月开学回来时，没了。那时候有一辆自行车，哪里都敢骑。烦心了，骑车去西湖兜一圈。那时，西湖游客少。1989年9月，为了省十元车费，我硬是从杭大骑到了海宁盐官看潮水，来回90多公里。夜晚回到寝室，屁股一挨到床，疼得立马跳了起来。

我们要出校外，基本坐公交车。南大门有11路公交与52路电车：11路直通武林门，52路是带辫子的电车，直达老火车站。北门外有10路车，直达平海路，可以去那里看电影、吃天津“狗不理”小笼包。

住的部分，前面已经描述。如今记忆最深的还是：7月杭州酷暑难耐，没有风扇，寝室拥挤，夜晚难以入眠。怎么办？男生们想出了绝招：十点熄灯后，攀援公共浴室上的铁梯子爬到六楼楼顶，把草席铺在楼顶上睡觉……整个楼顶这里一堆，那里一团；这里放音乐，那里侃大山，热闹非凡。夜深了，大家伴着星星睡觉，凉快是凉快。只是凌晨被太阳光芒早早照醒时，发现一夜的露水已经把我们侵袭得全身酥软，然后只得迷迷糊糊去参加期末考。

1987年秋，新图书馆落成对外开放。一楼大厅摆满了报纸杂志，人气最旺。而二到六楼是借书、自习的好地方，窗明几净、藏书丰富。尤其是已经装上了电风扇，夏季成了学习与避暑圣地。1988年7月初的一天，大家晚饭后过来抢位置，由于一楼走廊门前挤满了人群，门一打开，竟然把玻璃门都挤碎了，有人还割伤了手。

虽然八十年代进入大学的竞争激烈，但是一旦步入大学，和现在相比，上大学的费用并不十分昂贵，对家庭的经济负担也并不很重。八十年代的大学教育几乎是免费的：学费、住宿由学校统一安排，费用也不贵。大家一日三餐，一律吃学校食堂，当然没有如今的什么餐厅什么风味，每餐只有一样菜（先舀给你一点蔬菜，叫菜底，再在上面放一点狮子头啊、碎肉啊什么的），过着清贫、简单的日子。不管当时的生活有多么简单，但是这种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高等教育确实有其不可替代的优越性。我们的吃住都有保障。艰苦度过四年大学的同学太有人在，并不会到了无法就读的境地。我认识的一位某山区的中文系同学，一年到头，几乎都穿如今民工才穿的绿色军服，顺利毕业，如今也是某县的行政官员了。

当时学校每个月给我们赠送27元的菜票当伙食津贴，相当于大人六分之一的月薪吧。而我们食堂里最贵的菜是红烧大排，也才6毛钱。

很多同学回忆讲，杭大学生食堂烧的大排世界上最好吃！那喷扑而来的香味，是大家的最爱！记得大排肉并非每日供应，而是隔三差五，随伴一些青菜与肉汤。卖大排的窗口也是专门的，另排一队，非同一般菜肴窗口。因为会拥挤起来，女生很少敢排队。有时，甚至到

了插队打架的地步。有一次，某系一个男生把别人的鼻梁都打伤了，受到了处分。

在元旦或国庆的时候，食堂有时会给你加菜吃大餐——就是多一块炸鸡块什么的。我们就很兴奋，去食堂边上的小卖部买来啤酒助兴（那时有虎跑黑啤、麦饭石什么牌子的）。

杭大女生食堂前，有个很简单的可以开小灶的餐厅，叫来宾餐厅，大概摆了十来桌。我也才去过一、两次吧。学生一般是不会去就餐的。

那时别说风扇与空调，如果有一台收录机，就是很知足的事情。一台收录机需要两个月的生活费的。一个寝室，平均也只有不到一半的人会拥有。然后，去买来费翔、齐秦、王杰、罗大佑、千百惠、谭咏麟等人的磁带，播放歌曲欣赏音乐。当齐秦的《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出炉后，寝室公共浴室里，在冰冷的喷淋水下，不时可以听到“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的颤音嚎叫。

八十年代后期，在杭大男生中比较流行的音乐“口头禅”，除了“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外，还有崔健的《一无所有》：“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西北风歌曲《黄土高坡》：“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电影《欢颜》插曲《橄榄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这些歌，大概能抒发当时学生内心的无奈感、迷惘感、怀乡感、怀旧感。而唱电影《红高粱》插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则表达的是另外的情感：“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呀，往前走，莫回呀头，从此后，你搭起那红绣楼呀，抛洒着红绣球呀，正打中我的头呀！”。倚窗探头吼唱这首歌时，往往是女生刚好经过公寓楼下时候。

看电视也是比较奢侈的享受。我们公寓的每层都有一台，放在楼梯口的活动室里，周末开放供大家观看。遇到重大足球赛或者女排比赛，济济一堂，有骂娘的，有叫好的，相当热闹。1988年9月27日，汉城奥运会上，半决赛中，中国女排 0:3 负于前苏联。第一局的比分

是0:15（那时一局15分制）。参加奥运会前，中国女排已经是五连冠了。全国震惊，当时杭大男生宿舍里，砸下了不少热水瓶。

输了摔瓶子，赢了想上街，违规而率性，就是当时不少学子的气氛。1987年10月26日晚，中国足球队在日本东京国立竞技场以2:0战胜日本队，获得汉城奥运会入场券。这是中国足球第一次冲出亚洲。杭大校园顿时沸腾。晚上八点半，上千学生自发集聚在第四食堂前，然后打着横幅走到文三街欢叫了一阵，回来了。如此重大的国际比赛中，男足能在日本灌它两个球，打败对方。这种幸福如今的中国球迷是难以想象了吧。

1990年6月8日，世界杯在意大利米兰揭幕。为了看到精彩的阿根廷与喀麦隆的揭幕战，我们还跑到校邮政所楼上的一个小房间里看。球赛结束时，已经是凌晨5点。回寝室的路上，校园里晨雾弥漫，我们引吭高歌。

相比如今的大学生，那时候的大学生大学毕业国家包分配，没有很大就业压力。大家毕业后都有铁饭碗，就是好坏问题。所以个别学生信奉“60分万岁！”，考试过关就行。不像如今的大学生，一进去就要考各种证，为自己将来的就业找工作加分。自然地，已捧有铁饭碗的八十年代大学生有更多的精力去关心国家大事、有更强的使命感去议论改革走向。当年很流行的一首歌是罗大佑的《明天会更好》。

几十年之后，重新听到这首轰动八十年代高校校园的歌曲时，依然有丝丝的心动。不知今天的大学生听到这首歌时，还会象几十年前的我们一样热血沸腾吗？

当然，那时的大学生除了有更强的社会主人感。另外，由于个个是迈过狭窄的高考独木桥胜出的“天之骄子”，自负自傲思想自然也有市场。所以在某些思潮的引领下，很容易做出率性而违纪的行动。

除了电视，就是看电影了。杭大礼堂（电影院），每周六晚上有电影的，几毛一张票。这里气氛最好，因为大家几乎统一哭与笑的。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去黄龙洞前的省艺校电影院、去后门的杭磁会堂、去莫干山路上的浙京排练厅、杭玻电影院、去文二街上的露天电影院、去西湖底下的宝石会堂看电影。宝石会堂要从保俶路进去，走很长很

长的地下隧道。那时看过的知名影片有《鸳梦重温》、《罗马假日》、《城南旧事》、《芙蓉镇》、《红高粱》、《老井》、《末代皇帝》等。

1989年11月，校溜冰场建成，就在校游泳池斜对面，东门体育场边上。刚开始几个月，生意真叫好，人满为患。一阵热闹之后，后来似乎冷清了不少。

刚才讲到，由于毕业是包分配，学习压力不是很大。所以到了大一下学期，尤其是大二，不少人也学会了对非专业课程（就是公共必修课）的逃课。主要由于对个别课程内容的流于说教，不感兴趣。逃课也不见得都是为了睡懒觉，有些是对课程内容滞后时代的无声抗议。我记得某门课开学第一节是一位女老师。由于对课程不感兴趣，率性而逃课，中途都没去了。最后去参加期末考的时候，见到的却是一位男老师。惊讶之余一问，才知道老师早换了。由于旷课，所以，很多男生在期末考前一个月是很累的，需要去女同学那里借笔记，狂抄狂背。

我最喜欢的公共课是体育。那时候，体育老师朱国华也是年轻人。他自己也喜欢足球，所以我们男生的体育课，就是足球课，分组踢，皆大欢喜，痛快至极。他有一次体育课的内容是带我们爬校门口的宝石山，体育=旅游，难忘。

我们在大学接受的都是课堂讲座式授课制度，极少有讨论式。课堂上没人打断老师的讲课。我们一边听着，一边埋头做笔记，更很少公开讨论了。

2005年，当我看到李敖大师在电视上侃侃而谈的时候，我不禁感慨地写了一篇博文，对当年高校的教育讲课方式提出了肤浅的反思。  
《李敖——现代版的淮南橘》

2005年金秋时节，久居台湾的著名历史学家、文化大师李敖首次回到大陆“开讲”，在全球华人知识界兴起了李敖热。

我深深敬佩李大师特立独行的处世人格、深厚渊博的文化功底，以及机警豪放的讲话艺术！我也不会认为他的观点全部正确。但我坚信，他的独立人格与讲话艺术超过大陆绝大多数的文化人。

我想，历史悠久传统光荣的杭大尚且如此。那时的其他高校又能好到哪里去？

看看李敖吧，他的表情嬉笑怒骂、论据信手拈来的说话风格，好像给我记忆中一潭死水式讲课模式投进了巨石。在1990年前后，我在杭大校园里初次读到他写的《传统下的独白》一书，那率真痛快、亦庄亦谐的文风让我如沐春风，拍案叫绝。说实话，当时起初心里还有点不适应，因为那文风我此前还没见过。

话说回来，文化底蕴与讲话艺术达到李敖水准的，全球华人中又有几位呢？

八十年代，校园外的经商潮流不可避免地折射到象牙塔内。不少同学也开始跃跃欲试地想搞点小买卖，美其名曰勤工俭学。那时马云还在杭师院（如今的杭师大）读书，所以没有微商一说。某班的几个同学，课余跑到体育场路上的民航售票厅倒卖机票，被公安“劝”了回来；某班的几个同学，买来煤油炉与螺蛳。下课后，在宿舍楼梯口炒卖螺蛳，弄得楼道里烟雾弥漫，貌似小兵张嘎烟熏鬼子的炮楼；有的同学，合伙在校医院对面，租平房经营了小书店，主打卖明信片、小礼物什么的；有的合伙，周末把女生食堂一个饭厅租过来，打出了“烛光咖啡厅”的牌子……那时教工路与天目山路交界处，有个大酒店叫花园大酒店。有一次，专门来校园招聘女大学生服务员。很多女生就参加了在校团委一楼举行的选拔会。

从毕业辞别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开始了对大学时光的追忆。今日随着岁月的流逝，对大学的思念就像久存于地窖的美酒，越发浓郁，越发酵厚；随着年龄的增长，回忆具象又显得愈发迷离，愈发零星。

毕业后，我去杭州时，若有时间就有回娘家的习惯冲动，总是想去杭大逛逛。可是，发现模样大大地被改变了：女生宿舍被改造成居民区；男生宿舍住进了高中的学生（最难过的是，我一直把11幢当家，如今的宿舍大妈看我的眼神却充满了狐疑，冷傲地拒绝）；训练馆涌进的是周边市民；草地上冒现的是老人、儿童；绿荫马路上停满了轿车。熙熙攘攘的年轻人流隐匿了；食堂门口充满青春气息的海报消失

了；教学楼中整一繁忙的求知韵律不在了；欢乐洋溢的舞会、指点江山的沙龙，都消散了……

## 六、话说杭大新闻系

杭州大学于 1958 年成立新闻系，当时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几个新闻系之一。1962 年杭州大学新闻系停办。

文革后，杭大恢复新闻专业的招生始于 1982 年秋季，当时隶属中文系。我于 1987 年报到时就是中文系新闻专业。杭大中文系那时也只有三个专业：汉语言文学、古典文献学与新闻学。本科生一届合计起来大约也才一百出头。不过，1987 年，中文系还有历史系与地方以委托代培的形式，开招了中文专科与历史专科的学生，各有五、六十人。

那时一个县，新闻媒体除了县委报道组，就是广播站。记者合起来也才几人，而且基本不可能有新闻科班出身。人们只能从有限的几张报纸、几个频道上获取信息、获得娱乐。所以，那时候记者还是属于神秘行业；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很高尚的职业，人称是“无冕之王”。媒体不像如今，自媒体时代，人人可以当半个记者。

杭大新闻专业，一届也才招 30 人，录取分数线较高，温州地区包括我也就 4 人。我自己也是杭大恢复新闻专业后，从瑞安考进来的首个学子。那时自然是自豪得很，以为可以干一番事业的。

因为取分高，所以新闻系自然是人才济济，能人名人比比皆是。时任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同志的女儿，也在我们系就读。如今的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朱国贤学长，就是杭大恢复新闻专业后的首届毕业生，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慎海雄则是 1989 年毕业的新闻专业的师兄。

我们 87 级刚进去时的辅导员是王维成老师。那时，图书馆新大楼刚造好。他带领我们去义务清理过图书馆后门杂草。我们新闻班的班主任是沈爱国老师，比我们才大 3 岁。那时还是个年轻人，杭大新闻班首届毕业生，如今是浙大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新闻系主任、教授啦。他当了我們四年的班主任，教很实用的新闻写作。一直视我们为他的嫡系部队。他是我回忆杭大时的重要元素。有个学弟这么撰文评价他：

“因为有他，我们这些上下年龄相差几十岁的师生才彼此粘连，守望相助。因为有他，我们才觉得读书时的那个新闻系从未远离过，一直就在那儿。”

除了他，我记得张大芝与黄旦老师教新闻理论，邬武耀老师教采访学与秘书学，吴工圣老师教新闻史，徐艰奋老师教公关学，王兴华老师教宣传学、张允若老师教外国新闻史、桑义燐老师教通讯写作、张梦新老师教我们唐代诗歌，朱菁与何扬鸣老师那时候刚过来，算最年轻的老师了。此外，中文系很多老师如刘一新、华宇清、余荇等教我们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基础写作、外国文学。如果说新闻学是教人如何宣传，是“铁肩挑道义”的入世学，那么中文系老师教的都是提升个人文学修养的，是“悠然见南山”的出世学，让后来自以为怀才不遇的我受益匪浅。

记得学现代文学时，中文系老师还动用了学校大巴，送我们全系学生，先后去莫干山、绍兴、苏州等地采风观光。

我们很喜欢徐忠民老师教的摄影。徐老师为人也和气。那时候学摄影，四个同学可以暂时拥有一台学校的红梅牌相机，相当了不起了，如同如今拥有一辆豪车的感觉。我们揣着它去西湖边上抓拍，然后到学校暗房里自己冲洗出来，个个玩得兴高采烈。其他系的同学看了很羡慕。有一次，隔壁哲学系的一位同学陪老乡逛西湖，他就去租了一台相机，但是不会拍，不会换胶卷，就来向我提请求：“你能陪我们去玩，去拍照吗？路上一切费用我出”。

汤洵老师教的电影学，我们也喜欢。因为我们可以经常去电化教室看奥斯卡影片，如《金色池塘》等。

那时候，很多有才华的学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了很有师兄风范的慎海雄，85级的吴因军也让我很有印象。可惜吴因军早早地离世了。他的同学如此撰文怀念他：“因军注定是不平凡的一个。他的思维，他的行为，他的文章……”

八十年代的时候，班级里三十人，女生不到十人的。如今，据我了解，是倒了过来，女生远超男生。同时，传统媒体面临社会上新媒

体巨大的挑战，许多老记者内心满是失落。杭大新闻系也升级为浙大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世道变了……

## 七、话说杭大的学生

人才多的地方，自然还有奇才。有奇才，就有奇招与奇事的。那时，个别的学生，由于太聪明，也由于制度的漏洞，或为了名利、或为了留杭名额，出过奇招、发生过奇事。或乱表忠心落下笑柄，或敲诈打架违纪开除，当然也有人胜之不武。冯小刚与严歌苓心中的文工团发生过丑事，那么杭大发生过也就不足为奇……可惜本文不是电影剧本，暂按不表。

我毕业后回老家工作，所以对在大城市工作的校友情况了解不多。只知道杭大出来的院士、高官、高管不少，尤其在浙江省内，在各行各业都身居要职。不过我对基层杭大校友毕业几十年来的境遇，有所耳闻。大致罗列几个特别类型，应能影射少数基层杭大毕业生的另类际遇吧。

A 学兄，杭大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取消了全国高考，直到1970年大学才重新开始招生，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后来人们把这些从工农兵中选拔的学生称为“工农兵大学生”。），回家乡后官至人大主任，为地方做了不少贡献，九十年代退休。

B 学兄，杭大八十年代初毕业，从中学老师开始，一直升职到某地副市长，后来却因受贿锒铛入狱。

C 学兄与 D 学姐，来自浙北与浙西两个地方，在大学里是才子佳人，慕煞旁人。校园鸳鸯很多毕业后都劳燕分飞，可是他俩坚持了下来，还结婚生了个孩子，让人感佩！可是八、九十年代工作调动并不容易、交通也不发达，最后情感败给了距离，还是分了。

E 女同学，数学系毕业，自幼聪明，个性不弱。在大学里读书时，与杭州一位开食品店的青年谈了起来，毕业后分手。回家乡工作后，

精神却偶尔会出现小问题，一直未婚。人们认为是失败恋爱落下祸根。那时毕业虽然包分配，但是工作调动却是很难的，人才流动是滞缓的。

F 同学，中文系毕业不久，就在一次游泳中发生意外，离世了。

G 同学，大学里擅长交际，为人热情，却在上班路上遭遇车祸，走了。

H 同学，杭大地理系毕业，某名校老师，却在九十年代，夜晚在小公园里遭遇抢劫，歹徒匕首意外刺中其心脏，走了。

I 同学，出身书香门第，大学里才华横溢，毕业后在报社干了几年，后来追随父辈搞文化产业，发迹后移民北美，如今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了。

J 同学，出身干部家庭，品学兼优，大学里担任班干部。毕业后，在文化局工作，如今退二线，不过变成了虔诚的佛教徒。

K 同学，计算机系毕业。八十年代毕业后，进入了某县当时很红火的国有企业。没想到没过几年企业就不行了，濒临下岗的他最后求爷爷告奶奶才去了某职高当老师。

L 同学，外语系毕业，校花一朵。毕业后跟随男朋友去了美国，几十年来，断绝与国内同学老师任何联系。

M 同学，杭大某某系，工作后当了领导秘书，曾好心献计于我：“你有大媒体的同学资源，何不利用起来，多引入大记者宣传我市，领导会重视你的！”可惜吾心已成朽木，不可雕也。后来他官至正局，路上偶遇，似不相识、形同陌路。

最后讲我自己，我是 1991 届毕业的。我来自山区，又没找关系打招呼（自以为是我县首个新闻本科生，不会差到哪里去）。结果呢，你没托人打招呼是吧？你自傲清高是吧？政治前景较好的县委报道组、新鲜红火的电视台都不让你去，到最基层的媒体——县广播站去！

（在那时，各县都兴办电视台，在电视台的冲击下，有线广播已经走下坡路。）

毕业后去最基层的广播站，是我大学四年从没想过的。我在杭大没有虚度年华，毕业分配巨大的落差让我无法接受。八月下旬，当我闻讯从山区赶到县城时，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分配条令都开出来了。

原来，十多年的寒窗苦读、堂堂杭大的浸染历练，终究还是敌不过当时现实中的关系与招呼的。

后来也有人对我讲，温州地区都奇缺科班出身的记者，某媒体本来要用你的，可惜有人反映你在大学里全面发展不够吧，就弃用了。我听了后，心沉到了冰冷的海沟里，有深深的遭遗弃感……

原来我自以为是一块宝，其实就是一根草。

在读书时代，我们那一代杭大人曾高喊过“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而现实是，绝大部分人不会卑鄙，但也不会高尚到哪里去。但求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就OK了。相比于那些早逝的、坐牢的、精神受刺激的，我们绝大部分杭大人没有大富大贵，也算平平安安做白领了。感谢母校，让我们在社会竞争上终生自带光环——“杭大毕业”！

那天看了电影《芳华》后，感慨良多。文工团在七十年代末解散了，真杭大在九十年代末消失了。虽然杭大学子与文工团团员比较，人物的时代背景与生活圈子截然不同，但是人物的命运流转轨迹，在时代变迁的背景墙上，不是相似的吗？

青春就像是一场盛大的流离失所。在繁华落尽之后，许多人对人生满是失落。因为人生没有如果。

毕业就像是台球开打，首杆击打过来，原先整齐排列的各色球子，分蹦开来。有的能在桌面上旋转出美妙的弧线，有的则早早落袋离开舞台。这就是命，夹杂着个人能力、机遇、个性因素的命。

我在校园里也没有白混，认识了不少其他系的优秀校友。只是毕业后一直没再见。如今即使再见了，容貌已改，彼此也应该认不出来了。那就相见不如怀念吧。他们是：历史系的高政；外语系的麻为民、陈声平；数学系的朱春华、叶坚定；政治哲学的廖国权、葛巧棣、管步远、龚仕忠、陈鸿祥、严晓鹏、陆红权；法律的许罕飏、廖林华；经济财金的陈东、崔华；中文系的贾翔、陆文华、竺逸超……当然，还有不少依稀记得容颜却再也叫不出名字的校友。

个别知名校友，如朱国贤学长、沈满洪老师、慎海雄学长我倒是偶尔在电视媒体上可以看到，很亲切的感觉。

我们相聚时来自五湖四海，分别后有各自的征途要走。不可能把所有同学都请进生命里，生命归根到底是一场不能所有人一起走的独自旅行。

如今回忆之时，黯然惋惜；虽然恍然如昨，却不再是昨日。

昔日的朋友啊，很高兴你能来。只能说，遗憾你离开。

## 八、话说杭大的未来

杭州大学前身为 1897 年创办的求是学院。1996 年，便进入全国“211 工程”，尤以中文、历史、数学、化学、教育、心理等学科为著名。当时就有 12 个博士点，与浙江大学一起成为浙江理科、文科高校的两大“领军”高校。杭大的综合实力当时略逊于厦大，但比上海大学和苏州大学强。总体而言，在综合性大学中处于 211 之前列，位于综合性 985 靠后排水平。

我这里有细节回忆。当年，我有一次与 1987 年考入宁波大学外语系的高中同学杨剑闲聊，发现我们当时竟然拥有同一位大学老师：杭大教外国文学的华宇清先生。可以理解为，杭大当年在师资上援助了刚刚创办的宁波大学。如今的宁大也是稳坐省内前五了吧？

杭大帮扶了别人，自己却是 1998 年走了。

一位杭大教授如此悲泣：“母校作为一面旗帜，她的凝聚人心的心跳和呼吸不在了！她的儿女成了失去依傍的航船上的水手，被打落在水面上，茫茫然不知所之！学校消亡了，亡校就像是亡国，一点不差！……母校，你可是浙江大地上一棵巍峨参天的大树！你支撑了浙江高等教育的半边天啊！”

再看看那些不起眼的中专职校，摇身一变成了本科院校招起硕士、博士，并在城外圈起大片的土地建造新校园。享誉海内的杭州大学，又是谁，把你的发展权扼杀？！

你是中国高等教育盲目扩张的牺牲品。……四校合并，破坏了浙江高等教育的既有格局，使得浙江高等教育布局更不合理，与周边省份相比，更显单薄、滞后！

合并的结果，难免是四校共缩，被挤在一口锅里吃饭。这不是自缚手脚，四方皆输吗！……其直接结果是本科招生一再压缩，面向浙江培育人才的功能不断萎缩，离人们原先的期望越来越远，要在家门口读重点大学的几率更少。这真的是有点自高、自隔于江东父老了！”

另外一位杭大教授卫军英如此感叹：“依稀间，仿佛多年来形成的大学文化早已稀释，那种多年承传的人文精神也杳然黄鹤。如今走进这个曾经充满文化气息的校园，昔日的那种大学神圣感早已荡然不存。校区里脚手架高高竖立是在建造教职工公寓，校区干道上停满了各种品牌的汽车，双休日总裁培训的豪华轿车就像是奢侈比拼一般……但是再也看不到三点一线来来往往穿梭而过的学生，看不到图书馆门前总背着书包进进出出的匆忙，看不到草坪上捧着书本仰头默诵的如痴如醉，甚至也看不到树荫间男女同学情窦初开的青涩和缠绵……母校竟变得如此荒芜和颓废。如今的学生们再也不会知道，就在这个校园里，就在身边的小径上，曾经有过多少积淀着深沉历史文化的大师故事：陈建功、陈立、夏承焘、姜亮夫……而后来的学者在惭愧中也很少再复述昔日的文脉，更有许多学者挥泪相别，他方更觅前途。”

还有一位杭大校友如此评论：“1998年合并后，浙江大学并没有很好的传承和发扬杭州大学的人文精神，客观上造成了杭大部分优秀师资的流失，西溪校区已经不再是主要的教学基地，且部分地块被用作商业开发，学校失去了往日杭大的风貌，一定程度伤害了杭大校友的情感。”

甚至有人如此讲，也许四校合并最大的结果就是，满足了浙江大学追求“第三”的虚荣。

杭州大学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科教学资源，其校名是一块享誉全国的“金字招牌”和一笔难以估量的无形资产。既然是唐僧肉，当然有人打她的主意了。多年前，某师大提出要改名为杭大。位卑却喜欢管闲事的我当时写了这么一篇博文。坚决反对杭师大的马甲冠名“杭大”

全国政协委员、杭州市政协主席孙忠焕在今年（2010年）的全国‘两会’上建议，将杭州师范大学更名为杭州大学，并把新杭州大学建设成为省内乃至国内一流综合性大学。

本人今天才得知该消息，感觉很反感。坚决反对杭师大的马甲冠名“杭大”！

鹊巢鸠占，只能更彻底地消灭杭州大学。是否涉及法律问题姑且不说，情感和道德上说得过去吗？

八达岭的长城跨塌了，就是存留遗迹，也还是长城遗迹！

浙江临海的古长城能挂上“八达岭”的牌子吗？

圆明园只剩几根柱子，但还是圆明园！横店的影视城能取代吗？

那些为此高兴的人士，肯定不理解“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真正含义。

杭大人，真正的根，就在那西溪河畔。

老杭大的很多校友在浙江省各行各业都身居要职。他们的反对声无疑成了其他大学更名为杭大的最大阻力。问题是，1998年被合并前毕业的杭大人，都正在老去，迟早要退出历史舞台的。所以，我估计将来杭大被恢复被利用还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浙大已经踩在杭大、浙医大、浙农大的肩膀上，进入全国前五了；西湖大学也是板上钉钉地来了……如果，将来涅槃重生的新杭大，没有与它俩形成三足鼎立的态势（用目前的衡量标准讲是没有很快恢复自己1996年就已经拥有的211地位），那所谓的新杭大，还是真杭大吗？

如果新杭大校园还不包括西溪校区，或者西溪校区被改变教学用途，那老杭大不仅是家破人亡，而且是被挖了祖坟，呜呼哀哉。

套用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里的话：“To be or not to be, it's a question”，可以写成：杭大是重生，还是消失，是个永远值得浙江人思考的话题。

我还是坚持认为，如果不可以与他俩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如果没囊括西溪校园，那重生不如怀念吧！

否则，即使再生，也是对老杭大的否定与失敬。

## 九、剧终

我青春时的新闻情怀，由于个人能力不够等原因早已支离破碎。我这个曾经的《杭大学生报》记者团团长在基层平平庸庸、毫无建树。1993年辗转去意大利做了几年苦力，成了杭大毕业生去那里做苦力的第一人。与文成山区农民同吃同住，还要因粗活干不过他们受到嘲笑。端盘洗碗切菜受伤挨训失业……知道了什么叫“吃不着苦的苦，比吃苦的苦还要苦”，际遇堪比《芳华》中的刘峰在海南骑三轮车吧（当然他的道德境界比我高很多啦）。这就是命，认命吧，我一直这么安慰自己。

回来后，出版了一本小小的意大利语学习书籍《新编实用意大利语》。我立马厚着脸皮想到给母校图书馆赠寄了两本，扉页上写着：

杭大，  
少年时，你是我的梦；  
青年时，你是我的家；  
中年时，你是我的魂。

这是差生的薄礼上贡，也是游子的喃喃自语。

杭大校园已经物非人非，一代人的芳华已经逝去，最年轻的杭大也已人到中年。虽然，无论是聚会还是微信群上，校友们谈笑如故，可还是不难看出岁月给每个人带来的巨大改变。我们都不想看到我们老去的样子，就让拙文，留住我们曾经的芬芳年华吧！

（2018年5月1日前夕初稿，2020年8月25日修订）

[返回目录](#)



# “杭大”在哪里？

——题杭大人出版社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施建基

杭大在哪里？在杭大路标里。宝石山下，黄龙一脉，文教胜地。

杭大在哪里？在杭大新村里。道古桥边，历史街区，年轮刻记。

杭大在哪里？在杭大民宿里。古刹钟声，径山深处，心有成蹊。

杭大在哪里？在西溪校园里。求是育英，千钧校训，百年桃李。

杭大在哪里？在万人履历里。饱经岁月，遍走四海，徽证如一。

杭大在哪里？在微信电波里。五洲同频，日夜泉涌，永不消逝。

杭大在哪里？在光影绘画里。青葱翠莲，冰天烈焰，长情醉忆。

杭大在哪里？在心里，在梦里，在眼里，在远方和诗里……



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1-970152-38-8